# 再生中国

● 李 艳

#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上

中共党史出版社

# 再 生 中 国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上)

李 艳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年·北京

# 再 生 中 国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下)

熊 志 勇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年·北京

责任编辑：春　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李　艳　熊志勇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3

ISBN 7-80136-181-4

Ⅰ.再…　Ⅱ.①李…②熊…　Ⅲ.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历史　Ⅳ.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334 号

**再 生 中 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李　艳　熊志勇　编著**

**出版发行**：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北门)

电话：(010)62881570　传真：(010)628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市社科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23.5 印张　530 千字

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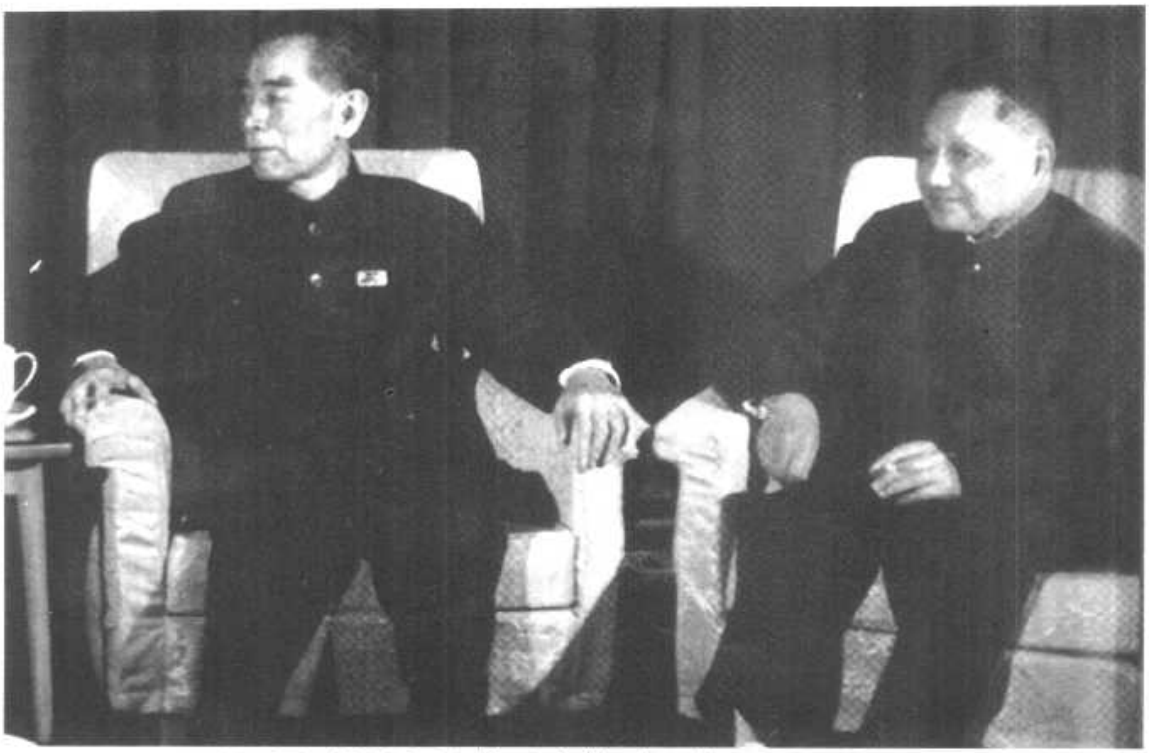
印　数：20000 册

ISBN　7-80136-181-4/K・156

定　价：44.80 元(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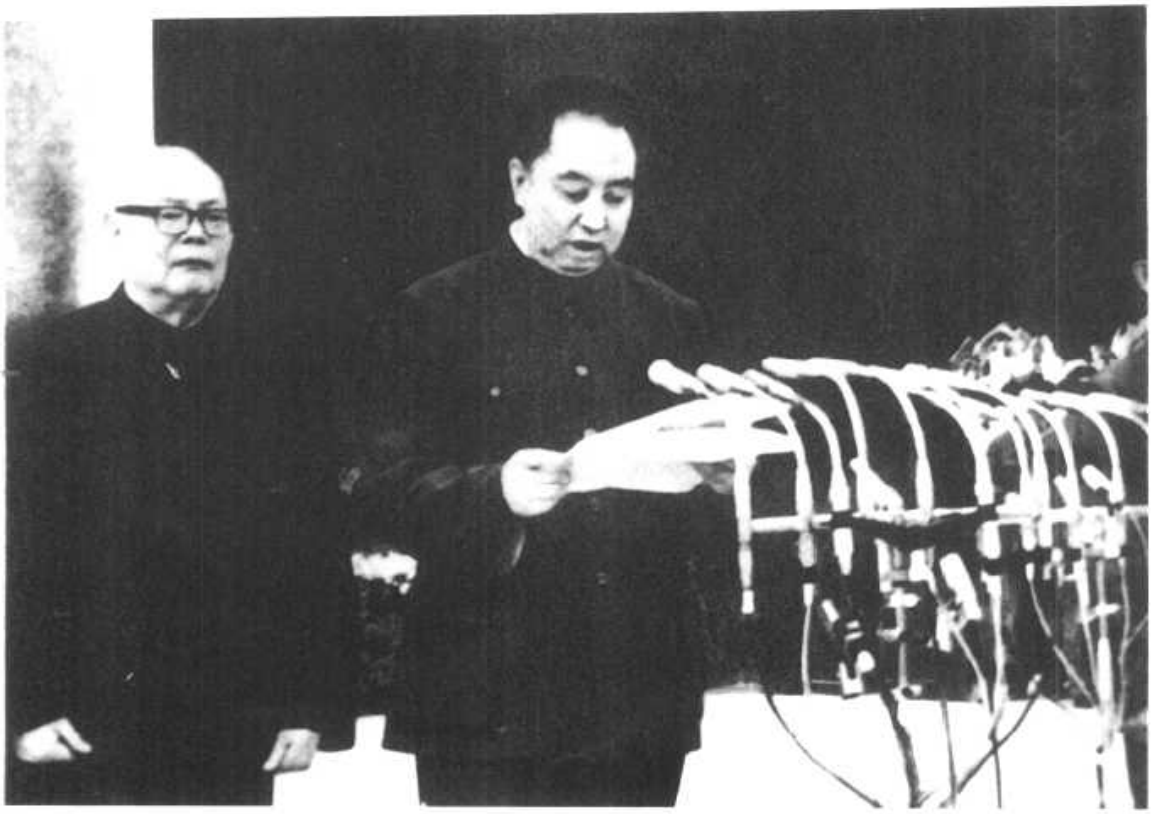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康生授意下写出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工作，开始对全国进行全面整顿。图为周恩来在医院会见邓小平。

1975年11月，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在周恩来逝世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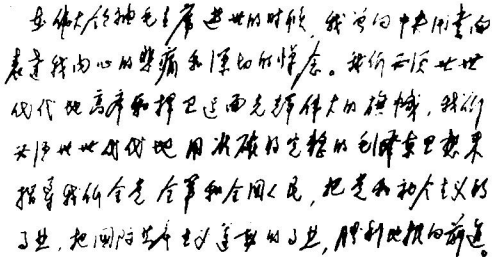
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

学好文件抓住纲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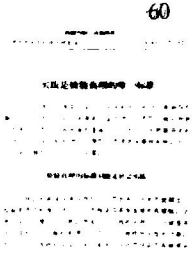
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信，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声。图为部分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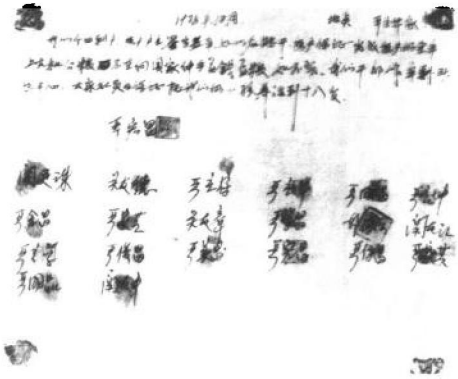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在主席台上。

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举行，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是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图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在主席台上。


60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锋芒直指“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农民在秋种遇到干旱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风险，自发实行了一包到底的责任制。图为小岗生产队社员签订的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6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召开中央机关干部大会，胡耀邦在大会上作《中央机关要作全国的表率》的讲话。

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出访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对美国的访问。图为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阳台上。

1989年11月，邓小平同江泽民亲切握手。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视察。

谨 以 本 书

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二十周年！

献给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

作出贡献的人们！

**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党校国情国策研究中心

**编　　著** 李　艳

**总 策 划** 孙启泰

# 前　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斗转星移，桑田沧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冰雪消融，人面桃花。

时光飞逝，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使用率极高的术语，已经成为我们人民共和国自身历史嬗变的一个象征。尽管在当时，谁也没想到，1978 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竟是如此重大——它成为新旧时代转换的一个标志，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史上一座伟大的里程碑。

岁月如歌。“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如歌的岁月，依旧化不开、反而加重了我们那种心系 1978 年的浓浓的情结，于是，我们提起了笔，为着不能忘却的纪念，为着回顾历史的经验，更为着面向未来的使命。

之所以如此，还因为二十年的光阴已不算太短，面对光荣与梦想，我们所说、所做已经很多很多。而回首往事，我们所思、所写也可以多一些厚重，少一些明晦，对这段极其重要而难忘的历史，作出客观地透视、理性地沉思、真实地再现。

新旧时代转换的镜头最先定格在1976年。当毛泽东溘然长逝,遗留下的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念与"天下大乱"而未能实现大治局面的现实。在二十七岁的社会主义中国,人们祈盼着毛泽东后时代的合格领路人。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华国锋来了,揣着"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证书,罩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光环,但实践证明,他只是毛泽东的寄托,而不是历史的选择。在理应"改天换地"的历史关头,华国锋没有表现出必须的勇气、智慧与能力……

"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两个凡是"诞生了。但实践证明,它只是执迷不悟的遮羞布,而不是拨正航向的引路灯。在本该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两个凡是"再陷人们的思想于囹圄,真理依旧错位,灵魂依旧放逐。

大批"极右"、向洋"跃进",一边是指鹿为马,一边是海市蜃楼,亟须抚平创伤、伟业中兴的中国,又在徘徊不前的蹒跚中浪费着大好光阴。

难道东方的雄狮还要继续酣睡?

难道蔚蓝的地球真要遗忘文明古国?

堂堂中央之国面临着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再生与振兴!

十年噩梦毕竟警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中国落后了的警醒,对"左"倾泥沼的警醒,引发了奋进的激情和艰苦的斗争。终于,几度沉浮的邓小平再次复出了,现代速信与徘徊不前的丧钟震耳欲聋地敲响了。

是人民选择了邓小平,是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是中华民族选择了邓小平。

"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曾经把1975年的中国导演为改革试验田的邓小平，在漫步“邓小平小道”、“以观后效”的等待与思索中，早已把握了中国龙的时代脉搏，悬壶济世、高瞻远瞩。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春雷响过，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延续着久已在地下奔突运行的博大喧响，山呼海啸般地席卷神州大地。

从此，思想不再冻结，迷信难再盛行。

从此，天开云散，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从此，月明风清，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一个伟大的转折不可遏止地到来了！又一个“遵义会议”，转折在北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改变了沿袭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得到实际上的确立。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由此，邓小平理论逐渐被全党所认同并最终写到了党的旗帜上，改革开放成为其最鲜明的特征；

由此，中华民族被置于一个亘古未有的全新的坐标系中，中国土地上衍生出了一些千百年来不曾有过的东西。

于是，“包”字来到山水间，它将横扫贫穷褴褛，带来脱贫希冀。咬破手指、立下血书的18个小岗人，不仅没有“哪个因大包干进大牢”，反而成为诱发一场深刻的全面改革——“第二次革命”的新契机。

于是，落实政策，廓清冤案迷雾，还我朗朗乾坤。彭德怀并不“反党”，刘少奇也不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一次又一次迟到的追悼大会在召开，一位又一位英烈的骨灰被放归祭坛，一批又一批的无辜者被解放出监狱、“牛棚”。

于是，中国的南海边演绎“春天的故事”，开启夜郎门户，走向五洋浩淼。小渔村深圳撕开对外开放的第一道口子，“经济特区”沿着它所杀出的“一条血路”，大踏步地“向内地进军”，中国融入了世界，世界融进了中国。

于是，有了巨人对巨人的评说，决议伟人历史，解开“历史难题”。是“非神化”，不是“非毛化”，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永放光辉。

于是，“两案”的审判台庄严搭起，还历史以真实，还正义以尊严，还人民以公道。

……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中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中国充满了昌盛与富裕，中国充满了光荣与梦想。

或言，没有对过去狂热与迷离的幻灭，便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转折；“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是为再生。

我们满怀激情，试图讲好这个“再生中国”的故事。

业未央，路正长。而今，我们的国家与人民，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作跨世纪之旅。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人民将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我们的国家将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让我们把历史的箴言装进信心的行囊，向着二十一世纪，昂首前进！

作　者

1998年1月于劲松

# 引　言

流水江作浪，行云林含风。

天道中兴，大兆于前。

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历史性地起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它的奠基礼是在三年以前，三年以前的动荡岁月中所举行的——

从1975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一段时间，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即酝酿阶段，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后来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先声。从一定意义上讲，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实际上就开始走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因此，讲改革开放，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不能不讲1975年的全面整顿。

岁月沉沉，歌声起兮云飞扬……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 目　录

一、邓小平在 1975 …… 1

等待。

等待了许久、思考了许久的邓小平，“升帐”主政中国。

全面整顿、全党要讲大局。急急如律令。

“先锋官”万里往返冲杀于万里铁道线……

“中军官”胡耀邦活跃呐喊在中国科学院……

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挽言“不知有汉，遑论魏晋”。

1975 年的中国，风云突变，幻化无常。

1—1　邓小平发出全面整顿令
万里勇当“开路先锋官”…… 1

1—2　钢铁工业闻风而动
农业战线风雷激荡 …… 25

1—3　人民子弟兵提防野心家
教育革命“老九不要走” …… 35

1—4　评《水浒》宋江架空了晁盖
反“右倾”桃花源人再下沉 …… 60

二、龙年惊变：1976 年的中国 …… 74

龙，中国人的图腾。

龙年，主凶，主吉？

9 月大悲，10 月大喜。

9月9日，毛泽东撒手人寰，举国痛悲；

10月6日，“四人帮”束手伏擒，举国皆欢。

悲也天安门，喜也天安门。

华国锋成了中国党、政、军的最高领袖，这是华国锋时代的开始，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

2—1　“你办事，我放心”
政坛“黑马”华国锋 …… 74

2—2　“过去”与“既定”区分正邪
以快打慢“四人帮”伏法 …… 92

2—3　举国揭批“四人帮”
广场兴建纪念堂 …… 109

**三、华国锋徘徊在1977** …… 126

“萧规曹随”，如临深渊。

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思想到行为。

“毛主席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

于是，人们惊呼：“大跃进”又来了！

于是，邓小平仍要虎踞笼中、“以观后效”！

但人心不容被复制，跨越冰山，邓小平从容走来。

似春风徐来，一代学子走进了大学的宫殿。

3—1　两大问题如芒在背
“两个凡是”赫然出笼 …… 127

3—2　华国锋主导三月会议
邓小平复出三中全会 …… 134

3—3　华国锋制造新崇拜
神州发起“洋跃进” …… 141

3—4　迷雾中波起澜兴

邓小平自告奋勇…… 159
3—5　分歧战未见分晓
十一大使命未酬…… 173
**四、讨论真理标准的 1978** …… 180
血，在流淌。
张志新、遇罗克、“四五”烈士……的血，融入思想解放的历史长河，激活了一滩死水，徘徊的中国掀起波澜。
死水——“两个凡是”的一滩死水。
波澜——真理标准讨论掀起的波澜。
4—1　遇罗克葬身《出身论》
张志新问天“谁之罪”…… 180
4—2　九死一生献国策
四五运动起狂飙…… 196
4—3　邓小平吹响号角
理论界率先发动…… 210
4—4　真理标准只一个
左倾禁锢万千重…… 238
4—5　邓小平支持一下
罗瑞卿临终冲刺…… 252
4—6　宋平表态应四方
人民思想大解放…… 269
4—7　《中国青年》高手布旧
“谭老板”好文迎新…… 294
**五、伟大的里程碑，矗立在 1978** …… 302
薄一波等 61 人是“叛徒”吗？
案牍如山，冤案、假案、错案。

谁对了？邓小平举荐胡耀邦，“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谁错了？华国锋作了检讨，“两个凡是”终被抛弃。

36+5，是一个充满艰辛的终点，又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从此，举国一致：“三中全会以来……”

5—1　冤案一理
人心大喜…… 302

5—2　政协工青妇
一切要正常…… 318

5—3　话问题解放思想
谈建设实事求是…… 334

5—4　新时期的新纪元
划时代的里程碑…… 360

# 目　录

六、包产到户：一场饥饿引发的深刻变革 …… 373

改革的大潮首先从农村涌起。

农民要种田，种田是要吃饱饭，这是最简单的道理。然而在70年代末的中国，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的话意味深长："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万里一马当先，举起农村改革大旗。

小岗分田，石破天惊，拉开了一道不可遏制的变革突破口。

邓小平给包产到户"落"了户。

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沉睡多年的神州大地。

6—1　万里主政安徽推出《六条》
小平点拨四川放宽政策…… 374

6—2　借地度荒　包产到户
永贵责难　万赵力争…… 385

6—3　小岗分田石破天惊
张浩来信乍暖还寒…… 395

6—4　江淮大地"包产到户"一波三折
天府之国"休养生息"成效显著…… 410

6—5　包产到户"落户"

人民公社摘牌…… 420

七、1979:万象更新 …… 43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新纪元，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从此展现在世界面前。

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艰难而又恢宏。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必然导致民族精神的高扬。从思想文化观念、内政外交经济，到生产工具、起居饮食，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而这场变革的艰辛，更表现在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对新生事物的阻挠和压制。

伴着凤阳花鼓那个催春的鼓点，1979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色彩纷呈，高潮迭起；当五星红旗在白宫升起，中美两个曾经敌对隔绝近 30 年的大国握手言和之际，一个划时代的举措又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大格局……

7—1　邓公访美五星红旗升白宫
自卫还击八一军旗挥越南…… 434

7—2　红星事件轰动全国
八字方针跃进止步…… 470

7—3　一条血路创特区
一桌火锅唱大戏…… 482

7—4　“四类分子”摘帽
“三家村”人平反…… 514

7—5　小平南巡清除“凡是”
叶帅讲话柳暗花明…… 530

八、1980:政坛风云激荡 …… 544

1980 年的中国政坛，随着历史的转折显现出深刻的变革。共和国第一冤案平反昭雪，否定“文化大革命”顺理成章。

历史转折的惊涛骇浪，对每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

华国锋难当重任，邓小平运筹帷幄，众元老鼎力配合。

胡耀邦、赵紫阳党政挂印。

政治局人事变动。

8—1　冒风险为少奇平反

除障碍"凡是者"辞职…… 544

8—2　追悼少奇庄严隆重

取消"四大"异口同声…… 559

8—3　入主国务院新总理亮相

解除职务"永贵大叔"赋闲…… 575

8—4　华国锋职务变动

胡耀邦升任主席…… 593

**九、拨乱反正完成在 1981** …… 609

伴随新年钟声的敲响，龙的传人又迎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好年头。

现实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历史在曲折中完成了交替。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高瞻远瞩、深思熟虑，这是巨人评说巨人的襟怀与风格。

公开审判"两案"与正确评价毛泽东，"两难选择"事关全局，拨乱反正系于一体。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邓小平的睿智与魄力，让人们切身感受到了大转折中"掌舵"的深刻含义。

"两把钥匙"拨开迷雾，六十华诞继往开来。1981 年的中国，终于跨过了那道高高的历史门槛……

9—1　"非神化"邓小平把关三要点

写决议胡乔木慎执一支笔…… 609
9—2　办"两案"彭真挂帅
破禁区审判公开…… 635
9—3　答法拉奇邓小平明辨是非
大讨论四千人统一认识…… 657
9—4　结审判举世瞩目
惩主犯人心大快…… 671
9—5　华国锋称病不出户
邓小平睿智定乾坤…… 694
9—6　两把钥匙启大幕
拨乱反正开新宇…… 705

后　记…… 721

# 一、邓小平在1975

等待。

等待了许久、思考了许久的邓小平，“升帐”主政中国。

全面整顿，全党要讲大局。急急如律令。

“先锋官”万里往返冲杀于万里铁道线……

“中军官”胡耀邦活跃呐喊在中国科学院……

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言“不知有汉，遑论魏晋”。

1975年的中国，风云突变，幻化无常。

## 1—1 邓小平发出全面整顿令 万里勇当“开路先锋官”

“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

“等待。”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两位世纪伟人的对话。

问话的是毛泽东，回答者是邓小平。

这是只因毛泽东才成其为一种问话的问话，这是只有邓小平才有的一种回答。

"文化大革命"之初,邓小平被错误地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放江西。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步兵学校,工作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厂校两地之间的田间踏出了一条坚实的"邓小平小道"。

"等待"。在这条坎坷的小道上,邓小平走了三年,思考了三年。正是在这三年的思考中,使邓小平率先达到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也正是这种思考的深度和等待的高超艺术,酝酿和造就着二十世纪中国"世纪伟人"邓小平。有人说,中国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就是从这条小道延伸出来的。芬兰政府首相曾这样说:"我们芬兰语中有个特别的词汇:忍耐。含意是拥有崇高的信仰,对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信心。这个忍耐与信仰便是邓小平的财产。"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一线阳光穿云而出,笼罩中国大地上空的"左倾浓雾",被撕裂出一条光明的缝隙。

1972 年 1 月 10 日下午,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有所转变。在场的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随即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信息传出去,以制造舆论,为正在江西的邓小平复出创造条件。

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邓小平很好地抓住了历史机遇,迅速地做出了恰当的反应。1972 年 8 月 3 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批判了林彪的罪行,并作了一些自我分析。同时恳切表示,希望能为党和国家再做几年工作。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很快作出反应。8 月 14 日,老人家写下

这样一段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过去我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8月15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批示的全部内容，同时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活动，让他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从而为解放邓小平作了准备。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了离开三年多的北京。

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并通知全党。

8月，在党的十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开始协助周恩来领导国民经济工作。

12月14日、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扬邓小平：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吧，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974年，中国高层政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筹备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话题转到邓小平身上。“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politics在英语中是“政治”的意思，周恩来当然懂。“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王洪文十分尴尬，也很紧张。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地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材难”三个字。周恩来说：“人材难得”。

毛泽东的话，决定了邓小平在1975年的地位与作用。

“等待”。西方人似乎也读懂了邓小平，对“等待”作出了非常合适的诠释——“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会议增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由于党和人民的斗争，也由于毛泽东态度的某种变化，“四人帮”“反周组阁”的阴谋遭到了失败。大会选举朱德为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不仅如此，大会还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这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第9个年头，邓小平复出主政中国。

“受命于危难之中”，此时接手主政的邓小平，面对的是一个严重滑坡的国民经济形势。

1974年全年统计表明，工农业生产总值仅比1973年增长1.4%，只完成了计划的95·6%，除粮食增长较多外，其他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所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与此同时，“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还在继续着全国形势的严重混乱；“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有所松动的政治局势依然十分严峻。

然天降大任于斯人。面对棘手的形势，邓小平决意进行全面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实，这就是3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邓小平后来自己就这样讲过：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也在1975年试验过一段时间，只不过当时的名称叫做“整顿”。

>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
>
>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在1975年3月的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上，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要把握发展国民经济这一大局的问题。他批评了只敢

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的倾向："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他没有侈谈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类的套话，而是客观地分析了形势，实事求是地告诉与会者：

> 目前的生产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609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

在全面整顿期间，邓小平反复强调了这个大局观："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不无焦虑地说，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这次会前的一个插曲，反映出此时邓小平这种不能等的心情是多么的急切与坚决。当省委书记们争相与他握手时，他突然一摆手，严肃地说：不握手了，现在工业形势很不好，等你们工作搞上去再握手吧。

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同"四人帮"作斗争的那个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毛泽东这时提出了三条指示，被邓小平机敏地抓住了契机，以此作为号令全国、全面整顿的纲领。7月4日，他在中央读书班第

四期学员会上谈话时，更鲜明地指出：

>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的精神，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

9月10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研室7位负责人谈话，强调要全面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批评现在的宣传（即"四人帮"控制的宣传）有很大的片面性。要求政研室要抓紧写文章。这次谈话触发了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想要写一篇全面论述和宣传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的文章。过后几天，他又读到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全面整顿的任务。胡乔木感到为全面整顿作思想理论准备，也很需要写这样一篇文章。

9月18日，胡乔木即找邓力群指出，文章的主题是全面宣传三项指示，集中精力进行全面整顿，促成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9月19日，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拟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打算。邓小平表示赞成，要他们抓紧写出来，并说：如果文章写得好，可以约几位副总理研究一下，送毛主席审阅同意后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9月20日，胡乔木把邓小平的意见向邓力群和政研室其他负责人作了传达。

邓力群立即找人一起动手，把1975年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文件、邓小平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收集起来加以研究，还请有关单位的同志就贯彻执行三项指示的情况和文章的写法开了两

次座谈会。拟就提纲后由4人分两组并行作业各写出一份草稿。邓力群看了这两份稿子，都不满意，决定重写。由邓力群口授，题目也由邓力群确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

《论总纲》这篇文稿相当集中地阐发了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的思想，它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三项指示作为实现四化的纲领，并对其中每一项指示赋予新的含义，尽量作了较为正确的解释。全面阐述了进行全面整顿，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尖锐地揭露了"四人帮"，既有深刻的说服力和强烈的号召力，又有尖锐的批判性和战斗性。

文稿首先指出，毛主席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在当前，必须"用这个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整顿是重点"。

文稿指出：

> 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

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文稿指出，当前斗争的特点是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总是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文章回顾了历史上的实例后进而指出：

>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文稿提出，检验学习理论成绩好坏、大小的"唯一标志"是："就看我们在应用中，是否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文中引经据典，毫不含糊地提出：

>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文稿批驳了那种鼓吹“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就搞上去了”的错误观点:

>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力气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文稿总结、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4个要点:我们的干部既要学会搞阶级斗争,也要学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用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其核心是责任制,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各级领导要做到生产、生活同时抓,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这篇文稿集中地概括了整顿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工作作风,探索了当时的中国怎样摆脱动乱局面,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路径,称得上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政治纲领。虽然没能公开发表,但文稿的精神实际上已经贯彻到整顿工作中去了。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论总纲》被批判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姚文元对该文写了47处批语。按照“四人帮”定的调子,《论总纲》被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571工程纪要的翻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大毒草”。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稿虽然阐述的是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思想,但邓小平当时并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后来,他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确实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

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号召,邓小平拉开了全

面整顿的帷幕。

万事开头难。全面整顿从哪里下手？邓小平把突破口选择在铁路系统。

铁路运输，被人们喻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如果大动脉出了毛病，那么东西南北中各处各地，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要受到严重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铁路运输受到了严重冲击，问题严重。1974年，“批林批孔”以后，许多路局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主要干线严重堵塞。全年运输减产5.3%，货运量比上年下降12%。铁路运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薄弱环节，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整顿、发展就无望。邓小平选择整顿铁路作为突破口，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也充满风险。这步棋下好了，会带动全盘活起来；下不好，后果则难以预料。

担负“开路先锋”重任的铁道部部长，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万里，他是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刚刚被任命的“新官”。

1975年1月28日，万里刚刚上任10天，邓小平就召见万里听取情况汇报。

邓小平说：“你了解的情况怎么样？谈一谈。”

深知重任在肩的万里，已迅速进入了角色。他扼要地汇报了目前铁路的严重情况，指出：现在突出的问题，一是运输生产下降。“文化大革命”以来，全路职工总数和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都有所增加，可是运输生产不但没有随着增加，反而大幅度下降。1965年平均日装车5万辆左右。现在只有4万辆左右（有时只有3万多辆），减少了1/5，按实际能力，应达到6万辆左右。二是事故惊人。1965年全年发生重大事故和大事故88起，1974年多达750多起。三是机车车辆损坏严重，全路机车完好率只有60%，大部分机车不能按期维修，不少机车是带病作业。四是一些铁路枢纽、重点站

段,经常发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运行。特别是徐州、郑州大铁路枢纽,堵塞更为严重,影响大部分铁路干线不能正常运行……经初步了解,徐州的问题,主要是派性严重,这是涉及到铁路与地方的关系,也是个体制问题。铁路运输生产问题十分严重,不过我看只要江苏省委态度明朗,问题就不太难解决。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当即指示:第一,关于体制问题,应当实行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第二,关于干部管理,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第三,关于运输生产,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过去我们的正点率一直是很好的,在全世界都数得着,现在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能行?

万里表示:铁路问题复杂,不仅仅有体制问题,恐怕派性是个更重要的问题,解决铁路问题难度较大,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问题。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

9天之后的2月6日晚上,邓小平和副总理纪登奎、王震等再次召见万里,在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铁路面貌。他指示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并要求文件中要写清楚有关方针政策,不要写成业务性的;文字不要太多,文章不要太长,关键的东西要写明白。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万里会同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组织人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当文件初稿完成送他审阅时,在"所有铁路职工,都要做好本职工作,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

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对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表现好的职工和单位，要给予表扬。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评教育”之后，他亲笔加上了这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这段话的要害是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并向它宣战。

很快，文件草稿送中央政治局讨论。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遇到阻力就通过了。之后，报毛泽东审定。很快，毛泽东也“圈阅”了。1975年3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下发到县、团级。这就是有名的“中发[1975]9号”文件。

9号文件的特点是，解决铁路问题旗帜鲜明，态度坚定，措施具体有力。文件开宗明义指出：铁路运输当前仍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文件下发后，人们把它概括为“一个突出，两个不适应”）。

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文件作出了五条决定，主要是：

——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落实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重申：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

——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继续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各铁路单位的政治运动和地区性的社会活动，仍由有关省、市、自治区统一部署。对于当前极少数问题较多，严重影响全国铁路运输的单

位，有关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限期加以解决，不能再拖。铁路部门要更好地依靠地方党委，牢固树立与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搞好同沿线群众的关系。

——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要发动群众，首先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健全起来。这些制度，是必须的，没有不行，有了不执行是不允许的。

——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做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铁路运输是否畅通，关系到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战备的全局。对于一切破坏活动，都要严惩。各地党委要认真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历史证明：9号文件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在1975年铁路整顿过程中发挥了纲领性作用，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整顿中也发挥了指导性作用。

在9号文件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

“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邓小平在讲了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后，着重谈了反对派性问题。他严厉地指出：

> 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是不行的。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

穷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

如何处理闹派性的头头？邓小平指出，办法就是"从原单位调开"，"调动后又钻出个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发工资。你的'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

邓小平最后说，他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他要求铁路部门3月份进行深入的动员，包括职工家属和沿线农民，真正做到家喻户晓。

一个文件，一个讲话，全面整顿的第一战打响了。

"尚方宝剑"在手的万里，大张旗鼓地"放火烧荒"，东讨西伐，南征北战。从3月5日开始，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传达9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联系实际，分析形势，研究部署整顿铁路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召开全路电话会议和部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以最快的速度，传达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各单位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制定落实措施；向问题严重的单位如徐州、郑州等路局和工厂派出工作组。

万里在会议上强调，要把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他响亮地提出：

"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

"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3月6日，即9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万里就派铁道部党的临

时小组成员李新率工作组去了徐州。

3月9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刚一结束,万里带着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会同江苏省委负责人亲赴徐州。

徐州,地处黄淮平原,不说其历来为兵家所必争的重要战略地位,仅从交通的角度看,徐州即是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点,扼中国东部、贯穿南北和东西的咽喉。

设在徐州的铁路分局,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灾区。造反、夺权,反反复复中,运输生产自然受到了严重破坏。特别是在复杂的领导体制下,更加剧了其混乱局面的发展与持续。徐州分局属济南铁路局管辖,而它又处于江苏省徐州市,分局的下属站段则分布在山东、安徽、江苏。一个分局要同三个省的地方打交道,于是,从铁路系统的内部到三省地方,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愈益复杂、混乱。

万里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赶到徐州,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央的指示直接向群众宣传。

3月10日,召开了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参加的传达9号文件万人动员大会;

3月11日,召开了徐州市、徐州地区党员动员大会;

3月13日,召开了分局机务段全体职工确保铁路畅通誓师大会。

在各种场合,万里反复地宣讲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一再强调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迅速改变局面,把铁路运输搞上去,并限期在3月底之前解决问题。万里利用各种机会,旗帜鲜明地批判派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徐州的问题,主要是派性严重。对少数带头闹派性的头头,要"一批二撤三调离",也就是说一要进行严厉批判,二要撤掉领导职务,三要调离原单位。对于不服从调动者,停发工资。对于顽固不化,继续闹派性,触犯刑律的要绳

之以法。

很快，整个徐州分局出现了一个学习、宣传中央9号文件的群众运动。一次，万里问一位家属委员会的委员："知道9号文件吗？"她说："我们都听传达了。"这位妇女把文件的基本内容讲述了一遍后说："这是毛主席圈阅了的文件，要我们家属都知道，我们还能不积极行动吗？"

在形成强烈的舆论氛围的同时，万里重点抓了分局领导班子的整顿。他主持召开了分局党委常委会议，逐个地听取了常委的汇报和自我批评。

分局党委书记栾永之在检查中，发自内心地说："我是持'支派'观点的，对两派群众有亲有疏。看到两派闹得厉害，影响工作，心里很不安。但觉得两派都得罪不起，就遇到矛盾绕着走，尽管谁也不得罪。核心的一点是怕说我摆老资格，再次被当作走资派打倒。我的自由主义严重。"

分管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位党委常委，在检查中承认自己派性严重，支一派压一派，在吐故纳新中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走后门，把闹派性的头头纳进了党内。

有的常委说："派性的危害实在太大了"；有的说，过去是"划不完的线，站不完的队，作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现在一定要按中央指示，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搞好安定团结，把运输生产搞上去。

在常委发言时，万里不时插话，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或批评。会议结束时，他又作了重要发言，肯定会议开得比较好，"大家结合实际学习了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学习了中央9号文件，揭露批判了派性，认真地开展了自我批评，有的同志做了检查，为全局改变面貌带了个好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强调指出："中央9号文

件给你们指明了方向，上级领导给你们承担了责任，现在要求你们挺起腰杆，批判派性，加强党性，带领各级干部和全体职工，在3月底以前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他希望徐州分局迅速变后进为先进，在全国铁路系统中带好头。

在全市形成围剿派性的气候下，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威吓群众的造反派坏头头顾炳华被抓了起来。此举震动了徐州，人心大快。

乘着形势好转的时机，万里要求徐州分局党委抓紧时间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徐州市搞出了众多的“阶级敌人”，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统计，仅在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运动中，就抓出了6000多人，加上株连，受牵连的达数万人。试想，一个徐州市成年人才有多少？这么高的“阶级敌人”比例，怎么能不引起万里的震惊。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制造了大批冤案，那怎么能安定团结，怎么能调动积极因素进行生产？”与此同时，万里还坦率地承担了领导责任，“我也要承担责任。”

万里和风细雨的教育及主动地承担责任，减轻了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思想压力，消除了落实政策、平反冤案的阻力，整个分局的平反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受冤的得到洗雪，批错的得到改正，人们从心底里拥护中央9号文件，焕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

批判派性，抓坏头头，平反冤案，仅仅10天，昏天黑地的徐州初见晴日。阻塞严重的津浦、陇海两大干线在徐州枢纽实现了畅通，长期欠产的运输计划4月份提前3天完成。“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不再仅仅是口号，更成为实践与行动。据万里后来说，徐州问题解决之快，是他始料未及的。

首战徐州告捷，朝野震动。

3月22日，万里回到北京之后，立即向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国务院领导听后感到很满意，决定要万里在国务院全体会上讲讲。

3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张春桥、纪登奎、王震、谷牧、陈锡联等国务院领导人以及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办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他说：今天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听取铁道部长万里关于传达贯彻中央9号文件，解决徐州问题的情况汇报。

万里在会上介绍了解决徐州问题的一些做法和体会，概括为几点：

一、要广泛深入宣传贯彻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联系本单位实际解决问题；

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坚决同派性进行斗争；

三、整顿好领导班子，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四、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特别是清查“五·一六”的政策，正确对待老干部、老工人和科技人员；

五、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与会各部门的领导人听了万里的介绍，普遍表示要向铁道部学习。在场的纪登奎、陈锡联、王震、谷牧等人对万里的汇报，予以充分肯定和赞扬，同时指出：目前还是刚刚开始，不能满足现状。不要“雨过地皮湿”，不要轰一阵子又过去了。要继续努力，把铁路部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的问题，运输生产建设上的问题，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最后，邓小平总结说：中央9号文件下去之后，铁路运输迅速好转，对各行各业都有很大影响和推动。他们的主要经验，就是只要放手发动群众，同派性进行坚决斗争，生产就能搞上去。铁道部

门这方面做得很突出，徐州的经验比较典型。这些经验值得大家很好学习。铁路部门也要开个会，检查一个9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总结一下经验。对那些闹派性的单位，不能再等待下去，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限期解决。

3月28日，铁道部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万里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报告中全面分析了铁路系统贯彻中央9号文件以来的形势，对以后工作讲了十点意见，主要之点还是强调要反对派性，狠抓领导班子建设，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关心群众生活，尊重地方党委的领导。

万里最后指出："贯彻落实中央9号文件是一场斗争。我们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艰巨性要有足够的认识。斗争可能有反复，但我们不怕。"

万里的话并非危言耸听，事实确实如此。

1975年铁路整顿的重点和难点是"两州"。一个徐州，另一个就是郑州。如果说徐州整顿见效之快出乎意料的话，那么，郑州整顿之难、之热闹也颇为出人意料。

郑州地处中原腹地，是京广、陇海两大铁路的交汇点，是全国铁路的心脏和枢纽。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的火车经郑州通向四面八方，这里是否畅通，对全国铁路运输影响极大。

郑州的问题和徐州类似，但比徐州更厉害。派头头掌权，地方省委领导人纵容、支持，有时连铁道部的运输调度命令也不执行，多次造成人为的运输严重堵塞，甚至不择手段地把国家拨给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过路物资随意扣留下来，归为己有。问题最为突出的新乡分局，大权掌握在以邢介江为首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手里。邢介江造反起家，官居高位后，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拉帮结派、无恶不作，已然是新乡一霸。

4月中旬，万里一到郑州，同该局主要领导人交换了意见，要求他们认真贯彻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用最快速度，采取最有力措施，迅速改变面貌。但是，派性作祟的郑州局领导人阳奉阴违，拖延不动。到5月份，全国20多个铁路局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只有郑州一个局没有完成任务，与全路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个老虎屁股，部里领导人不来摸谁敢摸。”6月初，万里携同李新二赴郑州局，决心实行“外科手术”，摸一摸“老虎”屁股。根据铁道部调查组关于新乡铁路分局的调查和群众的反映，万里和李新研究就先从这里下手。

6月2日，新乡分局召开党委常委会，研究解决邢介江的问题，决定从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6月3日，他们在新乡分局广场上，召开了一个有8000多人参加的职工大会。万里在会上发表了讲话，郑重宣布：撤销邢介江在新乡分局的一切领导职务，令其检查。

这次大会对那些闹派性的派头头，是个有力的打击，受到了广大群众热烈欢迎。

新乡分局问题的解决，揭开了彻底解决郑州局问题的序幕，郑州局和河南省的一些人感到了釜底抽薪的危机。双方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激化和表面化了。

6月4日到9日，在万里亲自参与主持下，郑州局连续召开了几次党委会，会上围绕新乡铁路分局与郑州铁路局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斗争。

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与万里同是冀鲁豫解放区出来的干部，过去就认识。此刻，面对万里的批评整顿，他坐井观天地认为郑州局的工作方向是对的，路线是正确的，形势是大好的。徐州的经验不适合郑州，万里对郑州局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是错误的。他气汹汹地质问：邢介江应该由铁道部处理，还是由地方处理？

造反起家、官至河南省委书记的“唐师傅”唐岐山等人，表示积极支持路局党委书记的意见，根本不承认自己有派性、有错误。相反，正如万里所说，“中央9号文件下来已经3个月了，可是郑州局领导人有的不但不承认自己有派性甚至认为郑州局的不安定、不团结，责任在铁道部。”有人还给万里贴大字报，说万里来铁道部“尽搞不安定不团结”。

另一方面，党委常委、第二书记苏华，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胡逸平等人则认为郑州局是派性掌权，问题严重，并对唐岐山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

万里好言相劝老相识：“我们是老伙计了，意见提尖锐是为了帮助你嘛！”不想这位老相识满脸的阶级斗争，根本听不进去：“路线斗争，还有什么老伙计不老伙计的！”

两种不同意见针锋相对，已经到了僵持不下的地步。但问题必须要解决，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拖下去了。

显然，郑州的问题关键在领导班子。怎么办？一批二调。万里和李新提出了调整郑州局领导班子的方案，征得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人的同意，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二位副总理表示同意。

6月10日，郑州局召开机关干部会议，万里在会上着重分析了郑州局运输生产上不去是因为不安定、不团结，是派性在干扰，是坏人在捣乱。他说：“郑州局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问题如此严重，久拖不行，不能再等待下去了，必须从组织上采取措施，对郑州局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他在会上宣布：

免去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在郑州局的一切领导职务，调离开郑州铁路局，由河南省和中央组织部另行安排工作；由苏华同志代理郑州铁路局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主持党委工作；由胡逸平同志负责郑州铁路局革委会工作。

郑州局的班子虽然进行调整，但是唐岐山等人不服。在省委主要领导人的纵容支持下，唐岐山等人串连一些派头头进行干扰和破坏，多次向中央告状。

7月24日下午，李先念、华国锋、吴德等中央领导人在京西宾馆接见了郑州局的主要领导人唐岐山、苏华、胡逸平等，万里、刘建勋参加。会上唐岐山等人认为，郑州局的大方向是对头的，路线是正确的，领导班子是好的，铁道部领导人对郑州局的分析是错误的。解决郑州局领导班子的做法是打击新生力量，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对邢介江的处理是错误的……

苏华、胡逸平等人针锋相对，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铁道部对郑州局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调整郑州局的领导班子是改变郑州局面貌的必要措施，对邢介江的处理是正确的，大得人心，这些不容否定。

听取了双方意见和激烈辩论之后，李先念、华国锋均表态支持万里。李先念特别点明：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在制造省委与铁道部的矛盾，想从这里捞油水，挑拨省委与铁道部之间的关系，在造谣破坏，大家都应当提高警惕。

华国锋说：解决邢介江的问题就是为了发展河南大好形势，邢介江破坏铁路运输，扣截铁路运输物资，投机倒把，问题性质很严重。铁道部解决郑州问题大方向没有错，不要只抓一两句话不放。对新去的几位领导人，你们要多支持！

刘建勋表态同意中央领导人的意见，表示自己是始终支持万里工作的。

最后，李先念说："中央9号文件很重要，如果没有万里同志到处去贯彻，铁路不会这么快就畅通了。我对铁道部解决新乡问题是支持的。"

这次会议期间，纪登奎外出到浙江去了。接见后，李先念同纪登奎通了电话，商定：纪登奎从杭州直抵郑州，同万里、刘建勋一道去郑州。万里这已是三赴郑州了。

8月中旬，郑州局连续召开了几次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人的讲话精神。纪登奎在会上表示完全赞同李先念、华国锋等的意见，强调要进一步解决好郑州局的问题。河南省委虽然决定根据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解决铁路问题。但后来的实践表明，郑州局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来，此前的一切努力便又付之流水了。

在郑州局的整顿艰难进行的同时，铁道部对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相继进行了整顿。他们在有关省、市委的配合下，在大力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通过调整班子，逮捕一小撮坏人，调离一批坏头头，平反冤案，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使全国铁路运输的形势迅速好转。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大提高。

当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在一次讲话中深刻地指出：9号文件在各地引起的强烈反应，表明了党心所向、人心所向。

党心所向，人心所向，这是社会的主流，也是全面整顿赖以进行的根基所在。

## 1—2　钢铁工业闻风而动<br>农业战线风雷激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铁路整顿初战告捷，经济整顿随即全面展开。

铁路运输连接东西，贯通南北，铁路的整顿立即对全国发生了重要影响，它使一切推诿与塞责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过去一谈问题，就是铁路运输的影响，似乎一切问题都是由于铁路运输造成的，一切罪过都是铁路的。”邓小平在3月下旬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对各部门负责人说，“现在铁路上来了，你们怎么办？”

3月下旬的国务院会议，是专门检查研究中央9号文件的贯彻情况。在听取了铁道部长万里的情况介绍后，会议明确指出：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除体制问题外，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

由此，整顿迅速在整个工交部门展开。随着整顿的开展，全国工业生产开始打破停滞不前的局面，原油、原煤、化肥、水泥、发电量、内燃机、铁路货运量都呈迅速增长势头。1—4月，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同期增长19.4%。

相较之下，钢铁工业问题愈来愈显突出。1—4月，钢产量与计划要求相比，累计欠产195万吨。

5月8日至29日，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实际上是总结推广铁路部门和徐州的经验，以“铁”促“钢”，对冶金部门进行全面整顿，特别是要着手大力解决严重欠产的钢铁工业的问题。会上，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四家大型钢厂受到严厉批评。这四家钢厂由于领导班子不团结，少数人闹派性，严重挫伤了工人群众生产的积

极性,四厂欠产约占全国欠产量的一半。

李先念在会上讲话说:"毛主席提出安定团结的指示快一年了,为什么你那里还有派性,政策不落实?到底问题在哪里?我看关键在领导。少数人在捣乱,工人在着急,但那里的领导却软弱无力,不敢碰。"

他要求:"对这些人的问题要严肃对待,该处分的处分,该调动的调动,该批评的批评。对那些屡教不改的人,老是迁就,不处理,怎么得了?"

他语重心长地说:"我看现在这样搞,现代化没有希望。希望这次会后能确实解决问题。同志们回去不要轰一轰,开个万人大会就完了,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钢铁工业再不赶上去不行了。钢铁上不去,什么都被拖住,农业机械化、国防建设、基本建设,统统都谈不上。"

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整顿钢铁工业发表了重要意见。5月29日,他又到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作了《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4条方针: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这样的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要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要找不怕被打倒的人参加,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邓小平还风趣地作了这样一个比喻: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他鼓励敢于坚持原则,进行整顿的干部,不要怕别人抓辫子,要大胆工作,希望通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把局面尽快扭转过来,把生产搞上去。

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要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昏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调，该批的批，该斗的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邓小平再次讲到：“铁道部门在这方面做得就更突出了。徐州的经验比较典型。这些经验都值得大家很好学习。”“根据铁道部门的经验，徐州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在同派性作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也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徐州闹得那么厉害，最后被打击的只有三个人。绝大多数人，包括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都可以挽救过来。所以，实际搞的结果，打中面极小，教育面极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派性的斗争。”

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模范，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位置上。”邓小平说：“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6000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有些人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批评或者斗争过他们，伤了感情；有的地区虽然没有清查‘五一六’，但是也干了一些类似的事情。这些问题都要妥善解决。”

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邓小平说：“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最近武钢就发生了一天跑两次钢水的大事故。有些事故发生了，还分不清是谁的责任。因

此，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要讲清楚，对这些现象，过去的还可以原谅，现在就不许可再存在了。哪能随便不上班，马马虎虎呢？不上班就不发工资，不干工作就叫他离开嘛！”

在会议召开期间的5月22日，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指出了钢铁工业上不去的现状，分析了钢铁工业上得慢了的原因，提出了把钢铁工业迅速搞上去的六点意见：一、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二、加强各级党委对钢铁工业的一元化领导。三、坚决采取措施，整顿那些问题多的重点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使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四、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五、落实生产建设中的具体措施。六、加强企业管理，整顿企业秩序。

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州地区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报告》中说：在整顿前，“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这一派上了台就整那一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近几年来，那些用派性掌权的同志，又借各种运动之机整另一派的干部和群众。批林批孔运动一来，原来掩盖的矛盾爆发了。”“坏人就乘机兴风作浪，混水摸鱼”，“打着‘揭盖子的旗号，欺骗、拉拢少数群众，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疯狂进攻，妄图趁机推翻各级党的领导。”《报告》总结了解决徐州问题的经验，紧紧抓住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个关键，对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限期改正错误，到期不改，采取组织措施。对极少数坏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群众中批判。中央要

求各地参考他们的经验，解决本地区的问题。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即：中发（1975）13号文件），批转了冶金部这一报告。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情况欠佳的事实，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指出：只要领导认真抓了，欠产多的几个大型钢铁企业，也会迅速改变面貌的。

这次会议以后，工交部门的整顿向深入发展，并推进到其他领域，全面整顿的浪潮形成。6月底，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有了好转，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帐。7月，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好转，说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以来，对工业战线实行的整顿方针是卓有成效的，是完全正确的。对此甚感欣慰的邓小平，并不满足于此。他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还要通盘地研究。经他提议，从6月16日起至8月11日，国务院召开了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今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作准备。

在讨论了如何加快经济发展问题后，从7月2日起，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分为理论、体制、钢铁、工业和企业管理、基本建设、机械工业规划、改进计划工作、轻工农林商业、文教、科技等10个小组，

进行专题研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整个工业的问题，给整个工业战线的全面整顿提供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务虚会上决定制定一个全面整顿工业的文件，这就是7月中旬国家计委开始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

起草工作先由主管工业和计划的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后来又由常务副总理纪登奎抓。初稿于8月初写成，共14条。

8月8日，邓小平要求国务院政研室参加对工业条例的修改。在这之前，胡乔木等已经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对企业领导体制和企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邓力群、于光远参加了计划工作务虚会，并且是10个专题小组之一的理论组的召集人。

8月10日，国务院开会讨论工业条例，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也出席了。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谈话。他首先肯定了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制定的"工业七十条"。这个文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许多人不敢提它。邓小平认为，过去的工业七十条，基本上是好的，是修改的问题，不是要废除。他还提出了七条具体意见：一、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二、要把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作为一个大政策。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四、整顿企业管理秩序。五、抓好产品质量。六、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会后，这个文件的修改即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邓力群、于光远同计委的房维中等人参加。

修改后的文件全文从原稿的14条增加到18条。增加的主要内容是：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采用先进技术，引进高、精、尖的新技术、新设备，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工矿产品的出口；坚持质量第一；坚持按劳分配。对原来已有的整顿企

业管理，加强责任制，严格管理制度等条都作了充实。例如："整顿企业管理"这一条，加写了一段话，说明建立强有力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和健全强有力的能够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和精干的职能机构，同群众管理结合，搞好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党委的集体领导，不应当妨碍负责生产的领导干部执行职权，相反，一定要反对无人负责，反对无政府状态。"

修改稿完成后，9月交给在北京召开的20个企业座谈会讨论，10月又拿到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的12个省、市委书记中去征求意见，得到普遍赞同。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适时的文件，符合实际情况。有了这样一个"意识"，进行整顿有所遵循，加快发展工业就有指望了。大家都希望尽快使它成为正式文件下发执行。

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房维中等人，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又对文件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和修改，于10月25日完成。全文共20条，简称为《工业二十条》。"四人帮"出于别有用心地于1976年8月拿出来作为"大毒草"批判的，只是9月2日讨论稿的一个本子。

《工业二十条》对工作总纲、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整顿企业管理、两个积极性、统一计划、以农业为基础、大打矿山之仗、挖潜革新改造、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采用先进技术、增加工矿产品出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关心职工生活、又红又专、纪律、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思想方法等18个问题作了规定，主要内容是：

学习理论必须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发展。不能把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

整顿企业，首先要整顿党的领导，整顿企业的领导班子。要改变"懒、散、软"的领导班子，建立起一个精干的而不是臃肿的、坚强

有力的而不是松散软弱的、能打硬仗的而不是一拖就垮的领导班子。

要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企业生产管理制度，如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查制度、设备管理与维修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经济核算制等等，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同一切违反政策、制度、统一计划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行为作斗争。

要落实党的政策，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凡是被带上"保守派"、"站错队"等帽子的，一律摘掉。

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要划分"造反派"、"反潮流分子"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界限，对"造反"、"反潮流"更是要进行具体分析，正确的支持，错误的批评，反动的顶住。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关心职工生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世界上工业落后的国家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都要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要这样做。""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有，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大批政治觉悟高而又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干部、工人、科技人员都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工业二十条》可以说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工业七十条》的继续和发展。它体现了1975年以来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概括了工业初步整顿的经验，切中时弊地提出了发展工业的许多正确或较为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力图在经济战线上治"文化大革命"之乱的文件。

也正因如此，它必然引起"四人帮"的不满和抵制。在10月29

日国务院会议讨论这个条例时，有人提出文件太长，且没有引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于是，胡乔木在会后又作了一次修改，于11月3日完成。本拟交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后下发，但这时形势突变，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这个文件也就压了下来，既未交付讨论，更没有下发。但是，它的主要精神已经在整顿中得到一定的贯彻，收到了积极的效果。而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为指导工交战线的拨乱反正，于1978年4月20日作出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工业三十条》，则是同1975年的这个条例一脉相承的。

1975年8月份，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15省、市、自治区供销社负责人的座谈会，讨论了发展农村商业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重要问题。会议认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的商品生产还不发达，必须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大力发展。会议针对“四人帮”宣扬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指出：“如果限制过急，对发展商品生产不利，可能使社会商品减少。”

会议讨论了农村政策，认为“农村集市贸易是同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相联系的，是客观存在的，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补充。”

为了调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9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重申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强调不能限制社员养猪，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1975年9月15日，山西的大寨、昔阳显得格外热闹，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拖拉机厂正式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

省、市、自治区主管农业、财贸工作的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有各地区和各县的领导干部，有农业、企事业单位和科教单位的代表，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大庆油田的代表，还有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代表，共3700多人。

会议规定，将《毛主席有关指示》、《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国务院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等作为大会的学习文件。确定会议的任务是："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指针，认真讨论农业学大寨，特别是建设大寨县的经验，研究普及大寨县等问题。"会议规定，"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大会一切集体活动，如参观，开大会等，都要做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

大会主席台上，并排就座的有邓小平、华国锋、江青、陈永贵、姚文元等人，真是耐人寻味。其实这种现象，与会议召开的本身，都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的。

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尽管此时他执掌的整顿之舟已现搁浅之征兆，但他还是在讲话中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问题，因为这个会议毕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因此，他在讲话中突出地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是农业现代化，更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提醒人们"必须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农业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他提醒人们要头脑清醒，不要做出点成绩就吹牛，他说："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此时，江青插话："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邓小平马上斩钉截铁地讲："就是个别的，也是要很好注意的事。"

接着，他又说："据22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平均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60几块。四川倒数第二，90几块，这行吗？类似四川100左右还有好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账。这种现状，我们能够满意吗？"

邓小平讲得很严肃，尽管江青几次插话、干扰，他还是把农业要整顿的主题清清楚楚地传给了每一个与会者。

根据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全国各地很快抽调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社队进行整顿，全国各地掀起了大抓农业、大搞农田建设的新高潮。一时间，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成了各级党委的工作的中心和主题。农业学大寨运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涨局面。

但应指出的是，农业整顿当时强调的是学大寨，虽然就其重视农业，坚决要把农业搞上去这一面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一主题毕竟是"左"的，再加上农业整顿起步不久即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打断，因而未能像工交、军队等方面的整顿那样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

## 1—3　人民子弟兵提防野心家<br>教育革命"老九不要走"

在工农业整顿深入开展的同时，整顿工作迅速在其他方面展开。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

酝酿已久的军队整顿问题。这是继首先解决铁路问题之后，邓小平等走出的又一步具有战略眼光的棋。

老将军王平回顾说：他那时候，首先一条是抓军队，抓整顿军队。他说军队重要。

确实如此，这年1月25日，邓小平即在总参谋部会议上发出"军队要整顿"的号召。中央9号文件发出后，军工企业即按此文件精神开始整顿，国防工办也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使生产形势发生了变化。

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尖锐地提出，军队建设要解决"肿"、"散"、"骄"、"奢"、"惰"五个字，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

所谓"肿"，就是人数多，军费开支大多花在吃饭穿衣上面了；

所谓"散"，就是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总有少数人喜欢垒点山头，喜欢搞那么一个小圈子，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任人唯亲；

所谓"骄"，就是军队支左，权力大得很，大权在握，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在军队一部分人中，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而是骄横，影响了军队内部、军政、军民的团结。

所谓"奢"，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闹享受，闹待遇，有的甚至公私不分，违反政策；

所谓"惰"，就是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有的人工作不努力，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靠秘书办事，官僚主义。还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

邓小平指出，军队整顿就是要重点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为此，必须实行精简整编；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本

身的团结；恢复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并且要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领导班子。他还提出，整顿和准备打仗是军队工作的纲，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7月15日，叶剑英作总结讲话，就军队整顿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为军队整顿指明了方向。尤其重要的是，这次会议还向部分军队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严肃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从而在根本上打击了"四人帮"争夺军队的种种图谋，为最终解决"四人帮"的篡权阴谋起了重大作用。杨成武在《丹心向党功炳千秋》一文中谈到这次会议时说：

> 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对"四人帮"作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叶剑英同志针对"四人帮"煽动派性，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的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叶帅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又说："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叶帅在发言中，还非常气愤地脱稿讲话，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诡计。他对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会上，徐帅、聂帅也都作了重要的讲话，一致赞同小平同志、剑英同志的意见。
>
> 接着，叶帅亲自给各大军区、军种的领导同志打招呼，他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

谈话，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跟同志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紧接着，叶剑英同志就全力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头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军委的部署，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这是为粉碎“四人帮”采取的强有力的组织措施。叶剑英同志亲自拟定了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人员，亲任组长。他还亲笔写了这个名单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批准后，叶帅就带领“六人小组”紧张地进行工作，很快地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7月20日至8月4日，经中央批准，又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讨论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8月3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找能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请那些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人去休息。又提出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坚持质量第一，改善群众生活等重要意见。他深刻地指出：“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他提出调5亿斤粮食给一些城市，养500万头猪，甚至可以考虑办现代化的养鸡场。

叶剑英的讲话指出：现在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他们争权夺利，搞得党不安宁。这个讲话事实上是不指名批判了江青一伙。

李先念在讲话中提出要建立和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邓、叶、李的讲话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军工企业自本年3月起已在国防工办领导下进行整顿并取得初步成效，生产情况更明显地全面好转。

七月流火，整顿亦是如火如荼。邓小平因势利导，把整顿引向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科技教育战线。

与军队中要提防野心家的斗争相比，科技教育战线的斗争也是充满了火药味。“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受到严重摧残，许多科研机构长期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邓小平提出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把科研工作搞上去。

早在5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央批准国防科委的战略导弹核武器规划时，就批评了七机部的派性斗争，要他们限期整顿。邓小平指出，七机部现在两派这样闹，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也没有。对七机部的问题要限期解决，只等一个月。

正在外地治疗腿伤的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应召回京。在叶剑英找他谈话后，抱伤出征了。他拄着拐杖，上飞机，下基层，奔走在混乱不堪的国防科工战线。在七机部，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把混乱局面扭转过来。他疾言厉色地说：在问题面前讲客气，就是对党犯罪。

6月30日，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此后，张爱萍率工作组对七机部采取断然措施进行整顿，使这个当时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出现了较为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

7月，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是月中旬，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要求他们尽快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

胡耀邦来到科学院，上任伊始即鲜明地提出：“科研机关不搞科研怎么成”；“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的”；“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8级不行，得刮12级台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

们伟大的新长征。“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的子孙会骂，……行政工作、政治思想工作，都要围绕这个转。”

在对科学院进行调查研究和初步整顿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胡耀邦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经过院内外广泛征求意见，修改了两遍，将第三稿上报。

汇报提纲共分六个部分：

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

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

关于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

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

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

主要内容是：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国防；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必须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必须逐步建设一批新的专业科研机构，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自力更生，又不闭关自守；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落实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这个《汇报提纲》力图系统地阐述毛泽东的正确科研思想，澄

清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在科技界纠正“左”倾错误的许多重要意见。

但邓小平对这个文件稿并不是很满意，主要是认为全文太长，思想性不够，文字过于尖锐，也比较旧。遂于8月26日找胡乔木商讨修改意见，要胡乔木同胡耀邦等一起议论一下，由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

胡乔木提出的修改意见，主要有这样三点：讨论稿第一部分“关于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要更为鲜明些；要把毛主席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指示集中在一起，再补充征引若干，使之成为较有系统的10条，作为科学院工作和整个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将讨论稿的第二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归并作为一个部分，大加压缩，用整顿来统率。

胡乔木亲自动手，于9月2日改好，全文由六部分变为三部分。即：

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提出作为我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中心，中国科学院今后十年来根本任务的三个方面：协同各有关部门，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若干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

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这一部分从十个方面引用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论断和指示，还辩证地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群众路线与专业队伍、理论与实际、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与使用、哲学与自然科学等五个方面的相互关系，说明必须系统地、准确地宣传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防止和克服任何偏离、割裂或曲解。

提出科学院整顿的5项内容：(1)结合实际，认真学习，揭露矛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2)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

政策;(3)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4)调整和健全领导班子;(5)整顿机构。

9月3日,胡乔木把《汇报提纲》面交邓小平。邓小平看后比较满意,说这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即印发有关负责同志征求意见,准备讨论。邓小平多次召集会议,讨论这份汇报提纲。他说: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前面,不能拖整个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现在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不能把科技人员搞得灰溜溜的。不是把知识分子叫做"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

谈话中,邓小平提到了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他说: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对他应该爱护、赞扬。

谈话中,邓小平为这期间北京大学发生的一件事而拍了桌子。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昆的专长是搞半导体物理基础研究和理论教学。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北京大学竟要他到车间里带学生搞半导体生产,这当然完全没有发挥他的专长。科学院开始搞整顿后,黄昆被邀请到科学院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反映不错。

邓小平知道这件事后,很是关注。他说,你们有个搞半导体的,叫黄昆,是个老科学家,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周荣鑫你查一查,我是三天前知道的。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分配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1977年黄昆被中央调到半导体所工作)。

邓小平对《汇报提纲》的修改还提了若干具体意见,说经过修改后送毛主席并印发政治局,若毛主席批准后,将用这个文件发动科技战线的群众。

按照邓小平的讲话和讨论时的意见，胡乔木等很快又修改了一遍。9月28日，《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修改完成后即报送毛泽东阅。

这时，毛远新刚在9月27日同毛泽东谈过对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不满意的意见。对《汇报提纲》中引用的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毛泽东在10月13日对邓小平说，他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邓小平立即提出马克思这样讲过，坚持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其实，毛泽东这种否认是表达着对《汇报提纲》的不满，当然也有对邓小平的不满。等到毛泽东于10月下旬把《汇报提纲》退回，胡乔木再作修改，邓小平已经在政治局内受到错误的批判了。因而，《汇报提纲》的最后一次修改稿（第六稿）就压在了邓小平处，始终未能与全国人民见面。至于1976年8月"四人帮"拿出来大张挞伐的，不过是这个文件最初（8月11日）的一个讨论稿。

所幸，毛泽东虽然否认自己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但并没有否认自己讲过"老九不能走"。这是他在5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正是有这句话，教育工作的整顿就显得师出有名、理直气壮多了。

早在四届人大期间，周恩来、邓小平等就对"四人帮"对迟群的提拔作了否定，任命老干部周荣鑫为教育部长。随着整顿在各方面的开展，周荣鑫在教育部门根据中央进行整顿的精神做了许多工作。

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反复强调要全面研究马列和毛泽东的教育理论，重提两年前周恩来纠"左"时提出的许多重要意见，还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老师挨骂、学生不读书的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

“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

“一讲就讲两个，一个是十七年，一个是1972年回潮，就是不讲林彪路线的干扰”；

“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针？”

“毛主席当时讲的500万，是指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国有2500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

“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

“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提为革命读书呢？”

……

6月起，《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和评论，批评了那种认为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头路的荒谬认识，提出要使青少年“努力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否则，“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这些道理在今天看来已都是“小儿科”一类的东西，但在“四人帮”的多年淫威之下，这些原本是“小儿科”一类的东西也便有种“离经叛道”的气势了。

好在周荣鑫也不乏支持者。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即对所谓的“朝农经验”不怎么感兴趣。7月11日，他在援外工作会议上谈到国内

教育工作情况时说:“农学院都学‘朝阳’,我不那么赞成”。周荣鑫闻此言,不胜欢喜,于7月24日向新华社记者转述了这个意见。此后,教育部和报刊便一度停止宣传“朝农经验”。

形势看好,周荣鑫的讲话也就越来越放得开。8月23日至30日,教育部召开北京、上海、天津、广东4省市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周荣鑫在会上着重指出:

“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不要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现在一谈起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讲话,什么‘回潮’啊,‘又是1972年的风’啊!毛主席指示过的,也可以不管,这样不成!”

“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我的有些话可能刺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有些不满。”

“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

9月15日至23日,教育部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湖南、湖北、山东、江苏4省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传达讨论了周荣鑫的讲话,研究了城市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周荣鑫在北京等4省市会上的讲话,在教育界引起热烈的反响。与此同时,周荣鑫在许多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讲话一时广为流传,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欢迎。但在较长的时间里,教育部门一直没有公开提出进行整顿的问题。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对各个方面进行整顿并特别点了教育的问题后,教育部门开始公开地加入了整顿的行列。

10月,教育部开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经中央批准

后对教育进行彻底整顿。在起草小组研究汇报提纲时，周荣鑫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精神。邓小平说："25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科学研究工作后继有人问题，中心是教育部门的问题。现在有个危机——不读书。教师有个地位问题。教育部门也有个调动教师积极性问题。"后来，由于周荣鑫受到迟群一伙的迫害，这个汇报提纲未能成稿。

抓住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的契机，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开始对文艺工作进行整顿。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

7月2日起，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又受命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又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月14日，毛泽东更作了文艺问题的书面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他还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政治局自然要学习、讨论、贯彻，而邓小平对这几方面的情况不完全熟悉。这样，刚刚成立的国务院政研室就被推到前台。

7月9日，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传达了几天前毛泽东同他谈话中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他要求政研室给他作些调查研

究，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方面有关双百方针的材料。

为落实邓小平布置的任务，国务院政研室召开负责人会议，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调查研究工作主要还是通过个别联系，从熟悉的人那里了解情况。政研室理论组组长王子野带领小组成员郑惠等查阅1969年以来北京、上海的几种主要报刊，不仅整理出江青鼓吹"三突出"、妨碍"百花齐放"的材料，而且整理出了一份"四人帮"自1969年11月以来，在报刊文章中有意不提的"百花齐放"，明目张胆地把"百花齐放"从文艺工作方针中砍掉的材料。邓小平在10月4日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运用这个材料揭露和批评"四人帮"，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乘此时机，邓小平一面重提"百花齐放"的方针，一面不动声色地组织人对文艺界的来信作了批示。

当时看过影片《创业》的人，无不被影片宣扬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所鼓舞，无不被影片宣扬的中国人民有志气的英雄气概所感动。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却对《创业》大加指责，指使文化部于1975年3月10日提出报告，给《创业》加上了"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等十条罪名，并且停止在全国上映，组织批判。

7月18日，电影《创业》编剧张天民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创业》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见，对影片"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等几项决定，以及文化部的十条意见表示了不理解，并建议重新上演。

始终保存着这封信原稿的张天民，多年以后解释了当时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因为当时正处在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时期，这个整顿包括文艺界的整顿，而且这时候，毛主席已经对有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包括说文艺界没有文艺，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批评了文艺界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因为这个事积压了很长时间，江青给扣了十条罪状，我一直不满，所以写了这封信。小平同志看完这封信后，很快，大概就是第二天，就拿着我这封信转到毛主席那里去了，请毛主席看这封信。"

7月25日，毛泽东写下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还注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和来信人所在单位"。

对于"最高指示"，江青一伙不得不忌惮几分。但他们还是想自我解释一番。8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召集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在钓鱼台谈毛泽东的批示，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毛主席，主席没批。另封给邓小平转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张春桥说："主席用词向来很严格，你们要去仔细理解。主席说无大错，那还是有中错和小错嘛！并没有说优秀影片嘛！主席说调整政策，并没说别的。"

姚文元则说："每当党内要调整政策时，总有人利用，借机闹事。"

尽管江青一伙百般阻挠，毛泽东的批示还是不胫而走，四处流传，并引起连锁反映，推动了文艺政策的调整。

与《创业》同病相怜的是《海霞》。1975年春节期间，周恩来带病审看影片《海霞》；不久，朱德、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也陆续调看，一致表示肯定和赞赏，并建议放映此片招待国际友人。唯江青马首

是瞻的于会泳等拒绝执行这个指示。6月，于会泳等秉承江青意见，派人查封《海霞》全部底片和样片，发动了对《海霞》的批判，而且还以文化部名义连续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全体职工写信，说“《海霞》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

在邓力群帮助下，电影《海霞》编导谢铁骊、钱江先后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揭露“四人帮”的行径。反映《海霞》受到“层层围攻”的申诉信经胡乔木、邓小平转送毛泽东。毛泽东7月29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30日邓小平、李先念等审看此片。31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审看了《海霞》的两个版本（送文化部审看的片子和经过修改的片子），肯定了这部影片，并决定在全国上映修改过的片子，粉碎了“四人帮”对《海霞》的围剿，又一次打击了江青一伙在文艺领域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

进入8月以来，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军区、军兵种文艺单位，演出了许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歌颂伟大长征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包括话剧《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等。

8月，话剧《万水千山》经过修改，由总政文工团开始公演。江青说：“这个戏有问题。”张春桥说：“《万水千山》那东西，都是为那些老家伙评功摆好的！”

江青、张春桥的歪批，引起了众怒。9月，除“四人帮”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常委等20多位领导人，集体审看了话剧《万水千山》，一致批准在纪念伟大长征胜利40周年的10月正式公演，并决定拍成电影。

江青一伙在“那些老家伙”那里碰了壁，在基层文艺工作者中也引来了反抗。文艺界在学习毛泽东《创业》批示中，对江青等人在文化部的亲信扼杀《创业》，压制群众，排斥异己等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8月8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贴出

大字报，揭露批判四人帮扼杀《创业》、抵制毛泽东的批示和长期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正如《创业》是一部政治上艺术上都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一样，《十条》(指江青授意文化部给《创业》定下的十条罪状)也是一篇内容上，乃至语言上都不可多得的奇文"。"《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是反对安定团结的。"义正词严地责问《十条》的炮制者们："有没有行帮？你们有没有'哥们儿义气'，有没有'好处想着点'，'问题兜着点'？"严肃地警告"四人帮"一伙"不要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大字报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

邓力群发现这张大字报后，即交胡乔木送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随着邓小平再次挨批，这张大字报真的有了用处——1976年6月，李春光被"隔离审查"。

由于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连续对文艺工作者上书作出批示，文艺界受到鼓舞，直接上书毛泽东者不乏其人。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以下三件事：

9月27日，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写信给毛主席，建议在冼星海逝世30周年之际，举办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和聂耳的纪念音乐会。毛泽东表示赞成。于会泳等肆意对抗，按照江青、张春桥"不提纪念"、"不要请人"的指示，刁难、破坏音乐会，甚至把印有毛泽东题词"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的音乐会节目单全部废弃，另换一张没有题词的简陋的节目单。但10月25日，纪念音乐会还是如期隆重举行了，成为继《创业》批示后1975年文艺调整中的又一个高潮。

10月19日，姚雪垠写信给毛主席，汇报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写作情况及存在的困难。毛泽东11月2日写下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由于毛

泽东亲自关怀，姚雪垠即从武汉调至北京。粉碎“四人帮”后，《李自成》第二卷初版和第一卷修订版于1977年二、三月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由此复业。

10月28日，周海婴写信给毛主席，反映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鲁迅著作的注释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请求帮助，希望早日出版一部收入现存鲁迅全部书信的新的鲁迅书信集，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毛泽东11月1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这封信也是经邓小平呈送毛泽东的。毛泽东对周海婴信的批示，使张春桥、姚文元等百般阻挠公开出版鲁迅全部书信的倒行逆施无法再继续下去，也改变了《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到1976年鲁迅诞辰95周年之际，一部包括已经收集到的1381封书信的《鲁迅书信集》得以问世，一部16卷本的《鲁迅全集》新的注释本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禁演的公映于世，禁出的公行于世。与此同时，有关江青等人挨批的消息开始在群众中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舆论。所有这些，打击了江青一伙独霸文艺阵地的嚣张气焰，使文艺领域开始出现了新气象。

为了打破“四人帮”在宣传理论领域的一统天下，邓小平采取了另起炉灶的办法，这就是根据他的建议，国务院于6月设立了前面已屡次提到的政治研究室，其主要成员为胡乔木等老的理论工作者。国务院政研室当时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并主持和参加了许多重要文件和文章的起草，包括后来被“四人帮”诬为“三株大毒草”的《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等，很快成为邓小平进行宣传理论斗争的得力助手。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务院政研室被诬蔑为“谣言公

司”、“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有劳“四人帮”对国务院政研室如此“厚爱”,这里有必要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活动和斗争有所交待。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于1975年6月中旬,但早在1月上旬邓小平就开始酝酿了。在受命担负党政军领导重任之际,在着手部署整顿的同时,邓小平已经考虑到加强思想理论工作的问题了,已经准备为把思想文化阵地从“四人帮”手里夺回来而组织力量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第二天,即1月6日,邓小平就约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去谈话。其时,胡乔木经过“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审查,刚在1974年国庆节参加了招待会,还没有作组织结论。邓小平告诉胡乔木: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以及一些理论文章,阐述国内外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一些问题。邓小平还交代胡乔木,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

当然,这一切还只是在设想和商量的过程中,邓小平还没有提交党中央、国务院讨论,他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6月以后,全面整顿进一步深入而广泛地展开,来自于“四人帮”等极左势力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形势迫切需要加强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而当时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都控制在“四人帮”的手里,“四人帮”还培植了一批写作班子做他们的吹鼓手和棍子。所以,到1975年6月,组建一个强有力的、能战斗的写作班子,组建一个能够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机构,是整顿继续推进的迫切需要。同时,几个月来整顿的进行,经济形势的好转,人民群众的拥护,已使邓小平进一步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成立以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的这样一个机构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正在这时，毛泽东批准胡乔木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整理工作，这表明毛泽东已重新起用胡乔木，从而也成为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个契机。由于康生这时已病入膏肓，由邓小平负责领导继续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工作，这样，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这样的机构，由胡乔木等作负责人，担负《毛泽东选集》整理小组的工作及其他任务，"四人帮"已经没有理由阻拦和难以阻拦了。

6月8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胡乔木，商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有关事宜。邓小平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人负责。关于政研室的任务，邓小平提出，除了文章，承担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具体工作外，还要"分管学部"，就是分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

6月15日，邓小平向政治局正式提议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组成。同日，邓小平还向政治局送上关于《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的建议，说明毛主席已批准胡乔木参加《毛泽东选集》整理小组。

这两项提议经政治局审议通过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遂正式成立。负责人除上述报告中提到的6人外，又增加了邓力群，共7人。政研室的人员和办公地点按任务分为两部分。以编辑《毛泽东选集》为主要任务的在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和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在那里办公。政研室的日常工作由于光远、邓力群负责，这一部分人在中南海武成殿办公。

7月上旬，政研室正式开展工作后，很短时间内，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前面已有所涉及，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其代管学部，筹办《思想战线》的情况。

"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是我国最大的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当时下设13个研究所,2个研究室,有工作人员2000多人,其中干部和研究人员1800多人。

6月29日,邓小平再一次向胡乔木明确交代,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并立即要中央组织部提出学部领导机构人选,同时委托一位副总理召集国务院政工组、办公室和教育部等机关单位开会,把重新确定的对于学部的管理分工正式通知执行。

7月6日,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政工组发表学部领导机构名单,由郭沫若任主任,调林修德、宋仰峤、宋一平3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学部工作。

7月21日,林修德、宋仰峤、宋一平3人到学部任职。7月下旬,就把工宣队、军宣队送走,把下乡下厂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全部撤了回来。学部各个研究所的业务工作逐步恢复。

8月22日,胡绳到学部讲话,传达了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精神,指出要以三项指示为总纲来看形势、看任务,强调要安定团结,完成斗、批、改的任务。明确指出,"改",就是要从事业务工作;恢复科研。科研要面向现实,联系实际。可以不提开门办所的口号,因为对这个口号不同观点会有不同解释,会造成混乱。

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并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也通知学部领导成员列席。会后列席者立即向学部领导小组、办公室、政工组负责同志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并立即开始采取措施贯彻执行。

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国务院政研室开列了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名单。学部有21人出席,包括专家学者18人,领导干部3人。此举引起强烈反响,认为国庆招待会体现了安定团结的方针,体现了落

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学部政工组将出席招待会的学者吕叔湘、任继愈、俞平伯、顾颉刚、冯至、何其芳、丁树声、吴世昌、贺麟、韩幽桐、傅懋绩、严中平等的反映整理成简报。胡乔木看后感到有代表性，即报邓小平并建议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16日写下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这一批语，进一步促进了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的落实。

鉴于"两报一刊"等主要报刊都被"四人帮"控制，一时难以夺回，邓小平同样是决定另起炉灶，创建自己的阵地。当6月底国务院政研室刚刚诞生，邓小平就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由政研室指导。以后又多次催办。其实，创办刊物本身就是同"四人帮"争夺宣传理论阵地的重要斗争。10月6日，胡乔木在谈到学部准备创办的《思想战线》的办刊方针时讲得非常明确。他说：现在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刊物就要反映。这个刊物无论从任务和内容上说，都不单单是学部的刊物，它是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这是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要尽一切努力把它办好。

9月16日，毛泽东在科普杂志《化石》编辑张锋给他的信上加了"一封诉苦的信"的标题，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邓小平在9月10日就对胡乔木说：《化石》这样的刊物主席还这样关心，学部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还会不关心？再次催促胡乔木快把刊物办起来。

当时，学部所属各研究所过去出版过的杂志，只有《历史研究》、《考古》、《考古学报》仍在出版，其余都已停刊多年。9月22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拟就创办刊物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哲学社会科学部已经逐步恢复业务工作。现在除

准备按照需要和可能逐步出版各种分科的杂志外，打算先出版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名称确定为《思想战线》，性质是理论性、批判性、讨论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刊物拟于年内出试刊，1976年1月正式出版。

胡乔木接到这份报告后，即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指示抓紧筹备，说别人写文章，你们也可以写，但不要影射，要讲道理。还要求《思想战线》的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交中央和国务院审查。

这个请示报告经胡乔木改定后，于10月4日上报国务院并转报中央政治局。5日，毛泽东圈阅同意。6日，胡乔木就同学部临时领导小组3位同志谈话，专门讲怎样办好《思想战线》的问题。他要求把《思想战线》办成政治性、战斗性、现实性、理论性的刊物，办成能代表党的路线的、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文章的选题与质量，都应与党目前在各条战线上的方针任务相适应。当天下午，胡乔木又同负责办《思想战线》的同志具体谈了刊物的选题，出了一些题目。

学部在10月上中旬召开各所、室负责人座谈会，讨论胡乔木的谈话，决定以创办《思想战线》这个头等大事，作为整顿学部的突破口。很快，编辑部调集了60多人，提出了明年第一季度三期的选题计划，并落实了大部分选题的作者。试刊和第一期的稿子大多印出了清样。

一个崭新的刊物即将诞生了。

就在这时，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邓小平在受到批评、攻击的情况下，还指示胡乔木要帮助学部把刊物办好，但终于无法抵挡这股逆流。1976年1月17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不得不写报告给国务院，请求解除委托政研室“指导学部的业

务工作”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

整顿夭折了，《思想战线》也未能出版。

随着各方面整顿的开展，邓小平自7月起提出并越来越突出地强调了党要整顿的问题。7月4日，他在中央党校读书班第四期学员会上谈话时指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

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党的领导削弱了，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党的领导，这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因此，必须对党的领导、党的思想、党的组织和党的作风等各方面加以整顿。这中间的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

关于党的作风，邓小平指出：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抓党风，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

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整顿要抓住整党为核心，整党主要是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就是在这次会上，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这个问题的提出，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击中了“左”倾错误的要害，实际上已涉及到了党的思想路线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邓小平还讲道：“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要横下一条心。”他讲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管他是谁，60岁的老虎屁股也好，40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

根据中央的精神，当时各地区、各部门在整顿中突出了对领导班子的整顿，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对一部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作了处理，并对一大批“火箭干部”采取了挂职下放的措施。

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在省委会议上表示：要拼着老命干，不要怕打倒！浙江省委规定：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参加任何派性活动。此外，还明确提出，要把被坏人“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杭州市连续三次召开批判派性大会，每次参加者逾万。

与处理“双突”问题交相辉映的是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4月底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00多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

这是一次解放干部的重大行动，在“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这种“解放”当然不可能是彻底的，但毕竟是放了人，放了许多本就不应当被关押的人。因而，这件事本身就有着它的积极意义。

邓小平又将贺诚之女写给他要求给她父亲分配工作的信件转

给毛泽东，并对贺诚的任职作了安排。5月17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贺诚的任职报告上作了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可见，对于许多本无罪的人被打倒，毛泽东也是很痛心的。

干部政策的落实，党的整顿，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起到了促进作用。一切都出现了转机——

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与1974年增长1.4%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其中，农业增长4.2%，工业增长15.1%。全年财政收入达815.6亿元，比上年增长4.1%。

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始打破严重沉寂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新气象。

各级党的领导，尤其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各条战线的生产、工作秩序逐渐好转，许多地区的严重派性的武斗受到抑制，落实干部政策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全国的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安定团结。

……

整顿带来的明显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等实行的方针政策的正确，使长期遭受"文化大革命"苦难的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精神为之一振，使人心归向四化，归向邓小平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

## 1—4　评《水浒》宋江架空了晁盖<br>反"右倾"桃花源人再下沉

就在邓小平加强对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拨乱反正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时风云突变，形势逆转。

这并不奇怪，并不难理解。

因为毛泽东本就没有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之意，他不反对邓小平的整顿，是因为他尚未意识到这种整顿实际上终是要以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为根本出路的。

因为"四人帮"这一伙反革命势力还在，虽然因为毛泽东重新重用邓小平而稍掩其锋，但他们始终如病中恶虎，觊觎于侧，窥视于旁，伺机发难。

所以，全面整顿本就没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顺畅，反而事时遭狂风恶浪袭击，一如逆水行舟。

当整顿之舟刚刚下水扬帆之时，"四人帮"就发起了对整顿的第一次冲击波。他们借学习理论为名，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口号，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1974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在听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实是仍陷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窠臼不能自拔。

1975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并印发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央通知说："毛泽东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

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央通知发出后，全国迅即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此时的宣传领域，几乎是“四人帮”的一统天下。奉毛泽东之命，张春桥、姚文元主持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分别写下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与《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重头文章。他们对“左”倾理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在阐述中夹杂私货。

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写道：“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写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伴着学习理论运动，一股“反对经验主义”的恶浪袭来。三四月间，“四人帮”控制的两报一刊等报刊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的文章，矛头直指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而火力点更是集中到周恩来、邓小平身上。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其影射对象已是昭然若揭。

对于“四人帮”的挑衅与攻击，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

4月,他就张春桥等人提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提出自己的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4月23日,毛泽东在对新华社一个请示报告的指示中批评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提法:"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要求将"此问题请政治局议一议"。

接着,5月3日,毛泽东又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对江青等人搞"四人帮"和他们搞"反经验主义"的活动提出了严厉批评:"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指示,4月27日、5月27日、6月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邓小平主持了后两次会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发言中批评"四人帮"1973年底以来多次违背毛泽东指示另搞一套,批评他们闹宗派、搞小圈子、突击发展党员;还坚决驳斥了"四人帮"所谓会议是对他们的"突然袭击"和"围攻"的说法,明确指出,你们的问题40%也没有讲到,有没有20%也难讲。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对江青一伙进行严肃批评,在"文化大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对长期以来骄横跋扈的"四人帮"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此后,他们的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

邓小平等在政治局内与江青一伙进行的这场政治较量，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保证了整顿的初步开展，并为整顿的全面展开打开了通路。

当整顿之舟半渡其水的时候，一度在政治上处境十分狼狈的“四人帮”又觅得时机，收拾起窘迫相，加紧活动，反扑过来。这就是所谓的“评《水浒》运动”。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评起了《水浒》，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当即在一些领导人和一些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震动和不安。人们对此很费解：这究竟是随便说说，还是古为今用，有其所指？如果是后者，那么，它的背景是什么？针对的是什么？谁是现代的宋江？关心国是的人们，都已经比较熟悉毛泽东善于利用批判一本书、一出戏乃至一篇文章发动一场政治运动，那么这一次呢？人们在拭目观察这场政治风云。

“四人帮”嗅觉灵敏地抓住这一机会，利用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经毛泽东同意，于8月底开始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借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为名，大批特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其真实用意何在？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至此，“四人帮”热衷于评《水浒》的目的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的江青又猖狂起来了。

9月12日，江青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重新露面，大谈所谓评

《水浒》的问题，，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的"。还说什么她在北京受迫害，政治局有些人专门造她的谣，她现在要打反攻。

9月17日，她又在大寨召集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两校写作班子等共100多人谈话说："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把中央政治局对她的批评说成是"迫害"她。要求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华国锋就此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不但不同意，而且还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这使人们的思想波动逐渐平静下来。

9月20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12月间，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叶剑英等人说：要注意斗争方法，不能把权落到江青那一伙人手里。又说：邓小平比我干得好。

当整顿之舟扬帆驶向深海之时，以"文不对题"而告失败的"四人帮"掀起了更大的风浪，这一次，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终于使整顿之舟搁浅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暴迅即席卷神州。

斗争的双方都在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当然，邓小平等是力图用毛泽东的正确方面来纠正他的错误方面，而"四人帮"则是要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向极端。但在10月，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当了毛泽东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以后，"四人帮"这一方的政治砝码加重了。

9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的几次汇报对毛泽东发生了重要影响。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

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肯定还是否定？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化革命还对不对？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此外，毛远新在汇报中还竭力否定工农业、教育、文艺等方面整顿取得的成绩。

毛远新的汇报当然是挑拨性的，而毛泽东在不断听到毛远新等人的汇报，并经过自己的思考后，也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的态度就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指示在政治局内对邓小平展开批评。

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对毛远新的攻击给予严正驳斥，指出："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坚持正确立场的态度，在原则问题上的不让步，导致对他的批评逐渐升级。

10月中旬，百病缠身的一代大奸康生挣扎着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最近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革命，却有人想全盘否定它，反攻倒算。我斗胆说一句，邓小平才上台一年多时间，就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从个人出发，我活不了几天啦。完全是从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发。"

如果说毛泽东对毛远新的挑拨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么康生"活不了几天"的"斗胆"，对毛泽东的影响显然要大得多，这可真是临

死还要害人。

毛泽东还是没有完全相信,但他的"心病"被强烈地触动了,这就是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须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要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但邓小平却提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

邓小平不赞成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的态度,无疑加重了毛泽东对全面整顿后果的疑忌,促使毛泽东下定了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决心。而清华大学的两封告状信则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获得了突破口。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原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位同志,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报告迟群、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大胆揭发了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极端不满,公开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事实。信是请邓小平转的。

10月25日,在迟群的指使和参与下,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诬告周荣鑫"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等等。

11月3日,吴德在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4人信件的批示。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

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开始了。

11月12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了有1700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18日，又召开了全校群众大会，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矛头直指邓小平。清华大学铺天盖地地贴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

与此同时，在党中央内，对邓小平的批评不断升级。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领导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讲话要点》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信件的上述讲话，并且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讲话要点》还说：“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就正式向全国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

于是，“打招呼”成了最流行的政治术语。全国上下都在“打招呼”，人人都忙于“打招呼”、“听招呼”。

至此，持续9个月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不久，邓小平受到公开批判，在他饱经磨难的革命生涯中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了。

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总理追悼会上致悼词，是邓小平在1976年的中国政坛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一位英国作家写道：“邓小平的悼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次是他以后几年里最后一次

重要的公开露面……'四人帮'的宣传机器立即急忙开动起来。它宣称,四个现代化的后面,有一整套修正主义的计划。"

邓小平就这样在人民的视线中再一次消失了,他的名字虽然还高频率地出现,但那已是"批倒批臭"的词章了。

全面整顿,铁路先行。在全面整顿中,铁路是"开路先锋"。"反击右倾翻案风",铁路部门也是首当其冲。万里这位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开路先锋",成了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同邓小平一起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再次遭批判,被赶下了台。

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人们来说,并不奇怪,但感到茫然、困惑不解的是:怎么过去是"线(路线)正了,点偏了",现在又是"点正了,线偏了"?当时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反映了人们困惑不解的心情:

火车正了点,
钢铁增了产,
卫星上了天,
红旗落了地。

随着《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逐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形势日趋恶化,特别是一些经过整顿的铁路局,情况更为严重,派性复起,一些造反派和派性头头乘机翻案。最先起来闹的是兰州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

上一年在解决这两个局的问题时,省委主要领导人本来最后都表示"同意"和"支持"的。特别是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时,唐岐山等都曾经在中央领导人面前表了态。而今一看风头不对,便把刚讲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是"一贯抵制和反对的"。刘建勋、唐岐山1976年2月8日在给中央写的《关于解决郑州局问题的意见》中写到:"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主要是局党委代

理第一书记苏华同志刮右倾翻案风，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绝不是孤立的。这是同铁道部主要负责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他们在意见书中竟然不顾事实地写道：“铁道部和苏华搞的这一套，省委是完全反对的并且一再指出过。”

过去一直比较沉静的铁道部机关，开始出现震荡。大字报迅速增加。在铁道部办公楼门口，贴了一幅十来米高的巨大对联：“横眉冷对革命派”，“俯首甘为复辟奴”；横批是：“一贯如此”。院内墙壁上刷着“打倒万里”，“揪出走资派、黑干将万里”，“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镇压造反派，罪该万死”等大标语。同时，铁道部大院内也贴满了揭批万里和工作组的大字报。

那么多的大小字报，究竟揭发出万里有些什么问题呢？无非是批判万里极力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散布“今不如昔”的言论、鼓吹唯生产力论，把派性说成是主要矛盾，大搞“一批二撤三调离”。群众揭发出来的这些主要问题，都是“有根有据”的。万里对此也是“供认不讳”。他心中明白：“邓小平不倒，我啥事也没有；邓小平倒了，你保我也没用。”俗话说：再回首已是百年后。但与邓小平同命运的万里，当他再次成为邓小平麾下的一员冲锋陷阵的战将时，却已是两年以后的事。当邓小平再次复出，以总设计师的身份擘画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时，又是万里主政安徽，最先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要吃米，找万里”，又一次拉开了中国改革活剧的帷幕。

与忽啦啦的大字报同时而来的，是下属单位一些人纷纷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不难想象，这当中少不了被整顿过的那些人。

“万里检讨，火车乱跑；万里一倒，火车不跑。”如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铁路运输生产不可避免地又出现了逐步下降的趋势。1、2月份，铁路货运量计划没有完成。3月上中旬，全国20多

个铁路局中，就有9个局没有完成装车计划，实际上只装5.08万车，差4000多车。其中，仅郑州、兰州、南昌、太原4个局，每天就少装近2000车。客货车的运行正点率都由上一年95%以上，下降到85%左右。事故也比较多。以煤炭运输为例，山西煤炭大量积压，仅大同矿的落地煤就多达60多万吨，有的已经自燃。但是，其他各省因严重缺煤，一些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停产。华东电网因煤炭供应不足，已减少发电量。上海全市的存煤，3月中旬曾下降到4万多吨，经组织抢运有所增加，但也只有11万吨，仅够4天用量。由于运输紧张，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不少地方群众生活用煤也难以保证，有的地方已不得不凭票供应，甚至发生哄抢煤炭的现象。据河南省石油煤建公司反映，洛阳市已有6个煤场脱销；扶沟、淮阳、项城等县有的群众夜间披着被子排队购煤；水灾重灾区驻马店地区全区87个供煤点，有64个已经脱销，灾区群众已经出现烧用具和砍伐树木现象。

铁路运输如此，其他行业自然也是难逃厄运。全面整顿所带来的经济好转，很快便如过眼烟云，随"风"而去。

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提到的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共12条。主要内容是：

>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
>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
>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

内战。

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讲话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于是，“批邓”的问题就正式公开了。

然而，“四五”天安门事件后，整个局势发生了突然变化。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中央政治局将天安门的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更是罗织罪名，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和总指挥。

江青狂叫：我们胜利了！

王洪文也在高喊：拿茅台酒来！

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两个决议：一个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另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决议中明确指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成对抗性的矛盾。”同时，“邓小平”名字后边已经没有“同志”二字了。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邓小平妄图把它作为今后长时期'各项工作的总纲',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行动部署。一声整顿令下,翻案妖风骤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一律都要'整顿'掉。所谓整顿,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开足马力向着邓小平、向着全面整顿碾压过来,欲置邓小平于死地而后快。

但是,"四人帮"不会想到,在全面整顿中看到光明与希望的人民群众,正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祸国殃民的真面目。

人间自有公道在。在人民的心中,邓小平并没有消失,人们仍在企盼着邓小平东山再起,振我中华。面对"四人帮"的诬蔑、陷害,愤怒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心中的反抗意识。连一向被视为赳赳武夫的许世友亦不禁写诗言志,向"四人帮"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和战斗的怒吼:

娘们秀才莫猖狂,三起三落理应当;
谁敢杀我诸葛亮,老子打它三百枪!

在这首爱憎分明、感情炽热的诗里,许世友不仅旗帜鲜明地高度赞扬了邓小平是党和人民足智多谋的军师"诸葛亮",首次形象地用"三起三落"这一富有创造性的数量词,高度概括了邓小平坎

坷不平的革命与政治生涯，而且毫不畏惧地高度蔑视一小撮“娘们秀才”的“四人帮”，表达了要保护身处逆境的邓小平、与“四人帮”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与革命气概。

这多么似一股奔腾运行的地下岩浆，当它不堪地表的压力时，必将喷薄而出，释放它巨大的能量。

此后，不仅“四人帮”人心丧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在人们的心中动摇。广大干部群众的这种觉醒，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大革命”与“左”倾错误特别是“四人帮”的最终覆亡。因而可以说，全面整顿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最重要的准备。

# 二、龙年惊变：1976年的中国

龙，中国人的图腾。

龙年，主凶，主吉？

9月大悲，10月大喜。

9月9日，毛泽东撒手人寰，举国痛悲；

10月6日，“四人帮”束手伏擒，举国皆欢。

悲也天安门，喜也天安门。

华国锋成了中国党、政、军的最高领袖，这是华国锋时代的开始，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

## 2—1 “你办事 我放心”<br>政坛“黑马”华国锋

关于华国锋的身世，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版正式传记加以介绍。支离破碎的一些信息中，可以看到，华国锋是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那一年才17岁，1940年他投入了党的怀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命令山西抽调部分干部随军南下，当时担任交城县委书记兼任武装大队政委的华国锋第一个报了名，这样，“华政委”就从黄土高坡的山西，来到了山清水秀

的湖南,来到了毛泽东的家乡。

如果说这是一种历史的机缘的话,华国锋无疑是这一机缘的幸运儿。

为着更好地了解华国锋,我们先来看一篇文章。

## 紧跟华主席永远向前进

中共韶山区委员会

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两大喜讯传到毛主席的家乡韶山,韶山一片欢腾。巍巍韶峰尽情欢笑,滔滔韶河放声歌唱。一个多月来,我们韶山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遍山青松当笔,写不尽我们无限喜悦的心情,万里蓝天当纸,描不完我们无限喜悦的心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华主席啊,我们韶山人民无限依赖您,衷心爱戴您!

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培养、亲自决定、亲自安排的接班人。毛主席逝世以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在严重的历史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我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我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充分说明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愧为把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我们党的英明领袖。由华国锋同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们这个党大有希望,我们前程灿烂辉煌。

华国锋同志曾经长期担任党政领导工作,多次到韶山蹲

点，与韶山人民有着极其亲密的联系，回忆华主席在湖南的光辉革命实践，回忆华主席在韶山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我们深深感到，华主席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善于把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是领导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的领路人。

我们清楚地记得，1952 年春天，华国锋同志来湖南湘潭主持县委工作不久，他就带领几个干部，背着背包，来到韶山，住在苦大仇深的贫农家里，把毛主席的无限关怀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当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在推翻封建生产关系之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引导亿万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刘少奇则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极力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大搞“四大自由”，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华国锋同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带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满腔热情地支持韶山冲里新出现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同时亲自带头深入到各个屋场，调查土改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用本地的具体事例，启发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只有听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得到解放，逐步改变贫苦落后状态，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华国锋同志担任湘潭地委的主要领导工作以后，又多次来我们韶山蹲点，他亲自主持开办建社骨干训练班，组织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判刘少奇的“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及时总结巩固初级社，扩建升社的经验，并在全地区推广，使韶山

和湘潭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浪高一浪地蓬勃发展。1955年6月,韶山人民写信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韶山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好形势,毛主席亲笔回信,表示极为高兴,鼓励我们继续努力。毛主席的回信,是对韶山人民极大的鼓舞,也是对华国锋同志的工作的充分肯定。

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趁机跳出来,大刮"三自一包"的妖风,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华国锋同志再一次带领我们,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那段时间,提任省领导工作的华国锋同志,经常到韶山来,反复教育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管"单干风"刮得多猛,都要顶得住,决不能走回头路。1961年的一天,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派的一位"人物"窜来湘潭,把华国锋同志找去开会,硬要推销"产量责任制""经验"。华国锋同志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面尖锐地指出:这种搞法实质上就是单干,单干这条路线,就是不能走。不管对方怎样软硬兼施,华国锋同志真理在胸,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动摇。正是在华国锋同志的耐心教育和正确领导下,我们韶山人民顶住了"单干风",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日益巩固和壮大,在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大道上不断前进。

1968年4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韶山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华国锋同志就住在韶山生产队一户贫农家里。韶山是毛主席的家乡,是华主席多次蹲点,一直十分关心的地方。1969年,华国锋同志提议,按照毛主席1925年开展农民运动时湘潭县西二区所辖范围建立韶山区,并亲自建

立了中共韶山区委员会。华国锋同志多次指示我们，要把韶山建设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农业学大寨的典范，将来还要成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典范。

这篇文章刊载在1976年第12期《红旗》杂志上。

## 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科学地分析了完成民主革命后我国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形势，制定了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提出，农村土地改革以后，必须趁热打铁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先后担任湘阴、湘潭县委书记和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领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同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毛主席家乡韶山的贫下中农，最早办起了几个互助组，华国锋同志亲自前往韶山调查研究，对这个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给予了满腔热情的关怀和支持，推动全县逐步走上互助合作道路。随着初级社的蓬勃发展，华国锋同志又亲自指导在湘阴县洞庭围办起了全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华国锋同志坚强有力的领导，湘潭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始终走在全省的前列，到一九五五年三月，全省办起了一万二千个农业社，其中湘潭地区占百分之四十。特别是华国锋同志蹲点的韶山，运动发展更快。韶山贫下中农向毛主席报告喜讯，毛主席亲笔回信表示极为高兴。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革命洪流滚滚向前，遇到了党内外阶

级敌人的疯狂反抗。……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极力推销刘少奇的黑货,亲自出马,找湘潭地委的领导同志谈话,施加压力,要砍掉一批合作社。七月,省委召开全省地、县、区委书记会议,会前布置各地区发言时,因为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的步子比较快,冲破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束缚,刘少奇在省委的代理人极为不满,竟不让华国锋同志在会上发言。面对来势汹汹的逆流,华国锋同志毫不畏惧,鼓励县委书记们继续大力发展合作社,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华国锋同志的领导下,湘潭地区在刘少奇大刮砍社妖风的时候,农业社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多。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华国锋同志遵照毛主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指示,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全力以赴地领导运动。他系统总结了农业合作化的丰富经验,先后发表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严厉批驳了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一九五五年十月,华国锋同志参加了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歌颂了湘潭地区贫下中农牵着牛,手捧地契,踊跃入社的革命热情。毛主席听了非常满意。

一九五七年,资本主义右派趁我党整风之机,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而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华国锋同志,坚决地站在斗争第一线,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因势利导地组织和领导了反右派斗争。他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深刻地指出，这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就将没有希望”。华国锋同志坚定沉着，放手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及时组织群众进行反击，充分揭露批判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

……庐山会议前几个月，彭德怀窜来湖南，伙同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四出活动，拚命搜罗向党进攻的炮弹。面对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猖狂挑战，华国锋同志挺身而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作报告，写文章，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正确性，热情地歌颂革命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耻谰言。同时反复教育干部和群众，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干劲要一鼓再鼓，假话一定不要讲，群众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无产阶级原则性和求实精神，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称赞。在庐山会议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之后，毛主席亲自提名华国锋同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以后，毛主席来湖南视察，多次听取华国锋同志的汇报，称赞华国锋同志是讲老实话的人。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苏修叛徒集团的破坏和三年自然灾害，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刘少奇趁机跳了出来，散布悲观论调，大刮“三自一包”黑风，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华国锋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坚决顶住了这股

逆流。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形势,在困难的时候看到成绩,看到光明,信心百倍地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集体经济的力量,去战胜困难。一九六二年,刘少奇产阶级司令部派中南局主要负责人,到湖南推销"产量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黑经验,要华国锋同志执行。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华国锋同志毫不含糊,寸步不让,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种搞法实际上就是单干,当面顶了回去。当时兼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不仅自己到湘潭、湘阴等县调查,而且派人去了解所谓"产量责任制"的黑样板,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干部和群众,组织他们开展大辩论,使大家认识到,单干道路是走不通的死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华国锋同志还根据自己在湘潭县姜田公社蹲点的经验,主持起草了省委关于《加强党支部、办好生产队》的指示,有力地促进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不断巩固和发展。这一年,湘潭地区获得了大丰收,增产粮食九亿多斤。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一九六三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逐步展开。华国锋同志带领工作队,在韶山区永义公社蹲点,发动贫下中农,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了尖锐的斗争。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华国锋同志在工作中特别注意树典型,抓样板。岳阳县毛田区坚持同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斗争,革命和生产取得很大成绩。华国锋同志发现了这个典型后,多次到毛田检查工作,具体指导,撰写文章,总结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毛主席来湖南视察工作时,两次听取华国锋同志汇报毛田情况,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华国锋同志亲自指挥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韶山灌渠，为我省树立了一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好样板。华国锋同志不仅注意树立本地的典型，而且虚心学习外地经验。一九六三年十月，他和省委另一位领导同志，带领全省地、市委主要负责人，到广东参观学习，写出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主席对这个报告作了光辉的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指出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同志在担任省革筹小组和省革委会领导工作的过程中，处处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他反复强调要听毛主席的话，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搞什么"文攻武卫"，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制止了武斗。他不辞艰苦，耐心细致地做好各派群众的思想工作，总结推广搞好革命团结的典型经验，组织大批干部认真办点，树立样板，引导群众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重要指示，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群众的大联合，促进了全省党政军民的大团结。毛主席来湖南时称赞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

为了肃清打倒一切的反动影响，华国锋同志反复教育群众，要正确对待干部，严肃认真地做好解放干部的工作。由于华国锋同志坚持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湖南解放干部的工作是全国进展比较快的省份之一，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新省委。一九六八年，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江青、姚文元，在研究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名单时，硬要点名打倒省委的一位负责同

志,被伟大领袖毛主席否定了。事后,华国锋同志听到喊打倒这位同志的口号,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为此受到了一些人的围攻。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我们不能举手。这件事,充分表明华国锋同志一切行动听毛主席指挥……一九七〇年成立新省委时,华国锋同志提议选举一个反对过他而且犯了错误的人参加省委,并向代表们做说服工作,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毛主席对这种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一九七二年,华国锋同志执行毛主席关于解决湖南问题重要指示,拔掉了林彪反党集团安在湖南的黑钉子,教育挽救了犯错误的人,妥善地处理了湖南问题。他主持起草的解决湖南问题的报告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他在新省委成立后,立即主持制定了改进领导作风的十项措施,并以身作则,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参加劳动,送自己的孩子上山下乡,带头限制资本主义法权。他扎扎实实地领导了我省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一九六八年冬到一九六九年初,全省就组织了四万多人赴大寨参观学习,并培养和树立了新田县、安乡县等一大批先进典型,使大寨之花在全省盛开。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华国锋同志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十年建成工业省的指示,狠抓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树立了涟源钢铁厂、长岭炼油厂等一大批学大庆先进典型;组织了在全省建立小化肥厂的歼灭战,使每县平均有一个化肥厂;大力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使我省煤炭基本自给,为扭转北煤南运做出了贡献……

这篇文章原载《红旗》杂志1977年第2期。

上述两篇属于那个时代的文章,为认识华国锋、了解毛泽东为

什么最终选择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线索：

华国锋是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

华国锋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是在1955年。

正如前面所说，华国锋不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在民主革命的历程中，谈不上什么重大建树与功勋，除非书写一个县的县史，否则在这段历史中是实在写不到他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机缘使他成为毛主席故乡湘潭县委书记，这一年是开国不久的1952年。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家乡任职，华国锋自然是十二分努力，十二分小心。无论是在湘潭县委，还是在湘潭地委，以至任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莫不如此。在毛泽东认为的几次重大事件或风波中，华国锋都是很自觉地、坚定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

作为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在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挚爱深情中，当然也包括着对其家乡湖南、湘潭、韶山的更纯洁、炽烈的厚爱情感。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也就自然容易被毛泽东所认识。毛泽东对于华国锋，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从认识，初步印象，较深刻印象到深刻印象，从重视到器重的过程。

早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毛泽东就认识了"来自湘潭县"的县委书记华国锋。

1955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只有初中文化，17岁参加革命且已经有了17年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的华国锋，在学习毛泽东该报告的基础上，带领湘潭地委办公室秘书，到农村调查研究，并亲手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在指导思想上甚能迎合毛泽东意向，且又散发着毛泽东故乡的泥土气息和亲情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与关注，华国锋这个名字第一次引起他的注意。

1955 年秋天,毛泽东回到湖南视察,在长沙第一次接见了蓄着平头、穿着朴素而神情激动的华国锋,这在毛泽东是极不寻常的。10 月,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华国锋的介绍再次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是个老实人",而且,还特别地说道:"你是我的父母官哪!"

七届六中全会后,华国锋调湖南省委担任统战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毛泽东亲自选编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入了湖南 6 篇典型材料,中有 5 篇选自华国锋任职的湘潭地区,其中 3 篇由毛泽东亲自写了重要按语。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对刘少奇支持砍掉 2000 个合作社一事进行了尖锐批评:"我们有些同志,像裹脚老太婆一样蹒蹒跚跚走路,他们总是顾虑重重抱怨别人,你走得太快了,太快了。"而华国锋的文章和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经验介绍,被认为是来自农村最基层的典型情况,是对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系列论述正确性的最好证明。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1959 年 6 月下旬,即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带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回到长沙,回到一别 32 年的故乡。他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并由其陪同回到韶山。

在随后举行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还击"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进攻",并对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彻底"清算"。

彭德怀的问题牵连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张平化接任周小舟的同时，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到湖南，都要把华国锋召到身边，听取他的汇报，赞许他是讲老实话的人。

毛泽东的夸奖与信任，使华国锋更加充满了激情与活力。他知道，这种夸奖与信任，需要实实在在的东西予以"回报"。

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华国锋在湖南亲自总结推广了岳阳县毛田区"可贵革命干劲"，把毛田区搞成了全国仅次于大寨的农业典型。北呼南应——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馆里，毛田区的事迹排列到第一馆最前面的显著位置。后来毛泽东乘车途经岳阳，甚至想坐牛车到不通汽车的毛田去看看。毛泽东要坐牛车去，颇有玩笑之意，但毛泽东记住了有个毛田、有个华国锋抓的典型毛田，却不是玩笑。

1965年，华国锋调集10万民工，亲自任工程总指挥，为毛泽东的故乡湘潭，修建了全干渠长达240公里的韶山灌区工程，引涟水灌溉100多万亩农田，他还在卧龙般的渡槽上亲笔题写了"云湖天河"4个大字。

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狼烟已经在全国燃起。华国锋离开了是非之地的省会长沙，去湖南欧阳海灌区，担任灌区工程党委书记兼总指挥。

1967年7月21日，华国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点名人员上京参加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湖南两派的"谈判"。8月上旬，中央关于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定作出后，周恩来提名由华国锋参加筹建湖南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华国锋担任革委会副主任。

在打倒一切的天下大乱中，像华国锋这般未受冲击、岿然不动

的省委干部,是不多见的。显然,人们注意到了在他的背后,有毛泽东的影子。1969年4月1日至24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170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

"相传,春陵是古代的一个人的名字,他在这一带一直为人民做好事,后代人为了纪念他,把这条河改名为春陵江。"截断春陵江,解决郴州、衡阳两个地区水旱威胁,1970年7月,华国锋担任工程总指挥长兼党委书记的欧阳海灌区经众多建设者们4年之艰苦奋斗,终于全面竣工。在烽火连天的"文化大革命"中,有此成就,确实是殊为不易。这是湖南境内继韶山灌区之后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是华国锋"抓革命,促生产"的丰硕成果。它非常不易,也非常"适时"。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既有对水利工程的,当然也有对华国锋个人的。

1970年,新的湖南省委成立,华国锋任省委第一书记。这是自"文革"经过砸烂后成立的全国第一个新省委。因此,华国锋是中央任命的第一名省委第一书记。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同时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1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斯诺,讲话中谈到了华国锋。毛泽东说:"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班子里的人。"

斯诺回去以后,写了一篇记述在北京与毛泽东谈话情况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生活》杂志上,49岁的华国锋因此引起了国外的较多注意。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充满神秘色彩和惊险历程的南巡。毛泽东这次南巡的目的,是

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吹风，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了解去年“庐山会议”没有了结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

在武昌期间，毛主席想同华国锋谈话，我就打电话把华国锋从北京请来了。

8月25日晚，毛主席在武昌同华国锋同志谈话，我也参加了。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华国锋：你来了，你们现在忙什么？

华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

毛主席有点严肃，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应该主要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主席对华又简要叙述了党的历史……

这是汪东兴在其新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的一段记述。当时，华国锋已到中央工作，同时仍兼任湖南省委书记职务。

8月27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到长沙后的一个星期内，分别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尖锐地谈到了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而这一星期内，华国锋是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的。

在湖南省委大院一侧的“九所”毛泽东下榻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陪同人员心事重重地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然后，毛泽东站起身，亲自带头指挥唱起了昂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给大家

讲解歌词,要求大家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这两首歌。

刚到中央的"老实人"华国锋,再老实也明白,毛泽东带头唱出这样的歌声,是有着怎样的重大政治意义的!当毛泽东离开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随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这两首歌迅速地从湖南唱到了全国。

1972 年,华国锋经毛泽东提名,继任刚病死的谢富治为公安部部长。

1973 年 5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并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参与筹备中共十大的召开。

在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同年 9 月,他率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参加西藏自治区十周年成立大典。10 月 15 日,代表国务院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总结报告。

毛泽东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还不很熟识的华国锋,把"接班人"的担子交给了他。这也表明,毛泽东对于在自己的信任和提携下发展起来的"四人帮"一伙甚为失望,并有意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2 月 3 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同日,中共中央发出 1 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至此,华国锋走完了他的中国政坛"黑马"的历程。这匹"黑

马"的出现，不仅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一位外国的传记作家这样写道：

> 妄图操纵患病的毛泽东的"四人帮"，当然不是想为华国锋这位人们不大熟悉的"外地"政治家掌权铺平道路。但是，他们疯狂地反对邓小平无疑有利于华国锋的晋升。邓小平的坚定不移的务实精神使毛泽东感到不安，因此，从1975年秋起再次把矛头指向邓小平。但他清楚地了解其夫人以及上海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在幕后搞阴谋活动，并有政治野心。"四人帮"垮台后公布的语录证实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的有利条件正是在于他不参加任何一派，而是长期无限忠于毛主席。
>
> ……重要的是，他是务实派和激进派都能接受的人。因此，4月间，党的主席委托他负责审查"邓小平案件"。

当然，最为恼怒的还是早已"迫不及待"的"四人帮"，在他们看来，他们使完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周恩来搞下去，把邓小平搞下去，眼看到手的印把子却被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不费吹灰之力给取去了。因此，张春桥才有"1976年2月3日有感"，尽显失望与仇恨。

因此，"四人帮"才把篡党夺权的目标迅速转向华国锋，乃至把华国锋当作"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因此，华国锋只能站在党内正确路线与健康力量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边，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粉碎"四人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证书"，华国锋很自然地被推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这是后话。

1976年4月30日晚，华国锋在陪同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受到

毛泽东接见之后,又留下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形势等问题。毛泽东当即亲笔为华国锋写了三句话: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在病情加重的时候,毛泽东又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对他们作了重要谈话。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是在交待"后事",尽管毛泽东也意识到他的"后事"的悲观色彩——"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不少","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但毛泽东这种忧虑与悲观,这种交待性的诉说衷肠,又何尝不是希望华国锋等人维护和继续他的"文化大革命"呢?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十届三中全会予以追认。

1977年7月21日通过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全会

完全拥护中央政治局根据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于1976年10月7日作出的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中央政治局在我们党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进行激烈斗争的非常时期，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作出的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非常适时的，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这个决议，不仅对当时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稳定全国的局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巩固我们党的领导，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国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 2—2　"过去"与"既定"区分正邪<br>以快打慢"四人帮"伏法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是的，这是一场长期斗争。尽管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其萌动那一刻起，就已注定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而这场长期斗争的最后关头的较量,实际上是从"按既定方针办"的口号出笼开始的。

随着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的相继逝世,龙年的中国、龙年的中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之中。太多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了一种不知何所往、不知何所终的惶惑与不安。

"我哭豺狼笑":卧榻之旁觊觎久之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却暗自欢喜"天赐良机",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不过,他们自己心中也清楚,在他们的"登基"之路上,要做的事太多,要"打倒"的人也不少——

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临终前的"最高指示",使他成为指定了的当然接班人。

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执掌着军界大权。

邓小平,"人才难得",时仍身处逆境,但却是令江青一伙最为惧怕的一个。

……

因此,江青一伙心中也清楚,要夺取最高权力,还必须依靠毛泽东的威望,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离开了毛泽东,将什么也没有。

于是,他们想到了"旗帜"问题,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嘱咐。

于是,"照过去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表面上词义区别并不大的一句"临终嘱咐",竟成为时局的焦点,最后的斗争的中心。

"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前两句话,江青等人都是在场的。但是,想抓旗帜的江青等人却把"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并作为毛泽东的"嘱咐"大作文章。

毛泽东逝世后一周，江青一伙炮制出“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中发表。社论说：

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按既定方针”，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

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9月17日起，姚文元不断给新华社打电话，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中央报刊把它作为当时的宣传中心，占据主要版面，连篇累牍，反复宣传。他们这样做，就是要争夺毛泽东这面旗帜，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的忠实继承人，以党内“正统”自居，抬高自己，打击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同时也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方针和决策，保护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进而夺取最高领导权。

对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出笼，叶剑英表示这不能令人信服。

“按既定方针办是主席的临终嘱咐。”江青找上了叶剑英，喊叫着传播他的“嘱咐”。

“我不晓得这个临终嘱咐的来路。”叶剑英平静地说，“我问过许多人，先念、徐帅、聂帅，还有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没有一个清楚的。我们这么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都不晓得，岂不怪哉！”

“好呀，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想串通起来欺负我！”江青摆出了毛泽东遗孀的“高贵”身份，颐指气使地撒泼：“你们在一起都商量了些什么，谁牵的头？你叶剑英必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江青同志！”叶剑英一把摘下眼镜，竭力抑制着中烧的怒火，“我今年79岁了，顶多再活十年。我一生做过好事，也做过不少错

事,但我尽量凭良心说话。今天,谁要是硬逼我出卖良心,我叶剑英也可以不要这十年了!"

以胡搅蛮缠著称的江青被镇得目瞪口呆。

华国锋也不能不出面纠正。10月20日,华国锋在外交部长乔冠华9月30日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作了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避免再错传下去把它删去了。

但是,张春桥却在这个文件上批:"华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纠纷。"江青圈阅后,划了一根线表示同意张春桥的意见。

江青一伙一面极力阻挠下达华国锋的批示,以防伪造毛泽东临终嘱咐的骗局被揭穿;一面,又指使自己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加紧炮制舆论文章。

10月4日,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文章声称:

> 在这全党全军各族人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誓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庄严时刻,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毛主席的这一嘱咐,金光闪闪,字字千钧。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继续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
>
>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

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袖的时候，他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而当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之流完全背叛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他们不但"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第203页)，相反，却扯起修正主义的黑旗，终于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际上修正主义逆流猖獗一时，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新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前进。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上台以后大刮右倾翻案风。从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中抽出三条，炮制了"三条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他授意下炮制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论总纲》中，更是集卑劣手段之大成，肆意歪曲马列和毛主席的话，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方能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识破党内资产阶级的种种鬼蜮伎俩,看清他们的实质,坚定地贯彻捍卫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同时,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也一定会采取各种方式,施加各种影响,支持党内资产阶级,妄图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能斗争就不能进步"的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准备迎接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在同党内资产阶级,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前面的征途尽管还会扑来阵阵邪风恶浪,还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坚定地执行毛主席既定的革命政策,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过去,我们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后,我们继续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定会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经过不断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八亿中国人民,是毛主席在长期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用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亲自哺育起来的英雄人民。亿万人民学习、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在这样的人民面前,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

……今天,在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面前,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哺育的英雄的中国人民面前，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我们亿万革命大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永远沿着毛主席既定方针指引的方向前进。

这篇长文，不啻是一篇反革命的动员令，杀气腾腾、硝烟血腥味遍布字里行间。在知情人们看来，其矛头直指华国锋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暗指他们是"修正主义头子"，并叫嚣"绝没有好下场"；即使在不知情，但已熟悉"文化大革命"历程，掌握"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规律"的广大干部群众看来，也不难感受到一场极为重要的"斗争"已经展开。

"按既定方针办"，"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劝进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

9月23日，姚文元布置新华社给江青写信。

迟群、谢静宜则盗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了"效忠信"。10月4日，迟群又在清华大学发动，布置各系给江青写信。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这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的写信人，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夺权之势

头、“登基”之欲望更加猛烈起来。

最后的较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鼓噪声中,江青一伙在暗中的夺权行动更是呈“风紧”之势。

9月9日和10日,张铁生在辽宁省团委和省知识青年办公室讲话说:“现在,我们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华现在是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人在支持拥护他。”张铁生的讲话记录还专程送给了在北京的毛远新。

毛泽东逝世的当天,迟群在清华大学讲话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大家要坚定、镇静。要特别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

在小喽罗们不断敲边鼓的同时,江青一伙亲自上阵“办大事”。

王洪文按他们一伙的计划执行最有影响、最能反应国内各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人倾向和态度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他布置秘书架起保密电话,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直接与各省、市、自治区通话。他面授了两条重要指示:

一、在为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

二、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9.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9月11日晚、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士奇电话。

一些与"四人帮"接近的负责人对此暗暗高兴,而不少负责人对此产生怀疑,直接打电话请示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请示这是不是中央的决定。

米士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主席生活过的地方,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华国锋闻报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想架空党中央,夺取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权的行动步骤。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再寻找机会。

9月19日,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江青在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密谋后,突然打电话给华国锋:"提议中央立即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而且,江青还狂妄地提出,不让政治局

常委、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就定我、洪文、春桥、文元,加上你,还有毛远新参加会议。”江青俨然以当然主席的口吻发话,擅自将她自己、姚文元、毛远新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议在王洪文、张春桥的策应、配合下,于9月1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内的一间小会议室举行。会上,江青要求清理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并提出“应该由我们来清理!”由于政治局多数人不同意她的要求,江青大吵大闹了一阵,也只好作罢。

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再挑事端。张春桥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江青则抓住叶剑英、李先念等要毛远新回辽宁的意见,公开提出:“毛远新不能回辽宁,要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当这些无理要求当场遭到多数政治局委员拒绝时,江青逼着汪东兴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问叶剑英怎么处理,叶剑英说:“要坚决顶住!”

10月1日,江青到清华大学讲话,诬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她说:“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我也向你们年青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10月2日,王洪文让新华社记者给他照标准像。“四人帮”还特意照了“历史性纪念”的彩色合影。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讲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同日,江青到景山公园,在几株苹果树下搔首弄姿,笑逐颜开,让摄影师一气给她拍了17张半身像。在摘苹果的时候,她说:“苹

果也留着吧，过盛大的节日时再吃吧。”

还是在这一天，迟群催促“梁效”写作班子加快整理一批党、政、军领导人的黑材料，送“四人帮”急用。迟群的秘书洋洋得意地说：“主席、委员长、总理就要定下来了，要提升一批，罢免一批。”

10月4日，梁效文章发表的同时，张春桥写下了类似于林彪《571工程纪要》式的政变提纲：

历史与现实。如今。时代。

革命与专政。怎样革。

怎样巩固政权

杀人。

“四人帮”甚至拟定了他们逼宫的最后计划：在他们最后摊牌时，以掌握在手的“第二武装”民兵为主，以控制的部队为辅，动用坦克，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武力逼宫！

同日，驻北京郊区某兵种部队，突然调换了参谋长！上海的商店里，大红纸都卖光了，“四人帮”的爪牙正在准备庆祝他们的“特大喜讯”，并公然对反对他们的人叫嚣：“9号以后再同你们算帐！”

一些省市专门发了拍电影用的伊斯曼彩色胶片，准备拍摄所谓“盛大节日”的庆祝活动！“‘四人帮’就是一伙反革命，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性质早已越出了党内斗争的范围。”情况万分危急，已到了生死关头。另一方在做些什么？

“疾风识劲草，板荡识诚臣。”9月10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家，开门见山地提出“现在主席去世了，你对这个局势怎么想啊”的问题。华国锋回答说：“这个，我还没想好哇！”叶剑英认真地说：“你没有想好，人家可是抓得很紧喽。”“过去你是副主席，有个主席在，有些事情不好处理，现在主席逝世了，你就要站出来，该拿主意的要拿主意，该下决心的要下决心啊！”

其后,叶剑英接连几天第二次、第三次找华国锋谈形势,希望华国锋能站出来,负起斗争的责任。在第四次谈话时,华国锋说:"只要老同志支持我,我就干!"

叶剑英当晚即把粟裕、宋时轮找到家,要他俩作好准备。然后亲自给已是政治局委员的汪东兴打电话,要他妥善保管好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一一加以清理登记或封存。

邓颖超也驱车到叶剑英住地,共商铲除"四人帮"、挽救党、挽救革命事业的大计。

还在毛泽东病重的日子里,聂荣臻来到叶剑英住地附近,名曰小住几天,实则与叶剑英共商铲除"四人帮"大计。两人一致认为:这个东西,不是正常手段能解决的,特别是江青,弄不好,不太好办,但不解决不行。

毛泽东逝世后,王震去看陈云,建议他"应该串串门子,到叶帅、小平同志那里串串门子。"几天后,陈云来到叶剑英住地,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局势怎么办啦,得赶快想办法。"

粟裕、宋时轮则催促叶剑英抓紧动手,乃至还作好了万一发生不测,只好上山打游击的准备。"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说:"还要看时机,要捕捉最有利的战机。""你们想得很远,是要有最坏的打算。不过,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件事情办好。""我相信我们能够战胜他们!"

10月3日下午,李先念驱车来到叶剑英住地,他是奉华国锋之命,带着华国锋的"手令":

"叶帅:现在情况很紧急,要赶快想办法,由你下决心好了。"

叶剑英接到华国锋的手令后,同李先念就铲除"四人帮"的若干细节作了仔细商量和详尽安排。

10月5日下午,在北京西山中央军委作战室内,华国锋、叶剑

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等中央政治局委员酝酿着粉碎"四人帮"的最后决策。此时,驻在上海的海军政委苏振华在电话里向叶剑英报告:"'上海帮'动起来了……"聂荣臻元帅办公室也来电话,聂帅说有人监视他的住宅,他已经转移了,希望叶帅和其他同志要防备。各种迹象已完全表明,江青一伙已经迫不及待磨刀霍霍地"动起来了"。

"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一句老生常谈的政治术语,现在变成了将要发生的血淋淋的现实。"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们要当机立断。"李先念果断地说。

"干!"叶剑英毅然地将手向下一压,"人民是支持我们的!"

华国锋也激动地一挥手:"干吧!"

1976 年 10 月 6 日晚 8 时,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由叶剑英亲自指挥,首先抓捕了按时前来参加政治局"常委会"的王洪文。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宣布决定:"王洪文,你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篡党夺权,问题严重,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王洪文在被带走的时候,不自禁地哀叹:"没想到你们有这样快。"王洪文的自白绝好地表明:他们已经动手了,可是行动晚了一步!

随后,前来"开会"的张春桥、姚文元也在怀仁堂束手就擒。与此同时,在中南海江青的住宅里,江青落网。正在住宅里看电视的毛远新,也被逮捕。

耿飚奉命带领一些人接管了新华社、中央电台等宣传机关。这样,在前后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就顺利地处置了"四人帮"及其在京的同伙、帮凶、爪牙!

祸国殃民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这样被粉碎了。

10 月 21 日,85 岁的郭沫若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表

达了人民的心声: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1976年10月7日,当胜利的曙光照耀着华夏大地,中国这艘巨轮已驶入新的航程。

但这一切还都处在保密状态,《人民日报》及全国所有的报纸以及电台,没有透露半点风声,谁都不知道10月6日午夜爆发的那桩惊天动地的壮举。

因为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尚处于"四人帮"余党手中,他们还拥有一大批民兵武装。这里是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发家"的地方,是他们赖以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军事基地"。

"四人帮"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早就积极策划夺取军权。这一图谋失败后,又策划建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妄图把民兵变为他们掌握的"第二武装"。这个阴谋又未能得逞,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扩大和武装已经由他们控制的地方民兵。

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的8月下旬,"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就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突击发放武器,加紧装备上海民兵。共发枪74000多支、炮300门、枪炮弹1000多万发。他们还密谋策划、炮制了一个以"反击"为代号的所谓"防止反革命暴乱实施方

案",命令每天有1000名民兵、200辆汽车值班待命,并组织民兵"夜间拉练",实际上是为反革命暴乱作预演。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他们又在20小时内突击下发子弹600多万发、炮弹15000发,进行所谓"战备演习"。上海的几个头头还到民兵指挥部突击检查,部署应急力量,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具体准备。

"四人帮"在此期间也加紧了与上海的亲信的秘密联系。9月21日,张春桥在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了8月间丁盛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汇报,以及他们控制的上海民兵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张春桥对徐景贤说: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要小心谨慎,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9月23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

10月7日的上海,除了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意识到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就连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在这一天仍如期举行婚礼,没有察觉王洪文在北京已发生了意外情况。

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对上海的情况早就有所了解、有所防范,他们根据上海的情况,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把上海的几个头头召到北京,陷上海"基地"于群龙无首的局面。

10月7日晨,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市委书记周纯麟立即赴京开会。上午9时,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马天水向大家宣布了这件事。按照惯例,每次去北京开会都有"四人帮"事先通气,这次情况异常。会上决定马天水一行到京后两小时即给上海通电话。

马天水到了北京,也就算"到了地方"。上海方面更加惊恐不

安。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不停地打电话到北京找"四人帮"及其党羽也毫无结果。王洪文、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何文秀在电话中找到了在京的于会泳、祝家耀、周宏宝,但他们不仅没见到"四人帮",而且也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异样。

10月8日中午12时许,上海方面终于与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接通电话,得到"我的老胃病发了"的暗语。上海市委常委会决定:金祖敏的秘书廖文金立即飞赴北京,用身体好(情况好),老胃病发作(右派得势)和心肌梗塞("四人帮"完蛋)三种暗语尽快向上海汇报情况。徐景贤还给新闻单位负责人下令:"你们这几天要注意新华社的电讯稿,如中央发出有关处理上海几个人(指王、张、姚)的决定,你们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广播。你们一定要听从市里的命令。"

当晚,廖文金从北京传来消息:"我娘心肌梗塞死了。"

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召开市委常委会。认定"北京发生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要决一死战"。他们认为是拉出民兵队伍,搞武装叛乱的时候了。

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施尚英气急败坏地叫嚷:把民兵队伍拉出来,同他们对着干,抗战到底!

"四人帮"的保镖陈阿大,拍着胸膛狂叫:我脑袋是挂在裤腰带上的,非决一死战不可!先用沉船堵住黄浦江,再把铁路搞断,还要用大型钢锭封锁飞机场跑道,挡住陆海空的来路!

工会头头叶昌明提出:要发动总罢工,实行停工、停水、停电,造成全国影响,胁迫中央!

王洪文的"小兄弟"之一马振龙大哭大叫:宁可杀头,也要大干,不干对不起"洪文兄弟"!

"四人帮"的笔杆子朱永嘉提议: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

打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口号。他叫嚣:即使失败了,也要"以鲜血教育下一代"!

群魔乱舞之下,徐景贤、王秀珍决心孤注一掷:要像"首长"们事先策划的那样,立即发动武装叛乱。他们决定"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组织了武装叛乱指挥班子,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并决定兵分两路,分头行事。第一路由徐景贤率领,负责抓总,并分工管住报社、电台,掌握舆论工具;第二路由王秀珍率领,抓工、青、妇、民兵、公安,直接指挥武装行动。

接着,徐景贤写下第一道手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上海全市进入了一级紧急战备状态。繁华的大上海,刹那间阴云密布,笼罩在恐怖之中。

民兵指挥部正在调兵遣将,一批批荷枪实弹的民兵被部署在市区各战略要地,还有一些民兵戴着头盔,手持武器,昼夜巡逻。

控制上海首脑机关和交通枢纽的行动正在展开:从市区到郊区设立三道控制圈,既戒备本地的干部、群众,又抵御解放军从外地进攻,相应的口令、暗号已经制定出来。

为武装叛乱架设的15部电台,组成了两个通讯网,相互之间沟通联络,日夜收发电报。运送人员和物资的220多辆汽车、摩托车,来往奔驰于各个武装叛乱据点之间。

被武力控制的报社、电台戒备森严,它们已受命不许刊登、播发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并且随时准备发表叛乱的口号和《赫鲁晓夫是怎样篡党夺权的?》这一类恶毒攻击党中央的文章。

一场武装叛乱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眼看就要给我们的国

家带来深重的灾难。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叛乱者的愿望发展。

在北京,已经明察这场武装叛乱情况的党中央,作出了果断、有力的决策,在马天水到京之后,又把徐景贤、王秀珍先后召到北京,上海这"三巨头"一走,叛乱分子顿陷群魔无首的困境。与此同时,一批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被派往上海,打乱叛乱部署,控制事态发展。

在江苏、浙江和吴淞口的海面上,人民解放军陆海空部队严阵以待。指战员们已经接到命令,做好了准备,如果叛乱分子敢于铤而走险,立即采取行动加以平息。

在上海,广大干部、群众对武装叛乱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同样是叛乱分子们没有想到的。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没有对发动叛乱一呼百应,而是在为江、张、姚、王垮台的秘密传闻而奔走相告,互相庆贺。

流水落花,大江东去。当党中央正式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几天前还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叛乱头目们,及其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了。

太阳从东方升起,大上海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 2—3 举国揭批"四人帮"
## 广场兴建纪念堂

"四人帮"被粉碎了,深入揭批"四人帮"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首要之事。

10月8日到15日,中央政治局分别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

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粉碎“四人帮”，并初步揭露了“四人帮”一伙阴谋政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党罪行。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列举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泽东1974年2月以来对他们一伙的批评的事实，作出了对他们一伙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这个通知是一个重要文献，第一部分全文如下：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

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国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

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1974年10月，“四人帮”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去见毛主席，告周恩来总理的状，妄图利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织他们的内阁，遭到毛主席的痛斥。1976年2月3日，在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一天，张春桥亲笔写下一个《1976年2月3日有感》，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极端不满，妄图取而代之。

他们大搞阴谋诡计，私立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到处插手，煽风点火，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在宣传报导中，突出地宣扬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在

同某外国作家进行的几十小时的谈话中,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他们动不动就训人,给人戴大帽子,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以为时机已到,无所顾忌,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四人帮"加紧秘密串连,阴谋策划。他们四出游说,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封为"无产阶级钢铁公司",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公然煽动反对党中央。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在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发表,并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10月2日,华国锋同志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中指出,毛主席1976年4月30日亲笔写的指示是"照过去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错了三个,戳穿了他们的伪造。10月4日,他们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用"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肆意攻击党中央。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加快了步伐,要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中央决定,对王

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喜讯传出，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呼，因为粉碎"四人帮"，终结"天下大乱"的局面，是如此深刻地代表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从10月21日到30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香港、澳门各界爱国同胞也举行了庆祝会。

10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的社论，社论说：

>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以无产阶级的雄伟气魄，对"四人帮"反党集团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取得了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庆祝胜利的同时，揭批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布置。

——197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专案审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反党罪行，并收集汇编其罪行材料，准备下发各部门、各地区，提供批判材料。专案组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由汪东兴负责。

——成立中央宣传口和中宣部，负责领导宣传理论工作。宣传舆论阵地历来为"四人帮"所把持，但在他们被粉碎的那一刻起，"四人帮"的这种控制权便成了历史。中共中央首先成立了中央宣传口，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5人组成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协助中共中央管理全国的宣传工作。不久之后，成立中共中央宣传部，张平化担任部长。

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

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军队系统、在京宣传单位负责人共133人。中央宣传口耿飚、朱穆之、李鑫参加了会议。

耿飚首先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并根据宣传要点的精神讲了话。宣传要点主要有三个:

一是突出宣传华主席;

二是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

三是彻底揭批"四人帮"。

会议指出:"四人帮"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敌,要坚决打倒;要宣传对"四人帮"的斗争不能手软;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要掀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对"四人帮"表扬过的单位和个人,不要轻易在报刊上点名,对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一般也不要点名。会议初步揭批了"四人帮"篡党夺权和破坏宣传理论战线工作的罪行。讨论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性质与意义,部署了揭批斗争的任务。这次宣传工作会议,对当时的宣传工作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强调突出宣传华国锋,继续新的个人崇拜;揭批"四人帮"限于批右,不批"左"的指导思想,对揭批"四人帮"也带来不利与阻力。

各级领导人将中央1976年16号文件精神向广大群众反复宣讲,传达了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一系列批示,阐明了对"四人帮"斗争的性质、意义和党的政策,从而较为有力地动员和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形成了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简要地说,这场揭批斗争是在中央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的,前后共进行了"三大战役"。

第一个战役,着重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

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四人帮"要害是篡党夺权》的社论。社论指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全部反革命罪行的要害,是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建立法西斯的帮天下,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四人帮"干的千件事、万件事,事事不离开这个要害,事事为的是这个要害。12月2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围绕"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罪证材料,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以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为中心的第一个战役的斗争。广大干部群众从组织上、政治上揭批"四人帮"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大搞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和篡党夺权的种种阴谋;揭批他们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残酷迫害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揭批他们网罗党羽、组织法西斯帮派体系,突击发展党员,提拔亲信,重用坏人,建立法西斯专政等。

大寨大队的农民群众对"四人帮"进行了深揭深批,一致认为"四人帮"的要害问题就是"三搞一篡",即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大庆油田的工人群众对"四人帮"进行了深揭深批,一致认为"四人帮"破坏工业学大庆,反大庆,砍红旗,目的是篡党夺权。

浙江省人民群众对"四人帮"进行了深揭深批,批判"四人帮"在浙江大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的罪行,一致认为,"四人帮"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是在浙江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重大步骤。

……

揭批"四人帮"本身就是一场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随着斗争的展开和深入,阻力和干扰也越来越大。

首先,阻力来自"四人帮"势力的干扰、破坏。他们采取种种手段、设置障碍、阻挠揭批斗争。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制造谣言,转移斗争大方向。诬蔑"这场斗争是派与派之间的斗争",说什么"要警惕'真四人帮'揭批假'四人帮',挑动不同派别之间的对立情绪"。1977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表明"政治谣言"已经非常"猖獗"。通知指出: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有少数坏人制造谣言,甚至伪造华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妄图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干扰运动的方向。通知要求要稳准狠地打击政治谣言的制造者,要不听谣,不传谣,不信谣,要健全和改进传达报告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根据这个通知精神,3 月 28 日国务院下发 30 号文件指出,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少数罪恶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

(二)在帮派内部统一口径,研究对策,订立攻守同盟,转移或销毁罪证,叫嚷"两肋插刀也不出卖朋友","不能卖友为荣","不当投降派"。

(三)争夺群众,散布"错误人人有份",企图拴住群众;甚至搞假揭发,嫁祸于人,打击陷害积极分子,用"四人帮"的办法来整好人,搞新的冤假错案,以隐蔽自己、破坏揭批斗争。

(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眼看保不住自己,就安插第二套班子,让其同伙搞假揭发批判,进行"合法斗争",明批暗保。

其次,阻力来自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的干部群众。他们曾与"四人帮"或帮派体系篡党夺权活动有联系,干过一些坏事或错事,

顾虑重重，捂盖子，左躲右闪，不敢揭批或避重就轻；特别是一些与"四人帮"有密切关系、甚至是帮派骨干分子，仍占据领导岗位，利用职权主持揭批"四人帮"的大会，实则压制揭批运动。

再次，揭批运动的阻力来自当时的党内。虽然他们不是自觉维护"四人帮"，但实际行动却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一)他们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规定凡是毛泽东看过、点过头、批示的都不能碰，更不能批。

(二)他们对揭批运动定调子，认定"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必须批判他们的"极右"实质，而不准批"左"。这种"极右"的定性，严重阻碍了揭批运动的发展和深入。

(三)对揭批"四人帮"划出许多新的"禁区"，例如：一不准触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二规定揭批查的重点放在中共十大以后，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的事实。这些"禁区"严重束缚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手脚，严重的阻碍了揭批运动的进行。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党内以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坚定的立场，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措施，排除阻力和干扰，把揭批运动不断引向深入。对于来自党内的阻力，则通过学习、讨论、争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整个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在不断排除阻力与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

1977 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乘胜前进》的社论。社论指出：1977 年的中心任务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要充分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这场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个战役，着重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

1977 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

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开始了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为主的第二个战役。

《人民日报》等报刊登载了许多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广大干部群众、知情人士向中央揭发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丑恶历史。江青等人曾经不择手段地迫害了解他们历史的知情人,而今,他们的历史却被查了个"底掉",他们千方百计想隐瞒的东西,终究是隐瞒不了的。

"根据调查核实的大量证据,已经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揭批第二战役的顺利进行,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对"四人帮"作出组织处理作好了准备。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指出:

> 王、张、江、姚是一伙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
>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肆意篡改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四人帮"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根据党章规定，全会一致决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向全国通报山东、上海、云南、辽宁等省、市以及保定地区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和经验；同时，根据斗争和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调整和加强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调整和加强了中央党政军一些部门的领导，逐个地研究这些地区和部门的问题。

第三个战役，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理论。

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的极右实质有其各方面表现，并先训练好骨干，做好宣讲、批判工作的理论和思想准备。

但是，这份"材料之三"名义上是关于"四人帮"思想、理论、路线方面的材料，实际上对于"四人帮"的重要的反革命理论却很少触及。这是因为，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否认"四人帮"有什么思想和理论。他认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从而没能指出"四人帮"反动思想和理论的重大问题，这

就使广大干部群众甚觉失望。

但广大干部群众仍坚持认为,第三战役是关键一仗,必须要从思想理论上把"四人帮"揭深批透,要把揭批斗争同思想理论的正本清源结合起来。展开了对诸如"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关系新变动"论、"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论、"老工人变成既得利益者"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论、"全面专政"论、"黑线专政"论等大量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从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批判;并开始冲破只准批"极右实质"的限制,联系实际揭批了"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种种极"左"表现。

在这一阶段,有两大禁区开始被突破。

首先是理论界终于不得点名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的禁区。

张春桥、姚文元是"四人帮"的理论"灵魂",是他们那一套危言耸听的假社会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炮制者。他们的思想理论,不仅危害全国,而且危及到世界上某些兄弟党,其影响和流毒甚大。而张春桥、姚文元的上述两篇文章,前面已有所介绍,可以说是他们的两篇代表作。

对于这两篇文章,理论界于1977年就已撰文准备批判。《红旗》杂志曾请示要不要点名批判张春桥、姚文元这两篇文章。2月4日,汪东兴批示说:"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评。"并将这一批示印发所有宣传单位,规定要严格执行。这当然给思想理论界划出一个禁区,扣上一个"紧箍咒",大大影响阻碍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化与发展。现在,理论界终于冲破禁区,抛掉"紧箍咒",点名批判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这

两篇文章,打开了揭批斗争的新局面,开始接触到"四人帮"的实质性的东西。

通过这一阶段的揭批斗争,从总体上讲,开始剥掉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笔杆子"和"文艺旗手"等画皮,还其反革命真面目,初步涉及了被他们一伙搞乱了的一些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和政治是非。

其次是揭批斗争又冲破了揭批"四人帮"只能揭批1974年以后的禁区。

林彪同"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大乱中国,乱中夺权。这是不争的事实。1966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炮制过程与出笼过程,就标志着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反党篡权活动的开始。林彪自我爆炸后,"四人帮"包庇、继承和发展了林彪的极左路线。"四人帮"的"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就是从林彪的所谓"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批判干部的运动"的反动理论发源而来的。一个现象说明,林彪自我爆炸后,追随林彪反动理论、反动路线的人很自然地投靠到"四人帮"麾下,就是因为这两个反党集团从思想路线、理论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等方面一脉相承的缘故。

这些事实都说明,揭批"四人帮"必须联系林彪。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勇敢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提出:"要把'四人帮'批深批透,非联系批林彪不可。"

实践证明,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彪,大大深化了揭批运动,一些单位和部门还进一步挖出了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爪牙,对于摧毁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排除阻力、干挠,揭批查"四人帮"运动经过几大战役,历时两年多,到1978年底取得

了基本胜利。主要有:

对林彪、"四人帮"大量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对诸多方面的破坏进行了一定的揭发批判,初步分清了被他们搞乱了的部分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治是非和政策是非。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敢于突破旧的和新的禁区,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先进分子。

结合揭批查运动,各条战线进行了整顿,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

到1978年8月,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的主要负责人中,查出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而被撤职的有9人,约占这些地区主要负责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开始注意和逐步恢复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破坏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的作风。

全国上下开始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共中央内部的斗争逐步纳入党内斗争的正常轨道。

当然,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的揭批查运动不可能是彻底的,但上述已经取得的胜利,已足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必要和可能结束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揭批查"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尽早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

与轰轰烈烈的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时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是,在共和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

这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一呼百应。恩格斯在悼念马克思的时候说过:"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

于毛泽东主席正是怀着同样的感情。

1976年10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作出《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为了永远纪念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教育和鼓舞工农兵和其他劳动群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决定：

(一)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二)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

对于这个决定，10月10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说得好，这是《亿万人民的心愿》。社论中说：

毛主席是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中央决定在我国首都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让世世代代人民群众能够亲眼瞻仰毛主席的遗容，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激励他们的革命斗志，这是八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

11月24日，在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下午4点10分，华国锋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

来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的工地。华国锋在奠基仪式上讲话说:今天,我们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庄严举行毛主席纪念堂的奠基仪式,将中央的这项符合亿万人民心愿的决定付诸实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建成以后,世世代代人民群众将在这里亲眼瞻仰毛主席的遗容,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重温毛主席的教导,亲身感受毛主席的教育和鼓舞。

在这里,华国锋发出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接再厉,乘胜前进,把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华国锋讲话后,走到米红色的基石前,挥动铁锹,在纪念堂的基石上培上了第一锹土。

此时华国锋心情如何,是不可得知的。但有一点,他肯定是相当满意的,这就是,"继承毛主席遗志,听从华主席指挥!"成为毛主席纪念堂工地最响亮的口号。

从这一天起,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速度可以说是真正的高速度。方圆两万多平方米的施工现场,四周悬挂着"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等巨幅标语。战斗在这里的人们,心里就像燃了一团火,手上有使不完的劲。他们把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怀念的深情,倾注到工程建设中,把自己的汗水洒在这庄严的工地上,被大家看作是最光荣的事情。每个单位,每道工序,每项任务,工期不断提前,纪录不断刷新。

八亿神州心相印,举国上下望北京。这一工程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千里迢迢,万里遥遥,一封封充满怀念毛主席深情的信件、电报和各种珍品,从祖国四面八方飞向北京。

新疆的钢铁工人寄来了天山上的雪莲花籽，六盘山上的“赤脚医生”寄来了长征路上的树苗，重庆市的“红小兵”寄来了红岩村的松树种，内蒙古边防战士送来有“反修前线”焙烧的红砖。还有兰州的石匠、山东的木匠、黑龙江的雕刻工、上海的美工、海南岛的书写员，纷纷来信要求贡献自己的一技之长。

打开一个红布裹着的精制木盒，十二颗晶莹美丽的鹅卵石呈现在眼前，随盒寄来的信上写道：“听到毛主席纪念堂开工的消息，我们黄海前哨獐子岛上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心情非常激动，决定把我们日夜守卫的祖国海岛上的鹅卵石寄给你们，请把它放在毛主席纪念堂周围。这十二颗鹅卵石，象征着我们十二个战士日日夜夜守卫着毛主席。”

……全国有多少这样普普通通的战士，又有多少这样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啊！实在是太多太多。在这样的氛围中辛勤劳作的工程建设者们，又该是怎样的心情与干劲，已无须用语言来描述。因为人们应该记住：从动工兴建到落成，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每一个到纪念堂瞻仰过毛主席遗容的人，都应清楚它的工程量该是一个怎样的数字。

1977年9月9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开大会，隆重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并举行纪念堂落成典礼。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同首都一万群众出席大会。

华国锋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沿着党的十一大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他指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就是党的十一大路线。

他说:“现在可以告慰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指明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正在满怀信心地大踏步地前进。

“一切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使我们党改变毛主席所制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统统不过是反动的幻想。”“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做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从这一天起,每一个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们,都有了一个新的心愿、新的行动,这就是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每一个去瞻仰的人,都将获得新的感受,新的力量!

# 三、华国锋徘徊在 1977

“萧规曹随”，如临深渊。
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思想到行为。
“毛主席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
于是，人们惊呼：“大跃进”又来了！
于是，邓小平仍要虎踞笼中、“以观后效”！
但人心不容被复制，跨越冰山，邓小平从容走来。
似春风徐来，一代学子走进了大学的宫殿。

揭批运动一开始，国外一些不明中国内情的人士说：打倒“四人帮”是反对毛泽东。有关新闻单位从查阅 1976 年 9 月至 1978 年底的 40 多种报刊中看到：日本报刊在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后就提出“非毛化”问题，其后，一些外国报刊和香港、台湾报刊也有类似的评述。一般均认为“反对江青的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实行‘非毛化’的前奏”，“‘非毛化’的进程已经开始”。

其实，华国锋只扮演了一个“看守者”的角色，“照过去方针办”，从思想到行为，几乎没有变化。从而陷中国于徘徊之中。

## 3—1　两大问题如芒在背　“两个凡是”赫然出笼

从华国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那时起，他的一切作为与不作为，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凡是”。离开了“两个凡是”，他们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

华国锋是在中国共产党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下走上了主要领导岗位的。客观地讲，毛泽东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有效地阻止了“四人帮”掌权，也为以后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就此而言，华国锋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然而，就华国锋的自身条件来说，他的经历，他的思想，他的愿望，他的能力等等都决定了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领袖后的政治方针，一是必须借重毛泽东的旗帜和威望，以实实在在的毛泽东“合法”继承人身份和毛泽东最忠诚的学生的名义出现。即使是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后，要在政治上稳住脚，指挥、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也只有如此。离开了毛泽东，他同样是一无所有。这一点，华国锋应该是有认识的。联系到当时国内外的实际状况，客观地说，对于一个远不成熟的政治家的华国锋来讲，他只能如此而别无其他选择（尽管这对稳定当时全国的大局有一定作用）。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展开，两个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凸显出华国锋在思想与实践上的错误，并成为他提出“两个凡是”的直接原因。

深挖狠揭“四人帮”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就必不可免要涉及到“晚年毛泽东”。

当然,“四人帮”不代表毛泽东。毛泽东对“四人帮”作过严肃尖锐的斗争。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和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毛泽东是有所察觉的,并一再予以严肃的批评教育和限制。但毛泽东晚年犯了重大错误,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尽管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但错误终究是错误,并且这种错误与“四人帮”的得势与猖狂是有着一定联系的。

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而且尤其尖锐地批评了江青。甚至,毛泽东后期十分厌恶江青。但是,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总的说来是基于“教育”、“关心”和“爱护”,是“恨铁不成钢”!这从“四人帮”始终官居高位、始终是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依靠力量这一点即可得到说明。其实,若没有毛泽东的赏识、抬举、器重至委以重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就决不可能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这么一个“四人帮”。其实,在对待“文化大革命”、对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等根本问题上,毛泽东与“四人帮”基本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四人帮”去违背、去背叛的问题。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决不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深入揭批“四人帮”,进而从思想意识上揭批“文化大革命”,从思想理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等方面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不但不是玷污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且还是正确认识与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必要的环节,是确立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必要环节!

只是,由于在刚粉碎“四人帮”后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还没有更多地从这个深度去思考问题和

解决问题。这正如后来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这样地去认识还有一个过程。同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华国锋也决不允许从这个角度、高度去提出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

在华国锋看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他华国锋。也正因为如此，华国锋把维护住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完成毛泽东生平“两件大事”中的后一件，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视为他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和好学生的最好表现。

1976 年 10 月 8 日，在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老帐，搞“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本身，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这里，华国锋已经定下了错误的基调，这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如何认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10 月 18 日中央下发的对党内的通知，基本上执行和体现了华国锋“打招呼”的基调和精神。前面已经提到，该通知是一份重要文献，一份研究华国锋指导思想、粉碎“四人帮”前后特殊时期政治、文化、社会状态的重要文献。之所以如此说，当然不在于前面已经摘录的第一部分，而在于它的后几部分：

> 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1975 年 5 月 3 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以华国锋同志为着的党中央，继承

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关心群众生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努力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不难看出，这个通知，仍然是"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产物，除了粉碎"四人帮"以外的一切还是"照过去方针办"。换句话说：除粉碎"四人帮"外，"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进行或还得继续下去！"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

10月25日的"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按中共中央10月18日通知的基调和精神，强调的是"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社论充分体现了华国锋坚持"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如果假设一下"四人帮"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其《通知》与《社论》除了对象改换之外，其基调和精神与此不会有什么两样。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揭批"四人帮"运动一开始，就十分

明确地提出“四人帮”是与毛泽东根本对立的问题，用大量事实说明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与“四人帮”对毛泽东的背叛，并澄清打倒“四人帮”就是反对毛泽东的种种错误观点，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由此走上把“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同毛泽东的“左”倾指导思想相割裂、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歧路，又无疑是错误的短视行为。历史地客观地讲，这种严格地区分与把握，确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它的最好解决，是两年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方式来实现的。

但是，如何认识与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当时还是已经提出来了。不过，它是以这样的特殊方式提出来的：要不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怎样认识“天安门事件”。一言以蔽之，应该怎样看待和处理“邓小平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从党和国家前途出发，从广大干部群众的利益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出发，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次向华国锋提出建议，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

然而，华国锋在高级干部打招呼会上讲揭批“四人帮”时，是把继续“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与之相并列的。无论是通知抑或是社论，都少不了一句：“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华国锋搞的是“两手一起抓”，一只手打倒“四人帮”，另一只手打倒邓小平。

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邓小平为“黑后台”的“天安门事件”自然也不得平反昭雪。

1976 年 11 月 18 日，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针对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说：“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

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他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汪东兴还斩钉截铁地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继续办“四人帮”那样的样板学校朝阳农学院,继续放映“四人帮”炮制的以“批邓”为主题的电影《决裂》等。他坚持说这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指示过的”,不会错!

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认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并强调指出:“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1977年1月8日前后,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全国各族人民自发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在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当然也包含对一年前惨遭镇压的“天安门事件”及事件的受害者的悼念和怀念,也饱含对“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的愿望。

同时,当《人民日报》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汪东兴时,汪东兴只准发四五篇纪念文章;不发《人民日报》社论;对周恩来的评价不准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听了宣传口的汇报后,针对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况,提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华国锋在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明确写上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提法。随后,他要求

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社论中。

2 月 4 日，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批：“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以“两报一刊”社论出现的文章，“两报一刊”没有一个人参与撰写，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当时的新成立的中央宣传部也不知道，它是由曾担任康生秘书、康生死后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负责文件起草的李鑫领导的理论学习组起草，经李鑫多次修改而成的。

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指导思想。同时，社论还说：

>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华国锋通过这篇社论，把自己“抓纲治国，实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两个凡是”颁于天下。

“两个凡是”的正式出笼，其实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性来源于它不过是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

后，坚持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实践毛泽东的“你办事，我放心”的信赖和诺言。

“两个凡是”的正式提出，表明华国锋等人已走上了一条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悖的不归路。

## 3—2　华国锋主导三月会议　邓小平复出三中全会

正如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在拿到2月7日的社论后，在讨论会上所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但华国锋等人已决意一意孤行，并把“两个凡是”搬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上。

3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似烟似雾的迷迷蒙蒙，笼罩在城市上空，穿过它的阳光也显得弱了许多。当然，普通的平民百姓们，并不知晓中央又在开会了。

在华国锋“两个凡是”指导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围绕着“两个凡是”指导思想及具体关于“邓小平问题”，中共中央展开了激烈的内部争论。

在会前，华国锋亲自召集为他起草报告的人们，系统地讲述了他对这个报告的想法、观点，对内容结构作了部署。中心意思就是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来对待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等全国人民最敏感的问题，以扭转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力，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即提出，应该赶快让邓小

平出来工作。可是，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拒绝。此时的叶剑英还不便与刚刚成为“英明领袖”的华主席说得太多，但不久，邓小平一家就被叶剑英安排住到了北京郊区的西山。两人之间的会面“聊天”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这次起草会议报告时，叶剑英曾几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要求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予以尽快平反。但叶剑英的这些正确意见仍未被华国锋所接受。

会议举行时，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贯穿“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要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必要性”，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针对当时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指出：“有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天安门事件问题上来，甚至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人们“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为了论证“批邓”是“必要”的，他甚至还把“邓小平问题”同“四人帮”余党的反革命翻案活动联系在一起，实在是荒谬之极。

作为会议文件，会上印发了所谓“李冬民反革命案件”材料。李冬民原是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8年参军，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复员，在北京重型

机械厂当工人。他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逐渐醒悟过来,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对批判右倾翻案风不满。1977年1月,他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另有一个人叫张兆庆,原是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的造反派头头。"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写反动标语,攻击这是"反人民的右派军事政变",为"四人帮"鸣冤叫屈。李冬民和张兆庆本来素不相识,观点也是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可是他们被说成已"合流"的一伙"反革命集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冬民假案才得以平反。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经华国锋批准,这一起假案被整理成"罪证材料"印发。华国锋利用这个假案材料在会上说:

> 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华国锋等人的态度,使党内的分歧与斗争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激烈了。

还没有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在得知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后,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公开支持许多同志批评"两个凡是"。

陈云、王震针对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顶住华国锋等人的压力,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坦陈己见。

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

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邓小平。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的发言稳重老辣，王震的发言毫不留情，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华国锋等人无力反驳，只好采取行政压制手段，不让他们的发言见诸于会议简报。

会议上，许多与会者也不同意华国锋审定的报告里说“四人帮”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他们指出：林彪、“四人帮”之所以采取极左的形式，这是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有极高的威望；由于我国存在着广阔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容易被利用，容易导致极左；由于建国以后我们注意了反右，对“左”倾倾向注意不够，而且长时间存在着“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说法、作法的思想观点。

华国锋等人不仅拒不接受与会者这些持之有据的意见和观点，坚持批“极右”的观点。而且更为刻意地强调：

>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成为华国锋全面推行“左”倾指导思想和方针，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一次会议，在指导思想和实践中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继续设置障碍。

但在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

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更加强烈，旅大市委、市革委会门前就曾出现了一些批评吴德、陈锡联，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委员长”和“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的大字报。华国锋等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和不安。华国锋即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但是，华国锋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是有条件的。他派人找到邓小平谈话，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信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严辞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和要挟，大义凛然地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披露天安门事件真相，认定其是革命事件的文章。这实际上是间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亲自处理的，毛泽东有批示，不能平反。汪东兴则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文章？并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毛泽东说的，你们这是反毛主席呀！”

就在这期间，叶剑英迎来了他的80寿辰。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叶帅家中。邓小平一家更是早早地就到了。邓小平说：老帅们都来了。叶剑英则紧跟了一句：那你是我们老帅的领班。

同一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坚决顶着华国锋等人的高压政策，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强烈要求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愿望。北京外国语学院“童怀周”小组成员编辑出版了《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上下卷共1032页，广大干部群众竞相抢购，供不应求，有的地区翻印出版，成为脍炙人口的畅销读物。这也表明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华国锋等人的强烈不满情绪。

在此情景下，华国锋等人不得不作出让步，采取相对的顺乎党心、民心的做法。终于，在粉碎“四人帮”后经过长达 9 个月的激烈斗争，于 1977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是于 1977 年 7 月 16 日至 21 日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会议是毛泽东逝世以后，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这对于华国锋来说，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华国锋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党的十一大作准备。在这以前召开十届三中全会的条件是不具备的。有关粉碎“四人帮”和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切重大措施和决策，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并且领导全党付诸实施的。没有这一段的工作，就不可能召开这次中央全会。华国锋在会上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政策。

7 月 21 日通过的全会公报指出：

>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全会完全拥护中央政治局根据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于 1976 年 10 月 7 日作出的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中央政治局在我们党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进行激烈斗争的非常时期，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作出的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非常适时的，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这个决议，不

仅对当时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稳定全国的局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巩固我们党的领导，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国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全会经过认真的讨论，完全拥护华国锋主席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经过十届三中全会讨论，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意见。1977年5月3日，中央转发的邓小平同志致华主席、叶副主席、党中央的两封信，受到全党同志的赞同。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在闭幕式上，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再一次明确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准确的、完整的科学认识，要正确地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指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强调说：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邓小平的重新出来工作，充分体现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和强大力量。消息传出的当天，全国军民一片欢腾，不少地区出现了盛大集会游行庆祝的热烈场面。老一辈革命家、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的张恺帆，立即题写了一首题名为《邓小平同志东山再起》的七绝诗，由衷地表达了这一无比高兴的心情：

多谋善断早闻名，理应东山再显身。
毕竟人间公道在，又为吾党起干城。

这些情况说明，邓小平的升降荣辱决不仅仅只是他个人的升降荣辱，而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升降荣辱！邓小平再次复出，再次“东山再起”，是我们这个创造伟大奇迹的伟大的时代的必然产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里程碑。这对于在当时条件下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及其纠正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马克思主义路线，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仅从局部上讲，也是对“两个凡是”的重大突破与否定。

这些情况还说明，一个以实事求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因为“邓小平问题”同“两个凡是”是势不两立的。实践证明，华国锋决不可能放弃他所认为必须坚持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也不会自觉地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尽管在这次全会上，华国锋的讲话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继续宣扬“两个凡是”。但是，包括华国锋自己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已开始意识到或感觉到，这已经有强弩之末的味道了。

## 3—3　华国锋制造新崇拜<br>神州发起“洋跃进”

因为华国锋是“毛主席亲自培养，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还专门亲笔写了“您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所以华国锋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毛泽东最好的学生和接班人。

客观地说，对于华国锋的这种“认可”有当时局势的需要，有它

的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自知之明。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却更多的是就此走向另一个歧路,这就是产生自我陶醉感,默许、怂恿甚至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中国当时的现实正是如此,还未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走出来的中国人,又被卷进了对华国锋的新的个人崇拜的宣传攻势中。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毛主席语录"一次次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上,为宣传华国锋提供着最为"经典"的根据。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1963年11月6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1963年12月7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泽东1963年12月1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这份党内指示,被适时地公开发表,即为"洋跃进"寻找到了"毛主席的批示",也强烈散发着华主席早就找到了一个"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的巨大的说服力。

新闻媒体上,每天都不断地映入人们眼帘的、进入人们耳中的,是许许多多《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华主席是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华主席掌舵不迷航》等样式的题目与文章。为了更好地感受当时的这种宣传气氛,我们不妨摘引几段"经典作品":

> 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人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们党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现实危险。在这个严重的历史关头，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取得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决定性胜利。华国锋同志领导我们党在惊涛骇浪中转危为安，使我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我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信赖和衷心爱戴。华国锋同志不愧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

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的人物。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正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经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重重艰难险阻，才确立下来，并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公认。毛主席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领袖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在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期间，灾情严重，“四害”横行，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华国锋同志顶住了逆流，排除了干扰，战胜了困难，正确地妥善地处理了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毛主席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为了继承毛主席的

遗志，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地作出了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英明决定，揭露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更加显示了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领袖的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革命的胆略和英明的远见，进一步证明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前程似锦。

……

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们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的可靠保证。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列宁全集》第25卷第251页)。

在加强宣传攻势的同时，另一方面即树立绝对权威的工作也做了不少。例如在四川省江津县，一青年工人聂坤映的所谓"反革命攻击罪"中，就有一条："该犯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胡说什么粉碎'四人帮'不只是华主席一人的功劳，还有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的功劳，要不是几个老帅给华撑腰，他就奈何不了'四人帮'"等语言。

在热衷于新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华国锋对国民经济生产是关心的。华国锋在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后，虽然在总体上仍继续坚

持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与实践，但面对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他也很重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他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是一致的。当然，由于他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两个凡是”，因此，在怎样发展生产，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上又与他人并不一致。

“四人帮”的垮台，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清除了一大障碍。在全国广泛开展的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 1976 年底开始，先后召开了农业、计划、铁路、工业、财贸、煤电、运输、粮食等一系列全国性的生产建设方面的会议。这些会议都强调要搞好生产，要抓企业整顿，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健全领导班子，要加强职工队伍的团结，确定各行各业的计划，采取必要的措施等。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散布的有关经济问题的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同时，开始清除这个反革命集团盘踞在中央部门、地方的各级经济领导部门和企业中的势力，夺回被他们篡夺的一部分领导权，平反昭雪他们制造的冤假错案，使大批久经考验、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领导部门得以重建或加强。这些会议精神的贯彻，相应措施的实行，使各工业部门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开始恢复，使工业企业逐步转入正常轨道。

1977 年 2 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破坏铁路工作的罪行，明确指出，1975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著名的“9 号文件”是正确的，它在当时不仅推动了全国铁路形势的好转，而且对整个工业交通生产建设起了促进作用。“四人帮”把这个决定说成是“复辟纲领”，完全是颠倒黑白。

会议研究了铁路管理体制问题，重申铁路运输仍按 1975 年 9

号文件规定，由铁道部集中统一指挥；思想政治工作，实行铁道部党委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双重领导，以地方领导为主。1977年3月召开的计划会议，还针对“四人帮”散布的有关经济方面的谬论，提出了“十个要不要”：

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强调要分清敌我界限，不能颠倒敌我关系。

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驳斥了“四人帮”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谬论。

要不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强调要把资产阶级派性搞臭，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

要不要搞好生产？强调企业要以生产为主，各项工作都要为生产服务。

要不要规章制度？强调要制定和执行必要的规章制度，理直气壮地抓管理。

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强调为国家提供积累是每个企业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要不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强调要反对平均主义，克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和不干一个样的现象。

要不要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强调要努力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宏大的技术干部队伍。

要不要引进新技术？强调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加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

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强调加强国民经济计划，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十个要不要”在个别地方还是沿用了历史遗留下的错误提法，但从总的看，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对于帮助人们分清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上的是非，同林彪、“四人帮”散布的各种谬论划清界限，肃清流毒，并清查其帮派体系，起了积极的作用。

……

经济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在各级党委和业务部门领导下，联系实际，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如何搞好生产的讨论，同时执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逐步恢复生产，国民经济开始发生变化，停滞、倒退的局面初步扭转，工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务院 1977 年 7 月转发的《关于 1977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显示：工业总产值 3 份以来逐月增加，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 48%；铁路平均日装车，4 月份达到 55100 车，超过历史最高月水平；80 种主要工业产品，5、6 月份的产量，绝大多数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 26 种创造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29 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总产值，有 24 个上半年超过了上年同期水平。

到 1977 年底的统计，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5055 亿元，超过计划 4.4%，比上年增长 10.4%；工业生产总值 3728 亿元，超过计划 3.6%，比上年增长 14.3%；农业生产虽然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订计划，但由于广大农民的努力，大大减轻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粮食产量 5655 亿斤，比上年减产 71 亿斤；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7%；全年财政收入支抵，结余 31 亿元，扭转之前连续三年完不成计划，支大于收的状况；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7.1%，库存总额增长 12%，市场供应情况开始好转；在国民经济初步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上，全民所有制中 4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由于逐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农民从集体分得收入也有所提高。

这些情况说明，由于政策对头，被林彪、“四人帮”强力压抑、禁

锢和束缚的生产力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但是,国民经济这样迅速的好转,是带有很大的恢复性的,是在历经"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低基础上、低水平上的一定程度的恢复性质的增长。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不能忘记在初步恢复的国民经济中,还存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燃料、原材料供应十分紧张,许多企业的管理和市场流通领域仍然混乱,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效益很差,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有待改革,技术力量薄弱机器设备落后恶化,职工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较差,交通运输跟不上需要等有待进一步理顺和解决的严重问题。

但是,华国锋等人却对形势的有所好转缺乏全面冷静和切合实际的分析,对1977年经济增长的恢复性质认识不清,把经济状况估计得过于乐观了,认为这标志着"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相对应的是,对"文化大革命"动乱对我国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严重程度认识不够,对百废待兴、百业待补的严重困难估计不足,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缺乏深刻的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加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也有急于想把"文化大革命"所耽误和损失掉的时间夺回来、补上来,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希望;再加之华国锋等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也严重妨碍对经济实际情况的研究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因此,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和"左"的"习惯势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潮",致使经济工作出现了1958年式的"大跃进"苗头。

这是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重大失误。这是华国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工作上的必然反映。

1975年12月31日深夜,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有两位来自美

国的年轻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客人恭维道："我们感到最新的是中国的精神发展，这一点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是世界的榜样。"

毛泽东的回答是："这是靠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第二天是元旦，照例有一篇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社论的题目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公布了毛泽东批评"三项指示为纲"的最新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由此推演出这样一个逻辑：否定或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必然会犯错误。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纲举才能目张。搞工业也好，搞农业也好，搞其他工作也好，都要围绕阶级斗争这个纲。

华国锋萧规曹随、毫不懈怠地走上了毛泽东所指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并有所"发展"地提出了"抓纲治国"的口号。在那篇著名的"二七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即 1977 年 2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任平的文章，题目就是《抓纲治国》，对"抓纲治国"的战略有所阐发。文章写道：

> 抓纲才能治国。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传达了毛主席生前的重要指示："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
>
> ……
>
>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生动局面。农业

要大干，工业要快上，各行各业的工作都要有一个大的发展。我们的任务很重，需要解决的矛盾很多，面临的困难也不少。抓纲治国，就要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任务上来。只有把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抓好了，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各项工作搞好。试想，不把"四人帮"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倒大寨红旗的罪行批深批透，农业能够搞上去吗？不把"四人帮"否定大庆的根本经验，对抗"鞍钢宪法"，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反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罪行批深批透，工业能够搞上去吗？其他各项工作莫不如此。你真想把农业、工业搞上去，把各项工作搞好，就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任务。

……

纲举目张。只要我们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就一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文章讲得头头是道，至于其中有些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今天的人们一看便知。且说华国锋不仅是要抓纲治国，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是提出了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此种语言甚是耳熟，实际上也正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的一个学习之例：当年的语言是"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今冬"。

由此，经济工作中的新"跃进"似乎已呈不可避免之势。

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同，这是一次强调"机械化"与"现代化"的"洋跃进"。

与1958年的"大跃进"相类似，这次"洋跃进"也是从高指标、

大口号开始的。

刚粉碎"四人帮"不久的 1976 年 12 月，在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宣布：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运动。"

"到 1980 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到 1980 年，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实现粮、棉、油、猪达到《纲要》(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指标！"

"到 1980 年，全国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洋跃进"的战鼓已经擂响了。大寨再次引起世人注目。

这里作个说明，大寨这面红旗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了解内情的人不难判断。正因如此，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的逝世，使陈永贵等人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们担心着大寨红旗的命运，忧虑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孰料，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继续举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使大寨、昔阳及大寨式干部们又一次成为时代的幸运儿。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后不久，便亲自提议于 1976 年 12 月 10 日至 27 日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全国人民以揭批"四人帮"为动力，继续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由于华国锋等人的积极倡导，拨乱反正工作刚刚起步，还需经过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在一段时间内，绝大多数人还没能认识到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所以在第二次全农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全国各地仍把发展农业的希望寄托在普及大寨县运动上。在这种形势下，大寨仍然是党政军要员和人们朝拜的圣地。据不完全统计，1977 年到大寨参观访问的外宾有 432 批 5199 人，国内参

观者共达47.42万多人。1978年,有外宾325批5405人,国内参观者达18.29万多人。

然而这一切都已接近尾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普及大寨县运动,实际上已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回光返照。插在极左路线坚冰之上的大寨红旗,随着春风的吹拂,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形成,就是一股股冲击极左路线的强劲春风,大寨样板赖以生存的根基开始塌陷。

1979年,一些报刊开始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些极左错误作出批判和否定。

1980年,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中大寨、昔阳本身存在的问题及错误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判,大寨、昔阳推行极左路线的真相被公之于世。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正式宣告了大寨红旗的黯然落地。然而,这些都已经是后话了。

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其《报告》要点是:到1980年,要尽最大努力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使全国农、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

这意味着,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国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必须增加66%;化肥增长则必须超过100%以上!

还是1958年"大跃进"时的语调,《报告》强调指出:

"这对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对于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对缩小三大差别,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紧接着,各省、市、自治区被中央要求尽快建立健全"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10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

一切宣传机器都开动起来，为在“1980 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而大造舆论。“跃进”之势初见端倪。

到第二年初，全国第三次农业机械化会议在北京召开，由国务院主持。会上，不少同志表示了对目标的担忧甚至否定，但是，会议坚持原有目标。并由《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

《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祝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召开》(1 月 5 日)；

《做农业机械化大干快上的促进派》(2 月 1 日)。

同一时间，全国“工业学大庆”的高潮也掀了起来。

1977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13 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从大庆开到北京，历时 24 天，先后有 7000 多人参加。华国锋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宣称，中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在没有掌握可靠地质资源的情况下，他代表中央在会议上宣布：

“第三个五年计划(1976—1980 年)期间，全国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

“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4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指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

> 当前的形势很好。由于这几年“四害”横行，造成的损失很大，因此，目前在某些地区、某些企业，还存在一些暂时的困难，这是我们应当看到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我们当前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很多。最根本的，是粉碎了“四人帮”，排除了干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可以顺利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涨。我们的物质基础也比过去雄厚多了，增产节约潜力很大。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

旗帜，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学好文件抓住纲，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4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20多年前发表在《新湖南报》上的《贵在鼓劲》(1963年4月2日)一文，文章的作者是今日的"英明领袖"华国锋：

今天新湖南报刊载的《可贵的革命干劲》一文，介绍了毛田区的群众和干部在党的领导下，鼓足革命干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色事迹。

……

毛田区的经验，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为社会、为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财富。同时，也证明了：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启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带领群众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7月3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转发的国务院提出的《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断言，上半年工业生产有较快速度回升，这是"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局面正在出现"的大好征兆。

9月11日，华国锋召集国务院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他指出："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

在这次会议上，国家计委提出的经济增长建设计划被批评为"太保守"——与1958年"土跃进"时，毛泽东批评以周恩来为总理的国务院"太保守"何其相似！于是，国家计委只好将计划拿回去

“加码”。各省、市、自治区也只得如法炮制，各种高指标一抬再抬，再次出现竞相攀比速度的局面。

相距 1958 年正好 20 年。20 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太长？抑或是太短？

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号召人们“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争时间，抢速度，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

一时间，“跃进”之声四起。各地区、各部门的“宏伟跃进计划”纷纷出笼，热得烫手。

煤炭工业：10 月 29 日，煤炭部领导人向中央政治局保证：“要拿下前所未有的高速度！——1980 年总产量达到 6.3 亿吨，‘六五’期间，平均每年增长 5000 万吨；即 1985 年，总产量达到 8.8 亿吨；1987 年赶上美国，突破 10 亿吨大关，到本世纪末，再翻一倍，达到 20 亿吨！”

冶金工业：11 月 9 日，冶金部领导人在中央政治局面前汇报说：到 1980 年，钢产量达到 3500 万吨；1985 年，达到 6000 万吨，力争 7000 万吨；平均每年增加 500—600 万吨；到 1990 年，钢产量突破亿吨大关；到本世纪末，超过美国，达到 16000 万吨以上！”

国家计委：1977 年 7 月 8 日，将一份胆大得出奇的“引进”计划递交给国务院：在“五五”计划后三年和“六五”计划期间，除抓紧 1973 年批准的 43 亿美元进口方案中在建项目尽快投产以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其中有：

2 套大型化肥装置；

3 套化肥关键设备；

4 套中间本原料装置；

3 套大型石油化肥成套设备；

1套30万吨乙烯综合利用工程；

4套化纤成套和关键设备；

2套年产量200—300万平方米的合成革装置；

3套合成洗涤用品原料生产装置；

大批石油勘探设备；

1套年产1000万吨露天煤矿成套设备；

1套60万千瓦或90万千瓦原子能电站；

1套年产1200万吨采矿设备；

……

以上项目，共需外汇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基建投资需要400亿元。

1977年11月24日至12月11日，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还开了半个月的预备会议，以示郑重。

会后，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次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将上述《汇报重点》和《1978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批转各地区与各部门，要求贯彻执行。其主要内容为：在今后23年，在经济建设战线要组织若干大规模"战役"，分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在"五五"计划后三年，重点战役战场有两个：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作为铺垫；

第二阶段：在"六五"期间，各项建设达到新的水平，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达到2.5亿吨。为此，必须开展一场宏大的基本建设战役，在工业方面，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油田、10个大型钢铁基地、9个大型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型化纤厂、10个大型石油化工厂、10个大型化肥厂、六条铁路干线、若干个大型港口；

第三阶段：在本世纪末，中国要全面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

和国防"四个现代化",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届时,粮食总产量达到 13000—15000 亿斤,钢产量达到1.3—1.5亿吨,赶上和超过某些工业发达国家。

华国锋在 1978 年 2 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国务院关于 1976 年到 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也是如此。大会通过的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等错误理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报告一个突出之点是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认识不足,对生产力惨遭破坏的严重程度认识不够,盲目地宣称"我国国民经济已稳步上升、健康发展的轨道","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到来了",要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表现出明显冒进倾向。如要求在本世纪末我国农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要赶上和超过欧洲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农业生产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自动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很显然,这样大的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每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0%),不论从我国的财力、物力、技术力量、资源和建设周期来说,都超过实际可能,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

在五届人大召开之前,当时分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曾提出,这个规划还在讨论之中,提出这个指标,那个项目可以,但在还没有研究清楚的情况下,不要拿到人大会议上通过。可是,华国锋坚持把没有经过论证和反复研究的十年纲要提交人大会议讨论通过。在八届人大会议预备会后召开的有关经济会议和计划会议上,有些干部也不同意搞高指标,一些高指标也分不下去,就硬往下压,

要大家"背"回去。

在如此激动人心的宏大工业发展计划面前,农业的原有计划和指标又显得有点"小脚老太太"了。于是"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应运而开。会后,中共中央将会议提出的"农业实现更大的跃进"意见转发全国,要求贯彻执行。

在这次会议上,"农业生产新跃进的形势正在到来"的判断获得赞同,随后,原来的计划被修订为:到1980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000亿斤,棉花产量达到6000—6750万担。为此,农业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确保按时实现农业机械化。对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以强调要将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到生产大队过渡……

此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重病初愈的人,未得休养、复原,就被要求立即跑步前进,于是出了问题、跌了跤子:

第一,农轻重比例失调。从基建投资看,农业占10.6%;轻工业占5.8%;重工业占48.7%。从1978年农轻重总产值结构看:农业占27.8%;轻工业占31.1%;重工业占41.1%。

第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新项目上得过多,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1978年,基本建设投资479.3亿元,比上年猛增114.9亿元,增长了31.5%,占当年国民收入的15.9%和财政收入的40.7%。当年在建的中型项目比1977年增长300多个,达到1700多个。

第三,积累率过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积累率1976年为31%,1977年为32.3%,1978年达36.6%,仅次于1959年的43.8%和1960年的39.6%,为第三个高峰年。

对积累率的使用上,又重生产、轻生活,生产性投资占82.6%,而同人们生活直接相关的住宅、文教卫生、城市公用事业建设所占比重1978年只有17.4%。因而,多年来人民生活方面长期得不到

解决的问题日益严重，乃至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第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过多，与我国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不相适应。仅 1978 年一年就鉴定了 22 个大型引进项目的合同，共 78 亿美元，全部现汇支付；钢铁、化工项目的引进合同，只签订了一部分，全部签完尚需 50 亿美元。到 1978 年底，我国的物资、信贷、财政和外汇收支均发生了较大的不平衡，经济建设造成了新的失误和困难。

高规划、高指标固然可喜，它对刚刚从"四人帮"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具有极大的鼓动性的吸引力，但不切实际的高规划、高指标又很快成为海市蜃楼，在一定程度上再次浪费了中国人民焕发出来的劳动热情和干劲。这种心理上的打击，只有让历史来付出代价了。

## 3—4　迷雾中波起澜兴　邓小平自告奋勇

在新的个人崇拜和"洋跃进"的气氛中，一股在指导思想上否定左倾思潮的意识在顽强地涌动，并在理论与实践中作着不屈的努力。这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沧桑正道，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先声。

农村政策的调整和落实起步较早。"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在这方

面，当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开路先锋”——万里再一次冲在了农村经济改革的最前列。

“四人帮”垮台后，铁道部的广大干部群众，都希望万里回铁道部。但在1977年4月，万里却被任命为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

对此，铁道部的群众呼声强烈，迫切希望他回铁道部。有的说：万里的铁道部部长，是经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的，去年批邓时只是说“他在交代问题”，并没有免去他的部长职务。他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把他降到副部长？

1977年6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邓小平即将恢复领导职务，中央任命万里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负责解决安徽省委领导班子问题。万里又一次主政地方，担起了领导安徽全面工作的重任。

万里到安徽后，首先带领全省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揭开了被前省委主要负责人捂了8个多月的盖子，使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破不立，边破边立。与此同时，万里领导安徽省委把认真落实中共中央的农村政策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万里和其他省委领导人亲自动手，深入实际，就当时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倾听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意见，经过三个多月的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的调查研究、酝酿讨论，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拟订并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万里等省委三位负责人还先后到肥东县、长丰县的有关公社、大队宣讲《决定》，征求意见，边听边修改。1977年11月15日，省委召开了地、市、县委和省直各部门第一把手参加的、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为中心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再次讨论并修订《决定》，最后通过后，作为省委文件下发各地贯彻执

行。

这个简称为“省委六条”的《决定》的主要内容是：

一、恢复和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允许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

二、根据需要和可能，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

三、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严格控制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努力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

四、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开发多种经营，抓好超支还款，坚决做到社员分配兑现；

五、粮食分配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

六、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等。

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当时，却有石破天惊之感，其逾越雷池、勇闯禁区之处甚多。比如，过去是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现在则不仅“允许”还要“鼓励”——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过去是被批判的“自由种植”，现在是要注意“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此，可以说，“省委六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内容涉及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全国第一个文件。

这些政策让早已喘息不过来的农民休养生息、缓过气来，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农村秩序有明显的效果，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一时间，安徽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1978 年 2 月 3 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详细报道了“省委六条”产生的具体经过。3 月，新华社播发了万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章。

一石激起千重浪。那些依然停留在“大批促大干”的左倾思路

上的人们，先是被这些“异想天开”震得目瞪口呆，继而便是无尽的怀疑与指责：

“给农民的自主权太多了！”

“这样下去，会不会滑到1961年？”

“这不是社会主义方向！”

……纷纭众说，把万里和安徽省委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迷雾四溢中，一位巨人托住了万里和安徽省委，托起了中国农村的一个新时代。这就是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看破红尘万里、执掌未来中国改革巨轮的邓小平。他热情地肯定了安徽省委的新观念、新举措。他说：

我们现在需要有些新概念，不能老是原来的老框框。“文化大革命”前企业管理中一套是学苏联的，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把这一套也砍了。

现在，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多想门路，不能只在老概念中打圈子。

邓小平的讲话，给万里和安徽省委以极大的支持，给安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安徽省委、安徽农民的探索之心、实践之步，更加坚定了。在“省委六条”政策精神鼓舞下，安徽省一些地区大胆冲破多年来的一整套捆住农民手足的“左”的东西，开始了改革农业管理体制的探索，率先闯出了“包产到户、责任到人”的“大包干”的“凤阳之路”。

春风送暖暖人身，政策送暖暖人心。

严冬过后春雷现，江淮大地气象新。

安徽农民的喜悦，引来了“天府之国”农民的热切跟随。继安徽省委之后，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类似安徽省的农业政策，即《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这个简称“十二条”的文

件，既有对兄弟省份经验的借鉴，也有结合本省实际的特色内容。除了保障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等项外，还充分肯定了不少农村已经自发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方法。这个文件的贯彻，使四川省农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1977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550 亿斤，比 1976 年增加 53 亿斤。棉花、油料、甘蔗、烟、茶、蚕丝、水果、生猪等也都比上年有较大的增长。全省社员人均分配粮 435 斤，比上年增加 66 斤；人均分配收入 63.10 元，比上年增加 9.6 元。

一首民谣说："要吃粮，找紫阳（即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即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民谣见民心，足见安徽、四川两省的农村经济政策是多么的深得人心。

南海之滨的广东省也积极行动起来。1978 年 4 月，中共广东省委制定出《关于减轻生产队负担的规定》，初步解决了全省农村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

6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湖南省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并作了批示，肯定中共湘乡县委对农民不合理负担做调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指出，要坚决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从各方面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任何单位和部门一律不准无偿平调社队的劳动、财力、物力，搞非生产性建设，坚决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做到增产增收，多劳多得，分配兑现。中央强调，各地都应参照湘乡的经验，根据当地情况，认真解决好这个问题。

上述这些有关农村政策的文件，尽管步子迈得还不大，但对稳定农村形势，发展农业生产已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的落实，使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复苏。1977、1978 年，全国的农业生产连获丰收，粮食产量分别为 2.82 亿吨和 3.04 亿吨，

比1976年增长6.4%。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初步改善。

在工业企业方面,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和工交企业试行。这个《工业三十条》是从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1972年的《工业十条》和1975年的《工业二十条》等草案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文件对整顿工业企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标准,强调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规定了企业的任务,强调企业必须以生产为中心,各企业都要恢复和实行中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职工代表大会制或职工大会制;提出了搞好工业管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强调要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

《工业三十条》在当时是进一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依据,也是发展工业生产的武器,对工交战线贯彻落实新时期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文件下达后,各省、市、自治区抓紧企业整顿,初见成效。一批"老大难"的关系全局的重点工业如鞍钢、包钢、上海港等,比较快地改变了落后面貌。当然,如同当时各种文件一样,《工业三十条》也有明显的"左"的影响和痕迹。

1978年7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一方面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另一方面,会议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大胆地提出和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强调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组织的作用,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扩大企业的经济自主权。同时,会议强调放手利用我国资源,从外国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在思想理论方面,经济学家、理论工作者们以自己的智慧,为

国家走出误区与困境作着积极的努力。

1977年2月下旬，北京地区经济学界召开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后，陆续召开了多次这样的讨论会。同时，许多地区的经济学界也活跃起来，开展了一些学术讨论活动。在这一年里，各地的经济理论讨论，主要是围绕着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

一是按劳分配问题。许多人驳斥了"四人帮"鼓吹的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谬论，明确指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明确指出计件工资和奖金同计时工资一样，都是实现按劳分配的有效形式。

二是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许多人揭露了"四人帮"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反动目的，肯定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

思想理论界的这种投入与探索，到1978年便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汇合成一曲宏大的时代交响。为着叙述的方便，这里介绍几篇具有指导意义的经济思想理论文章。

197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特约记者的题为《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的文章，从社员的家庭副业究竟是不是资本主义尾巴，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是不是发展资本主义，保留社员的家庭副业究竟有无必要和发展家庭副业的关键是什么等四个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界线上澄清了一些问题的是非。

5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题为《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文章着重阐述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新的劳动生产率。同时批判"四人帮"破坏按劳分配原则的种种谬论。

10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胡乔木的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论述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强调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否则就要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认真实行以农业为基础,并要加强经济学的普及与提高。

……上述文章,都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提出现实问题,从理论上、政策上阐明是非,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对经济路线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条人间正道的主角是再次复出的邓小平。

在复出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讲了这样交心的话:坦率地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那么,复出后的邓小平首先是做点什么工作呢?是当"后勤部长"。

经过对当时历史条件和形势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他毅然决定从抓科学教育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入手,不只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发起冲击。他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表示"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果不其然,邓小平以他独有的胆识与魄力,在徘徊的1977年,划出了大中国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解放知识分子"是邓小平改革科学教育的第一步。

在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强调必须从毛泽东思想整个理论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科学的理解。他还特别列举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毛主席的主张"。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

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1975年,还针对"四人帮"的污蔑,提出"老九不能走"。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谈会上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他讲了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说:

>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样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等学校六十条这些的。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
>
> 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科学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
>
> 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
>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邓小平语出惊人,大无畏地为教育、科技"翻"了"案"!为知识分子"平"了"反"!把被"改革"了的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再"改

革”过来!在那种大讲特讲、大批特批“十七年”,自“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还没有人敢对“十七年”说半个好字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这番讲话,真是振聋发聩。教育部长刘西尧感慨言之:“‘八·八’讲话,震动很大,赶超有望,心有余悸!”

9月19日,邓小平对刘西尧等人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即认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根本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所谓“两个估计”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邓小平针对刘西尧的“心有余悸”,要刘西尧“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不要“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这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跟着天不怕、地不怕的邓小平闯“禁区”,特别是闯“两个凡是”的“禁区”,那倒确实是需要大无畏的气概和英勇的献身精神的。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部大批判组”的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文章说: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 1971 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就在 1971 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里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

文章中这些毛泽东对于教育、知识分子的重要指示，是从迟群

的笔记本里查出来的。它被"四人帮"蓄意封锁起来，然后由他们一伙炮制出"两个估计"，打击迫害知识分子。这场"大论战"本身也说明，要冲破"两个凡是"，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文革"前的错误，确实是多么艰难。教育部尽管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一步也甚不容易。因为，寒流还在不时地袭来——

11月中旬，《光明日报》在2版头条通栏标题《打好文艺战线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下，刊登了文艺界知名人士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并加了一个"编者按"，其中说：

> 十七年的文艺战线，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黑线，对我国文艺事业确实有过相当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总的说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紧接着，1978年的《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了署名"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说：

> 十七年中，文艺战线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建国以来，在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下，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次都严重打击了资产阶级，大大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
> 毛主席在1963年和1964年对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严厉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工作的干扰破坏……

从这两篇文章里不难看出，其言语词句尽管闪闪烁烁，但其立论的根据仍然是"两个凡是"！仍然是以"两个凡是"为界线、标准；

同时，反复强调“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也是为了固守“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正确的这一阵地。

但无论如何，科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不容否定的。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这其中，造福一代人、造福国家和民族的高考之门正是在这时重新开启的。

高考之门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关闭的。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之下，焉有正规大学教育与招生制度之完卵？

待到“白卷先生”张铁生亦成为“反潮流英雄”的时候，高考制度之尊严便彻底地荡然无存了。

本来，在粉碎“四人帮”后，教育部曾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并有望获得一定程度的突破。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这次座谈会前一段时间，时任天津市委常委的高教部老部长蒋南翔已提出了从高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的问题。蒋南翔给刘西尧打电话，要求教育部允许他在天津选拔一些高中生，直接升大学。

刘西尧听了蒋南翔的意见，觉得此法很值得尝试，便在招生工作座谈会上把这个意见公开了，其意思是想逐步推广下去，争取有所突破。

不想，此意见一公开，竟引来了激烈的争论。天津市参加会议的有关负责人更是马上发言、“紧急避险”：蒋南翔的意见不代表天津市委。由于教育部领导层的思想也不够解放、不够统一，招生制度要不要改、怎么改的问题毫无进展。教育部于 8 月 4 日向中央上报的“招生工作意见”，还是基本沿袭了“群众推荐”等原有做法。一个历史性的契机就这样付之东流。

第一个呼吁恢复高考的是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就是在 1977 年 8 月初邓小平邀请一批科教界人士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上。查全性的慷慨陈词,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邓小平表示肯定恢复高考的作法,但考虑到此时已是8月份,便说:今年恐怕来不及了。

这时候,有人说:要改也来得及。

刘西尧也觉得越早恢复越好,教育战线的工作可以越早的主动起来。便建议说:如果招考工作推迟半年举行,还来得及。

邓小平闻听此言,当机立断说:好,那就这么办,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从8月13日起,教育部第二次召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开了44天,决定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使教育界的拨乱反正迈出了重要一步。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教育战线出现重大转折。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把招生制度改革公告天下。社论指出:

> 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指导。我们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
>
> ……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报几个学校和学科类别,让祖国进行挑选。这样做,为的是广开才路,提高质量,早出人才,早做

贡献，以适应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

……这个办法，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大学生是平行的。今年先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定比例的大学生，随着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随着中学生文化质量的提高，还要逐渐增加比例。只要我们抓紧中小学的教育革命，从小培养学生不脱离劳动，我们就可以大胆放手地这样去做，丝毫也不应该犹豫和动摇。

中国教育工作的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 3—5　分歧战未见分晓　十一大使命未酬

粉碎“四人帮”10 个月了，但左倾指导思想仍在继续；

邓小平再次复出了，但天安门事件仍没有平反；

“两个凡是”受到阵阵冲击，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仍未占主流地位；

……在这种种矛盾与分歧互见的复杂背景下，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这种背景，似乎已在预示着这次大会应该从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完成拨乱反正任务的历史使命的可能性，大大低于 50%。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 1510 名，代表着 3500 万名党员。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

“这次大会是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在我们党取得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

团的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大会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是党的十一大新闻公报中的一段话，它表明，这是以华国锋等坚持“两个凡是”者为主导的大会，但说它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却纯粹是一种宣传语言。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党发生了分裂，而是说，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对“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发起了冲击，邓小平的复出就是“两个凡是”一次失败的纪录。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分歧，表现在拨乱反正的各个方面，对立的双方彼此都是心中有数、针锋相对。只是在当时，这些“团结的大会”背后的斗争，不为更多的人所知晓而已。

8月11日，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选举223名代表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华国锋当选为主席团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当选为主席团副主席，汪东兴兼主席团秘书长。预备会议一致通过了十届三中全会即已提出的这次大会的三项议程：

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三、选举中央委员会。

8月12日下午3时30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华国锋主持大会。乐队高奏《东方红》。

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此时的华国锋，并未预计到这是他的政治生涯中所作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政治报告，也不可能预计到这是他主持的唯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但他事后也许感到满意，他的政治报告竟长达4个小时，“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华主席在报告中指出，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华主席在报告中准确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主席指出，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个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华主席指出，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四人帮"全面篡改毛主席的伟大理论，篡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他们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诬蔑在我们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根本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摧毁我们党，摧毁我们的军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华主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华主席指出，只要党和

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走资派在党内就是一小撮，并且不断揭露和清除，不可能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指明了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坚持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准确地识别和彻底孤立、集中打击像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华主席指出，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华主席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和历史意义，指出：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华主席说，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这绝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华主席指出，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华主席在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内抓纲治国的八项主要战斗任务：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不能否认，华国锋的政治报告有一些可以告慰历史的东西，但与错误的东西相比，正确的东西太少，而且都不是根本性的思考与命题。

在这次会议期间，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对华国锋政治报告中的错误理论、观点、认识和他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主要有：

关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关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是不科学的，像宗教，资本主义世界观这类上层建筑范畴的问题，就只能用批评、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而报告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高度赞扬，否定“文化大革命”有错误，这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毛泽东的说法。

有的代表还指出：在华国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这一期间，有的政治局委员当群众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时，竟然

下令以"反革命罪"把批评者抓起来的事件,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解决这些问题,等等。

尽管代表们提出许多正确的意见,力图帮助华国锋纠正错误,但是,华国锋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在政治报告定稿时,仍然坚持他的一套错误理论和观点,排除了依靠大会代表的集体智慧纠正一些重大错误的可能性。

针对上述情况,8月18日,邓小平在十一大闭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同时,邓小平再一次地呼吁和号召: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讲,这是一次属于"过去"的大会,属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大会。它不仅没有能够从党的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和实践上完成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任务,反而起了严重阻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顺利进行的消极作用。

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到政治路线、社会实践上完成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已经十分迫切地提到全党面前。而且,完成这一任务的契机已经出现,条件已经成熟。叶剑英那首气壮山河的《八十书怀》正是言近旨远之作:

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8 月 18 日，大会通过了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大会认为，华主席的政治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总结了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准确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是指导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战斗纲领。”

8 月 19 日，新选举产生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选举上述 5 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这样一个包容“新”、“旧”潮流代表的领导集体，意味着 1978 年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个大的转折。

# 四、讨论真理标准的1978

血，在流淌。

张志新、遇罗克、“四五”烈士……的血，融入思想解放的历史长河，激活了一滩死水，徘徊的中国掀起波澜。

死水——“两个凡是”的一滩死水。

波澜——真理标准讨论掀起的波澜。

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党政军民学、士农工官商，人人关注，人们的头脑已打开了一扇窗，新中国迎来了又一个崭新的黎明。

## 4—1 遇罗克葬身《出身论》 张志新问天“谁之罪”

历史上曾经多次重复过这样的情形：当过于强大的邪恶势力作为一种潮流突然袭来时，少数的人舍生奋起，不畏强暴，英勇搏击，从而成为惊天动地的英雄。大多数的人们，则不得不将愤怒和真话埋在心底，默默地跟着走一段路，而后是沉默中的爆发。当然，作为历史剧不可或缺的人物，在黑云压城的形势下，总少不了投机者以及少数的自私者、懦弱者。

思想上的巨人，才是行动上的巨人。其实，英雄人物就是如此，与其说他们的光辉来自于伟大的业绩，不如说首先是来自于思想

上的率先解放或突破更为准确。换句话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攻占一座城堡易，打开思想上的炼狱难。

正因如此，回顾一部中国的现代史，也仅出现过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任务和意义是：冲破数千年的封建主义的旧礼教、旧道德、旧宗法观念、旧思想的牢笼，在复杂纷纭的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激荡和斗争中，中国人民的中坚力量，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及时把握住了时机，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轨道，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任务是使中国共产党首先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绝对化的教条主义底下束缚中解放出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它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次较为普遍、广泛和生动形象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有力地打破了建国以来较长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以来被神圣化了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人们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林彪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是，也深深地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对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纠正和各条战线的整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的重

大问题和案件创造了条件，为在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实践上开创新时期、打开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有它的前奏，都有属于它的英雄般的先驱者。

——哥白尼为了捍卫"地圆说"被教会杀害了，但是教会只能消灭哥白尼的肉体，却无法扑灭哥白尼发现的真理。哥白尼的热情赞助者乔尔丹诺·布鲁诺，勇敢地接过哥白尼手中的火炬，向神圣的教会发动猛烈攻击。他到处宣布宇宙是无限的，整个宇宙没有中心。同样，他被罗马教会视为异端分子，被教会当局的"异端裁判所"逮捕关押。布鲁诺坚贞不屈，于1600年2月被判处极刑。教会在罗马城的鲜花广场燃起熊熊烈火，活活烧死布鲁诺，而布鲁诺在烈火中忍受着极大痛苦，却高昂着永不低垂的头。后来，鲜花广场的熊熊烈火，竟成了更加巨大的真理的火炬，照亮了罗马，照亮了欧洲，照亮了全球，照亮了未来的新世纪。

英雄与伟大的时代总是密不可分的。

当遇罗克、张志新……这些思想解放的先驱，这些捍卫真理的勇士，通过历史的凯旋门，重新回到了人民中间，新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便郑重地翻开了它的第一章。

……

"文化大革命"的风狂雨骤，把中国人民一股脑儿地带进了极左思潮的炼狱。在"万岁不离口"的亦步亦趋中，一股思想解放的烈火，从未停息地在地下奔腾运行着。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

这是1966年9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园里出现的一

副对联，它用最精炼的语言道出了“出身论”抑或叫“唯成份论”或“血统论”的精髓，也是“文化大革命”之初所谓“阶级路线”的生动写照。

这种论调本身当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因而，这幅对联一出现，立刻引起一场空前激烈的论战。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论战竟把一位24岁的文静书生引向了秋风萧瑟的刑场。

这位青年叫遇罗克——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一颗划破夜幕的陨星。

1957年，遇罗克的父亲（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和母亲（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双双被错划成右派。从那一年起，不但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连遇罗克的操行也由过去年年的“优”突然变成了“中”。仿佛从金色的塔尖上跌落下来，15岁的遇罗克开始尝到人世间的辛酸了。

“高考门门不能下90分！”他对自己的功课是知底的，可他又担心受父母“问题”的影响。他的担心终于成了可怕的现实。1960年夏末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人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一个是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

第一次高考后，遇罗克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夕，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遇罗克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

“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征兵开始了。遇罗克又立即报名。然而，他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在旧创口上，更觉疼痛，更感惶惑。

千顷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

遇罗克知道自己将难以摆脱掉出身的"先天不足",因而,他反倒是无所谓了。"前村无路凭君踏",走自己的路,随他去吧!

1965年11月,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一个精心制造的大冤案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嗤、嗤"地点燃了。

遇罗克无法得知这背后的种种"铁幕",但他记住了"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于是,他非常认真、非常高速度地写出了几篇态度鲜明的文章,投书报刊,只可惜均遭退稿。所幸他并不气馁。

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他在这篇文章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种种谬论。他在日记里写道:"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大动乱开始后,少年磨难的遇罗克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对发生的一切作了敏锐的观察和无情的批判,并记入自己的日记。

他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批判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词句颂扬毛泽东,须知"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

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6月4日日记中对运动中的狂热极为不满,他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哄,每个学生都效仿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

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他激烈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他的日记中记载着：“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是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

……不幸的是，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日记，被发现了，被当作“变天帐”出现在“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了。接着，又成了遇罗克的“反革命罪证”。

几天之后的深夜，遇罗克被带走了，因为他竟敢反对大名鼎鼎的“左派”姚文元。

1969 年 9 月的一天，遇罗克从“学习班”归来，写下这样的第一篇日记：

>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就在这天晚上，他开始撰写《出身论》。对于这一做法，他自己后来这样注释道：出身论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负(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的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人做的。”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写的。

他剖析了前面提到的那副“好汉”对联，指出：“这副对联的错

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他认为:“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文章列举大量事实控诉了出身论对青年的毒害,最后发出呼号: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他认定:“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10月深秋的北京街头。被一片“打倒”声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忽然在许多公共场所读到一份油印的《出身论》,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其实,这个小组只有一人,他就是遇罗克。

仿佛漫天阴霾中透出一片晴日,《出身论》立即引起强烈的、广泛的反响,多少人在阅读,在抄录,在沉思,在议论。难以数计的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

兴奋之下的遇罗克又连续发表论述出身论的文章,大反特反,大论特论。可是,灾难已经逼近了。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出来表态,公然说“《出身论》是反动的,代表了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

面对来自权力顶峰人物的强大压力,年轻的遇罗克始终坚强不屈。“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围绕在他身边的“故事”,已使他清楚未来的危险。他在给广东一同志的信中说:“我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被邮检了。”“尽管我们

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

1968 年初，遇罗克被捕了。手铐与寒风裹挟着他呼啸而去。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在 1966 年 8 月 26 日日记中的誓言：“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在审讯中，遇罗克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恶毒攻击”罪，表示绝不接受。

……“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你为什么攻击中央首长？”

“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

“你为什么攻击江青？”

“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

“混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让你攻击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一句也没有批判……”

这样的审讯频繁进行了 40 多次，遇罗克大义凛然，唇枪舌剑，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烈，豪杰！铡刀下，不变节。”

在所谓的“交待材料”中，遇罗克的语言更加严密、话锋更加犀利：

“我过去认为，1959 年到 1963 年期间，如果没有错误，就不会那样困难。”

“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

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

……这也许不是真理，但也决不是“恶毒攻击”。这只是一个有理性的公民，出于一腔热血，讲的自己的肺腑之言而已。只可惜，这些真话不合时宜，也就因言获罪了。

由于违犯狱规和“态度不好”，遇罗克多次被戴上背铐和重铐。不可名状的痛苦，折磨着这个纤弱的书生。背已经微微驼了，顶开始渐渐秃了，脸色更白、更黄，看不到一丝青春的光泽。但是，“丹砂粉碎丹仍在，铁链锻成铁愈铮。”在他躯体内为真理而斗争的烈火还在熊熊燃烧。

“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的头上，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虽然“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在林彪、“四人帮”把持下的法庭还是决心以“思想反动透顶”、“大造反革命舆论”等罪名置遇罗克于死地。

“遇罗克，你顽固透顶！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两分钟考虑后果！”

审讯员突然如此恶劣，遇罗克意识到生死一刻到来。“下场”与“后果”意味着什么，已昭然若揭。

在选择了真理也就选择了死亡的时刻，遇罗克像我们民族的无数英雄一样，昂起了高贵的头。

改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遇罗克，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在一阵疯狂的口号声中，在一片高高举起的“红海洋”里，遇罗克和其他囚犯一起走到了生

命的最后一个驿站。

宣判开始了。遇罗克的罪名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宣传……“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遇罗克昂然挺立，不肯低头。当警察来押他时，他拼命挣扎，不肯把带着脚镣的双腿向前迈出一步……

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陨落了。那一年，他才 27 岁。让我们永远记住他生前的这一段话吧！这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的醒世警言，我们今天读起来尚有面红心跳之感：

> 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

“历史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遇罗克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1979 年 11 月 21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克无罪”，谁是领罪人？

“今天来问罪，谁应是领罪人？”

1975 年 4 月 4 日，寒潮袭击下的沈阳。风冷如刀。

没有阳光，没有蓝天，也没有春天特有的芳馨。

灰暗暗的天宇下，倒下了一位英雄。没有布告，没有公审，只有流的血。鲜血染红了印在囚服上的三个字：张志新……

> 哀民生之多艰兮，长太息以掩涕！
>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只有读懂了2200多年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面对动乱、危机、濒临灭亡的祖国，用血和泪唱出的这首哀歌的人，才会读懂无声地倒下的张志新。

作为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一名共产党员，张志新也曾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武斗狂潮，很快令她的激情冷却下来了。

她变得沉默了。

她总是一个人长时间的思索着、苦恼着、探寻着，她几乎一句话也不说。"你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是现在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人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打倒这么多人，省委领导人全靠边了，难道这些人都是敌人？我想不通啊！老干部总是为党作过一些好事，有些人犯了一些错误，是否都该打倒？这里面有名堂！中央文革里有名堂！我对江青、叶群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对林彪就是不信任！"

沉默，一连数日孤独地沉默着。这沉默是痛苦的，又是短暂的，就像一个蓄满山洪的水库，看上去连一点波纹也没有，可是一个大的可怕的爆发已经孕育成熟了。

不久，张志新就同成千上万名原东北局、省委、省人委的干部一起被赶到了盘锦五七干校。志新在干校忍着肝病的痛苦，白天和同志们一起劳动，拉车。夜里，借着暗淡的灯光，她拚命地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寻找答案，解决难题。她沉默寡言，忧心忡忡。

默默地劳动，默默地学习，默默地思索，张志新在默默中形成了一整套观点、看法，于是，长时间的沉默被打破，她从沉默中爆发了。在和同志们的交谈中，在连排会议上，在后来一次又一次批斗会上，张志新旗帜鲜明地、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见解，锋芒直指林

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封建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与极左的个人崇拜、思想禁锢。她庄重申明：

“对江青我就是怀疑，对江青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可以？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自己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江青审查了没有？江青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么？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揭？中央文革也可以揭么？”

“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下去不堪设想！这不是树毛主席的威信，是树林彪自己的威信，我对林彪没有什么信任！”

“现在天天搞个什么‘宣誓’，搞这个形式主义干什么？他不忠于毛主席，就是做哪些事也不行。忠不忠于毛主席，主要看认不认识真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的威望不是靠大树特树树起来的，是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毛主席在党的历史上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

这些铿锵语言，似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漆漆的夜幕。

在那万马齐喑的日子，张志新勇敢地说出了亿万人民的心里话，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声，向着林彪、“四人帮”公开地挑战，公开地进击了。

然而，先驱者的磨难也就从此开始了。

张志新被立案审查了。但她无所畏惧，决心做一个高举真理火炬的共产党员，冲破林彪、江青一伙的“异端裁判”。

于是，迫害升级了。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戴上“现行反

革命分子"罪名逮捕入狱。

高墙大院关住了张志新的自由身,却关不住她活跃而坚定的思维翅膀,她依旧翱翔在真理的天际,不曾停步,不曾后悔那"回头是岸"。

贫下中农给她办学习班,开导她说:"咱庄稼院有句话,小胳膊可扭不过大腿呀。你,你就忍两天吧,哪有不晴的天?哪有不干的道?"——真挚的感情,朴实的语言,深深感动了她。她眼里含着泪说:"多好的贫下中农呀,就是为了他们,我也要坚持真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

入党15周年的纪念日,1970年12月25日。她身在牢房,耳边又响起了入党时的誓词。感慨万千中,她挥笔写下了《迎新》诗篇:

十五年前的这一天,
我庄严地宣读了誓言,
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为人类解放而献身。
十五年后的这一天,
我严肃地接受"党"的"审判",
不是我违背了誓言,
也不是党来把我屈冤。
为什么还没有落案?
时间和实践将公正裁判!
追求真理,坚持战斗,
奔向党指引的航线。
驾驶起生命的航船,
铲私根,战恶浪,永向前,

勇敢地去接受考验，

用胜利去迎接春天。

对于所谓的审问，她从来都拒绝回答。没有办法，只好改用谈感想的方式提审。下面就是这种感想式提审的部分记录：

问：到这儿来以后，有什么想法？对个人问题怎样认识？

答：9月24日批斗后逮捕了我，我没有构成犯罪，我想不通。

问：你始终不认罪，劲儿到底别在哪里？

答：我说的都是事实，是真理。我没有向任何人乱讲，包括我的爱人。我是按照组织原则向党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权利，怎么会是犯罪？

……

“你为什么这样嚣张地攻击林副主席？”

“这是我的看法，这不是反革命行为。”

“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哪一条是反对社会主义？你回答我！”

“你犯了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罪行！”

“我不是攻击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党培养我参军、上大学，我怎么会反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党的原则的！”

“你拒不认罪，要考虑个人前途！”

“离开党，谈不上个人前途！我没有什么考虑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回去吧，写一份认罪书交上来。”

“好吧，我会交给你一份认罪书的！”

在漫长的岁月里，

在尖锐的斗争中，

失去党的具体领导，
她可知怎么行？
呼唤没回应，
喉干泪水净，
在战友的带领下，
她锻炼成长，
红心献革命，
永不忘誓言！
为真理而奋斗，
誓死捍卫党。
今天来问罪，
谁应是领罪人?!
今天来问罪，
谁应是领罪人?!

在她自己创作的令人哀婉伤痛的《谁之罪》诗歌声中，张志新交出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认罪书"：

……在这段时间里，我进行了学习和考虑，坦率地讲，没有解决认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立场观点不变，态度如前，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高举着真理的火炬，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想要革命么？你就应该是强者——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这哪里是一份"认罪书"，这是一颗捧向党的赤热的心，这是一柄讨伐林彪、"四人帮"的锋利的剑！哪一个革命者读了这份"认罪书"不潸然下泪！只要还有一点共产党员气味，谁忍心对她再施酷刑？

由于这是"中央首长"那儿挂号的大案要案，辽宁省的追随者

还是蛮横地判处张志新无期徒刑。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当邓小平再次复出撑持危局、全面整顿的时候，“四人帮”一伙也在暗地里加紧着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张春桥叫嚣要“杀人”，“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积极照办。他穷凶极恶地说：“张志新死心塌地，活一天和我们干一天，杀了算了。”下令法院办理加刑手续。

1975年4月3日，张志新再一次出现在法庭上，她以审判者的姿态进行了最后一次斗争。经过简单的几句对答之后，张志新不等再问，便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她以法庭为战场，有力地揭露了“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罪行。她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说了一个共产党员该说的话，我的观点起之有因，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

审判只好草草收场，但立意杀害英雄的恶魔们，竟明目张胆地践踏法律，以这份没有签字的提审记录为根据，改判张志新死刑！不仅如此，他们杀人心切，第二天上午就执刑，法律规定的12天上诉期，竟连一天都没有给。

4月4日，当属于英雄的最后一个黎明来到时，管教员问张志新：“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张志新坦然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观点至死不变！”

这就是英雄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千古不朽的“正气歌”。

黎明前的黑暗迅即过去，历史还张志新以英雄的本来面目。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了为革命烈士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大会。追认张志新同志为革命烈士，称誉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向她学习。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一份英雄写给丈夫的遗书，正在华夏大

地传递着追求真理的呐喊。

曾真：

结婚十四年，我们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地抚养下一代，对林林要耐心，女孩子每长一年，事就更多，要很好地爱护她，叫她不要早婚。妈妈对不起她们，过去自己修养不好，打骂过孩子，让他们别往心里去。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要改正"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让林林好好照看小弟弟。不要伤心，要坚强！

那一百元钱，是我平时节俭积攒起来的，打算为父母办理丧事用。请把钱寄给我母亲，这也是最后一次孝敬！我没给父母写信。你也不要把我的事告诉她们，免得受刺激犯病。你平时要多注意身体，为了革命，多照顾自己吧。如果你照看不了孩子，可写信和母亲商量，把孩子放到天津。我不在了，收入减少了，担子都是你的了。对孩子要耐心，我对不起你！

一个人不管是生或死，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

我懂得了革命，决心要为革命贡献一切！真正的革命事业永远是兴旺的，蒸蒸日上的。我愿为美好的未来添点土，出点力，但有没有这种可能，看来不由我决定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祖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 4—2　九死一生献国策　四五运动起狂飙

**本报讯**　四川省雅安地区一位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一九

七五年写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万言书——《献国策》原件，最近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献国策》的核心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李天德因写这份万言书被"四人帮"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后经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直到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得到平反。……

这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一则短讯，粗心与匆忙的读者或许不加注意一掠而过，但若知晓了这则短讯背后的故事，就会发现它竟像一簇灿烂的火花，耀人眼目。

1939 年，李天德出生在四川荣县李子乡，年少时节，父母亲先后早逝而去。靠着大哥的照料，他才艰难地念完小学、中学。高中毕业后，做了一年中学代课教师，在 1956 年 9 月考入重庆大学。少年不幸的李天德，赶上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他自己也是沿着"红领巾—共青团员—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前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在 1957 年反右中，李天德对当时个别班的反右斗争提了意见，写了三张大字报和一些诗。根据中央 1978 年 55 号文件和中央 1957 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衡量，不是右派言论。原划李天德为右派骨干分子实属错划，应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

——这份 1979 年的平反文件，证明着"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李天德，在反右斗争中马失前蹄、"栽了跟头"。

从此，命运多舛，成为李天德的人生写照。1958 年李天德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同年底，他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入狱。

在狱中，他把夜晚的时间都花费在苦读经典著作上：《毛泽东选集》、《资本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读了

黑格尔、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康德、尼采等哲学名著，写下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知识就是力量。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李天德愈发心明眼亮。一份写自“大跃进”狂潮中的《反省书》，印证着此时的他是何等的冷静与理智：

对于我个人的言行，勿需反省，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我坚持我自己的观点，这就是：

（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各国共产党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右”运动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这是违背“八大”路线的；

（三）总路线的提法含有极左因素，反映了一部分群众中的冒进情绪，违背了我国现阶段的客观条件。“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斗争便是这条路线左倾因素的产物。

1965年底，李天德以他亲身经历的重庆大学1957年反右运动为背景，写成了5幕9场话剧剧本《和平里的战争》，投寄给《人民文学》和《剧本》两杂志。剧本从未变成舞台上的“活剧”，而作者却又招来了6年徒刑。判决书上这样写着：“李犯天德借写剧本为名，大肆散布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污蔑、攻击党的各项政策，污蔑‘五反’、‘肃反’搞糟了，妄图反革命复辟……”

他捱到1972年10月刑满后，仍然戴帽，在四川苗溪茶场管制劳动。

岁月如梭，一晃便到了1975年。

1975 年有好多大事不应忘记，但最具爆炸性的新闻和喜讯，当然是邓小平复出，主持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整顿。

尚能看到报纸的李天德，从中看到了希望。他要采取行动，去实现多年以来压在心底的一个梦……前往北京献国策。

《献国策》，这是他在狱中思索多年的心血结晶，他不甘心永远压在心底，无论利大利小，他都希望能够使之得见天日。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探亲假——总共 10 天。

他毕竟近 20 年来未探亲了。但准他假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李天德探的不是亲，而是"京"，首都北京。

在成都的小旅馆里把《献国策》形成文字后，李天德直抵北京，这一日，是 1975 年 8 月 12 日。

三份《献国策》中的两份，被他用纸包好，分别写上"中共中央收"、"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收"，投进了永定门车站邮筒。最后一份《献国策》，被他揣到了新华门，后又到了太平街八号的接待站。

接待室里，一个女接待员接待了他。

"什么事？"

"我从四川来，要面见邓副总理，送一份文件。"

"你把文件交给我，我可以代为转交。"

"我一定要面交。"

"交给我就行。我一定给你转交。"

《献国策》交给了女接待员，李天德也就把自己又交给了公安局。这是因为，在那人妖颠倒、是非颠倒的岁月，《献国策》锋芒所向，恰恰是直指"好得很，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过好处。

[A]我们的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

[B]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像仇人一般相互厮杀。

[C]让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

[D]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几年的空前大破坏。中央当然不可能知道文革期间中全国工农业产值的真实数目。

[E]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变得奸滑。……

李天德还进而从"文化大革命"上溯"三面红旗"和反右派扩大化，痛斥种种"左"的所为：

"关于三面红旗，虽然有人极力肯定，但我要否定。……人民公社是'共产'风，大破坏，乌托邦的狂热。……层层的干部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欺上瞒下。……大跃进的第二个年头(59年)一切工农业产品减少，到了60年，就变得奇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正确的。"

"大学生右派一律无罪释放。对治理国家大事确有独特进步见解者，可担任国家干部。"

他建议废除干部终身制，明确提出"中央主席，不得连任20年"。"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各部委，任职均不得超过15年"。他认为："这样做，即(既)避免了形成个人专制和宗派集团，也造就了更多的国家领导人，让人民中的更多的优秀人物都有机会管理国家事务。"

一篇万言《献国策》，提出整整12个方面的国策。犀利的笔锋，刻骨的真诚，触及当时人们讳言的个人崇拜，触及"三面红旗"，触

及“要七、八年来一次”的“文化大革命”，触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的功与过……

惟恐不被接待的李天德，一被接待就被“接待”得受不了。当晚8点，呼啸的警车把他押往北京市公安局审讯室。他落进“四人帮”爪牙之手。

1975年8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李天德——这是他平生第三次接到逮捕证了。10天后，四川派出的公安人员，押着他“免费”坐上南下的火车，回到四川苗溪茶场……

1976年2月24日，“建议判处李犯天德死刑立即执行”，已明明白白写在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上：

“李犯天德曾因反革命犯罪两次判刑，不思悔改，公然流窜到首都，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罪大恶极、屡教不改、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建议判处李犯天德死刑，立即执行。”

但也有人指出：李天德终究是亲自进京直接向中央献万言书。除此之外，他未向任何人阐述他的政治见解。判处死刑未免过重。

判决书终于正式下达了。李天德以“反革命罪”，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刑期自1975年8月19日被捕算起，至1995年8月18日止。

“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

只是“四人帮”真的被粉碎了，一切都开始变化，李天德也终于重见天日。1979年2月17日，雅安劳改大队接到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书：“现押你队李天德，经我院改判无罪释放，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特送上判决书一份……”

1985年4月，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收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来信。信中说，李天德的《献国策》是珍贵的革命文物，他们要征集、收藏原件，希望得到你院的支持。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过研

究，同意把《献国策》原件移交中国革命博物馆，让千千万万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磨难的青少年，从中得到教育。

国无宁日，天下大乱。从遇罗克、张志新、李天德等一个个个体身上，已不难看出，善良的国人们早已是忍无可忍，终于，一场称之为“四五”运动的群众运动降临了。

它首先是一种情感的反抗，以悼念周恩来为载体；它同时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反对极左思潮为深层次的内涵。

敬爱的周总理，
您的儿女对不起您，
您的英灵至今不能安息。
掏尽红心，
难表我们对您的深切怀念；
挥尽血泪，
难倾满腔悲愤思绪。
您的一生历史已作出最高的评价。
功高日月，声震环宇。
国际史上，
永载您的音容笑貌；
革命路上，
踏遍您的稳健足迹。
风云涌，鬼神泣。
巨星一陨天地哀，
四海五洲下半旗。
可笑群魔不自量，
妄想重翻腥风血雨。
鼓唇摇舌，捧裙牵裾，

猿猴沐冠，什么东西！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让那些家伙看看吧：
天安门前花似雪，
纪念碑下泪如雨。
你们不念我们念，
你们不祭我们祭。
总理精神万代传，
子子孙孙举红旗。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安息吧，
敬爱的周总理。

为什么好人总是挨整，坏人如此猖狂？为什么我们的国家灾难

如此深重？人们心里的问号越来越多，疑团越来越大。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中国人民失去了擎天巨柱。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潮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忧国家民族之未来、伤痛欲绝的人们，竟又被勒令不准佩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开追悼会。人们无处寄托自己的哀思，也无法抑制心头的怒火。

人们的怒火无处宣泄，"四人帮"竟又在伤口上撒盐：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中公然删去周总理给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马上看出来，毒箭不只是射向周总理，也射向了邓小平。

得志便猖狂的"四人帮"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人民。《文汇报》制造的这两起反对周总理的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3月29日，英勇的南京人民在街头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等革命标语，并纷纷走向雨花台，向周总理敬献花圈。南京人民斗争的信息迅即飞过长江、越过黄河，传到了北京。北京人民对于《文汇报》的这种反革命行径，早就义愤填膺了。工厂里、学校里、机关里、部队里，到处议论纷纷。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开始了。

天安门广场是历史的见证。这里曾经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曾经是中国人民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地方。现在，这里又成了声讨"四人帮"的战场。

这是一场用花圈和诗歌为武器，向窃踞高位的“四人帮”猛烈开火的特殊的战斗！

阴云漠漠妄蔽日，花开已报四月春。

3月30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曹志杰等29位同志，第一个把悼念周总理，决心同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悼词，贴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的五四运动浮雕下面。

一个一个献向周总理的花圈送来了，一份一份歌颂周总理丰功伟绩的诗词贴出来了。到4月3日，花圈已达几千个。送花圈的单位有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总部机关、北京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人民公社，还有天津、湖北、沈阳、陕西等外地来京的同志。送花圈的队伍有的几十人、有的几百人、有的几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一夜春风来，万朵白花开。欲知人民心，请到广场来。”

4月4日，是清明节，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这是“鬼节”，不许悼念的禁令，但是首都人民不怕跟踪盯梢，不怕打击陷害，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像狂流巨涛一般涌向天安门广场。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200万人次以上。整个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样精致的花圈从广场的北侧一直排到纪念碑的南端。

“漫天白花飞如雪，全民作诗壮山河。”

这是一个诗的海洋。整个纪念碑周围贴满了诗词。广场贴不开了，就向南面的松树林发展。人们在树林中拉起一根根绳子，上面挂满诗词和条幅，形成一条条峰回路转的“诗廊”。

这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会场：

揭竿淞沪震亚东，八一南昌军旗红。

万里长征献赤胆，弹雨枪林一心忠。

滚滚延河育劲草，巍巍宝塔育青松。
龙潭虎穴斗山城，舌剑唇枪战顽凶。
艰苦卓绝三山移，碧血凝染五星红。
反帝反修创伟业，为国为民立奇功。
人生自古谁无死，独留丹心化大公。

这是声讨"四人帮"的战场：

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
青江摇桥闪鬼影，反罢河妖红霞现。

这首诗"谐音"用得好、用得妙！

这些诗传颂传抄者，络绎不绝。《天安门革命诗抄》等书作者所写的《前言》中说：

"愤怒出诗人"。愤怒的人们以诗词为武器，向"四人帮"呼啸着发起了冲锋，无情地揭露了这些政治流氓、江湖骗子的丑恶嘴脸，同时沉痛悼念和尽情歌颂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真是"诵者声泪俱下，抄者废寝忘餐"。一首诗词是一把匕首，无不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一首诗词是一把火炬，使人们对"四人帮"的满腔仇恨烧得更旺。这些凝聚着革命人民的血和泪的诗词，无不出自作者们灵魂深处的呐喊，因此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革命群众看了，愈益斗志昂扬；敌人看了，则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它们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不少作品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无论在我国或世界文学史上，它们必将占有光辉的一页！

天安门事件被人们誉为伟大的四五运动，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它以鲜明的旗帜，磅礴的革命气势，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向全世

界庄严宣告：中国不是“四人帮”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只有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入夜，一张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引起广大群众的注目和拥护。传单全文是：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一、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二、七四年十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七五年一月，主席识破了江青，按周总理的意图召开了四届人大，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

四、七五年七月，毛主席批评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

五、最近所谓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翻案复辟活动。毛主席说：“翻案不得人心。”这些人翻历史的案成了过街老鼠。

后来，这份传单被定名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成为同邓小平“挂钩”的重要“证据”。

……从南京的雨花台，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人民革命的波涛，汹涌澎湃，“四人帮”濒临灭顶之灾，终于举起屠刀，向人民下毒手了。

4月5日清晨，大批的群众走到天安门广场，竟看到这样一幅景象：花圈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掉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地上是一滩滩的水，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

这怎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怒？自己的战友为悼念周总理而被一个个押上警车，关进牢房，怎能不难过，不气愤？“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这样，4月5日的激烈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四五之夜，天安门广场一片恐怖。这天晚上，200多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被拘捕了。“四人帮”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蔓延到全国。

天安门事件被“四人帮”诬陷为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把悼念周总理诬蔑为“借悼念总理为名，恶毒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把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活动。3月30日，王洪文就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4月2日，当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的革命烈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姚文元对那个心腹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同日，他在给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电话中说：“清明节是旧习惯”，“现在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总理，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4月4日，姚文元再次打电话告诉《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这就说明，定性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不是什么因为4月5日发生的烧、打，而是“四人帮”早有预谋，早已定性的。

在歪曲事实的基础上，由“四人帮”亲自指挥，炮制了那篇臭名昭著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假报道，给人民群众安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邓小平。

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事件毫无关系。“四人帮”为了将邓小平置于死地，竟说他是事件的总后台。在炮制《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时，姚文元说：“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尔后，凡是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评论、

文章就把什么“邓纳吉”啦，什么“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啦，什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总根子”啦，种种诬陷不实之词，加在邓小平的头上。特别是“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作组与梁效合写的《党内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竟胡说什么“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姚文元还嫌这话不够，又亲笔把“一手造成的”改为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四人帮”4 月 5 日对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不仅没有吓倒人民，反而彻底暴露了他们的法西斯嘴脸，更加激起了强烈的反抗。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巧妙地保护和珍藏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诗词、祭文、悼词，这成为革命群众在新的情况下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

像轻工业部一名干部，把抄录的革命诗词，照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排列顺序，重新抄在纸上，外面绕上很厚的棉线，好像一个线团。

公安局的一位民警同志，把抄录的革命诗词转到他的家乡农村埋在地下。

一位在秦皇岛工作的同志，清明时节恰在北京，他抄录了大量革命诗词，用塑料布包起来，埋在香山。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 16 位同志，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冒着入狱的危险，四处搜集、整理，以“童怀周”的名字油印出版这些珍贵的天安门诗抄。

……在天安门广场演出的这幕惊天动地的史剧，是历史上少有的壮举。它极其深刻地说明：人民觉醒了，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开

阔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斗争的才干，增强了胜利的信心。4月的斗争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为同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亿万觉醒了的人民。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说，四五运动的最重要意义还不仅于此，而在于它为中国人民最终冲破“左”的禁锢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换句话说，正因为有了四五运动，冲破“两个凡是”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并且以令人欣慰的速度快步到来了！

## 4—3　邓小平吹响号角　理论界率先发动

1978年5月11日，一篇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由这篇文章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舆论上的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曾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980年2月20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这样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

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这篇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文章，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 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曲。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荒谬和霸道是显而易见的。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中国就不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困境；就无法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无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无法拨乱反正，顺利实现新时期的历史性转变。

于是，“两个凡是”遭到了党内许多人的抵制，也越来越受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

“两个凡是”不行！

——最先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的是邓小平。那还是“两个凡是”一出台，当时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3 月 14 日，胡耀邦去见邓小平，他对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这一次，邓小平和胡耀邦谈了很多话。

从此，胡耀邦决心全身心地投入推倒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

义的"两个凡是"的斗争,成为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到来的幕后巨人。

4月7日,即"两个凡是"正式问世整整两个月的日子,仍处在"第三次下沉"状态的邓小平,对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三天后,邓小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的。"准确、完整"这四个字,既否定了"两个凡是",又蕴含着要否定错误的东西。把"准确"二字放在前面,更突出了要否定和纠正错误的意思。邓小平的这一提法,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成为全党走出"两个凡是"的禁区,开辟思想解放道路的先导。

邓小平提出:如果中央认为恰当,请将我的信转发全党。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在当时"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气氛正盛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个极大的鼓舞,对拨乱反正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同年5月24日,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谈话中说:

>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

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今年4月10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7月21日，邓小平发表讲话，他指出：

我在今年的4月10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

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我们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在这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针对华国锋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

最根本的东西。”同时，邓小平正式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邓小平于 9 月间复出，使中共中央里正确方面的力量大大加强。在这一期间，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一齐出来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长期倡导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推动全党全军全国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运动的开展。

1977 年 9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聂荣臻的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文章。文章说：

> 在这里，我想特别讲讲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接着，聂荣臻的文章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过程，结合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进一步阐明和论述他的观点，文章说：

> 《实践论》、《矛盾论》所阐述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也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实践论》的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是第一性的，实际生活，现实事物，是第一性的，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到底，只能从实际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经验的检验。《矛盾论》讲的是客观世界的矛盾及其

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我们的思想要符合客观世界，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存在的矛盾，反映客观存在的矛盾。客观世界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变化，我们的思想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矛盾的变化；一切正确思想，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否则就变成形而上学。

9月19日，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中，通过论述我们党同张国焘和"四人帮"在党指挥枪这一原则问题上的斗争，指出"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永远对党忠诚老实"。

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文章强调："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文章总结了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经验，说明："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题为《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两报一刊社论。社论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学习马列主义的态度是"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方法。"毛主席还批评过有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

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些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实事求是的思想的精辟论述，有力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首先是理论工作者的赞同和共鸣，他们都积极地投入了与“两个凡是”的斗争。

如果说邓小平 1977 年 4 月 10 日的信是吹响了向“两个凡是”斗争的号角，那么，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理论工作者的觉醒和参与，则表明了这场斗争在所难免，势不可当，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华夏大地即将展开。

如果说“两个凡是”的反义词应当是实事求是的话，那么，真理标准问题，则是“两个凡是”在理论逻辑上的“死穴”。此穴一被点中，“两个凡是”就再也无法站住脚了。

当谜底揭开时，人们都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但在当时，身在此山中的人们，为着解决既要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又不能公开批判“两个凡是”这样一个难题，真的是殚精竭虑、颇费思量哩。

在首都北京，后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思索着，并在中央党校导演着一场伟大历史变革的前奏曲；

在六朝古都南京，后来的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长胡福明也在思索着，并与《光明日报》磨砺着一把掷向“两个凡是”的利刃。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胡耀邦复出后，以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身份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要说明的是，此时中央党校的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而把实践标准作为检验文化大革命的标准，作为评判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的标准，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大范围地严肃地提出来，认真地进行讨论，又恰恰是胡耀邦主持下的中

共中央党校。

事情要从党的十一大讲起。十一大报告中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胡耀邦是参加十一大的代表,又正在筹备中央党校的复校开学,他很自然地要具体考虑这个问题。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以路线斗争演绎党内历次斗争的排列,所谓第九次路线斗争,就是指同刘少奇的斗争,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就是指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指同“四人帮”的斗争。这是十年大动乱中的一大冤案、两大胜利。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实际上,就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做出评价。

那么,胡耀邦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呢?中央党校的沈宝祥回忆说:记得就在那个时候的一天,我们几个人在胡耀邦办公室谈完问题以后,就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有人提出: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法?

胡耀邦回答:“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

他的回答脱口而出,语言又是那样明确,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他的回答使我们感到很新鲜,也很受启发。

1977 年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指出:办好各级党校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的事业,“不但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而且要把党校办成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要做到每期学员结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时,在党性方面、作风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进步,明显的提高。这一条,应该作为衡量党校办得好与不好的一个主要标志。”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招生开学,

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党校校长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汪东兴，参加了开学典礼。

华国锋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中央认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我希望中央党校的同志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密切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在学习中走在前头，学得好一点，用得好一点。"

叶剑英也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稿是胡耀邦亲手改写而成的。他说：

"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

胡耀邦也在典礼上讲话，指出：革命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时时意识到时代赋予自己的重担，就会意识到要更好地学习。他对不同时期、不同经历、不同年龄的学员，分别提出了希望，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刻苦钻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这样，中央党校研究党史的任务就更明确了。12月2日上午，中央党校党委开会（当时中央党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制），审议党史教学计划。当时，党史教研室一些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不敢越出文件的框框思考研究问题。在听取汇报和讨论的过程中，胡耀邦多次讲话和插话，讲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理论啊！"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当然要跳出框子。”

“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

“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主持会议的副教育长冯文彬也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最后，胡耀邦布置，成立一个由吴江牵头的小组，要完全按照科学态度，搞出一个新的方案来。下个礼拜讨论。

1977年12月10日，在胡耀邦处开会，讨论方案。胡耀邦进一步讲了研究方法。他强调：“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是方法论，方法不对头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要完整和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意思想体系，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入学的态度，严肃的严密的科学的态度，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脱离实际，断章取义……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胡耀邦的这些话，同“两个凡是”是对立的，也可以说，是直接反对“两个凡是”的。他提出，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他设计了框架，并特别交待，这是一个大事，明年一月中旬要拿出个初稿。

在吴江的指导下，以金春明为组长的研究小组经紧张工作，到1978年1月中旬，搞出了这个文件的第一稿。1月18日，吴江将这个文件打印稿报送胡耀邦。

这个文件的第二部分是："怎样进行研究？"提出了两条指导原则，现摘录如下：

1、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为指导，去进行研究。

2、"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为标准，也就是以社会实践为标准，来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是非。

这个文件还指出，今天"已经有条件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歪曲了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这样地研究路线斗争的历史，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实现思想大解放的重要环节之一"。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当时的国内情况以及大多数人们所能达到的思想认识水平，我们不会奇怪文件中还有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的内容。重要的是，以上两条指导原则和提出的要求，从主导方面来说，已突出了实践标准，体现了胡耀邦在前述两个会议上讲的意思。

1 月 20 日，胡耀邦审阅了这个文件并写了如下批语："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 14000 字，可扩充到 30000 字。"根据胡耀邦的批示，研究小组的同志进一步修改充实了这个文件。冯文彬提出，可同一部的学员开座谈会，听听他们的意见。此时的一部学员都是高级干部，分别来自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党组成员、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部队军以上干部及相当上述职务的干部。其中有些人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3月6日，吴江邀请一部的学员进行座谈，听取意见。被邀参加座谈会的共6人，其中之一就是随后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紧密相连的杨西光。

经过研究小组成员的修改和充实，1978年4月，形成了第二稿。这个稿的名称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在这一稿中，实践标准写得更明确了：

> 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要尊重历史事实，"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列宁)。绝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玩弄个别实例，来"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搞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上当受骗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4月中旬，这个文件被发给了全体学员阅读、讨论、征求意见。中央党校复校后第一期学员共807人，包括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理论宣传干部班。一些文章中所说的中央党校1000多中高级干部的讨论，实际上就是指此次800人的大讨论。

学员们对这个文件的讨论是认真的，热烈的，大多数人没有什么顾虑。综合报告说，学员们认为，这个文件提出的"关于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原则，比较明确，对于引导大家正确地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很有必要的"。这表明，大家对研究党史的指导原则，包括实践标准，都注意到了，而且接受了。有不少学员

已经以实践作为标准，思考“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是非了。他们提出质疑的问题有以下一些：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如何评价？

武汉七二〇事件如何评价？

杨余傅事件如何评价？

怎么把林彪写入了党章？

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如何看？

三次党代表大会对三次路线的总结是否还是正确的？

这么大的党，被林彪、“四人帮”几个人搞到崩溃的边缘，什么原因，我们的路线上有没有问题？

……

当然，讨论中也并非是众口一辞，一致叫好。也有一些学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这个文件在讲到第九次路线斗争时，为什么没有再写叛徒、内奸、工贼？为什么摘掉三顶帽子？这可是原则问题；天安门事件目前还是要按华主席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精神写……另有一些人则是对实践标准本身还不够理解，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

讨论中表现出来的两种明显的倾向，即是此时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思潮有形无形的对立与折射。不仅党校学员们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暴露出不少糊涂观念，从全党和全国总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个人迷信还没有打破，思想还处在僵化的状态。这就促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和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思考问题，并决定以实践标准为主题，由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执笔撰写一篇文章。孙很快写出了，深入论述这个问题，完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稿。这时，《光明日报》送来了约胡福明撰写并已经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稿子，要求理论研究

室帮助修改。经请示胡耀邦,决定将两篇稿子"捏在一起",仍用初稿的名字。这篇经胡耀邦定稿,并根据双方商定的意见,头天在《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在《光明日报》以稿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理论动态》是中央党校的内部理论刊物。1977年6月4日,胡耀邦召集10名同志开了一个会,商量要办一个内部理论刊物,最后定名为《理论动态》。当时,胡耀邦明确指出,办《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一个问题一篇文章,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以后,有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个提法,更准确了,但含义是一样的)。就在这个会上,胡耀邦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就是搞科学态度。"他所说的科学态度,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这也是他创办《理论动态》的初衷。

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正式创刊,10日一期。

从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坚持实事求是开始,随着问题的展开和深入,自然而然地触及到判断是非的标准即实践标准问题,《理论动态》的文章也逐渐地有了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的文章,都是要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

《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发表了《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这是理论动态组的同志撰写的。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一些人的错误的是非标准:"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但用语还不明确。

《理论动态》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发表了邵华泽撰

写的《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这篇文章引了毛泽东同志的话："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文章以相当篇幅论述了实践标准。文章的第三个标题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在此题目下，邵华泽写道：

>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四人帮"没有真理，害怕真理。他们的是非好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他们的反党阴谋。在他们那里，闹而优则仕，说假话有功，吹牛皮光荣。他们中的一些亲信、爪牙，不就是靠这一套发迹的吗？
>
> 在"四人帮"横行时，有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都被他们搞乱了，必须一一纠正过来。
>
> 判断一个干部能力强不强看什么？看实践，看他工作的实际效果，看他的行动是否给人民带来了好处以及这种好处的大小，绝不是根据他说得多么动听。
>
> 判断一个总结、一篇报道水平高不高看什么？看实践，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群众的实践，是否经得起客观实践的检验。绝不能认为抄录马列词句多就是水平高。那种看上去句句有本本根据，可一点也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件、报告、文章，有什么水平？应该丢到字纸篓里去！
>
> 判断一个单位工作好坏看什么？也是看实践，而不是看发表了多少报道。……

这是笔者所见到的在拨乱反正中明确提出和阐述实践标准最早的一篇文章，即使是从《人民日报》于 1978 年 1 月 9 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算起，也是如此。但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讲文风问题，没有从哲学上正面展开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所联系的实际也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因而显得份量不够。《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与《理论动态》文章逐步走向实践标准问题相比，石头城中的胡福明，无疑在批判思维上领先了一步。这位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身中山装，一副教师模样的教师，多年之后是这样叙述自己选择“两个凡是”突破口的思路的：

> 那是1977年的6月下旬，“两个凡是”发表不久，我就在理论上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是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经常也修改自己的观点。按照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是个人崇拜，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我一旦思想形成后，就着手考虑写这篇文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曾作了这样的评价：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胡福明一贯欣赏这句名言，更懂得“理论要回答现实问题才有生命力”。因此他密切关注着中国的现实，思想敏锐而活跃。

幸运也罢，机遇也罢，本就只偏爱那些勤奋的人、有实力的人。一个行动的懒汉、思维的懒汉，又哪里能寻得什么好运呢？

这是一张非常普通的人生履历表：

姓名：胡福明；出生：1935年7月；籍贯：江苏无锡。

学历：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2年毕业于中

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主要经历：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南京大学哲学系、政治系，担任教师、系副主任、系中共党总支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分子”，被批斗、游街、扫厕所……后被定为“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现实斗争。1976 年 12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南京电讯，题为《剥掉“四人帮”画皮大长革命人民志气　南京大学师生员工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滔天罪行的高潮，全校形势一派大好》。内中，用上千字的篇幅写胡福明：

> 政治系教师胡福明在批判大会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系“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一层层剥开了“四人帮”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画皮。他列举事实说明，长期以来，“四人帮”采取斩头去尾、断章取义、偷梁换柱、肆意歪曲、拼命封锁、无耻伪造、顽固对抗等种种恶劣手段，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例如，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政治与业务、革命与生产、红与专、精神与物质、认识与实践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四人帮”任意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强调一面，去反对和否定另一面……

在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第一个站出来的是胡福明；在江苏省召开的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第一个站出来发言的也是胡福明；他还在 1976 年《南京大学学报》第 4 期上发表了《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他指出，张春桥的文章，在理论上是上层建筑决定论，是历史唯心论；在政治上是鼓吹法西斯专政，否定人民民主。1977 年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凡是”之后，胡福明在南京听了传达。他当时是这样想的：

"两个凡是"实际上是维护"文革"那一套,维护个人崇拜,个人专断。这样,就什么民主也没有了,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认为,批"两个凡是"还不是核心问题,批"两个凡是"是为了否定"文革",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了平反冤假错案,要全面拨乱反正,实际上是批评毛主席老人家的晚年的错误。批"两个凡是"不过是为这些扫清障碍。所以批"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批评两个主席,这个风险当时是看到的。

胡福明所说的"两个主席",就是毛泽东和华国锋。批评"两个主席",也就是批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批评华国锋坚持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这是问题的核,也是问题的底。

要批评"两个主席",其风险之大就是醉酒者也能吓醒,于是,便只有避开正面冲突,迂回地找一个突破口,找一个下笔的地方。胡福明先是和陆锡书合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文章,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主要是说明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把它当教条、当神学。文章不乏说服力,但胡福明总觉得还不够味,不能解决问题。他就进一步考虑,"两个凡是"的要害是把毛泽东的话当作真理,毋须实践检验;而且是证明的工具,真理的标准,这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违反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因此,要从真理标准问题下手来做文章。抓住了这个题目,胡福明很兴奋,自感是捉住了"两个凡是"的要害问题。

确实如此,胡福明抓住了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个题目,也就抓住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如同扼住了"两个凡是"的咽喉一样。这道理一旦捅穿竟是如此简单,简单得只隔着一层窗户纸。"我一旦思想形成后,就着手考虑写这篇文章。"

就在胡福明孕育这个注定要引起轰动的题目与文章的时候，《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的到来，扮演了一个“催生婆”的角色，促使胡福明产下那正在思索中的文章。

王强华的到来，颇为偶然。那是在 1977 年 5 月，南京召开拨乱反正理论讨论会。胡福明出席了这次会。王强华以《光明日报》记者身份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作为一名南京人，王强华并不认识胡福明，跟江苏省的理论界也不熟悉，是胡福明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他的注意。胡福明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唯生产力论”是错误的，生产力是应当重视的。胡福明以为，“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

与会的王强华，自然也负有组稿的责任，他也正是一位责任心颇强的编辑。他发现胡福明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也就主动与他结识，约他为《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写文章。王强华的约稿，虽然只是“一般性号召”，并没有给胡福明出具体的题目，却促使胡福明把躁动于腹中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赶紧写出来。亦教亦学，寻章摘句，作文著说，在他的职业里本为常事，更何况自己有一腔义愤，对方有一种邀请呢？不过，这时候，这位哲学教员即使有再强悍的哲学思辨，也无法预见，他这“个人行动”竟会酿成震撼整个中国的大波澜，也改变了中国理论界的命运。

在那个时候，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并且付诸行动，确需一种罕见的勇气。在一种浓浓的偶然色彩下，胡福明的文章在医院里孕育出来了。

1977 年 7 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进江苏省人民医院，他白天在哲学课堂上为人师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边尽为夫之道。南京的夏夜，自来少有清凉。天正热、心正烦，蚊虫鸣声、病人的呻吟、人体由于汗浸发出的各种味道、医院深处充塞着的各种声息，

把胡福明包围起来，令他无法入睡。万般无奈中，胡福明忽然想到了王强华，想到了对“两个凡是”的那一份不满，就在医院的走廊上看书，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内容一一摘录下来，开始着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经过了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这时已是暑假，他便坐下来整理提纲，大约用了一周时间，写成初稿。经过三次修改，于9月初寄给王强华。

假如不是王强华结识了胡福明，并且要他为自己的报纸写文章；假如胡福明的妻子没有患病也不用他在医院照料；假如那个时间不是三伏，或者南京的医院里面有一部空调，让他在夜间安然入睡，那么，胡是否也会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写出这样一个题目来，并且寄给这样一家报社？

在中国政治的格局里面，胡福明这样的人物，本来并不具有任何影响大势的力量，就如同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一个小地方发生的事不能影响大势一样。若没有后来那些人在这件事上因势利导，胡的努力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会消弭于无形。

但历史这条河流在她转弯的地方，常常会有一些偶然的风生水起，推动它突然跳跃起来，急转直下，一泻千里。以后的事态证明，文章的命运与一连串偶然的事情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胡福明当时寄去两篇文章，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另一篇是批判江青的文章《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当胡福明的稿子寄到《光明日报》哲学组时，王强华又到上海等地出差了，直到12月才回到报社。

由于王强华出差，《光明日报》另一位编辑代王强华拆收了胡福明寄来的稿子。那位编辑首先觉得胡福明所写的批判江青的文章，在当时已经很多，显得一般，决定不用。至于那篇《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标准》，倒是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题，只是文章中引述马克思的话以及对于引文的解释显得太冗长，也决定不用。

不久，王强华出差归来，那位编辑把胡福明的两篇文章交给了王强华，并告知自己的处理意见。王强华看了胡福明的两篇文章，也觉得批判江青的那篇太一般，不能用。但是，当王强华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虽然觉得引文太多，显得冗长，而且理论讲得太多，但是这一文章的观点却是切中时弊的。这样，王强华以为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在作修改之后，可用。王强华又请《光明日报》党委委员、分工主管理论部的马沛文，仔细地研读了胡福明的来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沛文是有二三十年的新闻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他读了胡福明的文稿，敏锐地看出：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学术方面，而在于政治方面，在于精心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角度批判"两个凡是"，因而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

真是英雄慧眼，文章也因此被留用。于是，编辑对胡福明的文章进行了修改，删去了冗长的引文及有关解释，排出清样。在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历史已经记住了胡福明，但人们也应该记住另两个平凡的"小人物"，但却影响了大转折进程的幕后英雄——王强华、马沛文。

1978年1月19日，王强华写信给胡福明，信中附了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稿子被排出清样，表明编辑部要采用这篇文章。王强华在信中说：

> 已粗粗编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似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您看看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

"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文章没有泥牛入海,并且决定刊用,对于胡福明这样的文人来说,已是幸运事,自不会计较修改修改。遵照王强华的意见,胡福明对文章作了改动,又寄回《光明日报》。

一个伟大的事变,就这样有了一个平凡的开端。

就在南京的胡福明修改着他的批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的时候,几乎同时,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胡耀邦讲话的指引下,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命题,是从理论上批判"两个凡是"的最佳切入点。

于是,孙长江动笔作这篇文章。1978 年 3 月,他向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马文瑞汇报了自己正在写作的这篇论文。此时,胡耀邦调往中共中央组织部之后,虽然仍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但是中共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由马文瑞主持。

天各一方的胡福明和孙长江,各自埋头修改和撰写着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都没有想到打响真理标准问题第一炮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人民日报》的"张成"。

这是 1978 年 3 月 26 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的右下角"报刊论文摘要"栏目里,摘要发表了胡福明的文章,即《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文末注明:"摘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8 年第 1 期。"

作为一种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个版面上,紧挨着胡福明的文章,发表了用花边围起来的一篇思想评论,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署名"张成"。这篇理论性的文章不长,只有 1000 多字,却发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第一声呐喊。"张成"的文章就毫不含糊地说道: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总是从认识、意志、思想、理论中去寻找真理的标准，因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本身之所以是真理，也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和证明的。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作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

张成的文章，虽然简单，但是毕竟把这个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公开提了出来。如果把他的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换成"毛泽东思想"，那就清清楚楚是针对当时的现实。这篇思想评论，虽然通篇没有一句提到"两个凡是"，而实际上却在批判"两个凡是"。这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角度批判"两个凡是"的第一篇文章。

这位"张成"，实际上也就是张德成，当时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那时，《人民日报》理论部在主任何匡和副主任汪子嵩领导下，针对粉碎"四人帮"之后思想战线上诸多拨乱反正话题，提倡写"千字文"，即一题一文，短小精悍，说清道理，生动活泼。何匡和汪子嵩出了一批题目，让理论部的编辑们"自由选择"，写成文章。那时，张德成到《人民日报》工作不久，也就让老编辑们先挑。轮到张德成时，那一批题目差不多就都有"主"了，只剩下一个《标准只有一个》。张德成别无选择，只好奉命写《标准只有一个》。文章写出来后，汪子嵩、何匡先后作了许多修改。因此，张德成认为这篇文章

是几位同志的“集体作品”，不应只署他一个人的名字，便随手把“德”字圈去，变成“张成”。

遗憾的是，这篇“千字文”发表之后，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不过，“张成”的文章的发表，却加速了胡福明那篇负载起历史重任的文章的发表进程……

在“张成”的文章发表后的第8天，即1977年4月4日，《光明日报》对胡福明的文章又作了一些修改之后，决定在4月11日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推出。《光明日报》已经拼好“哲学”专刊第77期的大样。这时，胡福明的文章约5000字左右，题目由原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就在胡福明的文章将发而未发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光明日报》总编辑易人！新总编辑是在3月初任命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班的学员——杨西光。

杨西光是安徽芜湖人，有着多年新闻工作经验。1949年后他曾历任《福建日报》总编辑，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当“文化大革命”之火在上海滩熊熊燃起，杨西光被“打倒”，遭到批斗。粉碎“四人帮”后，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时仍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称)副主任，亦即相当于上海市副市长。在中共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之际，杨西光被调往中央党校学习。在党校，杨西光与胡耀邦有了许多接触。不久，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得知《光明日报》总编辑缺人，便建议调杨西光担此重任。1978年3月，杨西光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但由于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班是在4月初结业，所以，杨西光在4月上旬走马上任。

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听了胡耀邦多次报告，很佩服胡耀邦拨乱反正的勇气和见解。他也参加了党校 800 人的大讨论，在先前的座谈中他即明确表示“同意实践检验”。杨西光在中央党校的这段学习经历，使他能够把胡福明论实践标准的文稿作特殊处理，追求一种影响历史的安排。

就在杨西光刚刚坐进《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不久，马沛文把第 77 期《哲学》专刊大样送给了杨西光，请这位新总编审阅。杨西光一口气读完胡福明的文章，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力作，不能如此“埋没”。他立即作出令人吃惊的决定：把这篇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放在《光明日报》头版地位醒目地推出。

正因为杨西光准备把胡福明的文章放在头版头条地位，所以他又觉得文章分量还不够，还应作一些重大修改，以加强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给“两个凡是”以有力的一击！为此，杨西光又决定：第一，胡福明的文章不能局限于理论问题，而是应该从现实的思想斗争的需要出发，加强战斗性。文章要贯穿反对“两个凡是”。要作大修改。第二，必须扩大这篇文章的影响。除了《光明日报》在头版推出之外，还要联合其他报纸加以转载。

与先前“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的修改方针相比，杨西光的思路已为之一变，变成不怕尖锐只怕不尖锐了，显然，这是一个新的层次。至此，胡福明此文的命运已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这一点已露端倪。写到这里，人们不难看出，胡福明真是太幸运了，他不仅幸运地结识了王强华，而且是幸运地遇上了新一任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

正在这节骨眼儿上，胡福明从南京到北京出席一个学术会议，孙长江在写一篇同一命题文章的情况也被杨西光知晓。于是，经杨

西光安排,4月13日晚,杨西光、胡福明、孙长江、马沛文、王强华这"五大员"在《光明日报》社聚会,讨论胡福明文章的修改。杨西光此时的打算是,既发胡福明的文章,也发孙长江的文章。所以,他在会上对胡福明和孙长江说:"你们两人的文章,谁先改出来,我先发谁的!"

根据4月13日晚的讨论意见,胡福明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光明日报》于4月20日又一次排出小样。杨西光派人把小样送中共中央党校吴江那里。

吴江看了稿子后,指出:"稿子写得有勇气,理论逻辑上差些,要理好,并加以提高。"随即,吴江向孙长江提出一项重要建议,即把孙长江写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因为两篇文章都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各有优点,不如把各自优点合在一起,以加强文章的分量。

杨西光以为吴江的意见很好。孙长江也同意了,由于胡福明离开北京回南京,于是,杨西光请孙长江动手,以胡福明的文章为基础,把孙长江的文章补充进去,进行一次大修改。

孙长江的这次大修改,是至关重要的。孙长江把文章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加上"唯一"二字,也就是说,除了实践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唯一"两字,把概念说得非常明确,使文章提高了一个层次。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唯一"二字果然令人注目,首遭问罪兴师。

4月27日,吴江在孙长江修改后的文稿上方,给《理论动态》编辑组长孟凡留言:

孟凡同志:

请即排印15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

各一份],5月10日那期用。

吴　江　4月27日

杨西光决定先将此文交《理论动态》发表,其意是要借助于《理论动态》的途径,使此文在正式发表前,听取胡耀邦的意见。因为杨西光知道,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的文章,事先都要经过胡耀邦审阅。当然,这样的重头文章,《理论动态》又怎肯放弃"近水楼台"的机会呢?

头一回,胡耀邦在清样上画了一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标点。胡耀邦第二次审阅,是在1978年5月6日下午。胡耀邦看了之后说:"我以为这个稿子可以了。"也就是说,胡耀邦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后拍板了。

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前已没有作者胡福明的字样,文末括号内注明这么一行字:"《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考虑到文章很多段落已重写,后来修改的过程中胡福明没有参加,又未来得及听取他的意见,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领导和其他同志的,因此再署作者的名字已不恰当。经再三斟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注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修改"。这"本刊作了修改"一句,原本是"本刊作了较多修改"。后来删去了"较多"两字,以减轻中共中央党校的"参与"分量。

那么,此文要由"供稿"的《光明日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又该如何署名呢?杨西光决定署"本报特约评论员"!为什么杨西光要署"本报特约评论员"呢?出于以下两点:第一是富有权威性;第二是可以不必送审。本来,重要的文章送审,也是必要的、应该的,只是考虑到当时送审要送到汪东兴手里,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能胎死腹中!胡耀邦建议杨西光用"本报特约评论

员”名义,“本报特约”意味着不是“本报评论员”,而是约写的外稿。既然是外稿,当然也就不必送审了。

就这样,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终于以头版地位推出了酝酿了9个月之久,反复修改多次,署“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一场批判“两个凡是”的理论风暴,引发了一场转折历史的思想解放运动。

## 4—4　真理标准只一个　左倾禁锢万千重

“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

如果说,《人民日报》在1978年1月9日发表了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实践标准问题;

如果说,《人民日报》在1978年3月26日发表了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打响了“真理标准”论战的第一炮。

那么,真正有份量、引起广泛注意和强烈反响的,推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之门的,还是《光明日报》5月11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胡耀邦曾在当时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预言:“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胡耀邦的判断完全正确。

外国记者们也是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做足了中共高层“派别争斗”的文章——

> 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察觉。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恰逢华国锋访问朝鲜之际,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披露于世后,汪

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向华请示应付的方针，华接报后，主张持慎重态度。

——外国记者们确实是十分敏锐地观察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分为两"派"：一派坚持"两个凡是"，被称之为"凡是派"；另一派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称之为"实践派"。

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打算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地位推出的。不过，还是让位于关于华国锋主席的重要新闻：

满载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华主席离平壤回国金主席车站热烈欢送。

配合这一新闻，还刊登了华国锋和金日成在平壤车站握手告别的照片。

华国锋是在 5 月 4 日上午乘专车离开北京前往朝鲜访问的。在访问中，华国锋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接待，鲜花、歌声与笑脸充盈于访问之中。5 月 10 日，华国锋结束对朝鲜的访问，于 5 月 11 日回到北京。

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屈居头版二条地位，占了头版下半版，再转到第二版。这种无意的巧合，构成了耐人寻味的第一版面。只是在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这"上半版"与"下半版"之间的深刻斗争，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政治上的。

出于形格势禁的现实情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在写作时就很明确是针对"两个凡是"，从头至尾却没有半句提到"两个凡是"，而是以"深入批判'四人帮'"为名，曲折行文、婉约会意。全文约 7000 字左右，分四大段加以论述，各段小标题是这样的：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文章说：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变化。"……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前面已经提到，文章的作者们心中了然：批判"两个凡是"，也就是要批判"两个主席"的"左"的错误。可是，文章却巧妙地用"两个主席"来批判"两个主席"，令持"两个凡是"者无话可说。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

接着，文章列举了毛泽东是如何"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的：

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1955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104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1956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5页）

这就是说，毛泽东在1958年便感到自己在1955年所作出的论断“不妥”。说得更明白些，也就是毛泽东在1955年所作出的这一论断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连毛泽东本人都以为自己的一些话“不妥”，证明毛泽东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嘛！既然毛泽东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对毛泽东也就不能“两个凡是”了！这样引用了华国锋的话，又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声言自己的“不妥”，令持“两个凡是”者无懈可击。

不知是因为没有多少人细细读出意味，还是因为人们仍是习惯性以为这不过是《光明日报》又一篇纯“学术性”文章而已，没有太在意。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初到“光天化日”下的这一天，竟在毫无异乎寻常的平静中度过。

但杨西光心中有数，短暂的风平浪静将迅速被电闪雷鸣所打破。因为杨西光是决意也是有信心要打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炮的，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前，他就向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通报了情况，打了招呼，寻求诸位同仁大力相助——转载、转发。杨西光告诉他们，此文经胡耀邦阅定。这样，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这篇文章。

由于新华社的转发，所以在第二天，即5月12日起，有《人民日报》等多家中央、省市级大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平日的惯例总是《光明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是不多见的，因而被转载的文章也就被看成是非同一般、“颇有来头”的文章。许多人注意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从《人民日报》转载引发的。

果不其然，第二天，风暴骤起。在《人民日报》转载的当天夜里11时，吴冷西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总编室，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进行激烈的批评。正在值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一边接听电话，一边作记录。

胡绩伟所记的电话记录——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作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

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了,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吴冷西是中国新闻界重要领导人。1957年6月,全国掀起"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派吴冷西前往《人民日报》,担任第二任总编辑。吴冷西还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与毛泽东有着甚为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有许多批件是批给他的。在"文化大革命"前,他是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由这个小组制定的《二月提纲》遭到严厉批判,彭真下台,也就导致吴冷西下台。1966年5月,全国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派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吴冷西下台。毛泽东在当时曾不失幽默地说:"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泽东把陈伯达称作"扫帚",把吴冷西比作"灰尘"。此言一出,吴冷西也就被"扫"出《人民日报》,"扫"出新华社,"扫"出中共中央宣传部,"扫"进了监狱。粉碎"四人帮"之后,吴冷西在1977年担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毛办")副主任。

此时,胡绩伟以为,吴冷西的电话,并不是代表吴冷西个人,也不是一次普通的电话。正因为这样,胡绩伟印发了吴冷西的电话记录,在小范围内供有关人士参考。"电话事件"迅速在中共高层传开,引得人们愈加重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如于光远风趣地评价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是'老生常谈',而那个电话却立了'大功',一下子使人们注意起那篇'老生常谈'来了。"吴江也这么说:公平地说,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吴

冷西有功劳，如果没有吴冷西的指责，正像当时于光远同志告诉我的：他看这篇文章只把它当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浏览一下就放下了。吴冷西同志并不像于光远那样浏览一下就放下，我想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毛办”成员，与提出“两个凡是”有关，因此他对这个问题有高度的敏感。

今天看来，吴冷西的那个电话究竟说了些什么，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和无可争议的是，“电话事件”确实使更多的人来关注真理标准问题，这是一件有功劳的事。

自此，斗争开始了，似大海扬波，一波接着一波，一浪连着一浪。

5 月 13 日，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对胡耀邦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放在首位的是党内的安定团结，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文章，显然不利于党内的团结，特别是不利于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

同一天，《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的文章《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从宇宙不守恒的发现说起》。《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是请自然科学家们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呐喊助威。

同一天，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了电话说：“新华社不该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错误的文章。”曾涛当即表示不同意。据云，后来这位打电话者曾对别人这么说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同一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召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跟往常的会议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社派了两人出席会议。《人民日报》社来的人，出示了《人民日报》所排印的吴冷西昨夜打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接着，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砍旗"进行了讨论。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称："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马上针锋相对反驳道："理论问题要勇敢！"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有人建议以胡耀邦所说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写一篇反驳文章。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说，文章可以从真理越辩越明写起，写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不久，中共中央党校果然写出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发表于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论动态》。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右半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岳平"。这篇文章指出：

> 还有一种人，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这些同志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

这里所说的"还有一种人"，不言而喻，是指持"两个凡是"的人们。

5月17日，事态升级——汪东兴表态了！华国锋也表态了！

因为他们深知，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绝不是纯粹的学术讨论，而且直接涉及当前的政治——毛泽东晚年"左"倾理论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应予否定。"文化大革命"应该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华国锋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理论也

应予否定。所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仅关系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命运，更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走向、中国的命运！汪东兴等人正是明白“真理标准”大讨论背后的这些“潜台词”，所以在震怒之下，要对报刊严加控制，要阻止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天，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与华国锋、纪登奎和吴德等“几位政治局的同志”谈话。汪东兴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要害，是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枷锁”、“禁区”。汪东兴用三句话概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汪东兴问：“此文署‘特约评论员’。‘特约’，约的是谁？不知道！”汪东兴还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现之后，实践证明才是真理？”汪东兴指出：“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汪东兴所说的两篇文章中的“按劳分配”一文，是指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在 1978 年 5 月 5 日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很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在华国锋访朝归来那天发表的，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一文则是华国锋赴朝鲜那天发表的。1978 年 5 月 5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

## 应金日成主[illegible]请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 华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朝鲜

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宋庆龄
副委员长等到车站热烈欢送

就在这条新闻下方，《人民日报》以头版下半版地位醒目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此文很长，转往第三版后，又占了整整一版。实际上，《人民日报》这篇评论员文章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胡乔木主持下起草的。文章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坚定不移地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这篇文章曾送邓小平审阅。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曾这样指出：

>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治，也不能是按资格。

邓小平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是经过他审阅的。另外，这篇文章也曾送当时主管经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审阅。至于《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如前所述，是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

汪东兴还批评了张平化：你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怎样当的？是怎么把关的？

华国锋也终于表态了。华国锋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当然，“不表态”，实际上就是一种表态；“不卷入”，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卷入。

5 月 18 日上午，汪东兴召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以及熊复、王殊，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熊复接替王殊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谈一些意见。《红旗》杂志是中央两报一刊中的“一刊”，是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举足轻重。此时换帅，显见有因，并大有深意。从这时起，熊复在《红旗》杂志总编辑这个岗位上工作了 9 年多，直至 1987 年 8 月卸任。

在谈了新旧总编交接问题之后，汪东兴说道：“理论问题要特别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与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要查一查。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汪东兴特别嘱咐张平化道：“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受命要“把关”的张平化，当天下午便急急邀请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们到钓鱼台宾馆开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在 5 月 16 日闭幕的，各代表团正准备“打道回衙”。就在这时，张平化紧急召开代表团团长会议，是因为代表团的团长们，要么是各省的文教书记，要么是宣传部长，宣传问题本来就是要跟他们打招呼。

张平化的话，可比汪东兴的话委婉多了：“《光明日报》发表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但张平化没忘记提醒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态要小心，要用"鼻子嗅一嗅"："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风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拜托！拜托！"张平化要求代表团团长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省委、市委的常委汇报。

汪东兴和张平化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批评，以小道消息特有的神速在京城流传开来。于是，谣言蜂起。有人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了！"更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给抓起来了！"

5月19日这天，新任总编辑熊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到任后的"施政演说"，先是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精神，说道："汪副主席很关心《红旗》杂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进而也谈到了他自己对于《红旗》杂志办刊方针的见解："《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同张平化的提醒一样，熊复也是"有言在先"："理论问题要慎

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

“理论问题要慎重”，是汪东兴已经几次强调了的话题。华国锋也指示说：“《红旗》杂志不要表态。”熊复遵照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于真理标准问题保持沉默，“不表态”……

但只有《红旗》一家保持沉默，岂能堵住“两个凡是”大堤之溃穴？汪东兴等作着进一步的努力，寄希望以党性、党纪约束、压服中央直属新闻单位。6 月 15 日下午，汪东兴召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跟他们“打招呼”，强调新闻传媒的党性。汪东兴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

汪东兴接着说明了“党性不强”在宣传上所造成的危害：“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汪东兴着重批评了《人民日报》，谈了对《人民日报》4 篇文章的意见：一、《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帐的。对纪念周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二、《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

的发言，竟认为天安门的案子还没有彻底翻过。这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反革命的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三、《人民日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对邓副主席讲的话，华主席讲的话，为什么就不标出"精辟阐明"呢？四、(《人民日报》转载的)徐迟写陈景润那篇文章，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那样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

汪东兴在讲话中，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因为汪东兴已经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发表的。后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胡耀邦请华国锋来讲话，华国锋不来；胡耀邦请汪东兴来讲话，汪东兴也不来。给胡耀邦造成很大的压力……

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汪东兴更是余愤未消，要求接受教训，"下不为例"。这"下不为例"一语，也就是要把"真理标准"问题划上句号，不许报刊再发表类似文章。

但汪东兴没有想到，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旦开启，又岂是他的强权所能轻易阻挡的？来自邓小平的支持，来自人民群众的觉醒，迅速地使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席卷全国，其势之迅猛，已无可抵挡。

## 4—5　邓小平支持一下　罗瑞卿临终冲刺

这是一次重量级的交锋，也可以说是全面冲击"两个凡是"的进军号。

交锋的战场是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1978 年 4 月 27 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尚未发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已经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始了，当涉及到

真理标准问题时已是沸沸扬扬的6月6日。会议开始时，由韦国清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主题报告。

不料想，韦国清的报告题目就引发了一场“用词之争”。韦国清的报告标题用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认为必须改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要改呢？理由是华国锋提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跟中央的口径也就是跟华国锋的口径保持一致。韦国清报告中的一句“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由于“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更闹得疑义百出。这些人认为：“毛主席的话，不能改；华主席的话，也不能改。”也就是说，不仅要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而且要对华国锋搞“两个凡是”！

对此，5月30日，邓小平在与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入木三分地指出：

“只要你讲话同毛主席的不一样，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当前思潮的一种反映。”

5月29日，华国锋在会议上讲话，其“主要命题”是这么一段话：

>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历时11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们

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强调了要遵守纪律——换句话说,现在有人"不遵守纪律"。他说:"我们这样一个有8亿人口的大国,3500万党员的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要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顾全大局,发扬民主,遵守纪律。"

6月4日,《人民日报》以《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题,发表了华国锋的讲话。

华国锋讲话的3日后,即6月2日,邓小平也在会议上讲话。邓小平的讲话分四部分:

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

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

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

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邓小平后来于8月19日讲的这段话,清楚表明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肯定和支持,也说出了他6月2日讲话的背景。

不过,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是一字未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而是以"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支撑点,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实际上的最有力的支持。

邓小平在讲第一个问题时，“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强调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邓小平鲜明地批判了持“两个凡是”者也就是他所说的“有一些同志”：

>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邓小平引述了毛泽东的话，来批判“两个凡是”：

> 1930年，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坚决反对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的时候，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这种错误的心理。毛泽东同志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的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

面。”

邓小平又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话，来批判“两个凡是”：

> 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同志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如果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根据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

邓小平笑称持“两个凡是”者只是一间“收发室”：

>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邓小平在讲话中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 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部分，是“讲讲新的历史条件”。这“新的历史条件”，分明是针对持“两个凡是”者前些日子所说的“华主席没

有这样讲过”、“华主席讲的是‘新的历史时期’”。

6 月 3 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讲话，题曰：

《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在标题之下，《人民日报》还加了这样几行字，突出了邓小平讲话的主要精神：

> 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任务和方针。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待次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的讲话，有记忆的读者便不难发现《人民日报》有着多么强烈的倾向性。即使读者没有注意到，汪东兴却看得清清楚楚：“你们说邓副主席的讲话‘精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的讲话没有‘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

“你们是什么意思？”其实，这种质问本身就是答案，除了反映《人民日报》的认识与倾向性之外，还能有什么意思？！

这一点，随即得到了一种最好的旁证。在《人民日报》那“倾向性”很强的标题受到批评之后，《红旗》杂志在 1978 年第 7 期转载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是如此讲究“分寸”的。

“华主席在讲话中，极其精辟地阐述了……”

“叶副主席在讲话中指示我们……”

“邓副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指出……”

显然，《红旗》跟《人民日报》的“分寸”不同：《人民日报》形容邓小平“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而《红旗》不仅把“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奉献”给华国锋，还要加上“极其”的前缀语……这一词一句，都反映出《红旗》和《人民日报》不同的态度。

6月16日,《人民日报》的倾向性再次体现。这是汪东兴告诫中央直属新闻单位"下不为例"的翌日,《人民日报》却偏偏再来一例,赫然发表了署名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当时的邢贲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还没有成为后来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总编辑。"佼佼折驹,贲然其思"。其实,邢贲思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4月8日的《哲学与宗教》一文。这篇文章并不是探讨宗教哲学问题,而是批判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批判宗教色彩的个人迷信。他以为,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如果把哲学当成宗教,那就没有科学可言。这篇文章,也是对"两个凡是"的一种批判。汪东兴竟然说此文是"反动文章"!

至于《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其实是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的继续。张成的文章发表之后,《人民日报》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几乎全是持反对意见的,主要的理由就是感情大于理性,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如此,就是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来信来稿作者的情况来看,全部都是各行各业的年轻人,这些人多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学得一点理论知识的,因而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不过,仅就这批来信来看,重新提出和大力宣传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的、常识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何等的重要和迫切!正是因为有这些来信,《人民日报》理论部遂请邢贲思写了这篇文章作答。

答复文章原本还是交由张德成(即张成)来作的,正巧邢贲思知晓此事,自告奋勇:我可以写文章加以答复,我在哲学研究所就是研究这些问题的嘛!汪子嵩、张德成也认为由邢贲思来写,再合适不过。这样,读者来信便转到了邢贲思手里。

5月初,邢贲思就交稿给《人民日报》,此时《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一文还在最后时刻，未"掀起你的盖头来"呢。邢贲思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等报刊纷纷转载，反对意见很快就不绝于耳。这样一来，原来是对于读者来信作些答复的邢贲思的文章，其意义也就远远超过了一篇"答读者问"，而是成为对那些反对实践标准的人一次有力反击。只是邢贲思不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诞生背后的那些过程与心中有数的强烈针对性，因此他的文章少脱颖锋芒多厚重功力，威严与威力来自于似乎是不经意的平和之中。

邢贲思的文章一开头，这么写道：

> 最近收到一些同志来信，就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提出疑问。他们认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真理的标准，对于这一问题，我想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接着，邢贲思"扣住"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题，进行论述。邢贲思的文章的发表，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有力响应，也是对汪东兴"下不为例"的反击。

更深具意味的是，就在《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的当天，新华社即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邢贲思的文章。也就是说，邢贲思的文章，等于是一个多月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模式的重演，这一回，则只是把始作俑者由《光明日报》换成《人民日报》而已！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三报"和新华社又一次联手采取行动，例外的则仍然是"一刊"《红旗》杂志。在总编辑熊复坐镇下，《红旗》依然保持"沉默"！

"'四人帮'时有'两校'，如今有'党校'"。无风不起浪，流言亦有因。就在邢贲思的文章发表之际，另一篇重要文章正在中共中央

党校仔细修改之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

这篇长文由吴江主笔，孙长江写作。吴、孙二人都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修改，这篇文章正是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来的种种反对意见，作出系统的正面回答。当时由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胡耀邦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不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上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吴、孙不想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此文。

但在哪里发表为好呢?《光明日报》自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已经被"盯"得很紧。《人民日报》更是"此路不通"。至于《红旗》杂志，更加无从谈起。所以，历数北京的中央重要报刊，唯一的"生路"，在《解放军报》!

找《解放军报》，吴、孙这一次真的是天遂人愿、心想事成。因为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是个大大的"实践派"，态度也极为鲜明。顶头上司如此，《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副社长姚远方怎不敢于挑起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重担呢?!

罗瑞卿对于"两个凡是"深恶痛绝，坚持实践标准，是有历史根源的。当年林彪"大树特树"之时，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罗瑞卿即明确地表示反对："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什么'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 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罗瑞卿遭林彪忌恨，被诬陷打倒，与他如此强烈的反"左"意识不无关系。而他曾选择从楼顶跳下之路，又可见其"士可杀不可辱"的刚烈性格。

罗瑞卿复出之后，又是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罗瑞卿说，"两个

凡是”其实就是林彪所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现代迷信，不打倒不行，否则什么事情也干不成。1977 年 10 月 9 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征路上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一文，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用片言只语骗人、吓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僵死的教条。

当罗瑞卿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其拍手称快之情可想而知。他说：这是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当华楠、姚远方到他家就如何宣传报道正在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罗瑞卿指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从现代迷信中走出来，我们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6 月 2 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之后，当天晚上，罗瑞卿就打电话要求《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组织发表宣传文章。姚远方第二天上午就驱车赶往中央党校，去约他早已风闻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心中有所祈盼的吴江，立马答应。几天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经华楠和姚远方之手，报送到罗瑞卿那里。

罗瑞卿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非常重视，亲自动手，两次修改。他给胡耀邦打了六次电话，交换意见；他把文章送韦国清审阅，韦国清也表示赞同。在给胡耀邦的电话中，他性情不改地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为了扩大文章的影响，罗瑞卿决定寻求《人民日报》的及时转载。考虑到《人民日报》在第二天极有可能奉命不许转载，《人民日

报》采取了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当天转载!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同时发表。

为了加重文章的份量,罗瑞卿决定隐去文章作者吴江、孙长江之名,而署"《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

罗瑞卿在给《人民日报》打了多次电话后,文章发表日期定在1978年6月24日。

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同时出现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不论其内容如何,人们一映入眼帘,就已在心理上认同了它的重要与非同寻常,因为这种转载是少见的。

文章当然批判的是"两个凡是",但文章仍是避开正面冲击,通篇没有一句提到"两个凡是"。文章巧妙地借用华国锋的话,批判华国锋:

> 华主席在去年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曾着重地指出: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主席同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作了一辈子的斗争。……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把党的优良学风给破坏了。我们必须用大力气把它纠正过来。

文章详细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尖锐地批判了某些人的责难——亦即回敬了"两个凡是":

> 有些同志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末,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呢?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的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需要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把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要好好学习。……林彪、"四人帮"肆意篡改毛泽东思想，打着毛主席的旗帜，贩卖他们的黑货，我们不少人受过骗上过当，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文章指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邓小平同志最近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极其精辟的阐述"……小平同志"说得多么中肯，多么深刻，多么好啊！"

正如邓副主席所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有的人甚至不准别人坚持实事求是，只要求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照抄照转照搬，而不顾实际情况如何。甚至不允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允许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仿佛一讲实践标准，一旦冲垮那些"禁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站不住，就会大祸临头似的。真是怪事！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思想体系，是经过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它可以战胜一切倒退的、反动的思潮而决不被它们所战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

文章特别指出：

我们有些同志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熟读《实践论》，但一听到实践标准，就如临大敌，究竟为了什么呢？应当认为，这是目

前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思潮。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发表，似一记重锤响鼓，把"两个凡是"的破锣炸开了大缺口……

但没有人想到，主持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竟是一代元戎罗瑞卿生前的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7月15日，罗瑞卿飞往德国，治疗残腿，以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能够独立行走。不想，竟于8月3日突发心肌梗死，从此离开了人世，此距《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发表只有40天！

一代元勋就这样走了，人们缅怀着他的丰功伟绩，传颂着他为了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对胡耀邦说的那句话——

"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热泪潸然中，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可遏止地展开了。

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仍受压抑。7月，汪东兴到山东，在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中指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转弯"。而且还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和一些省市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批评了某些省市负责人表了态。直到10月间，汪东兴还对《红旗》负责人说，《红旗》杂志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当该负责人反映因为《红旗》不表态而受到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责难时，他又鼓励说："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红旗》不参加这场讨论"。在汪东兴的控制下，5个月中，《红旗》没有发表一篇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他们的指责、批评和压制，混淆了是非，影响了一部分中央有

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的思想，从而也影响了各单位的讨论。如有一个市，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后，反映强烈，不少单位纷纷展开讨论。可是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人却加以控制，一再在有关会议上宣布："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报社组织的文章，也被压了下来，对个别积极参加的人进行了粗暴的批评。

显然，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言行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对此，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再一次挺身而出，对两个凡是提出严厉批判，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浪潮滚滚向前。

7 月 21 日，邓小平在同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中，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跟他讲了，然后向这位负责人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9 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明确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不但大力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并在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到全国各地去"到处点火"。他先去了四川、广东，9 月中旬，又出关来到了已是瑟瑟秋风寒的东北平原。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后，他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讲话，批评了假"高举"，他说：

>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

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随后，邓小平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的事实论证了毛泽东思想中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的胜利。然后阐述了什么叫真"高举"：

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了，解决不了……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

紧接着，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关系问题，他指出：

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

学的反映。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谈到了他的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的，经过几十年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检验而高度概括出来的治国方略。他说：

> 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穷的国家，就是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比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的这段讲话，凝结了他数十年对社会主义探索、追求和奋斗的结晶，是他即将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后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指导理论。在这次讲话的最后，他豪迈地说：

> 什么是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邓小平的这些精辟论述，又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促进了这些地方大员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不敢想的问题，现

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开始敢讲了。”

在此前后,胡耀邦又组织了一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3月10日刊登在《理论动态》上;同月26日又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

文章一开始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不仅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然后提出“检验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靠实践”的观点,并从“真高举还是假高举,要实践来检验”;“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靠实践来检验”;“看待前进,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生产的领导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检验”和“检验文艺作品,也要靠实践”等六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在此之后,《人民日报》于10月30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题为《天才论和实践论的斗争》文章。文章说,林彪、“四人帮”所拼命宣扬的天才论早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障碍。扫除这障碍是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是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是历史前进的需要。文章辛辣地写道:

> 天才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主张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谁的脑袋特别灵,谁就是天才,历史是天才人物创造的。天才人物的思想,是超越时间、空间和具体条件而独立存在的,是最后的永恒的真理。它既不从实践产生,也不受实践检验。相反这种思想乃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人间一切是非的最高裁判者。这种理论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同实践论针锋相对的。

针对“两个凡是”,文章最后说:

> 如果有人认为,承认实践是检验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妨碍“高举”,那就只能是说:他这种“高举”,并不是真正高举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不怕实践检验，不害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实践检验，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检验倒，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不知被革命实践检验过多少次，越检验，它越闪放出真理的光辉。这面旗帜也不知被人攻击过多少次，文的和武的，它都经过了。不但没有被攻倒，反而更加高高地飘扬。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领导和热情支持下，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这个讨论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达到了高潮。

## 4—6　宋平表态应四方<br>人民思想大解放

干柴烈火，久旱甘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开启了人们思想解放的闸门。一场冲击“两个凡是”的浪潮，不可遏制地在华夏大地爆发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伟大革命斗争，生产斗争的实践是这样，伟大深刻的理论变革，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这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离开了人民的觉醒、参与投入是不可能的。在邓小平的坚定不移地有力领导和号召下，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热情呐喊下，在胡耀邦、罗瑞卿等强有力的动员、组织下，包括宋平、杨易辰、任仲夷等省委第一书记率先冲锋陷阵的带动下，广大干部，党员、群

众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先后积极投入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这个讨论扩大成为一场新的、全国性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

到1978年的下半年，真理标准的问题讨论达到了高潮。

自然科学工作者们不甘人后，奋勇争先。

还在5月中旬，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一发表，方毅就主持了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办参加的联席会议，专题讨论了这篇文章，并且做出这样的决定，支持它！支持这场讨论！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说："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虽不是主力，但我们也要敲敲锣鼓。"

7月5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理论讨论会，会议定名为《理论与实践关系讨论会》，在会上发言的有罗伟、宋洪元、于光远、吴江等十多人次。自然科学家们用自然科学史上的大量事实、事例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实践事实发生冲突时，科学是如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同时又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

例如19世纪末，有位著名的天文学家达尔文，认为当时的物理学理论已是相当完备的了，只是天边还有两样小小的乌云，这指的是当时的物理学无法解释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实验。而恰恰就是这两个实验向经典物理学提出了挑战。如果把经典物理学当作一种教条和偶像，人们就不会去理睬这两朵小小的乌云。爱因斯坦和普郎克正是从这两个实验中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量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

发言的科学家们结合了自己学科领域内理论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后一致认为：真理标准问题确实是个常识问题，但正因为在

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常识问题上被“左”倾指导思想给弄混乱了，所以就不只是一般的常识问题的争论了，而是完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任务的关键问题，是一种政治思潮问题。科学家们纷纷表示要支持在这个既是常识性问题，又是关键性问题上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市朝阳区党校，召开了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大专院校、哲学研究单位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新闻出版单位的有关人员160多人参加的，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问题的研讨会。

哲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孙耕夫主持大会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首先讲话。他明确提出，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见解、意见，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邓力群希望这次会议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打开新的局面；提倡科学无禁区，不同途径的探讨问题；不搞棍子主义，也不要怕被打棍子等。

周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在闭幕式上讲话。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意义重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统一，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周扬说，现在这个常识问题之所以成了问题，就是有人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似乎真理还要受实践的检验，真理就没有“绝对权威”了。由此足见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还远没有肃清，他们

的阴魂还没有散。他号召大家都来做清毒工作，做驱散阴魂的工作。周扬还肯定地回答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会削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问题，指出对于假马克思主义、假毛泽东思想，不仅要否定，而且要揭露，最后，周扬再次提出科学无禁区的观点。指出给科学设置禁区，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就是阻碍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次会议还就实践如何检验真理，实践标准和逻辑证明的关系，过去实践和当前实践在检验真理过程中的作用，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这是一次思想解放的大会，是理论工作者敢于拨乱反正，敢于冲破"禁区"，敢于研究，敢于探讨新问题的大会。"两个凡是"的理论思想被根本动摇了。这次大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回去后，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推动开来。

各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们也先后站了出来，亮出他们的观点与立场。

——宋平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个站出来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而呐喊、而战斗的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是全国第一个有领导、有组织地大张旗鼓地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省。

1978年6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了全省理论工作座谈会，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针对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情况，在会上讲了话。宋平强调指出：如果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跳出框框，砸碎"四人帮"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大胆工作。为此，宋平强调要从两个方面狠下功夫：第一，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能限于单纯的引证，更重要的是要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上下功夫；第二，对重大的理论问题，要敢于研

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要有勇气，敢于探索，要破除清规戒律，做思想上的前卫战士，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不敢去研究。在方法上，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工作不能脱离实际，要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解决实际问题，为现实斗争服务。最后，宋平公开地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 路线是非是可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些问题已经有了实践，有些问题还有待继续实践，真正通过实践把握了，心里也就踏实了。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志，一定要坚持唯物主义，坚持真理，当老实人，要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

6月27日，甘肃省委宣传部与《甘肃日报》编辑部召开了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与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正确的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文章对林彪、"四人帮"多年来颠倒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我们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揭批"四人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会者认为：林彪、"四人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宗教化。其目的是窒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灵魂，否定它是科学真理。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埋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以致整个毁坏党的事业。因此，我们一定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的东西纠正过来，恢复实践的权威，实事求是的权威，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重新发扬光大，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作风来一个大变样，推动各项工作的大发展。

《人民日报》11月10日又一次发表了宋平同志在甘肃省委常

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说：

> 中共甘肃省委最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热烈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常识，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准。
>
> 他说，现在有些同志顾虑较多，说话、办事，生怕和毛主席的某句话对不上号，有损伟大的旗帜。这要从思想上、理论上解决问题。
>
> 宋平同志最后强调说现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大胆实践。今天我们学习、讨论这个问题，目的之一就是树立实践第一的思想，没有实践就不能认识客观世界、客观规律，就没有科学。

——杨易辰和黑龙江是全国继宋平和甘肃省之后，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位省委第一书记和第二个省。

8月4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队》相继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文章，认真讨论了真理的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

在此次会前不久的一次动员报告中，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即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概明确宣布："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在这次会上，杨易辰首先宣布：要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是红的，而不是黑的"，以及"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的“三不政策”，使大家神情为之一振，无所顾忌地敞开了心扉。大家列举了粉碎“四人帮”至今之所以“心有余悸”的“五怕”表现：怕别人给自己扣上“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否定解放军的支左”、“否定新生事物”这样“五顶帽子”。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理论，搞乱了路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又在党内外搞法西斯专政，搞白色恐怖，把人们整怕了的结果。大家认为，现在只要抓住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能获得思想的真正解放；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辨别真伪，分清是非。最后，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一项决定，组织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上述一系列有关文件、《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央报刊上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展开广泛的讨论，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

随即，8月23日，杨易辰的题为《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杨易辰在他的文章中一开始就尖锐指出：

> 不能不看到，同大好形势不相适应的是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还心有余悸，消极地总结所谓历史经验，在原则问题面前模棱两可，左顾右盼，这也不敢抓，那也不敢动，正确的不敢坚持，错误地不敢纠正；甚至还在那里抱怨“理论难学”、“路线难分”、“上当难免”。这样的思想、精神状态是错误的，如不彻底改变，就跟不上新长征的步伐。这就告诉我们，要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加快四个现代化的速度，工作上有一个大突破，就必须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继续拨乱反正，进一步解放思想。

杨易辰引导大家用实践检验真理的这个标准来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重新认识怎样才算高举毛主席旗帜，重新认

识"文化大革命"和对晚年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这三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当时，是何等的够威够力，又需要有何等的胆与识。

——有胆有识的还不只是宋平、杨易辰，几乎与此同时，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以其在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月刊《理论与实践》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而跻身于地方大员领先集团之"三甲"。

任仲夷的文章立意鲜明，主题明确：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当前理论上最大的拨乱反正，它必须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更大的解放，使人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迈开更大更快的步伐。"文章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旨是：

> 我们必须懂得，要不要实事求是，说到底，是搞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问题。
>
> 实事求是，这是一面照妖镜。在它面前，一切伪理论、伪科学、假左骗局，都会原形毕露。有了实事求是这个武器，禁区可以突破，思想可以解放，工作可高速度地前进。
>
> 没有实事求是，对"四人帮"的许多假左真右的谬论就不能批、不敢批；没有实事求是，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文艺路线的"黑线专政论"等等都不可能推倒……中央报刊大力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实打中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思想体系的要害，是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第二部分联系毛远新在辽宁的罪行，讲道理摆事实阐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阐述怎样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指出，"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尊重社会实践，那就不可能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高于认识，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贬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恰恰相反，这正是捍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在刊物上发表如此尖锐泼辣、针对性极强，理论和实践结合较好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除了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头脑外，同宋平、杨易辰一样，也确实需要“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勇气。也许正因为如此，《光明日报》于 9 月 9 月全文转载了任仲夷的这篇文章；也难怪就在几天后，即 9 月 16 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党委的工作汇报时发表著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讲话，对东北三省之一的吉林做一番直接的强有力的发动。

“三甲”冲锋在前，跟随冲刺者越来越多，犹疑观望者越来越少……我们且一一观之：

——汪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8 月 29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汪锋同志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在最近举行的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讲话，要求所有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澄清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体系。

——廖志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9 月 12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廖志高同志在福建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报道说：

> 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同志说：最近一段时期，对

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全国正在热烈地展开讨论。这是哲学上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习仲勋，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习仲勋同志在广东省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学习会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在学习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常识问题。……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

——铁瑛，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9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浙江省委党委召开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会报道。文章说：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连续召开讨论会，学习和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在新近召开的讨论会上，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和省委书记李丰平发表了意见。他们说，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对进一步揭批林彪、"四人帮"，对推动当前的实际工作，对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进步伐，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江渭清，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9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江渭清同志在江西省委党校读书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9月25日，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在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干部读书班的典礼上说，最近在报刊上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能不能高

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刘子厚，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刘子厚同志在河北省召开的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在最近召开的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说，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毛主席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我党培育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发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弄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

——谭启龙，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谭启龙同志在青海省召开的州、市、县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谈到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场讨论的意义时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争论。

——王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铎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局以上干部学习会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最近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局以上干部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认真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于拨乱反正，大治内蒙古，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霍士廉，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霍士廉同志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党委召开地、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区党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会上发言。他说，当前在全国思想、理论战线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我们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立场的重大斗争。

——赵紫阳，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10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赵紫阳同志在四川省委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同志说，……要解放思想，就必须狠抓批林彪、"四人帮"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根本颠倒，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上、思想上来一个根本的拨乱反正。

——王任重，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10月14日，《陕西日报》发表了王任重同志在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王任重同志说，在理论界，近来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问题，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完全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认为，反对这个观点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说要"句句照办"的人，不管他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陈丕显，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丕显同志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全省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最近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

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场讨论，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认识的问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和影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问题，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陈伟达、黄志刚，中共天津市委第一、第二书记。

10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伟达等同志在天津市委学习讨论会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中共天津市委十一举行学习讨论会，认真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和第二书记黄志刚在发言中指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对于我们落实华主席"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许家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10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家屯同志在江苏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

——乔晓光，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10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乔晓光同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会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10 月 16 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的问题。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在会上就当前开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发表了意见。他说，弄清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落实政策，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都具有

极重要的意义。

——马力,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10月2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马力同志在贵州的省委召开的一次理论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同志最近在省委召开的一次理论学习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时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白如冰,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11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白如冰同志在山东省委党校领导干部读书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10月16日在省委党校领导干部读书班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十分重要,极为迫切。

11月3日,《安徽日报》发表了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当前思想战线上的战斗任务的报道,文章说: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我们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是伟大真理,就是因为它是从实践中抽出来,又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并不是因为它的创立者是什么"先哲"和"神明"。我们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它的体系,它的精神实质,它的基本的东西,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它的词句、它对个别的问题和个别事件的结论,更不是指革命导师和说过的话句句是真理。不去完整、准确地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只知摘引搬用革命导师的片言只语,把革命导师的每句话

都当成教条来信奉，这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只会把革命实践引到邪路上去。

——王谦，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谦同志在山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在最近召开的中共山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同志说，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抛弃。

——彭冲，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

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彭冲同志在上海市委党校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11月3日在市委党校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指出，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出于反革命的目的，把它根本颠倒了，搞得很混乱，他们否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否定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否定"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林彪宣扬"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鼓吹颠倒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倒过来"哲学。张春桥抛出了一个"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四人帮"和上海的一个余党便跟着胡说："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无非是两条腿，一会儿理论跑在前面，一会儿实践跑在前面，就是一前一后。"因此，不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就解放不了，胆子就大不了，办法就多不了，步子就快不了。

——王恩茂，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恩茂同志先后在吉林省党

委、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最近先后在省委常委会议、省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和全省地县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讲话。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根本原则。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败，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关键，必须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

——安平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安平生同志在听取了云南省文山自治州委等单位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后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同志，最近在听取了文山自治州委、丘北县委和部分公社党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之后，向他们指出，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勇于改正。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任荣，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任荣同志在西藏拉萨地区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任荣最近在拉萨地区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会使我们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段君毅，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1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段君毅同志在河南省委常委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最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解放思想，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落到实处，做好各项工作。

由于华国锋是从湖南省委书记任上走向中央的，这里也是毛泽东的家乡，因而，华国锋对湖南是有所期望的，他不愿意看到所谓的“后院起火”。就真理的标准问题，他曾专门给湖南省委负责人打过“不要表态”的“招呼”，所以湖南省迟迟没有表态。对此，湖南省人民非常不满，他们指着地图说：

“看，全国就只有两省没有表态了。一个是台湾省，一个是我们湖南省。”

没有比这再大的压力了。对于湖南省委此时的负责人来说，这种“不表态”，实在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熬煎。于是，打过的“招呼”也就不再成为“招呼”、也不再有人“招呼”了。

——毛致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2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致用同志在湖南省委召开的省直属机关负责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同志在省委召开的省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事，我们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

毛致用说，为了适应加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切实整顿机关作风，改进机关工作。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负责同志，要充分看到在这场伟大革命中，已经开始出现而且将继续

出现大量的我们所不熟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我们不仅思想上跟不上，而且知识贫乏。大家都要有紧迫的革命责任感，用饱满的热情和坚韧的毅力，加倍努力地学习，加倍努力地工作。

地方大员们如此表态，“拥兵一方”的军队高级将领们亦纷纷表态，他们同样关心着这场讨论走向何方，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

——沈阳，李德生、甘渭汉。

10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德生、甘渭汉同志在沈阳部队党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文章说：

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党委最近召开了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沈阳部队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在会上发言时说，现在，有的同志对全国正在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实际问题，感到不好理解。这说明，搞清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这个问题是多么必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就得不到解放，各项工作就难以做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样的说法，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搞得不好，是损害毛泽东思想。

——广州，许世友、向仲华。

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许世友、向仲华同志在广州部队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报道说：

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党委最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真理标准的问题展开了学习讨论。许世友、向仲华同志在发言中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本本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拨乱反正。

——兰州，韩先楚、肖华。

10 月 31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韩先楚、肖华同志在兰州部队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报道说：

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党委常委最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会议结束时，司令员韩先楚、第一政委肖华发表了意见。韩先楚同志说：搞清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从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我们军队的建设。

——南京，聂凤智、廖汉生、林平。

11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凤智、廖汉生、林平同志在南京部队分别向领导机关和徐州驻军的干部作报告的报道，说：

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司令员聂凤智、第一政委廖汉生和政委林平，最近分别在机关和部队向干部作报告，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问题。

聂凤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个重大的问题。在上层建筑领域，不解决这个问题，好多事做不好，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坏东西还会在那里起作用。

林平同志在报告中介绍了我们党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强调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有个科学的态度。他说，……我们说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是伟大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但不是脱离人民群众、脱离无产阶级的神仙，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但不是宗教教条。

——福州，李志民。

1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志民同志给福州部队领导机关和师以上领导同志作报告的报道,报道说:

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政治委员李志民最近在给部队领导机关和师以上领导同志所作的形势报告中,联系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国内形势,阐述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大意义。

打破精神枷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指导实践与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不是一回事。理论来自实践,只能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能顶替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结论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被新的原理、结论所代替,它的基本原理也必然会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日益得到发展和丰富。

——济南,曾思玉、萧望东。

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思玉、萧望东同志在济南部队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报道说:

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党委最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结合检查、总结今年头十个月的工作,学习和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济南部队党委第一书记、司令员曾思玉和第三书记、政治委员肖望东在会上发了言。他们强调指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能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大胆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把部队建设迅速搞上去。

曾思玉同志说,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有坚

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才能得到正确解决。

肖望东同志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认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利于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有利于正确地总结 29 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有利于加快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成都，吴克华，孔石泉。

11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吴克华、孔石泉同志在成都部队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报道说：

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党委最近连续几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会上，司令员吴克华、第二政治委员孔石泉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吴克华同志说，我们今天学习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目的是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进一步发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威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吴克华同志强调指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联系我们的思想实际，工作实际，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

孔石泉同志说，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紧跟全国已经发展的大好形势，加速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打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振奋革命精神，敢于正视

和研究部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新课题、新情况。

——新疆,刘震。

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震同志在新疆部队"三学"先进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报道说:

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司令员刘震最近在新疆部队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航空兵一师先进代表大会上,就真理的标准问题发表讲话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来一个思想大解放,精神大振奋,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跃进。

刘震同志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些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中毒不知毒,或者被林彪、"四人帮"的棍子打怕了,"内伤"未愈,"余悸"犹存。譬如在落实政策上,对过去搞错了的,不能尽快平反,平反了还要留着尾巴;有的这也不敢做,那也怕负责任,对于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不敢坚持,错了也不敢去纠正,这是很不好的现象。

——昆明,刘志坚、李克忠。

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志坚、李克忠同志在昆明部队党委常委和机关负责同志学习讨论会上的讲话的报道,报道说:

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党委和机关负责同志最近连续举行学习讨论会,加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昆明部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刘志坚和党委副书记、政治委员李克忠在会上发言,强调必须冲破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设置的"禁区",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刘志坚同志在发言中说: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运动发展很不平衡,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远未肃清,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过去林彪、"四人帮"

思想理论上给人们设置了很多“禁区”，粉碎“四人帮”后，有些人思想上还有余毒，有些人心有余悸，要通过多次学习，不断实践，思想才能得到解放。刘志坚同志说，林彪、“四人帮”断章取义，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鼓吹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如何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关系到各方面的工作，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李克忠同志在发言中说，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不容易。在这几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四人帮”都是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他们自己是最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但实践证明，他们是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检验了真理，实践注定了他们的彻底灭亡，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北京，北京部队党委。

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部队党委中心学习组和机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举行学习讨论会的报道，报道说：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党委中心学习组和机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联系部队实际，座谈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加深了理解。同志们说：在新的发展时期，许多新问题正在一个个地来叩我们的大门，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和加以研究解决。……要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就必须认真总结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究竟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既不能凭主观感觉，也不能凭“本本”来判定，唯一的标准是社会实践……在新的发展时期，如果不从根本上拨乱反正，搞清这个问

题，那就不可能从面临的新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势必变成一句空话。

北京部队党委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同时，还发出通知，要求所属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充分认识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伟大意义，组织为部队的学习和讨论，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使部队各项工作有新的起色。

——武汉，武汉部队党委。

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武汉部队党委常委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报道，报道说：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党委常委学习华主席发出的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一致认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粉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并没有终极真理。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这正是革命导师寄希望于我们的。我们有些同志不是把革命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当作教条，不懂得一切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是理论上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也是对我们的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再教育。

——北京雁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党委。

1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军事科学院党委常委连续召开有各部室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学习会的报道，报道说：

8月下旬以来，军事科学院党委常委连续三次召开有各部室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学习会，紧密联系院内的思想

实际和工作实际，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强调在军队科学研究中，认真贯彻执行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解放思想，大干快上，努力攀登军事科学高峰。

——北京，炮兵党委。

11月26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炮兵党委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专题讨论会的报道，报道说：

10月30日，炮兵第三次党代会刚选举产生的党委举行第一次会议，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炮兵党委第一书记金如柏、第二书记宋承志在发言中强调，深入开展这一讨论，对端正党委的思想政治路线，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优良传统，加快炮兵建设意义重大。

一是对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是非要敢于纠正；

二是对经过实践检验确实正确，对部队建设行之有效的东西要敢于恢复；

三是对以往的一些结论，包括上级的指示和别人的先进经验，要从实际出发学习运用，不能照搬照套。

——上海，上海警备区党委。

10月7日，《解放军报》发表了上海警备区党委召开驻机关的委员和部门领导同志参加的讨论会的报道，报道说：

上海警备区党委驻机关的委员和部门领导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以主观思维、理论作为真理的标准？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还是坚持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这是关系到我们共产党人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也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一场重大斗争。这个问题并不只是理论界、学术界和知识界的事情，和我们军队的同志也有直接关系。从理论上弄清这个问题，对于

拨乱反正，加速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

……

截止1978年12月8日，全国除安徽省、北京市两省市(另有台湾省)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均先后发表讲话或撰文表示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我国人民继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击中了盛行多年且被奉为当然真理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要害……

## 4—7　《中国青年》高手布旧　“谭老板”好文迎新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了，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并不愿轻易地抛弃“两个凡是”，他们还在坚持着，甚至是顽强地固守着。

本应是思想最活跃的刊物——《中国青年》，成为固守“两个凡是”者的最后“猎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青年》杂志被迫停刊。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准备，《中国青年》拟定于1978年9月复刊，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第1期已全部印完，北京地区已有4万多份通过邮局送到读者手中。这一期有介绍“天安门事件”中作斗争，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选登了“童怀周”编

辑的《天安门诗抄》。

10 日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汪东兴的一个电话：

一、《中国青年》第 1 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世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韩英立刻将此意见转达《中国青年》编辑部，并宣布刊物停印停发，等待研究处理。

编辑部当即作了认真的研究，认为汪东兴的这四条意见没有什么道理。

第一，关于华国锋题词是在 7 月份即向华国锋请求，后又多次请求无结果，现又出国访问在外；

第二，关于韩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提供，并经多方查实；本人既为共青团代表，共青团北京市委已公开号召向其学习；

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是悼念周总理，抗击“四人帮”的；

第四，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已有毛泽东在 1948 年为《中国青年》创刊写的手迹，并在复刊词中专门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而示特别尊重。

9 月 11 日，编辑部将其上述看法写信报告华国锋及其他几位中央副主席，并同时报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9 月 12 日晚，韩英召集杂志负责人开会，传达了他同汪东兴共同商定的对这期刊物的四点意见：一、由汪东兴动员请华国锋题词（华国锋已出访回国）；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及照片；三、删

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一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韩英还特地念了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与华国锋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华国锋的题词送到了编辑部。当晚,编辑部向团十大筹委会报告增加华国锋题词和毛泽东词三首。但《革命何须怕断头》与《青年革命诗抄》以不改为好。但是,团十大筹委会拒绝编辑部的这个意见。

在此前后,社会上已对《中国青年》出刊受阻事表示强烈的不满,更有人在西单街头贴出《救救〈中国青年〉》的大字报。

9月14日,编辑部再次上书华国锋及几位中央副主席,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及《青年革命诗抄》。

14日晚上,汪东兴把杂志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从晚上8点一刻开始,一直开到午夜12点50分。会上,汪东兴对编辑部干部们的批评,已达到申斥地步。他说《中国青年》杂志社"出了这么大风波","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青年社捅这个情况,离开了团十大筹委会。你们直接写信给中央了,并没有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不是和筹委会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天安门事件,华主席已经讲了。"紧接着,他念了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央关于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接着说:刚才第一个是讲出版的组织观念,第二个讲文章内容不符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讲过,为什么有的人还在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嘴里讲,文章又那么写,现在还这样干,行不行?内容上有这个意见,叫韩英去谈谈,你们不改也可以。中央不知道,将来你们承担

责任就行了。这期《中国青年》没有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四万一千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像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版。

你们的信，说不改为好，中央不承担责任，没让中央批准，筹委会审查，出了问题，你杂志社负责，你叫提意见，又不让我提。你杂志有威信，你现在把中央的威信搞坏了。

你叫我提意见我就提，第一期应该有毛主席的东西，应该考虑，华主席不在，叶副主席，聂帅题了字，我再给华主席讲讲，题个字嘛！毛主席逝世两周年，有总理的照片，主席的一个也没有，不考虑考虑？我说可以考虑一下，再有我说里边有两篇文章的内容与华主席讲话符不符合，考虑考虑。再有，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定了的。是你们记者写的文章，与转载不一样。

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产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

毛主席诗词三首你们一首不登，高举毛主席旗帜，怎么举法！街上大字报说我阻拦《中国青年》出版，怎么阻拦了？他自己要拼命发。今天说清楚，不是我阻拦，而是你们提前发。我就怕你们搞坏了。

为什么不发华主席的题词？华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能等两天？

一是不动了，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这是你们的意见。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题词可以不登，主席诗词也不登。这一期中央没有审查，就是中国青年社发出的。我声明，

我没审查。第二条意见，把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它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我看就这两个意见，不可能有第三个意见。

历史上有教训，凡是离开党的领导的，一事无成会碰得头破血流。

已发出四万一千份换回来。

《中国青年》复刊的第一期终于这样"敲"定了。

"谭老板"者，谭震林是也。

就是这位谭老板，在"文化大革命"中带头"大闹怀仁堂"，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一伙乱党乱军乱国的倒行逆施。而后，他即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又被诬为"叛徒"而长期备受摧残折磨。

林彪一命呜呼了，"四人帮"也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切的谭老板，心情之慰藉是可想而知的，也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但"两个凡是"的出笼，表明"左"的东西还在继续，这又使这位老将忧心忡忡，心绪难平。

一次约稿，使谭老板有机会再展他的性格风采，表明他的所思所想。

这次约稿者，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真正做到"沉默不言"的《红旗》。为纪念毛泽东85周年诞辰，《红旗》杂志编辑部于1978年8月份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当年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谭震林在《红旗》来人向他约稿时，即明确表示：写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出发，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从那个永生难以忘怀的时代走过，心中又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谭老板的文章成稿很快。10月下旬，文章初稿便送到了《红旗》

杂志编辑部。总编辑熊复看后，认为文章第四部分讲的都是有关真理标准的问题，应删掉。但责任编辑不同意删。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以个人名义发表，要尊重作者意见，不能强加于人。总编与责编正争执不下时，谭震林又送来了新的修改稿。谭震林在修改稿中把第四部分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并在附给《红旗》编辑部的信中说：

> 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
>
> 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来商量。

熊复看了信和修改稿后甚觉棘手，但还是坚持自己应当删去第四部分的意见，书面讲了两点意见：一，先派人同他谈，说明中央给《红旗》的是不能介入讨论的指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的段落。二，如谭不同意删，就照他的意见印出送中央常委审查。

11 月 4 日，谭震林对转述熊复意见的人鲜明地表示："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告诉熊复，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对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这个时候，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大部分第一把手或第二、三把手，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的一、二把手都已纷纷表态，积极支持并参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肯定其重要意义，而熊复秉承华国锋、汪东兴意旨坚持《红旗》"不介入"，已是十分被动了。

但谭震林的这两个"凡是"与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实

在是针锋相对，毫无妥协之处。熊复虽然知道自己十分被动，但终不敢擅自"介入"，无可奈何之中，他于11月16日将谭文送审，并给华国锋、汪东兴写了一个报告：

汪副主席并华主席：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了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明了全国局势的华国锋，此时倒也爽快，批准《红旗》刊发谭震林的文章。

邓小平、李先念看过谭文后，亦同意《红旗》予以发表。两人还分别写了批语。邓小平写道：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李先念在11月19日写的批语是：

文章太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

11月21日，李先念看了这篇文章后写道：

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熊复在接到这些批语后，再次请示汪东兴怎么处理。汪东兴只好说，那只好这样了。至此，谭震林的文章终于得以在第12期《红旗》刊出。文章开门见山地说：

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

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根本标志。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又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个毛泽东思想的鲜明特点，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给我的感受是很深的。

紧接着，文章以毛泽东提出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到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充分地阐述和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鲜明特点。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即结尾部分，谭震林写道：

在井冈山斗争中，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人民伟大革命斗争实践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同志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第一的基本观点。"他还指出："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通路。"

……我们绝对不能象林彪、"四人帮"那样，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割裂和歪曲，断章取义地摘引只言片语，奉若神明，变成教义，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到处套用。林彪、"四人帮"表面上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高喊"句句是真理"，实际上他们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要在党的十一大路线的指引下，解放思想，清除顾虑，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

谭震林文章的发表，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五、伟大的里程碑，矗立在1978

薄一波等61人是“叛徒”吗？
案牍如山，冤案、假案、错案。
谁对了？邓小平举荐胡耀邦，“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谁错了？华国锋作了检讨，“两个凡是”终被抛弃。
36+5，是一个充满艰辛的终点，又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从此，举国一致：“三中全会以来……”

## 5—1 冤案一理 人心大喜

邓小平和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发起的对华国锋等人的“两个凡是”的有力反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局部地区和一些部门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平反冤假错案，是同胡耀邦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

大家不会忘记那位个子矮矮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

大家不会忘记60年代初奉中共中央之命，赴安徽查实了张恺帆及李世农、杨效椿两案冤屈、震动全国的胡耀邦；

大家也不会忘记在1975年被派到科学院搞整顿、推动科技战线拨乱反正的胡耀邦；

1976年10月，不可一世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在家深居简出的胡耀邦又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心向背”：人心向者，撼之难，一如“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人心背者，撼之易，一如王、张、江、姚“四人帮”。

于是，他想到了这样一句话：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中兴伟业必须首先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还冤屈的人们一个公道，还所有的人们一腔热情与激情。

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他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他还请叶选宁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华国锋。

不知是华国锋未在意，还是华国锋误解了“人心”，总之，胡耀邦得到的华国锋的回音，竟是1977年2月出台的“两个凡是”论。

胡耀邦感到有些意外，他在3月14日去见邓小平时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的邓小平可不模糊，共同的思路下，两人交谈许久。同年3月初，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常务工作的副校长。他利用这一阵地，把平反冤假错案提上了工作日程。他召集党校内一些思想解放的“笔杆子”和《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开会，对他们说，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

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的人民心底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由此，一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初稿，就这样出来了。胡耀邦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并和这些同志一起陆续修改了17次才定稿。但文章没有马上发表，胡耀邦在期望着即将召开的十一大能有个"说法"。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但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而只笼统地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翻。

于是，胡耀邦决定不再等待，必须主动出击。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日，《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署名杨逢春、叶扬、陈中的《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写的很策略，把华主席的话放在了最前面：

>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消除'四人帮'干扰破坏在各方面所造成的恶果，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毛主席为我们党制订的无产阶级政策。"这是当前全党的一个重要战斗任务。
>
> 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
> 这些年来，"四人帮"肆意破坏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比其他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更凶恶、更疯狂、更狡猾。他们为了篡夺党和国家

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在关于干部队伍、干部标准、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以及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等一系列问题上，对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歪曲和篡改，竭力搞乱人们的思想。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四人帮"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深广，危害极大。

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号召，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决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仅一个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了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信件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认为这下大家可盼到大天亮了。有的信中说：我们看文章时一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觉得这下子有了希望了；《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说明中共中央着手于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见到"大天亮"，还非易事。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的同志对落实干部政策仍在"顶牛"。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更是指责杨逢春等三人的文

章是"大毒草",还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郭玉峰的话和所谓"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激起了中组部广大干部群众的很大反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围绕着中组部该不该承担解决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贴出了很多大字报。在郭玉峰的压制下,中组部的几位老干部气愤不过,干脆把大字报送《人民日报》社转送中共中央常委。

针对这一情况,胡耀邦对《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和文章作者说:"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而且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十二级台风。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最后总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是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胡耀邦还指出,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定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下一步,我们就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极右思想和极左行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胡耀邦与大家几经研究确定,决定再次发表重头文章,进一步制造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11月27日,这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着重说明:许多干部群众热烈赞扬第一篇文章的同时,也愤怒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罪行;而有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就拖,得推就推;有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委,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没有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

体系，以致帮派体系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还在暗中活动，欺上压下，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文章再次强调，抓紧落实干部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问题。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为"本报评论员"的文章的同时，在第二版《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5封读者来信。编者为这些来信所加的标题分别是：《不能无动于衷》，《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

接着，《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

12月10日，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人的竭力举荐下，中共中央撤销了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的职务，任命胡耀邦担任此重任。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得力人选。由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重新成立了"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12月15日，胡耀邦到任中组部，在随即召开的与全体干部见面会上，胡耀邦先打了招呼："今天，我只是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有些工作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接着，他对组织工作讲了很多，但是，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这样的几句话：

"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胡耀邦是这样说明的："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案'、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同

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冤案,等等,这叫'积案如山'。"

胡耀邦坚定地表示,对于建国后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每一项冤假错案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彻底解决,我们组织部门也要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的话锋一转,说:"但是,阻力也很大,像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党内还有,各地都还有,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度都好比攀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但是,我们大家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扫除多年来组织部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门的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四人帮'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接着,他说:"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在这一次的会议上,胡耀邦明确指示:从现在开始,由陈野苹、贾素萍、倪书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等几位老同志参加工作,成立一个老干部接待组,认真接待好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他指示说:"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在床来不了的,应该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倾听意见。"他在会上大声疾呼:"要拨乱反正啊!只有拨乱反正,我们的党,我们的社

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

随着小型整风会议的召开，胡耀邦在短期内初步揭开了中组部被原领导人捂了一年多的盖子。干部分配组、干部接待组、老干部生活组相继成立，开展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许多老干部到了中组部，看到这里的新气象，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这些十几年没有家的人，现在又有家了。”

胡耀邦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得到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称赞。在他到任的第一个月里，每天就有上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一个月下来信件达 6 麻袋。

有一封来信引起了胡耀邦的特别注意。这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205 名干部写的联名信，信中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 1000 多名干部已有 800 多人被分插在有关各部，只有他们这 205 位一直“没人要”。所以，他们要求中组部能尽快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从信末署名看，夏衍、楚图南等一批名人赫然也在其中。

胡耀邦看完来信，拍案而起，忿忿地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么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

他马上指派人员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成立联合工作组，对 205 人的情况进行调查。

……十几天后，工作组的一份《情况简报》报到了胡耀邦的案头。

胡耀帮看完简报后马上批示：一、这个材料值得一看；二、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三、立即在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

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方法。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对外文委205名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同时,本着对对外文委同志问题的处理精神,中组部还解决了中央各部委6000名"靠边站"的干部的工作问题。

与此相反,平反冤假错案却遭到中共中央专案组的反对和压制。其负责人大发脾气,说:"胡耀邦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啦!"华国锋、汪东兴、李鑫等人不断向他施加压力。面对种种压力和干扰,胡耀邦下决心发挥中组部职能,直接向中央负责,请求报告工作,不再受中央专案组的牵制。他决定把平反薄一波等所谓"61人案"作为突破口。他对中组部的个别同志说,必须迅速掀掉扣在薄一波等同志头上的这口大铁锅。

恰巧,与"61人案"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

所谓"61人案"主要是指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1936年根据党的指示,从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来的一批革命同志。在狱中,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四人帮"利用"红卫兵小将",把他们统统当作"叛徒"抓了起来,并声称这个"隐瞒"了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

申诉人名叫王先梅,"61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

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时才22岁。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奔走呐喊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敌人逮捕入狱。1936年秋天经党中央批准"自首"出狱后,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师政委、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随

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警备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指挥部队修建川藏公路。“文化大革命”前，他又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西藏军区副政委。1967年8月被迫害辞世。他在北京的家，也被查抄封门。

王先梅也是1938年14岁参加新四军、15岁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在丈夫受到迫害后，被下放到她所在的轻工业部江西“五七”干校。

1977年12月8日，王先梅向邓小平写了申诉信。邓小平收到信后当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汪东兴看到邓小平的指示也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邓、汪的批示，等于给胡耀邦解决“61人案”一个有力的契机。

12月31日，胡耀邦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批示过的这封申诉信，立即派人找到住在右安门的王先梅，传达了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询问其还有什么要求。王先梅提出：对王其梅的结论应该重新做。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就回到了轻工业部工作，几个孩子的工作也得到安排。

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的信（摘要）》，并配发了该报评论员的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评论员文章说：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转变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了头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也看成是“右”的表现。他

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他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积极主动去解决。

事情的进展出人意料的顺利。胡耀邦心中也是十分高兴。但当他向当时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同志写信提议,是不是把"61人案"等重大案件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时,得到的答复却是"61人案"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

在此前后,原轻工部第一副部长孔祥祯于1977年11月11日写的一封反映信也转到了胡耀邦这里。孔祥祯正是当年向狱中的同志转送党中央指示的那个人。他在信中写道:

"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8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殁,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这件事的经过呢?……"

信的最后说道:"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是啊,这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胡耀邦不甘就此罢手不管,而是继续做着努力。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61人"中许多人及死者亲

属要求复查此案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不久，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61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的一封材料中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61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这一下，中组部终于有了复查“61人案”这样重大案件的尚方宝剑。胡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4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经过4个多月的奔波忙碌，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走访了“61人”中的许多当事人和当年北平地下党向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及北方局决定的有关人员，中组部于1978年11月20日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分为7个部分：“61人案”是一起重大错案；61人在反省院的表现；61人出反省院的经过；61人出狱后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查61人这段历史的情况；调查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报告》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后说：

> 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
>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

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61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作了严肃批评之后，薄一波等人终于被昭雪平反。

在重点突破"61人案"的同时，其他平反昭雪工作包括政策宣传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7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党的组织部门是贯彻党的路线，掌握干部政策的重要部门，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彻底摧毁“四人帮”帮派体系，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尽快把过去审干工作中遗留问题认真严肃地处理好。

1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指出：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清理积案，消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尽快妥善处理。

1月28日，胡耀邦对待分配干部问题讲话说，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数干部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宜尽快作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该复查的复查，该平反的平反。总之，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好。

3月21日至4月24日，中央组织部分三批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胡耀邦每次讲话都强调，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是非分清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他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具体标准为：一是没有结论的宜尽快做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尽快改正过来；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适当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妥善安排；三是去世的，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连的家属、子女问题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

会后，各地区、各部门克服了种种困难，排除重重干扰，推进了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到1978年7月，按政策分配和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干部5344名，占中央和国家53个单位原有

待分配干部的87.2%。这对于当时所受“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潮影响、压抑、受困于“两个凡是”的各条战线，起到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促进作用，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落实在实际的拨乱反正中。

1978年8月10日，《组工通讯》第十期发表题为《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的文章，提出落实干部政策、复查、审查积案中，要认真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内被指控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案件；决不能把一般性错误搞成政治性错误，把政治性错误搞成恶攻言论；必须合理地分清是非，分清敌友，万万不可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冤假错案，必须平反、纠正。

同月17日，《组工通讯》刊登题为《“四清”中的错案也应纠正》一文，指出“四清”运动中有些地区和单位，在一段时间里，把干部队伍中的问题看得过重，引起定性不当，处理偏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一些同志，当时有的作了纠正，有的没有来得及纠正。现在应当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的东西。

平反冤假错案，中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华国锋、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同时，各级领导班子中和干部队伍中也有各种思想障碍、认识障碍、情绪障碍，也有些案子是毛泽东定的或是报给毛泽东知道的，平反了必被扣上“反毛泽东”、“为坏人翻案”的帽子；怕平反了错案，影响、伤害当时的积极分子；怕改正已定案件，会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怕影响自己的威信；怕有的人重新分配工作后与自己关系僵持等等。这些思想、情绪大多数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当然，也有极少数是因为个人政治素质或品质低劣问题。

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

上，针对落实干部政策的种种阻力，明确、坚定地指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准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胡耀邦在这里提出的"两个不管"与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胡耀邦9月20日讲话，正好同9月16日邓小平视察东北，在听取吉林省委的工作汇报时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讲话遥相呼应，推动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恢复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到全党大多数的赞同和支持。一时间，一些省、市、自治区部门负责人纷纷写文章、发表讲话，推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1957年错划的大批右派分子，从1959年到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决策，已先后分批摘掉约30万人的帽子。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6月14日至22日，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会议，拟订《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发了这个方案。同时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不要仅仅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出发，要统筹安排，细致地做好工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

改正工作。全国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进行右派平反改正工作。

10月17日，中组部成立了审查改正右派工作办公室，领导全国的右派改正工作。这一工作进展很快，到11月中旬，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基本结束，共改正错划右派分子54万多人，为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也作了妥善而恰当的安排。

中共中央对错划右派的复查改正决策，获得党内外广大干部的拥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增强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能勇于认识并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党心民心息息相通的政策”。(二)解放了大批人才。据工业、文教部门统计，被错划的干部中，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有的单位达80%。(三)解放一个人，影响一大片。不仅解除了几十万人的精神负担，而且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四)解决了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全面彻底纠正建国几十年来的大量冤假错案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生动地体现出胡耀邦在得知粉碎“四人帮”后提出的“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的治国决策的正确性。

## 5—2　政协工青妇　一切要正常

197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光明的中国》的元旦社论。社论指出：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主席提出的一年初见成

效，三年大见成效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已初见成效。主要表现在：一、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基本得到了澄清；二、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三、“四人帮”造成的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结束了；四、社会秩序大为安定；五、“四人帮”反军、乱军、篡军的阴谋活动受到了全军的揭露和批判；六、科学、教育、文化领域出现了令人喜悦的新局面；七、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降的局面已经扭转；八、“四人帮”疯狂破坏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在各方面造成的恶果正在逐步清除。

我们已不必去论证这些成就是否真的源于“抓纲治国”战略，我们只要记住社论的题目：光明的中国。确实，1978年的中国，是一个徘徊中孕育着光明的中国，一切都在走向正常，走向光明。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提出了我国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报告中还提出了许多高指标、大计划。

会议听取了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次修改宪法，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在部分省市有重点地征求群众对宪法意见，组织有关人员修改，提出一个宪法草案后，在全国各省市又分别召集几百人参加的征求意见会，再次修改，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在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通过，

并作为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稿提出来。

这部宪法经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名义审议通过,3月5日公布。由于"两个凡是"的指导作用,致使这部宪法有"左"的历史痕迹,反映了一些错误和过时的政治理论观点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内容,有些条文的规定也欠严谨、具体和明确。

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普遍进行一次新宪法宣传教育的通知》,要求集中必要的时间和力量,对新宪法大张旗鼓地进行一次普及性的宣传教育,以提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增强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叶剑英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的同时,2月24日至3月8日召开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委员1862人。

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在会上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韦国清作了《关于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说明。

经过讨论,会议同意许德珩作的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和韦国清关于修改政协章程的说明,一致通过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会议选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副主席:乌兰夫、韦国清、彭冲、赵紫阳、郭沫若、宋任穷、沈雁冰、许德珩、欧阳钦、史良(女)、朱蕴山、康克清(女)、季方、王首道、

杨静仁、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建人、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秘书长齐燕铭。

邓小平主席在会上讲话。他说，现在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深刻的革命。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必将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斗争中，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作出新的贡献。

1978 年 3 月和 4 月，分别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目的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制定规划、表彰先进、研究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措施。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邓小平的这一段讲话，讲的是“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也就是讲的冲击世界的新科技革命浪潮问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场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机会，迅速提高其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扩充综合经济国力。而我们国家呢？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邓小平的语调不禁有些沉重：

>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耽误了我们很多时间。
>
> 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这方面不要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
>
> ……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长达20来年的时间内发展缓慢，当然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声誉和威望，影响和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巩固、强化和发展。因此，邓小平尖锐指出：

> 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围绕着要不要四个现代化，我们

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他们真是要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吗？不，完全相反，正是在他们势力最猖狂的一些地方，社会主义遭到严重破坏。“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得不到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

也就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等等。

邓小平的讲话，今天听来，仍是充满了振聋发聩之语。它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作用，正如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闭幕式上的书面讲话，这是《科学的春天》。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

在4、5月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到会讲话，他着重说明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意义，强调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

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等等。

科学与知识又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

1978年9月8日，时隔21年后，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近2000人，包括50多个民族。

大会由蔡畅主持开幕式，邓颖超致开幕词；汪东兴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康克清代表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向大会作了题为《新时期中国妇女的崇高任务》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新章程。大会选举宋庆龄、蔡畅、邓颖超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康克清任主席。

1978年10月11日到21日，同样是相隔21年后，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大会代表1967名，来自30个民族。他们当中有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农林、财贸、文教、科技、卫生、体育等各条战线做出显著成绩的职工代表，有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以来的劳动模范，有在大革命时期和革命战争年代就从事工人运动的老同志，还有台湾和归国华侨的工人代表。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81岁，最年轻的20岁。

大会由马纯古致开幕词，倪志福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作了《中国工人阶级新的伟大历史使命》报告。

在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词，指出企业要恢复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实行民主管理，重大问题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工会将成为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工会要深入群众，保障工会福利，为工人的民主权利而奋斗，等等。邓小平的致词

受到代表们一次又一次热烈的鼓掌欢迎。

大会一致通过倪志福所作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工会章程》；选举倪志福为全国的总工会主席，朱学范、马纯古、康永和、黄民伟、陈宇、宋佩夫、王崇伦、韩荣华、刘玉娥（女）为副主席，还选举产生了27名执委会委员。

1978年10月16日至26日，时隔12年之久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人民大会堂里灯火辉煌，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巨幅画像悬挂在主席台中央。主席台对面的巨幅横标上写着：

“全国各族青年团结起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全国各地包括54个民族的2000名代表，热情洋溢，欢聚一堂。他们当中有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英勇斗争的英雄人物，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各条战线的优秀共青团员，有共青团的新老干部，有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和儿童教育工作者，还有台湾籍的团员代表和归国华侨团员的代表。

共青团十大的胜利召开，是我国青年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共青团中央停止工作达12年之久，全国团代表大会14年没有召开了。“四人帮”的覆灭，迎来了共青团的春天。

韩英主持开幕式，王照华致开幕词。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词，他号召全体团员和青年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中，更加生气勃勃，奋发前进，在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教育、文化、军事等各条战线上，充分发挥英勇突击队的作用。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任康永和、全国妇联副主席林丽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裴

丽生,分别代表工人、妇女、人民解放军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向大会祝贺。他们说,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青年,代表着我们国家的精华和未来。共青团不愧为党的忠实助手,不愧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英勇突击队。他们衷心祝愿共青团员和全国青年,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谱写出新的诗篇。

受共青团十大筹委会的委托,韩英作了题为《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摆在青年面前任务是:(一)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一代代传下去;(二)极大提高整个青年一代的科技文化水平;(三)做大干快上的英勇突击队;(四)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大发扬而斗争,把共青团建设成为团结教育青年的坚强核心。

胡启立作了关于修改团章的报告。

大会一致通过了韩英所作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共选出中央委员 201 名,候补中央委员 99 名,王敏生致闭幕词。

10 月 27 日,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韩英为十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第一书记,胡启立、王敏生、胡德华(女)、刘维明、周鹏程、高占祥、李海峰(女)为书记。会议还选举了 25 名常务委员。

经中共中央批准,共青团十届中央委员会作出我国少年儿童组织仍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议并通过修改过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当中国大陆陷入十年浩劫的动荡之中时,有三块中国的固有领土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它们是台湾、香港和澳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起，实现祖国统一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心愿。

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书房里遗憾地告诉到访的英国首相希思：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他又指着一旁的邓小平说：这是他们的事了。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反复筹划着如何解决统一祖国的问题。当然，跨越海峡的路要一步步地走。

197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对台湾工作问题的建议指出，我们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因而对台湾工作是当前最大的统一战线工作。

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把加强对台工作提到具体议事日程上来，贯彻执行中央对台工作方针政策。目前主要工作是：1.向党内外进行对台政策教育；2.组织对台宣传；3.做好对台胞、台属及其他有关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和落实政策工作；4.开展同台方人士交往和通信工作；5.做好回大陆的台湾各界人士的接待和安置工作。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除西藏外）均应成立对台工作小组。

经过这一步步扎实的工作，邓小平最终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与台湾的情况不同，香港、澳门脱离祖国怀抱，则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的原因。1978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港澳工作预备会议的报告》。批示认为：开展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套用内地的做法，要解放思想，大胆放手，多想办法，加快步伐，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工作也开始

起步。1977年中共中央3月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中共中央军委立即于3月24日举行座谈会，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叶剑英在会上强调全军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军队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叶剑英明确提出了十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解放军报》从5月12日到7月3日，连续发表10篇评论员文章：

《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

《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

《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

《应该不应该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

《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来搞好老中青三结合》

《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

《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

1977年6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国锋和叶剑英"向硬骨头六连学习，为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而奋斗"和"广泛开展学习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建设更多的'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题词，在部队掀起学习雷锋和硬骨头六连热潮。

1977年12月12日至31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经验，讨论确定了继续加强军队建设、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叶剑英在会上讲话，强调部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贯彻毛泽东战略思想，做好作战准

备，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邓小平讲话强调，调整后的领导班子一定没有“四人帮”的人，要把军队办成一个既能学习现代军事知识，又能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生产知识，会做政治管理工作的“军地两用人才”的大学校。

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等9个决定和文件。会议后，全军加强部队教育训练，逐渐开展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工作。

1978年1月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成立。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学院成立。

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讲话。韦国清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

与此同时，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也在北京举行。着重讨论和解决加速军队后勤工作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问题。7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颁发《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1978年12月19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各部队从1979年起，把科学文化教育正式列为部队教育训练的一项内容，规定部队的科学文化教育应以普及中学数学、物理、化学知识为主，以干部为重点。

两年多来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初

步改变了军队的面貌。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外交活动得到较好开展。从1977年4月起,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黎笋等率党政代表团先后访问我国。与此同时,邓颖超、华国锋、邓小平等先后出访缅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伊朗、日本、美国等国家。

在此期间,我国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利比亚、约旦、巴巴多斯、阿曼、苏丹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78年底同我国建交的已达116个国家。

1978年8月12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经过协商在北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共5条,主要内容为:(一)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二)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三)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五)本条约有效期为十年。十年后,在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布终止以前,将继续有效。

应日本政府的邀请,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2月22日下午乘专机从北京抵达日本东京,对一衣带水的邻邦进行为期8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日本朝野上下,对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极为关注。

到达日本国宾馆后，邓小平同原田外相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原田外相说："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的缔结，开始了日中关系史的新的一页。您的这次来访，定将有助于世界和平。"邓小平对此表示感谢，并说："几年来的愿望，今天实现了！"

东京正是秋高气爽、枫叶流丹的季节。邓小平下榻的国宾馆原为日本天皇的离宫，1968年至1974年按照巴黎凡尔赛宫的模式，改建为富丽堂皇的国宾馆，专门接待来访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9月访问中国谈判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曾经表示，待这座国宾馆改建后，希望周恩来总理能够成为这里的第一位客人。周恩来表示，只要中日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他一定去日本访问。今天，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邓小平作为第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来日本访问，实现了周恩来总理的遗愿。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邓小平和日本首相福田纠夫出席了互换仪式。

举行仪式的大厅灯火辉煌。福田首相举杯祝酒，热烈祝贺友好条约今天正式生效。他在祝酒词中指出："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为两千多年来不断进行紧密接触和交流的日中两国关系开辟了新的历史。这次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给日中两国关系史增添了更加光辉灿烂的一页。"

邓小平在祝酒词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日本政府和日本朝野各界朋友为中日缔约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和敬意。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将对维护亚洲

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

谈到太平洋地区，邓小平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想当年的1975年12月初，美国总统福特访华，仍是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参加了中美会谈。

在涉及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为了“不抛弃老朋友”，仍是徘徊瞻顾，踟蹰不前。

邓小平代表中方斩钉截铁地回答：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只有三条：第一，同台湾断交；第二，废除美蒋条约；第三，撤军。实现了这三条，就可以建交。

从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缔结，敏感的记者们也想到了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在10月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一问题果然有人提了出来。

邓小平还是直言不讳地回答说，中美双方正在商谈这个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恐怕也是大势所趋。中美关系从1972年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以来，有了不断的发展，现还在继续发展，但是还没有正常化。障碍就是一个台湾问题。我们向美国提出了实现正常化的条件，就是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实现三条：废约、撤军、断交。这方面我们要等候美国的考虑。

中美双方谈判建交问题，是从1978年7月开始的。在谈判中，邓小平不仅关心谈判进程，而且对第一轮的谈判都是给予一些具体的指示，甚至于在最后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自己亲自三次会见了美国的谈判代表。

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就是美国卖武器给台湾的问题。我们是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美国是接受了，但是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

当时如果要坚持美国要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

能丧失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和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说我们为了求得同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这个问题将来就会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所以，最后邓小平跟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把这个武器问题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来解决。

因为有了邓小平这句话，才有后来的"八·一七公报"。这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内容，简单说来就是美国承诺逐步减少向台湾的武器销售，而且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不超过建交时向台湾出售的水平，一直到最后完全停止。

12月16日，华国锋总理同美国卡特总统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公报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双方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美双方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于1979年1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同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宣布结束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其共同防御条约规定予以终止。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

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具有广泛影响和深

远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两国关系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当然，中美关系中还存在着台湾问题的障碍。美国必须停止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台湾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

两年多来，通过上述一系列外交活动，奠定了我国外交上的新格局，开始出现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

综上所述，自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到1978年底这两年多来，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还束缚于华国锋提出并推行的"两个凡是"，难以全面实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但是，经过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一批革命家的推动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做了局部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作，扭转了经"文化大革命"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破坏而造成的动乱局面，并逐步摆脱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灾难和浩劫，一些工作在徘徊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历史，就这样一步步地走向了现代中国伟大转折的起点。

## 5—3　话问题解放思想　谈建设实事求是

邓小平是一个十分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否想到，江西的那条"邓小平小道"，竟恰似他第三次复出后的中国之路？

邓小平十分清醒地看到，如果继续按照毛泽东晚年"左"倾路线走下去，毛泽东亲手创立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不能发展和腾飞，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而且有灭亡的危险。这一点，他在往返于"邓小平小道"的时候，肯定已掂量了许久，否则，便不会有1975年的全面整顿。

那次整顿，是一次壮志未酬的试验。而“四人帮”的覆亡，一时也未能改变邓小平的命运，他仍在“等待”。

只是，这一次等待，已不是消极的无奈，而是积极的斗争。从揭开对“两个凡是”的冲击战开始，邓小平无时不在积极延伸着那条“邓小平小道”。

终于，转折的前夜到来了，契机出现了。邓小平适时地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他在1978年9月16日视察东北听取吉林省委的工作汇报时，发表的著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讲话中指出：

> 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也就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猛烈地抨击了阻滞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上大踏步前进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思想，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抓住大好时机，

"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为实现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而奋勇前进。

"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听到这种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激励的语言,有哪一位会不怦然心动、热血上涌呢?

同年10月,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说:"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形势越来越好。很明显,林彪、'四人帮'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所散布的流毒和造成的恶果,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去肃清,整顿队伍的工作还要在每个企业中完全落实……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就是指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这次讲话,对揭批"四人帮"的形势作出了及时、正确的判断,宣告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这一点,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也看出来了。还是在这个金秋10月,邓小平应邀对日本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访问过程中,他以极大的兴趣参观工厂企业,考察日本经济。在神奈川县日产汽车制造厂,邓小平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宛如台风经过一样",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实说,"访日期间邓小平反复讲四个现代化,从这种不同寻常的热心来看,他在深入思考。"

这一点,得到了邓小平自己的证实。

10月26日,邓小平乘坐新干线超特快列车离开东京前往京都访问。列车以每小时210公里的速度运行,穿过了风景秀丽的村

镇。一批日本记者来到邓小平的车厢，要他谈谈对新干线的观感。邓小平语意深刻地说："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在日本参众两院议长举行的宴会前，邓小平说，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也是为了得到它。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

"你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这是日本原田外相迎接邓小平来访时所讲的话，而它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可以说是更为恰当。

尽管初衷不同，邓小平提出的全党工作的重心要不失时机地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还是得到了一致赞同。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所主张工作重点的转移，是要在前阶段有所前进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思想大解放的基础上，以此为开端，结束"左"倾错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讨论经济工作的务虚会。李先念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在总结建国28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不同寻常地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思想主张。

关于改革，李先念提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

想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关于对外开放，李先念讲到，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地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如此明确、大胆的思想主张，已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设想，而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展望。这说明，在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一条新的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方针、道路，也已在当时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开始酝酿；这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绝非一夕之功、一时之见，而是水到渠成之杰作。李先念的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央作为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文件之一。

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坚持"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少数人赞同工作重点转移，则是为了使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提出的一系列急于求成的高指标尽快付诸实施。是企图在不纠正"左"倾错误的前提下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首先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是确立指导思想的转移，具体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为内容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必须纠正，与此相连，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彻底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否则，就不可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任何意义上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也都是侈谈、妄谈。

也就是说，关于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势必把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引向一个关键时刻——未来的前途与命

运的关键时刻；势必把“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斗争带到一个最后时刻——是寿终正寝还是伟业中兴的大决战的最后时刻。

但华国锋还是选择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因为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数同意，因为这个建议也有重合他的初衷的一面，甚至他还在希冀并努力地去争取把这个建议的命题与内涵调和起来，尽管这种调和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召开的。

为了准备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共中央于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

按照华国锋本人的设想，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因此，他在开幕会上宣布的议题是：

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

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由于邓小平在此前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已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赞同，因此，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又同时提出：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任务总路线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并说“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很显然，这一“中心思想”与上述三个议题之间存在着明显矛

盾，因为按照这一“关系全局”的“中心思想”展开讨论，所涉及的首要问题，决不仅仅是上述三个具体工作议题。根本无法调和的问题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了工作会议上。

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当然不会按照与会者绝大多数人的思考和认识那样去思考、去认识、去做，这在他宣布会议议题的讲话即可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否定他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更是三缄其口。显然，他还是坚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而不想有什么转移。所以，按照华国锋的设想，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一下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就够了，整个会议准备开20天。

只是经过真理标准讨论的洗礼变得更加心明眼亮的大多数与会者已经明白，如果按照这种指导思想召开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分清思想理论路线是非，纠正“左”倾错误，批判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口号和实践，解决“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以前遗留的有关重大历史问题，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彻底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左”倾错误中解放出来。一句话，就不可能实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这是与党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背道而驰的，也是与会者的大多数所要极力避免的。

怎么办？正如在历次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样，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老战士们仍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毅然冲破了华国锋的“左”的指导思想所宣布的议题和范围，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把原定的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变成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拨乱反正和提出新的指导思想的会议。

整个会议期间，共开了3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是分成东北、

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大组进行讨论。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率先解放思想，冲破了华国锋对会议原定的框框和调子，提出了当时党内外关注的几个重大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过，关于各省、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坚决支持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抨击"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冲锋陷阵者，除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外，就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了。而吉林省委，又是邓小平在9月16日视察时作了《高举毛泽东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专题讲话，号召反击"两个凡是"，揭穿其假高举实质的地方。因此，东北组的反击"两个凡是"，要求恢复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是好的。同时，杨易辰是积极向中央建议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省委主要负责人之一。这年11月，杨易辰在省内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的中心任务，这要求全党为这个中心任务的顺利实现，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陈云发言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干部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因此，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1937年的"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

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有利于我党我军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

总之，"七七决定"、1941 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这里需要作些补充说明的是，1937 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即"七七决定")的第三条是这样规定的："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考察后，亦得恢复组织"。1941 年 7 月 22 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专写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与"七七决定"是相同的。而在陈云这次发言的前 3 天即 11 月 9 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就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充任"中央文革"顾问，以其特殊身分随意迫害中央、省部级老干部的罪行向学员们讲话时，已经谈到了这一问题：

我们近一年以来，做了很多积案复查工作，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解放了一批，同时给予在假案、错案、冤案中受害的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平反与恢复名誉、厚葬、开追悼会及做善后工作，以中国的俗话"沉冤昭雪"，让他们死也瞑目。一些在党内或政府里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就很快得到处理，但还有上千百万一般干部和群

众，这些人至今未得到公平处理，有的尸体早已化为粪便，但他的特务罪名仍然还挂着，他们的家属们仍然还背着沉重的包袱。组织部机构再大，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一一替他们把案件澄清，因此，希望各省地县基层各单位能积极做好积案复查工作，把这些人问题快一些弄清楚，能先解放的先解放，不要吊在半空中。

由于汪东兴、李鑫控制的"中央专案组"作梗，这些问题迟迟不得作出正确的结论。乃至不得不由陈云在这里作为6个问题之一的问题提出来而最终得到解决。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也不是叛徒，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中共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这是北京几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批判中央和地方的重要领导人，是中央文革的顾问，他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陈云提出的这6个问题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以前遗留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归根到底涉及到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关键问题。

因而立即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许多与会者都提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乱反正的要求，还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要求。

陈云的发言在东北组反应强烈。11月13日，东北组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表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12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都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加以解决。萧克在发言中还要求为“二月逆流”的冤案平反。

同日，中南组与会者在发言中说：陈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是当前干部讨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最好能给以解决。这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积极性，加强团结，是有好处的。

西南组的发言表示，陈云提出的几个遗留问题影响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西北组的发言也认为，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

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11月16日，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提出的6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

11月17日，杨得志、李成芳在中南组指出：联系天安门事件，我们认为武汉“七·二〇”事件也到彻底平反的时候了。陈丕显提

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

11月27日，聂荣臻在华北组发言说：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陈云等接着插话：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王首道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了，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的书面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陈云11月12日提出的6点意见。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与会者还提到，邓小平1975年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予充分肯定，正式为所谓“右倾翻案风”平反。

此外，许多人还对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

在与会者的强烈呼吁和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了大家的意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和之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其中包括：

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了这一决定，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同志一律要平反，恢复名誉。同时，江苏、浙江、河南等省委对同类事件也做了类似处理。

二、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平反。

三、撤销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

四、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

五、纠正过去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

六、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

七、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这些决定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大家说，这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优良传统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中央政治局上述决定的推动下，会议越开越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围绕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对许多问题都展开了认真讨论。与会者一致表示，从全国范围看，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搞了两年，主要问题已经解决，取得了重大胜利，现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很适当。如果不及时、果断地实行转移，就会贻误时机，脱离群众。因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完全正确，非常及时，这是一个非常英明和有远见的决策。

有人在发言中诠释：工作重点转移，这一决策不是暂时的，短期的，而是战略性的，是针对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而提出来的。今后我们要重点搞好现代化建设。

有人在发言中探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这个提法值得研究，如果这样，就没有主次，没有重点了。

有人在发言中告诫：除非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不可能在本世纪内完成。

有人在发言中提示：从1965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来，三起两落，粉碎"四人帮"以后是第三次提出来，这一次必须下大决心坚持下去，否则国家就强盛不起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能体现。

有人在发言中宣言：现在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阶级斗争必须促进和保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任务的完成，不能离开这个中心。今后主要精力要转到生产建设了。

……这些发言表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抓住了推动全局的关键问题，并基本统一了全党思想。

与会同志还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一些人指出：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不仅仅是理论之争，而是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事关用什么标准来判定路线、理论是非和能否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是党内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

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从反面意见开始的。11月27日的大组讨论中，有人发言，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不赞成已见诸许多报刊的"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的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投石击开洞底天。这种意见立即引起多数与会同志的反对，并引发了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热烈讨论。

胡乔木在大组讨论时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理论问题。总结"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用什么标准来判定路线、理论、思想的是非？怎样引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来？是非不清，又怎么能落实党的政策？

万里在大组发言时指出，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

习仲勋在大组发言时指出，关于实践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

邓颖超在大组发言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旗帜要鲜明。

徐向前在大组发言时指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丰富、要发展，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每句话永远不变地照搬。

还有人在发言中说：真理标准问题虽是马列主义的常识问题，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个原则不明确，思想就不能够解放，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就会受压抑。缺乏一个最后明辨是非的客观标准，遇有分歧就难以统一认识，不利于安定团结。

还有人在发言中说：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关系到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路线、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前途的争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实事求是地总结二十几年来经

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纠正错误的东西。

在大家进一步了解了“两个凡是”提出的原因、经过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由来后，对主张“两个凡是”、阻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志，提出了尖锐、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坚持“左”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办事，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成是什么“砍旗子”、“丢刀子”等等，那么冤假错案就不可能平反，“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不可能纠正，全党工作着重点也就不可能顺利转移。

经过大家的批评帮助，一些曾经受“两个凡是”观点影响，对这场讨论的意义认识不足的同志，都先后承认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和汪东兴，也程度不同地作了自我批评。

12 月 13 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言说，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他曾讲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至于 1977 年 2 月 7 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的‘两个凡是’，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汪东兴也在这一天，用书面发言的形式，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在“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的错误及其他错误作了初步检讨。

华国锋的自我批评与汪东兴的检讨，这种态度无疑是等于宣

布，党中央已经坚决抛弃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主张。在讨论发展农业方针问题时，与会者揭露和批评了农业战线上的一些“左”倾错误的表现，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作了重大修改，提交三中全会审议。

东北组的讨论还是保持着言词激烈的特点：报纸上每年叫大丰收，1972年减产了200亿斤还说丰收，丰收了15年，农业还是这个样子。……现在有1亿多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如果不下最大决心迅速缓和农民生活的紧张状态，我国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就不能摆脱被动局面。

西南组的讨论也并未因四川的“名声在外”而显得些许轻松：四川虽然名声在外，但还有一批生产队不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大部分生产队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不少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

经济发展一向落后于东南地区的西北组的发言就显得更为沉重：宁夏西海固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群众生活确实很困难。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

一些老同志特别对有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生活困难表示了极大忧虑。王震在大组发言时提到：我今年略略看了看贵州，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如我们长征经过的时候。全国解放30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对于这种落后局面的形成，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自然是难逃其咎，但问题仅仅如此吗？大家在讨论中进行了认真分析。

有人认为，农业发展慢的原因，主要由于错误路线干扰，也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有人认为，农业上不去，近几年经济政策翻来覆去是个重要原因。

有人认为，农业生产上不去，主要是一些重大政策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农轻重的方针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再就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多年来，我们把农民挖得太苦了，竭泽而渔，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有人认为，我们过去对农民卡得过死，怕农民富起来，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

还有人认为，农业发展慢，根本原因就是一些人觉得"左"比右好，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应当反"左"。

从这些发言可以看出，与会者已经对农业发展问题的"左"倾错误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针对这些错误，大家也提出了不少切合实际的建议。

华北组在讨论中提出：建议目前着重把政策搞对头，调动社员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特别要坚持等价交换，实行按劳分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充分运用计划、合同制和价值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

西南组在讨论中则有这样的建议提出：要承认农民的自主权、所有权。当前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在二三年内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农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鉴于历史教训，国家一定不要征购过头粮，近几年起征点必须稳定在三四百斤；缩小工农业产品比价，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建议每年提高30%，3年内提高一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从明年开始增到20%，以后逐年增加。

西北组在讨论中则提出：农业学大寨问题要很好总结经验，必

须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

邓颖超在发言中则直接了当地明确提出:学大寨不是农业的方向,农业现代化才是方向,对"一平二调"的做法应当禁止。

讨论中还有人提出,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在于调动农民积极性,调动的关键在于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改进领导作风,改善党和农民的关系。对农民要放手,不要卡得太死,要允许农民有真正的"小自由",不要怕农民富。如果认为农民富了就会产生资本主义,那我们只有世世代代穷下去。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呢?越穷越革命,但不能越革命越穷嘛!

从这些发言不难看出,正在酝酿中的农村改革已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我国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转机已经到来。

在讨论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时,与会同志也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大家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因而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等问题。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就经济工作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经济工作要从国情出发,克服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影响。要重视8亿农民这个大头,把农业搞上去,要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他提出了对经济工作的5点意见: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到2000万吨;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不要一拥而上;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

材料的缺口；五、要重视旅游业的发展。

陈云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希望在计划安排上再做考虑，进行必要的调整。

“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开国元勋被整得家破人亡，令人痛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的一条就是党内的生活极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生活准则受到严重破坏。鉴于以上教训，很多与会者提出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建议。

有人在讨论中提到：现在有些高级机关警戒森严，还有极少数人进了政治局后深居简出，“一入局门深似海，从此群众是路人。”这种风气不改变，就会脱离群众。

有人在讨论中指出：我们党的威信下降，应该引起足够警惕，失信于民比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更加危险。

有人在发言中谈到：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有些人讲话有顾虑，不能把心里话全部倾吐出来。因此应该广开言路，让人把心里话讲出来。

面对这种种情况，谭震林在发言时深情地回顾了党的优良传统，他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有不同意见就开会辩论，吵嘴，那时不叫反毛主席。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我提议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

叶剑英也在大会讲话中提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

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这样,华国锋原来设想的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就变成了纠正"左"倾错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的会议。与会同志经过认真讨论,做到思想见面,逐渐统一了思想,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逐步明确了。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闭幕会。根据所提的问题和会议讨论的情况,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并从四个方面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意义。他首先指出:

> 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接着,邓小平高度赞扬了这次会议的成功及其意义所在。他说:

>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紧接着,邓小平从四个方面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意义。他讲的第一个议题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说：

>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
>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

邓小平在尖锐地指出党内存在“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的人后，对其成因也作了历史的阐述，认为“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在帽子、棍子的淫威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也用不着思考了”。“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这也使人们不愿动脑筋。“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因此，“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接着邓小平列举了党内政治生活、经济工作、建

设事业上的因为思想僵化而产生的诸如“包办一切”、“以党代政”、“不合统一口径”、“随风倒”、“本本主义”“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等“怪现象”。指出：

不打破僵化思想，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他说：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号召：“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邓小平阐述的第二个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主要条件”。他首先指出：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接着，他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并指出"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随后，他强调指出：

>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力，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然后，邓小平就正确对待反映人民呼声意见，严守组织纪律，实行"双百方针"，发扬经济民主，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重视群众物质利益，保障工人农民个人民主权利，加强法制，加强党纪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阐发，其核心思想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邓小平阐述的第三个议题是"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解决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思想认识和情绪认识上的这个问题，也是事关全局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既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也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说：

>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

接着，邓小平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党内要互相帮助，互

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等问题，并作了阐述。在这个议题的最后，邓小平就“最近国际国内都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发表了精辟见解。他指出：

>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列主义。
>
> 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是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他所阐述的第四个议题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个方

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阐述了“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观点。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提出相应的措施是“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劳动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最后，邓小平说：

>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是学经济，一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邓小平这篇重要讲话，是对历时34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获得重大成功的精辟总结，也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讲了三点意见：一、进行现代化

建设必须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勤奋学习，解放思想。

12月15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圆满结束。正如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

## 5—4　新时期的新纪元<br>划时代的里程碑

引导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高速列车终于在1978年的年底启动了。

这是中国历史新时期的"公元元年"。

这是中国历史新时期的扉页开篇。

邓小平回忆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列席9人，共290人。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围绕着这个主题，大会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讨论决定了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许多老共产党员认为，这是党的七大以来开得最好最成功的会，我们党多年没有开过这样好的会了。

邓小平认为：这是一次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的会议，这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

历史忠实地记录下这一切——

一、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充分地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样就重新确立和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会议深入讨论了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才能顺利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才能正确地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两年来，通过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纠正了被他们颠倒的许多思想理论是非。但是，现在还有不少同志不敢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状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影响，以利于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

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会议坚持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认为它的实质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违背了党和毛泽东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会议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会议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着重指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较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并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个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会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二、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会议指出，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打断了，破坏了。此外，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也妨碍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变的完成。现在，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虽然少数地区和部门的运动比较落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抓紧进行，不能一刀切，但是就整体来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全会及时地、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的口号，结束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全会提出，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则是实施新时期总任务的重大步骤。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它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此，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的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会议指出，我们也不能放松同极少数敌视、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之间的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提到："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之后，随着剥夺剥削者及镇压他们的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了，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中国共产党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完全符合我国的社会实际和实践，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三、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

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和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毛泽东1956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

这些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确定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开

端，是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的《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会议认为，这个计划安排是积极的可行的。会议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197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而行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

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全会深入讨论了把农业尽快搞上去的问题，制定了解决农业

问题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要求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

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会议认为,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年到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许购过头粮。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规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1979年和1980年降低10%到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

全会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同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

四、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实事求是地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会议指出，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一道，代表党的正确领导，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会议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会议正式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卓越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

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会议一致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的一项重要措施。

五、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严肃党纪。会议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少宣传个人”。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到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全会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为了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顺利贯彻，全会决定加强中央的领导机构，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选举了中纪委常委和委员100人。

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决定人事问题，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许多同志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任命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这些人事安排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组织机构，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得以实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体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巨大成功。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特有的建树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成为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点。这一转折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于：

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徘徊、步履艰难的局面，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乃至以前的"左"倾错误路线并清除其流毒和影响；

三中全会根本纠正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并开始全面纠正自 1957 年下半年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发生的指导思想的"左"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始全面地健康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一个全局性的历史性的根本转变。

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及时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除非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绝不能动摇和干扰这个中心任务。从而彻底完成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根本转变。

三中全会在认真而且深刻地总结了 20 余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和解决了许多因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变化而出现的新问题，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条件和时机，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而开始了以改革开放的新实践为基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探索时代。

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内斗争完全纳入正常轨道，它同时表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已开始从缺乏民主的沉闷的不正常状态转变到民主活跃的充满生机的正常状态上来。

也正是三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

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地位，完成了自1975年以来，第二代领导集体艰难缓慢形成并最终确立的过程。

历史将邓小平推向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

历史终于选择了邓小平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历史将社会主义的中国推向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历史将中国人民送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说得好：

> 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一个会议，叫做遵义会议，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可以说，跟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可以对比，可以相同。1935年遵义会议，是在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军队都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举行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遵义会议只过了14年，中国革命就得到了辉煌的彻底的胜利。在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点类似于遵义会议。在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征中间，我们经历了各种挫折、曲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以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好像遵义会议以后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样。

业未央，路正长。

远眺征程，回头望，该有个小结，好理一理思绪，上路轻装。

一代伟人毛泽东去世了，但他巨大的身影完完全全罩住了华国锋，国人们可以走出岁月的年轮，却走不出巨人的身影。

千古罪人“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

做法却没有结束，国人们可以告别“天下大乱”的岁月，却离不开“抓纲治国”的徘徊。

“两个凡是”竟这样把中国前进的脚步整整羁縻了两年。

于无声处听惊雷！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揭开了向“两个凡是”总攻击的序幕，宣告了“两个凡是”即将终结。

终结在1978，转折在1978。

终结与转折，完成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因而，这是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走出“左”的迷误，走出两年来的徘徊，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全面的拨乱反正，这标志着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走出毛泽东的巨人身影，走出“选定接班人”的理念束缚，实际上确立以邓小平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这标志着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对于邓小平来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都是一次深具“遵义会议”色彩的全会，而社会主义中国正是以此为契机，终于迈开了改革开放的雄伟脚步。

从此，社会主义中国改革的脚步震动着世界！

从此，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中大踏步向前进！

从此，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

告别天下大乱的中国与中国人民，从此才步入了一个真正的新时代。

1978年12月23日，当东方的太阳再一次升起时，它的灿烂光辉所照耀的中国与中国人民，迎接的是一个真正的崭新的黎明。

# 六、包产到户：一场饥饿引发的深刻变革

改革的大潮首先从农村涌起。大梦之醒，源于“生存”——两个惊心动魄的大字。

农民要种田，种田是要吃饱饭，这是最简单的道理。然而在70年代末的中国，怎样让农民吃饱肚子，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的话意味深长：“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万里一马当先，举起农村改革大旗。

周曰礼的“绝密件”，找到了对症下药的处方。

小岗分田，石破天惊，拉开了一道不可遏制的变革突破口。

“要吃米，找万里。”

邓小平给包产到户“落”了户。

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沉睡多年的神州大地。

## 6—1　万里主政安徽推出《六条》 小平点拨四川放宽政策

“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这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一句名言。

认识中国农村的实际，是农村改革的基础。

站在今天的坐标上，回首那场新旧体制转换的历程，最初的起步竟是如此艰难……

1977年6月22日，万里被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就在这一天，他带着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离开北京到合肥走马上任。这位当年抓铁路整顿雷厉风行的“先锋官”，此刻又将面对一个更加棘手、更为复杂的重大课题。

上任伊始，万里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着手“清帮”治皖，很快初见成效。但是，如何改变安徽的落后面貌，从根本上扭转安徽的形势，实现拨乱反正，仍是一桩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

地处华东江淮腹地的安徽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的90%以上。历史上淮河两岸自然灾害频繁，安徽以多乞丐而闻名全国。长期以来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温饱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安徽也是一个长期遭受“左”倾政策严重破坏的重灾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很好发挥，经济发展缓慢，在全国处于落后位置。1977年，全省28.7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约占25%的队人均年收入在40元以下。大部分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有的仍在饥饿线上

挣扎。

百废待举，从何入手？带着沉重的思考，万里上任三个月，巡行3000多里，首先深入农村，体察民情，了解民心。

万里下乡调查，不搞前呼后拥，亦不惊动基层。他喜欢微服"私访"，通常是不打招呼，不带随行人员，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他认为这样看得真切，听得真实。再就是不开大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问、听。

万里巡行调查，车上除了秘书或警卫，加上司机之外，还有一位记者。他就是新华社常驻安徽记者张广友，而他与万里是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在铁道部"蹲点"相识的。从那以后，两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万里到安徽任职，张广友也因万里建议而调到了安徽。凭着记者的敏锐和共产党人的忠诚，他积极参与了安徽农村改革的艰难历程。

那年冬天，万里一行4人走访了皖南的芜湖、徽州、池州三个地区十几个县(市)。此后又到了淮北的阜阳和皖东的肥东、定远、凤阳、嘉山。

一路走访，一路思考。所见所闻，令万里的心情愈发沉重。

一次，他来到一户农民家里，见到了蹲在锅灶口的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便主动亲热地同他们打招呼。

可是万里连喊几声"老大爷"，对方都没有反应，仍然蹲在原地不动。

这使万里感到很纳闷。

当陪同人员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才缓缓地站起身来。

这一下万里却惊呆了——眼前的这位老人竟然下身赤裸，没穿裤子！另外两位年轻的姑娘也同样没裤子穿，只好蹲着原地不

动。

村里人说，这地方有的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天气太冷时，就只能这样坐在灶口取暖。

看到群众生活竟如此贫困，万里深有感慨，心情沉重地说："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老百姓还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何颜以对？问心有愧呀！

万里深入基层访问，不太满足于那些"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类的汇报，他要掌握真实的第一手材料，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

眼前的事实是：建国快30年了，山河面貌依旧，农民群众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改善。

对此，邓小平很坦率地说过："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于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1977年全国人均占有口粮低于1957年，农村有1亿多人的口粮不足。

万里皖南3000里巡行所了解的情况，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在淮北阜阳农村，一些农民过年连一顿饺子也吃不上。农民吃的是用地瓜面和胡萝卜樱子煮成的、散发出难闻气味的黑糊糊。

在肥东，万里听到一位农妇的抱怨是："这年月，日子困难，不好过，没法子！"她家的全部家当还不值30元钱，一根木棒就可以全部挑走。

在定远，当万里问一位年轻农民有什么要求时，他打开破棉袄，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

万里再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青年汉子又一次撩起破棉袄，拍着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

多么质朴的语言。摆脱饥饿，维持生存，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最实际的企盼。

更让万里难过万分的是他的金寨之行。

金寨，是红军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万里深入深山老区，看望一些老红军和红军烈士的亲属，当见到他们那种生活贫困凄凉的境况时，万里十分沉痛，不禁流下了眼泪。

大别山区穷，过去只是听人这么说，但怎么也没想到会穷到这种地步。他当即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 120 万元，棉花 14.5 万斤，棉布 108 万尺，粮食 50 万斤，救济老区贫困户。

在万里深入农村调查的同时，顾卓新、赵守一等省委领导人也都带头亲自下到基层调研。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讨论酝酿，一项治穷解困的重大措施终于出台。

1977 年 11 月，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万里在会上发表了一段动情的讲话。他说“中国革命在农村起家，农民支持我们。母亲送儿当兵，参加革命，为的什么？一是为了政治解放，推翻压迫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一是为了生活，为了有饭吃。现在进了城，有些人把群众这个母亲忘掉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一番肺腑之言，表明了他对人民群众的赤诚和解决农村问题的决心。

他清醒地看到：安徽是农业省，农业搞不上去问题可就大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一落后或遭了灾，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实现四个现代化了。把农业搞上去，关键是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积极性，一个靠领导，一个靠政策。农村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要制定好的农业政策，必

须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

万里在这次会议讲话中特别提到的“一个规定”，即中共安徽省委制定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它是粉碎“四人帮”后徘徊的中国所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亦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说起这份文件的出台，不能不提及当时担任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周曰礼。

周曰礼是扛着大盖枪参加革命的。在此之前的5年铁匠生涯铸就了他铁一般的性格。合肥解放后，他在皖北军区司令部任机要员。在那里，他认识了军区政委曾希圣，并给曾希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曾希圣当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便指名调周曰礼到身边当秘书，而且一当就是三年。出身农民、了解农村的周曰礼，在60年代初安徽的“责任田”试点中曾经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

1961年2月，曾希圣带领工作组到合肥市郊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搞“责任田”试点，周曰礼就是其中一员。

责任田在这个极为贫困落后、处于饥饿之中的小庄子里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周曰礼等人起草了一个试点报告上报省委书记处。不久，他又参与起草了省委关于试行“责任田”的有关文件和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

当时的安徽由于粮食短缺严重，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实行“一大二公”的政策，显然难脱困境。这种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责任田，对于度过饥荒确实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宿县有一位70多岁的老农，儿子因病不能参加劳动，本人又不肯当“五保户”，于是向公社党委书记要求带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和休养。

公社书记壮着胆子答应了他的要求。

一年下来，父子俩靠一把铁锹、一把四齿钩，开荒16亩，收粮3300斤，扣除自用，上交粮食1800斤，现金60元。

事实说明，天灾固然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因素，但"人祸"的影响恐怕更为主要。

这位老汉的现身说法，让其他农民看到了免于饥饿的希望。他们纷纷向社队干部提出了"把田包给我们种"的要求。

对于责任田，毛泽东最初是同意试验的。但是，随着他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忧虑不断加剧，态度也随之转变。

他指责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是刮"单干风"，"犯了方向性错误"，将其当作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加以制止。

八届十中全会后，包产到户更被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尖锐斗争的靶子进行严厉批判。曾希圣和支持这一做法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被撤职，全省上下许行多人因受牵连而遭到了批判。周曰礼是责任田的推行者之一，自然也免不了挨批斗。

虽然责任田在政治斗争的高压下被"改正"，但是经过这次试点，周曰礼深知包产到户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也是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万里主政安徽，抓农业生产，身为农委政研室主任的周曰礼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当时，大寨是中国农村必须效仿的样板。然而，这个60年代初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到"文化大革命"后，却逐渐变成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典型。席卷全国的"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不仅对中国农村，而且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学不学大寨，已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而是事关举什么旗、走哪条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在省地县各级党

委机构中都专门设有“农业学大寨办公室”，而这个“大寨办”几乎取代了原来农委的职能。

1977年冬，万里在安徽开始搞农村改革时，“两个凡是”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按照建设大寨县“六条标准”解决“五种人”的问题，从生产队向大队核算过渡，仍然是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1977年11月16日，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包括向大队核算过渡在内的12个问题。会后中央发布的1977年49号文件指出：“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今冬明春，可以再选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经过层层动员，全国各地刮起了向大队核算过渡之风。

在安徽省，“大寨办”和农委这两条线，都直接通向省委，都在争取第一书记的支持。万里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与安徽农村的实际十分了解，对那些“假大空”和报喜不报忧的材料很不感兴趣。他找到受冷落的周曰礼，同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周曰礼对1961年那段“起死回生”的历史记忆犹新。他直人快语，一针见血地指出：发展农业生产，“根子是政策问题，是人和土地的关系问题。”语不惊人，但却牢牢地抓住了根本。

没有利益驱动，怎么能有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50年代的特定条件下，靠着革命激情，可以不计报酬，可以勒紧裤带干社会主义。但是，勒一天、两天可以，勒裤带时间长了，精神上最初的激情也会消失。当时农村广泛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男劳力上工带打牌，女劳力上工带做鞋”，“头遍哨子不买帐，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

事隔不久，为了给省委的决策提供确实可信的依据，省农委起草了一份反映农村极左路线危害严重的“绝密件”呈送万里。这份有违时尚的“绝密件”列举了“浮夸、瞎指挥、大搞形式主义”等问

题，并以一些确凿的数据和触目惊心的事实为佐证，很有说服力。万里认真地看了这份“绝密件”，特意叮嘱周曰礼：“你们能否搞个针对性的政策意见？”须知做这样的事在当时是冒极大政治风险的，但周曰礼却知难而进。

为了起草这份有“针对性”的政策意见，周曰礼带着一干人马去了滁县地区。

滁县地区气候温和，交通发达，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令人叹惜的是，从1958年到1977年的近20年间，全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仅为2.2%和2.61%。其中定远、凤阳、嘉山三个县，不少社队人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人均年收入只有50元左右。全区大批农民外出逃荒。如此年复一年，恶性循环，农村已陷入焦灼的境地。

经过认真调研，集体起草了这份触动中国农村改革神经的红头文件——即前面提到的中共安徽省委的农村《六条》。

《六条》的主要内容是：(一)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三)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四)落实按劳分配政策；(五)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六)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其中的不少内容突破了“左”的禁区，最重要的是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自主权的实质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做主，摈弃瞎指挥和不切实际的花架子。《六条》中反映出的基本精神是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精髓。

在1977年11月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参加会议的省、地、县委领导人围绕《六条》逐条进行讨论。讨论中的思想交锋相当激烈，有人说《六条》“不是社会主义方向”。

有人说,《六条》"给农民的自主权太多啦!"

"这样下去,会不会滑到1961年……"

由于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人不在少数,原先准备写进去的一些政策性更宽的条文,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

面对遇到的阻力,万里表现十分沉稳。他叮嘱农委:"不要勉强!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要耐心等待,因为具体工作还要靠下面的同志去做。如果硬写进去,他们接受不了,反而会把事情搞糟。"

经过修改的省委《六条》一经发出,很快轰动了全省,继而震动了全国。《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纷纷派出记者到安徽采访。

安徽农村自此冲破了由于"左"的束缚造成的"万马齐喑"局面,伟大的中国农村改革实际上也从这里拉开了它波澜壮阔的历史序幕。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发表了该报记者姚力文和新华社记者田文喜所写的通讯,对安徽省委《六条》作了报道介绍,进而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六条》在安徽农村宣讲贯彻过程中,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在各地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男女老少兴奋地静听宣读文件。每当念到喜欢听的关键地方,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台下就有群众高喊:"再重念一遍这句话!""念慢点!"

文件刚念完一遍,一些群众就喊:"再念一遍!"虽然当时天寒地冻,但群众却兴奋地说:"听到新精神,天冷心里热!"

记者问一位农民: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

这位农民回答:"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

受限制了。今后大概也不会再'摸鸡笼子'，'砍鸡头'了吧？"

台上台下形成了强烈的共鸣，显而易见，只要政策对头，就能把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释放出来。有了好的政策和路子，加上农民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就一定能走出困境，把生产搞上去。

安徽省委的《六条》制定后，邓小平即给予了热情肯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考虑的是一个更加宏大的改革战略。因此，必须把安徽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引向全国。

1978 年 2 月 3 日，也就是《人民日报》推出安徽省委《六条》诞生的重大消息的当天，邓小平从成都起飞，出访尼泊尔。此前在四川停留期间，邓小平向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介绍了安徽的《六条》规定。他的点拨很精当：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只要所有制不动，怕什么！工业如此，农业如此。要多想门路，不能只在老概念中打圈子。

这使人们联想到邓小平那个著名的"猫论"，以其生动形象的比喻，给人们留下了无限丰富的创造性思维空间。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评价说：邓小平"非常直爽，从不拐弯抹角。中国有这么一个非常实际的领导人，无疑是民族之大幸。"

邓小平关注四川，因为这个全国占人口总数十分之一的农业大省，对于治国安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道是"天下已定蜀未定，天下不乱蜀先乱。"自古以来就有"治国必重蜀"的说法。

摆脱农业困境，在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乃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十年"文革"浩劫和极左路线的干扰，"天府之国"被搞得人心涣散，民不聊生，丰腴的土地却结不出丰盛的果实。饥饿同样威胁着那里的农民。

全省农业管理混乱，相当多的生产队成本无核算，帐目不健

全,单是历年累计的超支欠款一项,就达6.8亿多元,超过全省人民公社两年公共积累的总和。粮食生产的实际情况是一年不如一年,致使这个农业大省到后来根本就调不出余粮,连维持本省人民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要解决四川的农业问题,政策是否对路同样是关键。

四川省委从1977年下半年起,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清理农村政策。清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凡是经过实践检验,确实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和改变社会风气,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政策和有关规定、制度,都要予以肯定和恢复,并在实践中使之不断完善。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就要总结教训,加以改正。在这种正确思路指引下,多年积淀下来的农村问题开始逐步解决。

在听了邓小平的谈话和安徽省的《六条》决定后,四川省委更加增添了冲破"左"的束缚的勇气,加快了农村改革步伐,迅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

这个规定共有12条:(1)加强劳动管理;(2)严格财务管理制度;(3)搞好生产计划管理;(4)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坚决保证社员分配兑现;(5)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6)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7)奖励发展耕牛;(8)大力发展养猪事业;(9)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0)积极兴办社队企业;(11)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12)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规定强调要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认为"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简便易行,应当认真搞好。规定还提出,凡是全年人均口粮不足360斤的生产队可以免交公粮以保证个人收入。鼓励农民储存消费的粮食。

这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大政策,它对于恢复生产,稳定民心,

解决温饱，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因此，《十二条》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四川在实施“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农业方针以后，巴蜀大地发生了可喜变化，过去被认为几乎无法制止外流的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归了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曾经荒芜的田野又出现了勃勃生机。

四川省的《十二条》冲破了过去农村政策的不少禁区，为农民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壮了胆，撑了腰。不少地方的农民自发地将“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发展成为包产到组。对此，四川省委领导人予以积极支持，“只要集体所有制不变，各种非剥削的生产方式都可以施行。”农民群众的创造与实践，使四川成为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又一个重要发源地。

1978 年底，受四川省委的委托，新华社四川分社采编主任刘宗棠来到合肥，学习和了解安徽省抓农村改革的经验，特别是通过对安徽省委《六条》贯彻落实的情况调研，为宣传和推动两省乃至全国的农村改革创造了条件。

安徽与四川，东西呼应，迅猛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大幕。

## 6—2 借地度荒 包产到戶<br>永贵责难 万赵力争

1978 年夏秋之交，百年未遇的大旱肆虐安徽，江淮大地八九个月没有下雨，全省受灾农田达 6000 多万亩。

严重的旱灾，致使全省境内绝大多数河川断流。再加上三次要命的干热风，疯狂地摧残田地和庄稼，眼看尚未恢复生机的安徽大地陷于严重的灾情之中。400 多万人口地区的人畜用水发生困难。

一些地方已靠汽车运水，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还有的农民不得不赶着牲口逐水草而迁移。饥饿的威胁引起巨大的恐慌，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势将出现不堪设想的后果。

省委号召安徽人民"倾家荡产，奋力抗旱"。尽管全省上下作出了巨大努力进行抗旱，但1978年全省大幅度减产已成定局。秋后，不计其数的灾民举家出走，踏上了漫漫乞讨之路。据说光是一个上海就出动数千民兵，甚至动用棍棒，把大批灾民赶上闷罐车送回安徽。

原先打算到安徽凤阳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拍摄农村新气象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对眼前的严酷现实深感震惊。当他们实地实景拍摄的"内参片"被送到中央政治局后，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观看后不禁潸然泪下，感慨万千，说："解放29年，想不到竟有如此穷困的农民，竟有如此忍辱负重的百姓。"

人命关天，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拿出具体的抗灾办法来。

1978年9月1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度过这场特大旱灾。时下正值秋收秋种时节，若不采取果断措施，大片土地将被撂荒，来年的早、中季庄稼就会颗粒无收，历史的悲剧就可能重演。

谁都知道需要调动农民积极性，组织生产自救，可是究竟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一文，文中强调"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要反对那种"嘴上说社会主义，实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生产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的做法。

此时，周曰礼向万里提出了借地给农民种麦的建议。在这个关

系重大的问题上，万里表现出大胆试验、当机立断的政治勇气。他在紧急会议上指出：要全力抗旱，能多收一斤就多收一斤，多收一两就多收一两。保不住收成，一切都是空话！农民很穷，他们手中无钱，就是国家供应返销粮也买不起。这怎么行呢？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撂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

省委经过讨论，及时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明确规定可借给每个农民3分地种菜；对播种小麦的旱地不许征购；利用荒岗湖滩种植粮油作物，谁种谁收。一个"借"字，重如泰山！只有无私无畏、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共产党人才敢于作出这样的决策。

事实上，省委作出这个决定并不轻松。在会上就有人认为，借地度荒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样调动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

有的说：为什么借给社员个人能种，集体不能种吗？这是以"借地度荒"为名，搞分田单干，是方向道路问题。

对于这些吃饱了好还是吃不饱好的诘难与困惑，万里的回答也很幽默。

他说：我们借给农民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再说土地种上庄稼总比撂荒强。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

省委的"借地"决定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同时也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条件。从"借地"向大包干发展势不可挡。

肥西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颇具典型意义。

1978年9月1日夜，肥西县山南区区委书记汤茂林在柿树公

社黄花大队召开了有23名党员参加的支部扩大会。会议主要是讨论省委《六条》和抗灾自救问题。

汤茂林在会上问大家:落实秋种有没有办法?有人小声地说"办法倒是有……"

汤急忙问是啥办法?回答是:"就象1961年那么干。"

要搞包产到户?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汤茂林的心里直打鼓,上边明文规定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但是,不走这条路秋种就没法搞下去。经过一番议论,得出了一个"试试看"的办法:定土地,每个劳动力包5亩麦子,5分油菜地;定产量,小麦亩产200斤,油菜亩产100斤;定工本费(种子、化肥),每亩5元;定超产奖励,亩超100斤,奖励60斤粮食;定惩处制度,减产100斤赔偿。尽管这个办法合情合理,汤茂林还是不敢贸然表态,于是第二天就向县委第一书记常振英作了汇报。

常振英听罢先是摇头,汤茂林据理力争。常振英内心赞同这个办法,只是告诫道:真要这样干,性质就变了!但还是答应他们可以试试看。

送走常书记,汤茂林便召开紧急区委会。会上7名委员一致同意黄花大队的做法。汤茂林对此感到激动不已,会后立即赶往黄花大队,召开党群干部联席会,公布了区委的决定,喜出望外的黄花人对之报以热烈的掌声。就这样,借地度荒变成了包产到户,一个"超过政策界限"规定的政策在山南区有了立足之地。

9月18日,汤茂林在黄花大队召集附近3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和9个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开会,推广黄花大队的办法。出人意料的是与会者一致同意包产到户,照黄花大队的办法干。

一马当先的黄花大队两天内就把1700亩土地分掉了1420亩。解除了束缚的农民,对包产到户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大包干的

热潮迅速在山南区掀起。

然而，就在汤茂林等人为大面积推广包产到户东奔西忙的时候，一纸署名“人民群众”的匿名信于9月20日送到了万里手中。

在中国，8分钱的邮票就可能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特别是那些涉及到“政治问题”的匿名信。

这封措辞尖锐的来信指责汤茂林，说“这是刘少奇路线的‘翻版’！”“这是曾希圣‘阴魂不散’！”万里对这些指责采取冷静的做法，他将信批转给顾卓新，顾卓新又批给王光宇，要求交省农委处理。

当县委书记常振英告诉汤茂林：“人民来信”告他搞单干时，汤茂林据实反驳道：“是责任田，是‘四定一奖，责任到人’！”

常振英表示：“办法好是好，可还是不能联系产量。”汤茂林被逼出火来了：“常书记，不管联系不联系，反正我们山南区已经干开了！”

不干则罢，要干就干个彻底。这封“人民来信”反倒坚定了汤茂林搞包产到户的决心。9月22日，他召集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要求都照黄花大队的办法干，与会公社书记无一人反对。

同一天，山南区有3个公社的小麦和油菜已全部播种完毕，这显然是“包”字发挥了作用。很快，包产到户在肥西县扩展，并波及到别的县。

密切注视着包产到户发展态势的万里，对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在1978年10月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指出：“对农村经济政策要调查研究，排除一切阻力，大胆地实事求是地去干，不能抓辫子。”“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都等到我这个第一把手来决定。”“有的办法，通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了，就赶快改。”“联系产量的责任

制可以大胆试行”,“根据作物情况,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所有制不变,出不了什么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

领导者的谋略与智慧,在于穿越扑朔迷离的雾障举起希望的火炬。

在一次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万里明确表示:我们一切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加速生产的发展。我们的政策是否符合生产力的发展,就要看它能否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对于上级的文件和指示,不能简单地照搬照套,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当然,反对照搬照套,并不是提倡无政府主义,也不是说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可以不听,甚至采取阳奉阴违或自由主义态度。重要的是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安徽农村改革之初面临的困难和压力相当大。当安徽实行包产到户的消息传出之后,招来了一连串的攻击和指责。邻近的江苏省在两省交界处竖起大标语牌“堵资本主义的路”,高音喇叭面向安徽天天宣传“大批促大干”。《山西日报》则计划推出12篇批判文章……

对此,万里处之泰然。针对有人指责安徽省委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是“反对学大寨”,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安徽的做法等情况。万里说:我们没有大寨那样的条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没有“阳关道”可走,只好走“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的结论。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的样板。我们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

他们。

针对那时盛行的“取经”和“传经送宝”之风，万里明确宣布安徽省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从我们的现有条件出发。当前我们的实际，首要的是要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解放快30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能说得过去吗？我们现在虽然还很穷，还很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政策对头，我们会很快改变面貌的。

在改革大潮的风口浪尖，没有敢立潮头的精神就不会有所作为。对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创造采取什么态度，也是一块重要的试金石。

对山南区包产到户的大胆尝试，万里和省委其他领导人的共识是：让实践来证明其是否正确。不急于表态，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这既不违背中央精神，又对群众的做法表示了默认。

1978年10月，周曰礼遵照万里的指示，带领一些人分赴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后，写出了《农村政策需要清除“左”倾影响》一文，并在全国农业经济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了言。这份材料经过进一步加工整理，改写为《农业上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为万里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发言提纲。

这个发言提纲所触及的问题都十分敏感和尖锐。矛头直指“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提纲”明确指出：“现行的人民公社体制是‘政社合一’，实际上是‘党、政、社’三合一。”这种体制弊端很多，“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出现利用职权按照长官意志管理和指挥生产。”建议“对现在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行政、社分离，可以考虑以现在的公社设乡。”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从安徽来看，真正学得好的是少数，学得差的是不少。”“就全国来说，不宜提‘普及大寨县’的口号。建设大寨县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容易办到

的。”

这个材料，在万里带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全文刊登在安徽省委主办的党内刊物《党的建设》第一期上。

这也算是一个预演。万里带着这份提纲，就是准备回答一些人对安徽的诘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围绕着安徽、四川等地所推行的农村改革的争论，也日趋激烈。

陈永贵作为大寨的擎旗人，对万里、赵紫阳等人的做法自然不满。

自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以来，大寨经验也受到愈来愈多的批评。特别是对那条“格言诗”式的口号：“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人们的非议最多。

但是，此时的陈永贵并不觉得大寨经验有违实际。他认为大寨是毛泽东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应该无条件地捍卫。不走大寨之路，必然就是搞修正主义。

因此，关于大寨经验与农村改革的争论，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山雨欲来风满楼。

那一段时间的报纸，对四川、安徽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这些曾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东西，又重登大雅之堂。反对者认为，是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了！

果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那天，当万里在分组讨论会上介绍了安徽的经验后，陈永贵便当场质问：“你们这一套恰恰是大寨经验所反对的，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与会者把目光投向了万里。

万里胸有成竹，不急不恼地说："究竟是什么主义，广大群众心里最清楚。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好处，我们就可以考虑试验。"

"试验来试验去，你们还学不学大寨？"陈永贵有些恼火了。

万里的回答柔中有刚："如果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就学。否则，就不学！"

赵紫阳也在一旁说道："永贵同志，学大寨不能强迫别人照你的办法学嘛，要允许别人根据当地的实际灵活地决定方针政策嘛。"

"学大寨是毛主席号召、党中央强调的，难道不学啦?!"陈永贵气冲冲地说。

赵紫阳不紧不慢地解释道："学，也要看怎么学呀。总不能你修治狼窝掌，我也非要搞个老虎坑呀！没有虎头山的地方怎么办呢？所以要因地制宜。"

此语一出，全场的气氛活跃起来。

"你们这叫资本主义！"陈永贵怒不可遏。

"哦，我们革命几十年倒在农村革出资本主义来了，那么请问永贵同志：有资本主义就有资本家呀，在农村谁又是资本家呢？"

赵紫阳的反问令陈永贵语塞了。一气之下，他拎起文件包走出了会议室。

接下来的讨论情况，更令陈永贵等人感到不安。

西北组在讨论中提出：农业学大寨问题要很好总结经验，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

邓颖超的发言直率明确：学大寨不是农业的方向，农业现代化才是方向，对"一平二调"的做法应当禁止。

西南组有人提出：要承认农民的自主权和所有权。

还有人提出：如果认为农民富了会产生资本主义，那我们只有世世代代穷下去。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呢？越穷越革命，但不能越革命越穷嘛！

……

陈永贵等人本打算纠"偏"，谁料想大寨经验反倒成了众矢之的。

万里原先曾作了"挨批"的准备，结果出人预料。值得庆幸的是，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力争下，全会开成了解放思想、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大会。这对于安徽、四川的农村改革探索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三中全会根据与会者的意见，对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例如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和支持农民搞家庭副业，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1979 年 1 月，四川省委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决定按照"休养生息"方针使农业有较快发展，鼓励"包产到组"试验。到年底，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就达到生产队总数的 57.6%。

与四川毗邻的云南、贵州也进行了包产到组的试验。贵州省在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的支持下，到 1978 年秋后，全省就有 60%左右的生产队自发地搞起定产到组的责任制。在祖国的大西南，也悄然涌起了农村改革的春潮。

从 1979 年 1 月起，《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云南、广东等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为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了积极作用。

包产到组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包产到户！

但要迈出这一步，却非常困难。在当时的文件中仍然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两个"不许"，重若磐石。

改革之路，仍很艰难。

## 6—3 小岗分田石破天惊 张浩来信乍暖还寒

只有敢为天下先的猛士，才能在历史长河的这块空白地带，创立不朽的功绩。

18户普普通通的小岗村民，在关乎国家命运的严峻关头，与共和国的最高决策层一道，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在历史的机遇与我们相逢之际，邓小平对中国的问题看得很透彻："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因此，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也是使高层决策与人民意愿有机统一的重要前提。

如果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就会在惰性的"黑洞"中走向寂灭。于是，邓小平果敢地发起了一场新的革命。

改革需要寻找正确的突破口。站在改革起跑线上的领跑者，是那些绝处求生的凤阳农民。

安徽省凤阳县在历史上是个有名的穷地方。翻开凤阳县志，几百年的历史中屡屡出现"人相食"这类触目惊心的记载。流落在各地的安徽籍讨饭者中，以凤阳人居多，历朝历代，凤阳人以身背花

鼓逃荒要饭而闻名。就连大明皇上朱元璋,也从9岁讨饭讨到13岁。正如一首海内外广为流传的凤阳花鼓词中所唱: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历史上凤阳穷,但贫困落后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从1949年1月凤阳解放到1955年农业合作化之前的这段时期,凤阳的贫困面貌曾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9900多万斤,上升到1955年的2.6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00多斤,基本上解决了凤阳人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凤阳人勤劳、智慧,只要政策好,就会彻底改变乞讨之乡的面貌。

但是从1956年以后,凤阳农村的经济发展几经折腾,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在"左"倾错误的干扰下,重又走着可怕的下坡路,成为全国有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

从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中,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9.6亿斤,而同期国家返销给凤阳的粮食却达到13.4亿斤。此外,在这23年中,国家给凤阳拨发救济粮食4.1亿斤,投放贷款7000多万元,社会救济款5000多万元。在此期间,凤阳几乎每年都有几万农民外出乞讨。他们当中有的怀揣户口本,有的拿着党员介绍信,走南闯北,讨遍了大半个中国。

1978年大旱,凤阳外流人数达到高峰。腊月二十七,省委书记王光宇在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陪同下来到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只见集体土地大片撂荒,社员房前屋后的菜地也没种,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两位书记走了全村11户人家,竟有10户是冷灶无粮。在

临淮关火车站，王光宇看到的是大批被遣送回来的流民，其状之凄凉，令人揪心。

可是有的人对眼前的情景不以为然，说什么凤阳人自朱元璋起就有要饭的“传统”。这种冷漠麻木的调侃令陈庭元大发雷霆：“这是对老百姓的污蔑，没有一点感情！数九寒冬，冰天雪地，你也走一趟试试！”

这位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熟悉农村，了解农民，曾多次为了维持农民的利益而被打成“右倾”，挨批遭斗。但他初衷不改，心系农民弟兄，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好事。为了凤阳农民早日丢掉讨饭棍，就是丢乌纱帽、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

在贯彻省委“借地度荒”的决定时，这个县的马湖公社书记詹绍周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责任制。上面要求从生产队向大队核算过渡，马湖公社搞的是从生产队向小组核算转变，对这个冒风险的举措，陈庭元是支持赞成的。但在处理方法上，则主张先搞试验，不宣传、不推广、不制止。关键是“不制止”，这是尊重群众的创造和选择。

包干到组虽有效果，但并没有完全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事实证明：“大组不如小组，小组不如到户”，农民群众迫切需要的是1961年那样到一家一户的责任田。上面明文规定不允许，怎么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这个节骨眼上，18户人家组成的小岗生产队率先闯关了。

1978年11月24日晚，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一间茅舍里，聚集了全队的18户农民，他们所要决定的，是一桩关乎18户小岗人身家性命的重大事情。

小岗人是穷怕了，被逼无奈才铤而走险的。

全队18户，家家讨过饭。18户人家都有人当过生产队干部，

但都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上级每年都派工作队，最多时每户摊上一个工作队员，结果照样无济于事。除了1955年向国家卖过4万斤余粮外，以后的23年再没有一粒余粮可卖。1961年搞责任田，小岗人刚刚尝到甜头，但很快就被批作"复辟田"，收归大堆。"文化大革命"以来，一批二斗三割，搞得人心惶惶，虽然穷得响丁当，但照样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批归批，斗归斗，人要吃饭可是个不会弯的硬道理。

马湖公社实行"包产到组"有效果，但小岗队18户人家先是划为4个组，过几天又分为8个组，但都不能解决问题。再细分就只能是到一家一户了。

咋办？小岗人面临着"闯关"的考验。

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会计严立学，这三位都当过乞丐的汉子私下商量：如果"包产到户"能干好，咱们就豁出去了，不然，也是饿死。当晚他们召开的秘密会议，就是商议分田到户的事。

那种场面，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与会者都知道事情的份量，人们面面相觑，鸦雀无声。严宏昌神色凝重地掏出一份早已拟好的条文，悲怆的语调略有些发颤：俺们得自己救活自己。就是杀头也让脑袋掉到富窝里，为混口饭吃，死也值得。我们写了一个保证书，对咱们小岗搞秘密 包产到户 做了两条规定，如果同意就请各户按手印。

乡亲们七嘴八舌地喊起来：对，把土地分了。

再补上一条！你们要是倒霉，我们帮助把你们的小孩养到18岁！

大家争先恐后地用食指蘸上鲜红的印泥，在自己的姓名上重重地按下指纹。

这份对天盟誓的保证书是这样写的：

## 保 证 书

一、“包产到户”要严守秘密，任何人不准对外说。

二、收了粮食，该完成国家的就完成国家的，该完成集体的就完成集体的，粮食多了，要向国家多做贡献，谁也不要犯罪。

三、如果因“包产到户”倒霉，我们甘愿把村干部的孩子抚养到18岁。

签字人

严宏昌　严俊昌　严立学　严立富　严立华
严立坤　严立昌　严学昌　严富昌　严家齐
严美昌　严国平　严家芝　严美申　吴友江
吴庭珠　关友章　韩国云

1978年11月24日

分田单干，石破天惊。“违宪”之举，弥天大罪啊！

这些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风险所立下的这份保证书，如今庄严地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中国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和当年中国农村那段不平凡岁月的见证，理所当然地永远值得珍视。

纸里包不住火，小岗队分田到户的事不久便被公社领导人知道了。

在一次生产队长会上，公社书记发火吼到：“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怎么样？还不是活活折腾死了！你小岗尿得再高，还能有刘少奇的本事么?!”后来又硬性叫他们并到组里干，不干就不发给种子、化肥、耕牛和贷款。

在当时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决定，也怪不得那位公社书记。

压力面前小岗人死活不并组，铁了心包产到户。事情僵持了好长时间，春耕生产受到了影响。

1979年4月初，县委第一书记陈庭元到小岗检查工作，公社干部向他汇报了小岗群众自发"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陈庭元与公社干部一同到小岗了解情况以后却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有两千多个队，就算这一个是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已经分到户了，就先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就这样，小岗队的包干到户得以幸存。

感谢这位深明大义、体察民情、了解民心的县委书记，为小岗人点燃的火种，撑起了不可多得的保护之伞，使它得以度过最初的难关。

多少年以后，严宏昌提起这件事时还说："当时考虑，如果是公开地干起来，肯定干不成。所以，我们要保住这条秘密，要瞒上不瞒下。"关键是"不声不响地把生产搞起来"，用事实说明问题。

大彻大悟的小岗人，干得聪明。

现在看来，一"包"就灵，"包"字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关键是它牵动了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即从抽象的天堂退到了现实的大地。

万里在安徽搞农村改革，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抓住了"联产计酬"这个根本问题。

根据万里的意见，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经过调查研究，写了一篇题为《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的评述性报道，先在新华社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为"联产计酬"制造舆论。

1979年初，这篇报道经过修改，准备公开发表。对此，万里特别重视。他拿着这篇送审稿，请了许多有关方面人士讨论研究，

征求意见。他还向张广友介绍了李瑞环的情况，说李瑞环哲学学得好，理论水平高，又是农村出来的，对农业和农民的情况比较熟悉，稿子可以请他看看。

李瑞环看过之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表示支持和赞同。

经过认真修改，把“包产到户”这四个犯忌的字眼，改成了“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联产计酬，责任到人”。《人民日报》3月7日公开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这篇文章实际上已经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积极性和合理性。对于冲破“禁区”，大胆实践，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的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1979年初，万里派周曰礼带领省农委机关12名干部到肥西县宣讲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2月1日，周曰礼等人来到山南公社，在原原本本宣讲文件之后，发动群众展开了热烈讨论。他对乡亲们说：“有什么讲什么，把心里话统统倒出来。”

大伙七嘴八舌地表达了对实行包产到户的强烈愿望。

群众说：“早也盼，晚也盼，盼到现在搞了两个不许干。”纷纷要求中央在修改文件时，取消“两个不许”，允许包产到户。

大家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办法，不仅群众要求，党员要求，强劳力要求，而且干部要求，弱劳力和五保户也要求。甚至是到了苦苦哀求的程度。

2月4日晚，周曰礼赶回合肥，第二天向万里作了口头汇报。万里说：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省委要专门召开会议讨论。

2月6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周曰礼向常委们汇报了山南的情况。

会上有人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办法，但是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两个不许”，如果突破这个框框，就得向中央请示。

王光宇是一位老资格的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表态同意搞包产到户。他认为60年代初的"责任田"就是这种办法，农民都很怀念。"救命田"，至少在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可以先行。

万里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致使一些人谈包色变，心有余悸。但是，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这说明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接着，万里明确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并风趣地说：包产到户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即使是滑下去也没有什么可怕，把它拉回来就是了。

对万里的意见，顾卓新、赵守一等省委领导人以及出席会议的常委均表示赞同。

当天晚上，周曰礼带着省委常委会的意见，立即赶回山南公社。第二天，就向社队干部传达了万里和其他省委领导人的意见。干部群众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无不欢欣鼓舞。

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山南区的6个公社，在四五天内普遍干开了包产到户，而且很快席卷整个肥西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40%。

在此期间，周曰礼曾几次向万里汇报了包产到户迅猛发展的情况。毕竟是有违"政策"的事情，他难免有些担心。

但是，万里却很沉得住气。他镇定自若地说：不要怕，让他们搞。山南区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山南；肥西县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肥西。

有万里的支持，全省有16个县很快也干开了包产到户，并大

有覆盖全省之势。那阵势真是安徽一方热土好个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江淮大地蓬勃兴起改革热潮之际，《人民日报》1979 年 3 月 15 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一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读者来信。作者是甘肃省档案局的张浩。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这封读者来信又给苦斗中的人们迎头泼了一盆冰水。

信中写道：最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听到一些有关“包产到组”的情况。“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下一步还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张借群众之口说这不是中央精神而是“土办法”，很不理解“上头”为什么要让这样干。他在信中分析道：“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在很多地方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作业组只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像上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组，已不是作业组，而有点像核算单位了。现在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充分稳定，不能随便变更。”

张浩着重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那些干部、群众的怀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日报》在转发这封来信时加了编者按。指出：

> 要继续稳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

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在同日头版报纸编排的内容中,以醒目的标题介绍了吉林省怀德县南成子公社党委"纠正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错误作法"的经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认为,南成子的经验说明,"只要群众真正了解了中央精神,都不会同意以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做法。"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显要位置刊登张浩来信并加了编者按,其影响之深和波及面之广是不难想见的。

张浩的来信发表后,迅速在全国刮起了"纠偏风"。什么"坚决抵制单干风!""坚决反对复辟倒退!""坚决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流毒!"……种种"纠偏"的大标语又上了田头、岗坡、村头、路口。有的省甚至准备了十几个版面,十几篇评论,准备对安徽的包产到户"打排炮"。

一时间,风云四起,人们议论纷纷。对于来自党报的声音,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它的来头和指向。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对当时各地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冲击。已经实行包产到组或包产到户的社队情绪紧张,有的等待纠正,有的准备挨整。一些地方的群众思想混乱。许多农民停犁搁耙不干活——害怕白干了,有的找队干部报撤在地里的化肥帐,有的声称饿死也不回到归大堆的老路。

为了制止这种混乱,洛阳地委从3月18日至20日召开了各县、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仍然决定稳定现有做法。有人当场作了一首打油诗:"《人民日报》太荒唐,张浩不写好文章。一瓢冷水泼洛阳,混淆政策理不当。"以表达对张浩来信的强烈义愤。

四川省则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和奖惩问题的通知》,肯定"分组作业、定工定产、超产奖励"的做

法是克服平均主义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好办法，要求继续坚决贯彻执行。《通知》还特别指出，对于个别地方出现的搞包产到户的偏向，不要沿用过去“反右倾倒退”的办法加以批判；对于已经把作业组搞成一级核算单位的，而群众不同意改变的，也不要马上去纠正，允许暂搞一年。

对张浩来信反应最敏感、最强烈的，当数实行包产到户比较早、比较多的安徽省滁县地区。3月15日，来信发表的当天，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正在嘉山县，吃早饭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后，感到问题很严重。当天上午即从嘉山赶回滁县地委，并要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起草一个电话通知。通知指出：春耕大忙已经开始，各种生产责任制，不论是什么形式，一律不要变动，到秋后看实际效果如何再定。如果有什么问题，由地委领导负责。各县委要积极做好群众思想工作，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

各县委接到通知后，都表示同意地委意见，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坚决不变。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在县常委会上激动地说：“我是王小二开猪圈，一心门朝南，坚决不变。现在纠偏，后果不堪设想。凤阳不能再折腾了，也没有时间再争论了，群众的积极性刚焕发出来，你们只管干，出了问题由县委负责。如果追究责任，就说是我陈庭元让你们干的！”

嘉山县委书记贾成志也义正词严地说：“刀压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了！”地县委领导人的态度虽然坚决，但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仍然感到心中没底，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毕竟还是“大官”说话才算数。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就在滁县干部群众焦急万分的关键时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于3月16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

张浩来信的次日，来到了滁县地区全椒县古河区。

刚一下车，万里便被愁眉苦脸的县委领导人和当地群众围住了，要他给拿主意。万里对这个场面也感到吃惊，面对忐忑不安的干部和群众，他语重心长地劝慰和解释道："甘肃档案局那位读者来信，我是从一个内部材料上见到的。只是反映了'包产到组'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日报》批评的那些问题是支流，不要怕，搞一年再说。"

县委领导人仍惴惴不安地说："《人民日报》编者按说，'包产到组'是'错误做法'，要'坚决纠正'。"

万里回答说："什么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能叫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适应生产力发展，叫农业上得快就是好办法，反之，就是孬办法。谁吹这个风那个风，我们也不动摇。肥西县有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怎么办？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动了，一动就乱。"

县委领导人还是担心《人民日报》来头太大，怕将来招架不住。万里有些激动地说：那不是同"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来电"一样了吗？一听说"北京来电"就不得了，这怎么行呢？我们要尊重农民的选择。管他《人民日报》怎么说呢，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吃饭吗？再说《人民日报》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挤，我也可以挤！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还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就打退堂鼓，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万里当时的压力也很大。说实话，在那种情况下，不表态就算是支持了。

当天，万里就在滁县地区挂长途电话给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汇报说："我们已经干开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保护群众的

积极性。备个案，搞错了省委检查。”王任重说：“既然省委做了决定，可以干嘛！”

接着，万里又到了来安、天长、嘉山、定远等县，一路做工作，稳定干部群众思想情绪。并以省委名义及时发出了8条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春耕生产。同时，又指示省农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应答那封读者来信的责难。经过努力，全省绝大多数地方干部群众的思想得到稳定。

张浩来信引起的风波如此之大，其背景值得一提。张浩是河南省伊川县鸦岭公社黑羊大队人，在甘肃工作。他在回伊川探亲时正遇上当地搞作业组建立责任制。他仅凭与该队队长张振标等人的随便交谈就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并把问题扩大为“洛阳地区不少社队”。尽管张的来信内容难言属实，但他写信的时机却很重要。

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有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7省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3个县委负责人参加的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会上围绕着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多数人认为，包产到户否定了统一经营，本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

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在会上介绍了安徽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情况，认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责任制都应当允许存在，由群众自己在实践中加以鉴别和选择。

周曰礼在会上斗胆发言，为包产到户积极辩护，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国家农委为座谈会起草了会议纪要草稿，关于责任制部分，杜润生要周曰礼按照自己的观点另外起草一个稿子，准备向华国锋

汇报。

3月20日下午，华国锋接见会议代表时，开始由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接着由李友九宣读会议纪要草稿，周曰礼也宣读了他起草的稿子。周曰礼关于包产到户的看法令华国锋很不满。当即要王任重打电话问万里："安徽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会上谈的情况，省委是否知道？"万里答道："周曰礼同志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他的发言完全可以代表省委的意见。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等秋后再说。"华国锋见万里表态这么坚决，只好暂时作罢。

张浩的来信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由中央一位主管农业的领导人批给《人民日报》见报的。

稿件发出之后，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利用新闻舆论支持会议上的一种观点，压另一种观点。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对此做法也觉得不妥。她说：这封来信不该登，更不该加"编者按"。建议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的读者来信，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信中尖锐地批评了"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指出那封信和编者按"在我们这里造成了混乱。已经搞了以组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干部和群众，担心又要挨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政策有变化的人，现在疑虑更大了。有的人看到报纸好像找到了新论据，把联系产量责任制说得一无是处。""从安徽各地实践情况来看，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评定奖惩的责任制，效果很好。""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做法'，要'坚决纠正'呢？为什么一提起'包'字就担心害怕呢？在'四人帮'横行时，'包'字被视若洪水猛兽，不仅不准包产到组，就连小段包工也被批判。'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但余毒未

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马上就要瓦解了，这种看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是有鉴别力的，只能划个大杠杠，不能硬要群众采用这种办法，而不能采用另一种办法。”

《人民日报》为这封读者来信同样加了“编者按”，指出3月15日发表的读者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包工到组、联系产量是一种新的计酬办法，在试行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只要坚持生产队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这个前提，不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就可以试行。”这样一来，双方似乎打了个平手。然而，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

在当时，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人中，支持安徽的屈指可数。省委书记中，有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广东的任仲夷等。反对最坚决的是江、浙一带，这大概是害怕“近墨者黑”的原因。中央各部委中，也有反对得很厉害的。这也难怪，十多年的“学大寨”运动在农业战线已成了一种深固难移的思维方式。更何况搞包产到户，既“违宪”又“违法”，反对者自然都觉得理直气壮。

多年来都把农民当作小生产自发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对群众的要求和创造反应冷漠，动不动就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这种做法，万里是不赞成的。

万里主张“要正确对待农民”，这实际上就是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只有着眼于八亿农民的利益，社会主义才有吸引力。他认为：“无产阶级是因为受穷才革命，所以革命不是为了受穷；如果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嘛？老是吃不饱饭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优越性，最终必将被人民所抛弃。”

从这个意义上说，包产到户不仅救了中国，而且也救了社会主义。只不过在当时，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很多。

大约在3000多年前，希腊帕尔纲索斯山南坡的戴尔波伊神托所的入口处，镌刻了一句神奇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这句话表达了人们想了解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一旦我们真正了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旦我们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地尊重农民和农民的首创精神，广袤的田野就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

## 6—4　江淮大地"包产到戶"一波三折<br>天府之国"休养生息"成效显著

耕耘土地，

收获理想。

然而，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与发展，必定都是顶着压力、迎着风浪前进的。

在包产到户面临严峻考验的那些个日日夜夜，万里心系一方热土，始终坚信和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

1979年5月21日，万里驱车直奔肥西县山南公社。山南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是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态支持的。此前的"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批包产到组，在安徽引起强烈震荡，作为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山南，现在的情况怎样？这是挂在万里心头的一件大事。

一路上，只见麦浪滚滚，油菜结籽累累，农民们已经开镰收割，一派丰收景象。万里一行都很惬意。

在山南公社，万里与公社书记王立恒的谈话使他对山南的情况有了切实的了解。

当时由于张浩来信的影响，反对包产到户的声浪愈来愈高，社队基层干部有些顶不住了，他们十分盼望万里给拿个主意。

万里问王立恒："搞包产到户，你怕不怕？"

"是有点怕！"王立恒答道。

"不要怕，在你们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我是点过头的！"万里先是表明态度，然后关切地问王立恒："你到底怕什么？"

"怕'五统一'统不起来。"王立恒回答说。

"搞错了，不要你负责！不过，可要注意，集体财产不能瓦解，不能分掉！"万里的表态令王立恒深受鼓舞。他表示：这些问题，我们都有明确规章和具体措施，决不准侵犯集体利益。

万里听罢，点点头说："这我就放心了！"

午饭后，万里又来到馆西大队小井生产队。老百姓一听说万书记来了，立刻沸腾起来。大伙扔下手中的活计，赶回去见万书记，希望听听万书记对包产到户的看法，更希望向万书记反映自己心中的意愿。

万里同群众直接进行对话，第一个发言的是小井生产队会计李计忠："万书记，上边（指中央）可允许包产到户？"

"大胆地干吧，省委支持你们！"万里果断地回答。

"我们有点怕！"群众说。

"怕什么？"万里问。

"怕变！"群众异口同声地说。

"不会变！"万里肯定地回答。

"包产到户比'大呼隆'好，多干几年就有吃的了！"群众说。

"那你们就多干几年嘛！"万里鼓励大家。

"万书记，你能不能给我们个准话，到底能干几年？"几个群众一齐说道。

“不放心?”万里一笑,群众也笑了。“你们就这样干,包产到户想干多少年就干多少年!不过仓库、牛棚等所有的公共设施,公共财产要保护好,不能破坏集体经济!包产到户的目的是为了增产,让群众吃饱吃好!”

这时,大汗淋漓的山南区委书记赶来了,他是被人叫来的。万里热情地同他握手说:你的工作搞得不错!山南区这么短的时间,全部搞了包产到户,这么一件大事,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很不容易;集体财产保护好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上来了,形势会越来越好。

群雁高飞头雁领,有一个好的主心骨,群众也就放心了。

万里这次山南之行,对山南和肥西的干部群众,对于那些在农村改革中勇敢探索的人们,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5月25日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万里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旗帜鲜明地提出:“政策上再也不能失信于民”。他指出:农民为什么要包产到户,这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对极左错误的反抗。我们千万不能失信于民,过去的规定都要兑现,即使错了也不要埋怨。包到户的先干一年,秋后再说。说了话要算数,只有算数才会得到群众信任。

6月5日,万里来到定远县藕塘区和凤阳县进行调查。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万里汇报了凤阳实行“大包干”的情况。

万里问:“什么是大包干?”

陈庭元答:“大包干是凤阳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把它的主要内容简单概括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现在凤阳实行大包干的已占总农户的80%以上。”

“实行大包干的效果如何?”万里又问。

陈庭元说: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有个顺口溜:“大包干,就

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了这个老百姓编的顺口溜，高兴地笑了。他当即果断地对陈庭元说：“那好！我就批准你们干三五年！”

当陈庭元汇报说全县干部农民都热衷于搞大包干，但又存在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时，万里坚定地说：“错不了。错了我负责！问题就是看你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社员能不能富起来。”

陈庭元又说：“现在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

万里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只要能增产，五级核算也可以。每家都核算才好呢！就怕不核算，不核算，平均主义，糟糕得很。”

万里此行，为凤阳县委实行“大包干”撑了腰、壮了胆，更加激发了凤阳人把农村经济搞上去的积极性。

万里回到省城后，于6月25日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等3人，会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2人，去凤阳总结经验。在省、地有关领导人的帮助下，凤阳县“大包干”的政策冲破重重禁区，逐步条理化和理论化。1979年8月8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文章发表后，在安徽乃至在全国，凤阳的名声大振，凤阳人历经艰辛创造的奇迹和成就迅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春华秋实。“大包干”的推行给凤阳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还是那块古老贫瘠的土地，如今却在获得生产自主权的农民手中变成了取之不尽的聚宝盆。

就拿小岗生产队来说，1979年全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是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就未向国家贡献过一斤粮食的“三

靠队”,1979年包干到户后便创下了几个第一:第一次向国家贡献粮食6.5万斤,油料2万斤;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第一次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社员收入更是大大增加。据统计,1979年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万多元,人均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可达5000多元,平均每人可达700多元。最差的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250元左右。

农业丰收,庄稼人笑逐颜开,昔日的愁容阴云看不见了,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那种欢天喜地、扬眉吐气的神态,给到访的客人留下深刻印象。

过去队里仓库的粮食也不如现在一户农民家里的粮食多。过去收割季节,到处防偷窃,看场的看场,看田的看田,结果还是免不了丢这少那。如今,那么多花生拔后都晒在田里,那么多山芋干都抛散在荒野上,从未发现有谁家说东西少了。成片的柿园结满了柿子,没人去摘。衣食足,知荣辱。如今日子好过了,这些东西也就不稀罕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就是这么明白。

一年下来就收了这么多粮食,人们的生活竟得到了如此大的改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小岗人终于扔掉了讨饭棍,天天吃细粮,还为国家做了贡献。这些朴实善良的庄户人打心眼里感到踏实、舒坦!他们说:大呼隆干了20年,越干越穷,什么“绝招”都用过了,就是治不好我们的“穷病”,包干到户一年就治好了。真是千条计,万条策,不如“到户”一剂药。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拥护,我们赞成!

在包产到户的试点山南区,同样传来丰收的喜讯,仅夏季大小麦总产量就达1005万公斤,比1978年增产了两倍。特别是那个上了“内参片”的凤阳县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不仅获得了大丰收,而且也是多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6700斤小麦。

"要吃米，找万里！"这句朴素的语言由衷地道出了安徽农民的心声。

四川省的情况同样令人鼓舞。在四川农村改革的试点——广汉县，虽然 1979 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食总产比丰收的 1978 年增加 5%，达到 5.22 亿斤；油菜籽总产和单产则比上年增长一成以上。

就四川全省的情况而言，由于省委坚持执行"休养生息"方针，大力推广以包工包产到作业组为重点的生产责任制，为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生产提供了机会和条件。1979 年，四川粮食总产在遭受多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然创造了 620 多亿斤的新记录，比上年增加 12 亿斤，比 1976 年增加 127 亿斤。与 1976 年相比，棉花增长 30%，油料增长 79%，甘蔗增长 94%，蚕茧增长 75%，生猪增长 26%……出现了五谷丰登、五业兴旺的良好势头。过去四川是凭票供应猪肉，而现在是凭票收购生猪。虽然全省猪肉实行敞开供应，但因生猪发展太快，供大于求，全省大小冷库均处于"饱和"状态，导致农民卖猪难。农民为卖猪难而发愁当然不是好事，但从这件事所反映出的农村经济的深刻变化，对比过去那种"食无肉"的情景，或许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四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从省委推行的"休养生息"方针中，看到了解决温饱的希望。

安徽、四川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他们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包产到户的做法，却与当时中央的正式文件精神相抵触。1979 年 9 月 28 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改革肯定是要冒风险的，改革

每前进一步都是十分艰难的。

就在山南农民为喜获丰收而欢欣鼓舞，肥西农民纷纷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肥西县委突然作出了强制收回包产田的决定。

7月16日，县委的指示传到山南。明文规定要"纠正包产到户"，要把山南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末了，还特别强调："山南区委一定要认真执行县委的决定。"

7月20日，"转弯子"的学习班正式开学。参加学习班的是山南区的党员和干部。在学习班上，有人给包产到户开列了十二条罪状："群众生分了(指矛盾纠纷)；人心散了；班子瘫了；大块田分小了；科学种田停掉了；耕牛累死了；农具毁掉了；机器卖掉了；公房扒掉了；公活没人干了；教育质量下降了；贫富拉大了。

这一打"帽子"，随便戴上哪一顶都是足够沉的。

但是，山南的干部群众坚决抵制收回包产田，压力面前不屈服，泰山压顶不弯腰。

他们说："千条万条，增产不增产、群众拥护不拥护是最根本的一条。"

有的还质问县委："听不听省委的？山南包产到户试点是省里同意了的，你县委为什么要纠正？你县委不听省委的，我们就不听你县委的！"

还有的人问县委："国家要不要粮食？难道增产粮食犯法？难道农民就应当永远吃不饱饭？"

曾被认为是逆来顺受的农民群众，为了生存终于再也不能沉默了。

双方僵持不下，争论处于胶着状态。

县委一些领导人对群众出乎意料的强烈抵制非常恼火，他们上纲上线地提出：

“这是方向道路问题”。

“中央文件上明令规定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

“不管是谁，都得服从中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绝对不允许的！”

可是，山南的干部群众就是不买帐。学习班办了五六天，“弯子”非但没转过来，对立情绪反倒日见高涨。

就在这情况危急之际，《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郭崇毅先后来到肥西和山南。他们经过实地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为山南的包产到户鼓劲宣传。

8月初，省农村政策研究室领导人分别收到了汪言海和郭崇毅的报告，他们对此表示支持，并立即转报省委领导人。

此时，万里刚刚访问美国归来，闻知此事迅即召开常委会。在8月3日的会上，万里充分肯定了汪、郭的报告，指出山南的包产到户试点是省委决定的，如果有什么错误应由他承担；肥西县委强制收回包产田是错误的，应立即改正。

省委常委经过讨论作出决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制收回包产田。

8月5日，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王光宇和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亲自来到肥西，传达省委指示。由于省委的坚决支持，山南区燃起的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才没有被扑灭。

与此同时，汪、郭二人还冒着很大的风险，分别向中央新闻单位写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内部报道。《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分别于9月初发表了他们的报道。

经过一番风雨，安徽的农村形势更好了。全省28.9万多个生产队，只有0.5%的队没有建立责任制；实行不联产责任制的队占38.4%；实行联产责任制的队占61.1%。其中，包产到组的占22.

9%;大包干到组的占16.9%,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占10%;采取其他联产形式的占11.3%。

秋后的形势虽使农民看到了希望。但是,一波三折的包产到户此时又起争端。

1979年10月,国务院的一位副部长来到了山南。他似乎对空前的大丰收不感兴趣,甩开区委专门找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作调查,搜集了"包产到户"九大问题的"反面材料"。他当面指责区委书记汤茂林,说山南的做法性质变了,水的问题、烈军属问题、困难户的问题很突出,这样下去,集体经济越来越弱。汤茂林据理反驳,这位副部长悻悻而去。

这时万里所受的压力也不轻——来自上边的、下边的和省党政军机关内部的……

1979年12月1日,万里在中共安徽省军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的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分析了包产到户的性质及作用,对包产到户的是是非非作了科学的辨析。但仍有一些同志对此不能理解和接受。有人问万里:"军队大多数干部和士兵家在农村,如果都'包产到户',让土地拴住心,谁还当兵?谁还带兵?还不都跑去种地?"有人说,包产到户"军心动摇,长城不稳!""这是关系到国防建设的原则问题!"

还有人说,包产到户搞得合钢(合肥钢铁公司)工人都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

各种质疑一股脑儿袭向万里。万里没有立即作答,但他十分重视这些提出的问题。

12月13日,万里再赴山南搞调研。这一次,他是带着社会上对包产到户提出的问题,请教山南的干部和群众。

万里问汤茂林：部队有同志反映，你们在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乱军心”、“毁我长城”，有没有这个问题？

汤茂林回答：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山南区有现役军人 14 人，区委一一给他们去信介绍家乡搞包产到户后，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对军烈属予以照顾，除分配兑现外，每年另外照顾现金 150～200 元。

万里一听，说：好！这分明是在拥军优属，巩固长城嘛。

万里又问：合钢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汤答道：也不是这种情况！刘老家大队有一位工人家属叫熊祖华，一人带 4 个小孩，没搞包产到户以前，每年收入 150 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 420 斤，超产 1650 斤，还养了一头 200 多斤重的大肥猪和 7 只鹅。过去每年超支，今年没有超支。万里乐了，说：那不是工人要回乡，而是要双工资喽！生活水平比去年提高了很多。

接着万里又向汤茂林提出了 4 个问题：烈军属和五保户、困难户没人管了怎么办？如何解决破坏水利设施的问题？耕牛、农具，怎么保护好？穷队包产到户之后，能不能取得丰硕成果？汤茂林都逐一用事实作出了令万里满意的回答。

事实胜于雄辩。万里高兴地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看来怕这怕那都是不必要的。外界传的，有些根本不是问题，有些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关键在领导。”这次山南之行使万里更加坚定了农村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经过一番风风雨雨，包产到户逐步走向成熟。起初的那只“丑小鸭”，出落得愈来愈可爱，为它正名的条件也日趋成熟。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万里和安徽的干部群众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其间所遭受的冷眼、非议、指责、攻击和压力，更是难以言表。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凭着对生存和理想的执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安徽人豁出去了。

## 6—5　包产到戶"落戶"<br>人民公社摘牌

人民公社好。一曰大,二曰公。

为了架设这座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曾让多少人为之魂牵梦绕、如醉如狂,又令多少人为之忧心如焚、肝胆俱裂……

20年后回首:原本准备走进一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可是,要让吃惯了"大锅饭"的人省悟这条哲理亦并非朝夕之功。

1979年,安徽省粮食产量达到320亿斤,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有4个地区和21个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而没有实行责任制的霍邱县却大减产,但该县的周集区搞了包产到户,倒增了产。这个简单的事实充分说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合现阶段中国广大农村实际的最佳经营管理形式。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思维定势却不愿接受包产到户的积极意义。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仍然在一部分人当中很有市场。说到底,还是姓"资"与姓"社"的敏感问题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1980年1月,安徽省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会上对包产到户的争论相当激烈。主张把包产到户搞下去的地区有滁县、宣城和六安。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就正式提出,要

承认包产到户也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要求为包产到户报个“户口”。而安庆、合肥、芜湖和阜阳等地却不主张搞。宿县地委的一位负责人对包产到户更是深恶痛绝，他痛哭流涕地说：“这哪像社会主义！毛主席他老人家辛辛苦苦几十年，我们呢？一步退到‘解放前’。”“那些从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走过来的同志，感情上很难转过弯来。”

对此，万里在会上作了《要敢于改革农业》的长篇讲话，明确肯定：包产到户不是单干，而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他语重心长地向与会者敞开了心扉：“为什么包产到户，在安徽引起这么大的舆论呀！我们顶了多少年，我来的时候就顶了，开始制定《六条》反映就来了，给我扣帽子，了不得呀！有些善良的人，叫我不要犯错误，这是心有余悸。有人说，再坐喷气式，受不了！我60岁了。包字是个好东西，凤阳的大包干，火车上的三八包乘组，这是中国一种土的说法，不要怕这个包字！在那些长期经济落后、集体经济搞不好，极左思潮干扰严重，群众生活一直非常贫困的情况下，群众习惯于小农经济，这有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包产到户’并不是我们主张，问题是已经有了，已经生了孩子，他妈妈挺高兴，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许多人去看了都热烘烘的，回来以后就凉了半截。为什么呢？不合法，要批判呀！‘包产到户’没有什么可怕！我们的根本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苦苦哀求：‘让我们干两年好不好啊！’。同志，批准！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责难那么多？我是不同意这种意见的。”万里代表省委为包产到户落了“户”，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意愿和心声。

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体现。万里的讲话，正是体现了一个敢于坚持真理，

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这次会议后,以"包产到户"为主体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走出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的秘密状态,正大光明地在安徽公开推行。这股被广大农民视为第二次解放的强劲之风,吹遍了淮河两岸,并向全国各地延伸扩展。

1980年2月,万里调任国家农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跻身中南海,表明中央对安徽农村改革的重视和肯定,为推进安徽以至全国的农村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包产到户"落户"之初,争论仍很激烈。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他们代表安徽省作了题为《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言,介绍了安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

此前,周曰礼曾几次在这种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上"放炮",与"大寨经验"唱反调,所以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周大胆。可周曰礼认为,要破"左",搞改革,胆子就是要大。

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发言中,周曰礼用大量数据和例证,热情讴歌了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他尖锐地指出:"这些年来,农民看到的只是极左路线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在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发展农业号召时,农民群众对生产队集体生产没有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办法多收粮食。""这种包产到户形式的出现,正是极左路线逼出来的,是对极左路线的反动。""周大胆"还明确提出:停止"农业学大寨"运动。

周曰礼和陆子修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资"还是姓"社",符不符合中央政策规

定？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与社会主义不沾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认为包产到户调动的是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如不坚决制止，放任自流，人心一散，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丢了。中央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宪法》也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包产到户既违反了中央规定，也违反了《宪法》规定。

这次会议，除了少数省的代表和一些新闻单位、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表示支持安徽的意见外，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当时国家农委的领导人绝大部分表示要按现行中央文件办，实际上站在反对方的一边。

1 月 31 日下午 3 时，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参加听取汇报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各省、市、自治区农委的负责人也参加了汇报会。

会上，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汇报了会议情况。华国锋在听取汇报后讲了话。关于生产责任制问题，他除了重复 1979 年七省座谈会的观点外，特别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华国锋的讲话有着明显的倾向性。

邓小平在最后讲了话。他首先申明：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尽管万里曾向他汇报过安徽大包干的情况，他也表示支持安徽搞试验。但此时表态，也许火候还不到。讲究谋略的邓小平选择了一个与之相关的话题。

他说：我们在本世纪要达到小康水平，每个人收入 1000 美元。“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一千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

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一席话，旁敲侧击，发人深思。邓小平的倾向性也是不难分辨的。

周曰礼等回到安徽后，向万里汇报了会议情况。当时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刚结束，为了稳定人心，避免引起思想混乱，决定不传达全国农经管理会议的精神。在全省农业会议上，周曰礼起草的讲话稿曾遭到一些与会者的反对，甚至提出要改组写作班子，周曰礼这班人不能参加大会讲话的起草工作。万里否定这种意见，并对周曰礼原稿中最核心的内容加以肯定。

这次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刚结束，万里便奉调回到北京。就在此时，出现了一股公开批判包产到户的潮流。

1980年2月出版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的文章，并配发了很长一段编者按。

《农村工作通讯》是5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创办的一家面向全国很有影响的杂志。“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停刊。1979年国家农委决定从1980年1月复刊。

复刊前，这家杂志社的主要领导人曾到安徽滁县地委组织稿件。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曾陪同他到苏皖两省交界处的来安县龙山公社刘郢生产队实地调查。这个队与江苏的竹镇公社下湖生产队紧密相连，两村之间只隔一条小沟。这位领导人在考察了刘郢生产队和下湖生产队的情况后，感慨很深，对包产到户与大呼隆的优劣和反差有了实际的了解。当即邀请地委领导人和新华社驻安徽记者各写一篇稿件，介绍农业联产计酬的情况。

当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按规定时间于11月下旬专程进京送稿件时，前去组稿的杂志社负责人却突然变了卦，对陆子修等人避而不见。

蒙在鼓里的陆子修等人吃了个“闭门羹”，百思不得其解。他们

哪里知道这家杂志根据上级领导人的意见，正在组织稿件对安徽进行批判。果然没过多久，就推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这篇文章的口气很严厉，指责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违背了党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文章抓住芜湖地区在包产到户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猛烈的批判。声称要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

在编者按中，拉开一副很有来头的架式责问安徽，“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倒退为分田单干？”“把集体的耕地全部包到户，由户自筹生产费用，自负盈亏，到底还有多少统一经营的因素，统一分配是否已经流为形式，还算不算是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

文中还提醒人们注意：“这样全盘包产到户，固然调动了个体积极性，但对农业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改革，有些什么妨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弦外之音，就是要上纲上线地深究细查，把包产到户扼杀在摇篮中。

当惶惑不安的安徽人还没有缓过劲来之际，这家杂志又推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在杂志的第三期上发表了《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与上次一样，编辑部在文章前面又加了编者按。

文章的锋芒所指很具体、很明确，就是针对万里在安徽省农业会议上讲的“包产到户不是单干，而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而提出质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本质退为单干？”

如此气粗，显然是有后台撑腰的。为了组织围攻包产到户，这家杂志还以“大家谈”的名义，借他人之口发表对包产到户的否定意见，而对支持赞同包产到户者则不在其列。

此外,《农村工作通讯》还组织了一些农村经济界权威人士的文章,用《宪法》上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向包产到户施加压力。

又是一阵"左"风起,两种观点的较量到了紧要关头。

万里首先跟陈云商量。那是在1980年春,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上,陈云在主席团。休息时,万里见到陈云便说:安徽的包产到户已经搞起来了,怎么办?陈云合掌抱拳,高兴地说:我双手赞成!

胡耀邦也是支持包产到户的,1979年他讲"要吃米,找万里",就是个公开表态。

此时,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刚刚召开,这对于万里推进农村改革,回击责难和非议,也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万里在看过《农村工作通讯》的文章后,当即指示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和吴象针对文章内容,不点名地进行反驳。很快,张广友和吴象就拿出了一篇题为《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的长文。万里审阅文章清样后,建议用安徽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在《安徽日报》上发表。

应当说,以原省委第一书记或以副总理和国家农委主任的身份,要安徽省委农工部发这篇文章都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事情的结果却偏偏出人意料。没过几天,安徽省委就明确电告作者:省委农工部对稿件有不同看法,不同意用省委农工部的名义,也不同意在《安徽日报》上发表。

万里才走了几天,安徽的情况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足见争论的复杂和艰难。看来,不下大功夫是不解决问题的了。

就在这时,《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看到了这篇文章的清样,对文章很是赞赏。他对两位作者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以你们两位署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过,文责自负。"

两位作者将情况向万里作了报告，既然安徽有不同意见，也只好换一种方式来回答《农村工作通讯》的责难了。

4月9日，该文在《人民日报》二版全文发表。着重强调要全面正确理解中央文件的精神实质，有理有据地回答了那家杂志所提出的问题。

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对维护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而且也有力地回击了反对者的挑战。

在此期间，万里多次向邓小平汇报了安徽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关于包产到户引起的争论。

当时全国各地的报刊也发表了一批支持或反对包产到户的文章。总的说来，由于包产到户尚未正名，又有"抗上"和"违宪"的压力，所以支持者小心谨慎，反对者振振有词。

一些认识不同、身居高位的人，依仗手中的权势，对主张包产到户的人进行上纲上线地斥责，大帽子满天飞，大有秋后算帐之势。在这种氛围下，当初赞成和推行包产到户的人处境艰难，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对司机老苏说："我老周要是坐牢，烦你送牢饭。"争论的尖锐性，由此可见一斑。

正当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时候，邓小平站出来说话了。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时说：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并要求万里研究一个意见，提交书记处讨论。

4月中旬，关心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万里让张广友和吴象到

安徽农村了解情况。他们发现，包产到户在安徽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尽管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但省地县的某些领导人坚决反对。在基层，一些持反对意见的干部说：搞包产到户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还说什么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

有的人甚至说包产到户"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有的干部不是从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出发，而是考虑个人的"乌纱帽"，患得患失，于是提出什么"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

4月下旬，省委在芜湖召开南三区(即：安徽省长江以南的芜湖、徽州、贵池三个地区)地市委书记碰头会。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就对张广友和吴象在4月9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文章提出指责，这些自称政治嗅觉很灵敏的人责问道：春耕大忙期间发这么大块文章，啥意思?!

有一位领导人更是摆出一副威严正统的架式，把包产到户说成是搞"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工团主义"。他认为："不论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一种痛心的说法。并以威胁的口吻说道："现在，文风不正，有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强词夺理，硬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帐!"此话一出，四座皆惊，弄得气氛相当紧张。

这位领导人的讲话分明是冲着在场的吴象和张广友来的，只是没有点名罢了。此前，省委在蚌埠召开与之类似的北四区会议上，也有人给包产到户扣帽子，将包产到户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机会主义相提并论，讽刺这是为了一个"戈比"而斗争的行为。

种种迹象表明，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已经进入了至关重要的决战阶段。在这个关系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已不容

许模棱两可，必须坚定不移地冲破阻力和障碍，为包产到户摇旗呐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是非曲直。

5月27日至30日，由吴象和张广友撰写的8篇共2.2万余字的系列内部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连续刊出。这组报道每天早晨即送邓小平等在京政治局委员。这个系列报道以生动翔实的资料反映了包产到户给安徽农业生产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从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视角，正确地说明了包产到户的性质和作用。

事实胜于雄辩，报道所反映的情况向人们证明了包产到户的优越性。

安徽省来安县姜庙大队小店生产队社员姜泽如的妻子说：她从18岁嫁到小店，21年来没有一年不讨饭，直到实行包产到户后，才丢掉了讨饭棍。

玉明公社有一个叫叶旗衡的社员，过去年年粮食不够吃，年年欠账。1979年他家4口人包种10亩地，净得粮4000多斤，除了自己用，还卖了一部分，借出一部分。为此，他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借新账还旧账账账不清；

吃一斤买一斤斤斤不断。

横批：已经过去

安徽省1979年收购粮食80亿斤，比历史上最高的1976年多17.7%。以前农民担心的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现在农民关心的是国家收不收购议购粮的问题。在偏僻的地方，粮价还低于国家定价。曾被视为"贵重物品"的粮票，在一些地方也失去了意义。肥西县山南公社集市上的大米不收粮票才0.22元一斤，比北京市的国家供应价还要便宜。

群众说，包产到户好，好就好在一是增加了收入，日子过得好，

饭也能吃饱;二是"自由了",再不用过那种"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生活了。如今种啥、吃啥、干啥、穿啥……都有了"自由",把本该属于他们的生活还给了他们,因此,他们举双手赞成包产到户。

当初那些在苏皖边界上架起高音喇叭声讨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江苏社队,也对近邻安徽的巨大变化大为羡慕。他们说:"上江(江苏称安徽)快活得腚沟沟都流油了!"姑娘纷纷往安徽嫁,群众更埋怨当初他们的领导者没有让他们搞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大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当它逐渐被农民所认识并变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时,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便出现在神州大地。

1980年4月,正当安徽干部群众为包产到户而努力抗争之际,西南的四川传出了一个令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震动的爆炸性新闻:

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被"一分为三",成立了乡党委、乡政府和乡农工商总公司。挂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大牌子被人卸下,此举无情地宣告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大锅饭体制行将寿终正寝。

这是个胆大包天的行动。

谁不知道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晚年的得意之作?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岁月,这种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组织,曾被认为是建成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对此提出疑问或反对,极有可能招来攻击批判,甚至会有杀身之祸。

四川省采取这个行动,也是经过一番谨慎的思考和周密准备的。广汉作为四川农村改革的试点县,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愈来愈感到不解决这个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就不能使改革向纵深发展。

因此，他们从农村改革的实际出发，率先要求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重新建立乡政权，恢复乡组织。

人民公社是写入宪法的东西，并且是“三面红旗”之一，摘下这块罩着神圣光环的牌子需要巨大的胆识和勇气。

当时，上级领导者对向阳乡采取这个行动提出了明确规定和要求：“不广播，不登报，不宣传”，作为一项改革，进行探讨，搞好了就推广；搞坏了，烂也只烂这一家。

因此，整个行动没有声张，只是悄悄地摘了牌子。

可是，这样重大的事情岂能瞒得住？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传出，朝野哗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尽管广汉的行动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但历史前进的步伐已不可阻挡。那些首先斗胆摘下公社牌子的人们也许没有想到，当初他们做的竟是一项影响如此深远的事情。许多年以后，当记者问原向阳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李万贵，为什么当初没有想到把那块公社的牌子保留起来？这可是有“文物”价值的牌子呵。

李万贵说：当时我们就没有认识到那个嘛。我们只认为，名符其实，是人民公社就是人民公社，是乡人民政府就是乡人民政府，就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东西。

要不然，这块牌子真有可能被摆到合适的地方，让人们从它的变迁中了解历史的曲折与发展。

1980 年 5 月 31 日，正当一些人摩拳擦掌、群起讨伐刚刚兴起的包产到户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

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人的这次重要谈话中，还回顾了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强调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邓小平的这次讲话对于打破一些人思想僵化的制约和畏惧心理的束缚，促进包产到户在全国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的明确表态可谓一锤定音。

正如万里所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光我们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管什么用，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上了户口还很有可能会被"注销"的。

的确，如果没有这篇讲话，包产到户的前景就很难预料。实际上，有的地方已经在"收"了，甚至出现了反复。因此，当农民听到这篇讲话时，都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9月27日即发了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发[1980]75号文件)。文件指出：

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群众中，对于可否实行包产

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

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但也有一些地区，主要是由于"左"倾政策或其他领导工作上的原因，集体经济没有办好，生产力水平依然很低，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根据这种情况，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

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党中央正式决策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思想上、理论上的一次飞跃和突破，对于指导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起到了重大作用。

当初，从凤阳走出来的大包干曾被一些人视为"祸水"、"传染病"。发人深思的是，这种所谓的"传染病"却能迅速地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而多年来推行的"学大寨"运动却因其"左"的做法而在农民心中黯然失色。农业模式，从昔阳到凤阳的转变已成必然趋势，中国农村改革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历史，翻开了辉煌的一页。

# 七、1979：万象更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新纪元，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从此展现在世界面前。

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艰难而又恢宏。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必然导致民族精神的高扬。从思想文化观念、内政外交经济，到生产工具、起居饮食，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而这场变革的艰辛，更表现在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对新生事物的阻挠和压制。

伴着凤阳花鼓那个催春的鼓点，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色彩纷呈，高潮迭起；当五星红旗在白宫升起，中美两个曾经敌对隔绝近30年的大国握手言和之际，一个划时代的举措又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大格局……

## 7—1　邓公访美五星红旗升白宫<br>自卫还击八一军旗挥越南

1979年元旦，一个好年头的开端。虽然时值严寒季节，但沁人肺腑的春意却早已涌入中国老百姓的心田。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新年伊始，中美宣布正式建交，两国领导人相互致电祝贺，从而结束了两个大国长达近30年的敌视和对抗，翻开了两国关系史的新纪元。

这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结束近30年的隔绝分离，尽快实现海峡两岸各种渠道的接触与交流，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同一天，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受命发表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

也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发表谈话，宣布台湾和祖国大陆实行和平统一的问题已提上具体日程。

倒退10年，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那时候的口号是：打倒美帝，解放台湾！

时代变了，中国的外交方针与策略也在变。

随着1979的新年钟声敲响，中美关系进入了它的"蜜月"时期。

卡特总统给邓小平副总理的贺电热情洋溢：

> 新的任务在等待着我们。新的美中关系将大有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有助于推进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以及全世界的稳定。美国人民和我本人都期待着你即将进行的对美国的访问。在华盛顿我们可以认真地交谈全球性和双边的问题。

邓小平的致电简洁明快：

> 中美两国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实现正常化，两国人民都感到高兴。我期待着本月底访美期间同阁下会晤，并把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给美国人民。

华国锋总理、黄华外长与卡特总统、万斯国务卿的相互致电，

也都转达了良好的祝愿。

1月1日清晨,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举行隆重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交生效日。7时30分,当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晨风冉冉升起时,中国驻美联络处官员、美籍华人学者和华侨代表一片欢腾。

在此之前,台湾当局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官邸"的旗帜已经在1978年12月31日黯然降下。同时,台湾当局在美国14个城市的"领事馆"也宣告关闭。

同日,在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上,邓小平发表了令人鼓舞的讲话。他指出,中美建交并非权宜之计,"中国政府一向是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的深远影响将日益充分显示出来。邓小平的外交谋略显然具有更深层次的意蕴。中美建交以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有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团结反霸的斗争有了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与此同时,由于美国与台湾断交和美军撤离台湾,为中国的统一大业扫除了巨大的障碍。

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核心问题。从上海公报到建交公报发表的6年多时间里,双方争议和谈判的焦点也是台湾问题。当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共识后,中国政府亦开始调整对台政策,认真处理好这个复杂的内政问题。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讲到祖国统一问题时,没有使用"解放台湾"这样的字眼(而在此前不久,即1978年国庆招待会的祝酒词中,还在说"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这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关于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将会有所改变。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

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更可见潮流所至，实非任何人所得而阻止。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告台湾同胞书》还指出：

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双方的军事对峙，这只能制造人为的紧张。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

化干戈为玉帛，《告台湾同胞书》明白无误地传递了和平解决问题的信息。

从1979年1月1日起，金门等岛屿不再有炮弹的呼啸，福建前线无战事，炎黄子孙为之欣慰。在元旦举行的全国政协座谈会上，邓小平告诉大家，台湾回归祖国已提上具体日程，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我们对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但仍要做许多工作。

按照中美双方的商定，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的邀请，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随同前往访问的有方毅副总理和夫人殷森，黄华外长和夫人何理良。

邓小平副总理的随行人员还有：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夫人李友锋，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特别助理凌云、浦寿昌，邓副总理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新闻助理彭迪，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国家科委的吴明瑜局长等20人。

对于美国，邓小平是第二次踏上她的国土了。虽然邓小平两次都是以副总理的身份前往美国，但其意义、背景和邓本人的实际地位，却是今非昔比，大不相同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美国。

自1977年7月邓小平再度复出以来，经过他和一批老革命家的推动，中国终于走上了现代化建设的正轨。

实现现代化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必须依靠改革与开放这不可或缺的两翼。闭关自守、抱残守缺，最终只能导致一个民族的衰败。

历史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进行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因此，必须大力实行对外开放，通过开放，不仅要寻求友谊，建立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而且还要寻求资金、人才、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吸取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此外，当时的苏联不仅通过本土，而且通过蒙古和越南，对中国形成了“C”字形包围圈，严重威胁着中国国家安全，阻碍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打破苏联霸权主义的遏制和封锁，不仅需要中国自身的力量和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支持，也

要借助西欧、日本和美国的力量。这些，正是邓小平此次出访的真正目的。

1月28日，适逢中国农历大年初一。在这万家欢庆的新春佳节，邓小平为了赢得友谊，巩固国家安全，使国家走向开放，飞赴太平洋彼岸，对美国进行友好访问。赵朴初先生一首《欢送邓副总理访美——调寄西江月》，表达了万民的心声和祝福：

光景晴空万里，风云事业千秋。
太平洋上看轻鸥，自在飞翔宇宙。
稳渡滔滔海浪，回旋小小寰球。
喜听隔岸动歌喉，花雨缤纷满袖。

下午3点，波音707客机飞临日本上空，邓小平在机上给大平正芳首相发了一封电报：

一周后，从美国回国时，计划在贵国逗留。我为那时能同阁下及其他日本朋友交谈而高兴。

去年10月，邓小平为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访问了日本。那时还是福田首相当政。而今，首相官邸换了主人，大平正芳上了台，那么，顺路去会会他，就彼此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流看法，显然是有必要的。

北京时间29日凌晨4点半（美国东部时间1月28日下午3点半），邓小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华盛顿，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受到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及夫人、万斯国务卿及夫人等的热烈欢迎。

机场上，四百多人，其中包括美国各界人士、美籍华人和旅美华侨，他们冒着严寒，等待着激动一刻的到来。

虽然经过一昼夜的长途飞行，邓小平走下舷梯时依然神采奕奕，情绪饱满。他身穿深灰色制服和深色大衣，没有戴帽，微笑着向前来欢迎的人们频频挥手致意。

机场欢迎仪式结束之后，邓小平一行驱车前往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下榻。

风尘仆仆的中国客人稍事休息，便来到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参加一次别有风味的家庭晚宴——吃烤牛肉。

这次晚宴是在1978年5月就预订好的。那时，布热津斯基奉卡特总统之命来北京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邓小平为他举行了一次丰盛的宴会。在品尝了可口的中国饭菜之后，布氏邀请邓小平有机会到美国品尝一下美国家庭的饭菜。今晚，邓小平就是来践约的。

布热津斯基一家为了办好这次宴会整整忙乎了几天。他的夫人精心选择了菜单，亲自烹制了具有浓郁美国风味的烤牛肉、蟹肉、蔬菜、沙拉水果等等。布热津斯基负责选购满满一柜各色美酒。他的三个孩子——伊思、马克和米卡充当宴会的服务员。

晚宴开始后，觥筹交错，宾主频频举杯祝福，欢声笑语，不绝于耳。酣畅之间，布氏当众发表自己的高见：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邓小平反应很快，不置可否却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道："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对这两个国家都有真切了解的邓小平，获得了一片赞同。

在谈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已经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

邓小平哈哈一笑，随即答道："是的，我也碰到了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这一机智的回答，引得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正像一首歌中所唱，"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邓小平出席

这次晚宴，分明是在公开赞扬布热津斯基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这给布氏一家也带来莫大的荣耀。几天以后，布热津斯基在会见记者时仍然异常激动："在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一个十亿人的领导人到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到我家里赴晚宴！""我是说，这的确相当惊奇！"

1月29日上午10点整，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为邓小平访美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这是一座已有177年历史的总统官邸，当人们看到白宫前的旗杆上，中国的五星红旗首次引人注目地飘扬在美国国旗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旗之间，回想这两个国家充满火药味的长期对抗的历史，不能不由衷地感叹时代的巨变。是国家利益，也是全球和平的需要，使中美两个大国打开了大门。

卡特夫妇陪同邓小平和夫人登上了铺有红地毯的讲台。这时军乐队奏起了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这一切表明，美国政府是把邓小平作为一个友好国家的元首来接待的。作为资本主义阵营中头号的反共国家，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给予过如此隆重的礼遇。就是在西方国家，也只有与美国情同手足的英国首相才有此规格。据说，当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要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美国移民局坚持要他打手纹才能入境。苏联人认为这是侮辱，美国人认为这是原则。最后，赫鲁晓夫还是打了指纹才走进联合国大厦。而今天，邓小平的到来却使美国政府打破了对待共产党领袖的惯例。能够赢得自己的敌人尊敬的人，其人格魅力是伟大的。

在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后，卡特致词说：

> 今天开始了有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个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进一个多样化的和平世界。

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历程的传统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这是人们走亲访友的时候，也是团聚和和解的时候。

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和解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邓小平在答词中，高度评价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他意味深长地说：

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欢迎仪式后，邓小平和卡特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开始进行两国最高级会谈。

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之前的一段寒暄，一下子就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卡特："1949 年 4 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经在青岛呆过。"

邓小平："我们的部队当时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

"那你们早就见过面？"布热津斯基插话说。

邓小平幽默地一笑："是的。"

三言两语，话虽不多，却很能体现出邓小平的机智和风度。

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国际形势，并就涉及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会谈的详细内容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从卡特的回忆中可以获悉，中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等问题上，有着许多相似或一致的看法。

29日晚，卡特夫妇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和夫人。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美国三家电视台转播的这次宴会，被人们称之为“全世界多数人今晚所注视的筵席”。

从卡特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1500朵各种颜色的山茶花，使别致温馨的宴会厅里更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这些鲜艳夺目的山茶花代表了主人对中美友谊前程似锦的祝愿。

在150多位宾主当中，包括24名中国官员、6名美国内阁阁员、14名参议员、7名众议员和11位美国企业家。此外，宴会主人还满足了中国人的愿望——邀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出席。

作为东道主，卡特首先祝酒。他称赞邓副总理访美是两国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自从建交以来，今天是中美双方首次在最高一级水平上开始会谈。

我们的会谈是富有成果和建设性的，因为我们双方都敏锐地意识到，我们现在所做的将成为今后的和平合作的先例。……我们进入这种新的关系不是为了短期的利益。我们对一个由多样化的和独立的国家组成的世界共同体负有长期的义务。

卡特总统列举了中美加强合作的具体事实：

去年一年里，有120多个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而访问中国的美国团体更多。在自然科学、空间、农业、医药和其他领域内的交流已经开始。现在，随着正常外交联系的建立，这种交流的探索性质可以让位给一种更加有价值和持久的关系。

在争取自由的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一个只有二百年独立历史的年轻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

继续生效的成文宪法。有四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还是很年轻的。我们能够互相学到很多东西。

善解人意的卡特接着说：

像您，副总理先生一样，我也是一个农民，而且，同您一样，我过去也是一名军人。当我长大的时候，在我那个小小的农业村社里，农业生产方法和生活方式同几个世纪前并没有多大不同。我走出了那样一个世界而参加了一艘核潜艇的计划和安装工作。当我回到故乡时，我发现，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已经在短短的几年内改造了农业。

我了解到那种变化所带来的震动，变化所要求的有时是痛苦的调整，以及变化对个人和国家可能带来的好处和巨大潜力。

我也知道，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抑制不住变化。使科学技术的进步适应我们的需要——学会控制它们——在尽量缩小它们潜在的不同作用的同时从中得到利益，这样就更好了。

我知道，中国人民和您、副总理先生，十分理解这些事情。你们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现代化的工作证实了这一点。美国人民祝愿你们的这些努力取得成功，并且盼望同你们进行合作。

卡特的祝词文采飞扬且又意味深长。

邓小平的答词同样关注中美友谊，但措词却要冷静、具体、沉稳得多：

我们两国曾在三十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地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

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作的努力。我们高度评价卡特总统、万斯国务卿和布热津斯基博士为两国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邓小平没有用动人的词藻掩饰两国的差异，也没有忘记中美有共同面对的苏联霸权主义，他懂得如何把握求同存异的原则：

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双方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双方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

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也是两国关系的着眼点。

祝酒结束后，双方开始随意交谈。新朋老友，各得其所。

尼克松自 1974 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去总统职务以来第一次回到白宫。当乐队奏响《美丽的阿美利加》时，他情不自禁地对邓小平说："你知道吗？他们演奏的是同一支乐曲，就是我去中国时所听到的那支。"那段非同寻常的日子，令他难以忘怀。

邓小平与费正清的交谈妙趣横生：

"贵庚？"邓问。

"72 岁。"费答。

"我今年 74 岁"。

"但你仍满头乌发，而我早已秃头了。"

"这证明你脑筋用得太多。"

……

费正清是著名的学者,曾在中国呆过7年。他在哈佛大学执教中国历史40余年,是该校弗朗西斯·李·希金森讲座功勋历史学教授,也是公认的西方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之所以能获得参加国宴并在首席陪同卡特和邓小平的殊荣,是与他长期以来卓有成效地效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并积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分不开的。

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当雪莉·麦克莱恩对他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风趣地告诉她说,如果为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他很有资格获得金牌。三起三落,堪称仅见。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和夫人在卡特夫妇陪同下,出席了肯尼迪中心举办的文艺晚会。这场耗资50万美元的晚会,是由一家石油公司赞助的。这家公司同美国其他大公司一样,看好了中国这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因此想借邓小平访美之机先来一次广告宣传。

晚会上高潮迭起,群星荟萃。一支由天真活泼的儿童演唱的中国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使晚会的愉悦气氛达到最高潮。这激动人心的一晚,为中美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1月30日上午9点,邓小平和卡特举行了第三次会谈。卡特记述说:

> 我们讨论了双方偿还资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互相没收资产引起的),并保证努力解决这一个和其他遗留问题。邓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具体细节了如指掌。
>
> 我提出了最惠国待遇的法规问题。如果我们只给予中国,而不给苏联,将造成不平衡。邓对我说,在移民问题上,中国不能同苏联相提并论。他还说:"如果你要我输送1000万中国人

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这话很自然地引起了哄堂大笑。

我提了交换留学生计划问题。我不赞成他关于美国学生完全由他们自己在一起生活，而不同中国学生或中国家庭住在一起的决定。他解释说，中国的居住条件差，达不到美国人的起码生活水平。我认为他的理由不充分。我又提了另外一个问题：“只要你同意美国派多少学生到中国，至于谁能够去，我们不要你们审查。”他笑着说，对付几个学生，中国还是有力量的。中国人并不想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审查学生。他还说对于美国记者在中国各地的旅行将有些限制，但不会进行任何新闻检查。我对他说，既然给我提供1000万中国人，那我将给他提供1万名新闻记者。他放声大笑，并立即表示谢绝。

我要求他（在美国作公开讲话时）提及台湾问题，并使用“和平”和“耐心”等措词。他说他希望美国和日本敦促台湾同意谈判，说中国解决这一问题只是在两种情况下不以和平方式和不耐心，那就是，台湾长期拒不谈判和苏联势力进入台湾。他要求我明年起在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采取审慎态度。他表示他们不赞成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

我将美国就出售武器的问题给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告诉了邓：我们的政策是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苏联出售武器，但是我们不想影响有主权盟国的政策。他答称：“是的，我知道这是你们的态度，这好。”

我们还谈了一些其他问题，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机密的问题。会谈进行得很愉快，很有成效。

当天中午，邓小平应邀前往国会与美国参议员共进午餐，并出席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茶话会。

在参加由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国立美术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亚洲协会及中国理事会等6个团体联合举办的招待会时，邓小平向与会的约800名美国各阶层人士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他特别指出，苏联全力支持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军事侵略，成为影响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严重祸害。并且表示，“为了国际和平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

邓小平还批驳了有些人宣传的“中国人好战”和中国是“世界战争的策源地”的谬论。他说：“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反侵略的历史，就是今天，中国也还是处于侵略的威胁之下。说到打世界大战，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我们经常谈到战争威胁，并不是我们喜欢战争，而是因为这种严峻的现实确实存在。

1月31日，邓小平在布莱尔大厦接受了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名誉法律博士学位。

中午，邓小平在布莱尔大厦同11名有影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共进午餐。午餐会上，他呼吁美国、中国、日本、西欧和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他说：

> 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来自苏联，对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威胁来自苏联。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破坏它，挫败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捣乱。

当记者问到中国近来在中越边境进行军事集结的问题时，邓小平说：

> 我们理所当然地关心我们的边界安全，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但是究竟该怎么做，我们要考虑，我

们可以说两点，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人民也不是鲁莽行事的。

随后，邓小平与卡特一道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和文化协定》。在这之前，双方还签订了高能物理协定和领事协定，并就两国在农业、教育和空间技术领域内的具体合作达成了谅解。

2月1日，中美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公报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作出贡献。公报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访美的积极成果。

随后，邓小平离开华盛顿赴亚特兰大访问。在亚特兰大，邓小平和夫人一行在当地举行的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午宴上受到隆重的欢迎。邓小平在午宴上发表讲话时向卡特总统的故乡佐治亚州的公民表示敬意和衷心的问候。他特别指出，亚特兰大市的公民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建设起一座完全现代化的城市，这充分显示出美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技术革新60%首先在美国研究成功，有70%首先在美国得到应用。1978年的美国只有3.6%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和农产品出口国，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可以养活59个人。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先进的生产管理，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此，邓小平坦诚地说：

> 美国人民二百年来艰苦创业，实现了工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特别是你们称作阳光地带的南部地区，近三十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你们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

晚上，邓小平在乔治·巴比州长的官邸会见了来自美国17个

州的州长，并表示："我们很愿意同你们南方各州进行有效的合作。"

2月2日，邓小平副总理抵休斯敦访问。

休斯敦是美国南部最大的炼油、化学、机器制造和造船工业中心。美国25家最大的石油公司，有24家在休斯敦设有总部或分公司。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也在休斯敦设立了航天中心，著名的"阿波罗登月"和"太空实验室"计划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邓小平在约翰逊航天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克拉夫特博士和第一个环绕地球飞行的美国人、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格伦的陪同下，参观了该中心博物馆里的阿波罗十七号指令舱、月球车和有三层楼高的登月器的复制品，并愉快地在登月器和航天飞机中进行模拟飞行。这是这个中心第一次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

在休斯敦西北50英里的西蒙顿举行的一次晚宴上，邓小平会见了著名的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亚蒙·哈默。这位曾经见过列宁的美国企业家，同历届苏联领导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有鉴于此，官方拒绝邀请他参加有邓小平出席的各种重大活动。这次他是略施小计才"混"进了宴会厅。

哈默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是从他23岁那年苏俄之行开始的。

1921年，23岁的哈默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此时，他已拥有百万家产。

大学毕业后，要等几个月才能进医院实习。这时哈默听说苏联乌拉尔地区正在闹传染病，斑疹、伤寒流行，就决心去那里扑灭流行病。他买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队剩余物资中的野战医院设备，运到了苏联，指望在实习开始前的等待期间里，多获得一些医疗知

识和经验。在行医中，他很快发现，苏联当时迫切需要的不是医药，而是粮食。善于理财、富有创见而又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哈默忽发奇想：当时美国谷物奇贱，而俄国物产丰富，何不从美国运点粮食来换取俄国的皮毛之类的物品呢？这肯定有利于俄国人民，自己也能赚钱。双方商谈，一拍即合。于是，哈默从美国运来了100万普特小麦，开创了用苏联裘皮换取美国小麦的易货贸易。

哈默顿时成了乌拉尔的红人。

消息传出之后，目光敏锐、富于远见的列宁一下子就抓住这个信息，打电报到哈默所在的地方了解情况。

当时，俄国正在推行新经济政策，向外国资本开放，并且可以以一定条件租让工矿企业。哈默的做法自然引起列宁很大兴趣。

列宁亲切会见了这位有抱负的美国青年，不仅赞赏他的粮食买卖，而且鼓励他承租一个石棉矿。年轻的哈默干劲十足，凭着那种美国人的务实精神，说干就干。列宁虽然日理万机，但对这件事却十分重视，亲自过问，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为哈默承租石棉矿大开绿灯。列宁说一个美国人搞第一个租让企业，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他要求对承租者妥为照顾，要求外国资本家帮助俄国发展经济，同时也要保证外国人承租的企业取得合理的利润。

哈默在苏俄先后承租了石棉开采和铅笔制造两个企业，并成立美国联合公司，成为苏维埃政府同美国几十家第一流大公司之间的中间商。

哈默在苏俄居住了9年，其间经常见到列宁。列宁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曾经说过：全力支持这些人和他们的企业！这是通向美国商界的捷径，我们必须尽量利用这条通道。哈默也正是凭借列宁的支持才取得了成功。

1921年,哈默原本不过想在苏俄临时工作几个月,结果却做成了这么一桩无论在苏联历史还是在他个人历史上都值得重视的大事。

此时的哈默,又突发了另一个奇想。他想见到邓小平,并想通过邓小平的支持,到中国去做生意。

当译员按惯例向邓小平介绍哈默的经历时,邓小平止住了译员的话,对哈默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访问。"

邓小平的这个表示,令哈默非常高兴。他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太大了,坐一般民航飞机受不了。可是中国又不让私人飞机降落。"

邓小平听了哈默的话笑了起来,把手一挥:"噢,这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作出安排的。希望你多带些专家来。"

看到哈默受到邓小平如此厚待,很多美国官员和大亨们都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邓小平与哈默的交谈看起来是那么轻松,且不乏诙谐,但又是极其认真、实实在在的。几个月以后,哈默果真如约造访北京,又一次在新闻媒介引起轰动效应。

邓小平和夫人还应邀观看了马术竞技表演。当邓小平和方毅把乳白色的骑士帽(即"牛仔帽")戴在头上时,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邓小平一行欣赏了美国的骑士风采,对美国的骑士精神也有了更多了解。

2月4日,邓小平来到此次访美的最后一站——西雅图。

这里是波音飞机的摇篮,也是美国西北部重要的铁路、航空、公路枢纽。

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总经理爱德华·卡尔森和波音飞机公司

董事长桑顿·威尔逊为邓小平及夫人一行举行的午餐会上，邓小平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说："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就是你们这个被称为'通向东方的大门'的城市。这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两国是隔水相望的邻居。太平洋再也不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邓小平再一次表示：中国人民在争取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中，有许多方面要向创造了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美国人民请教。这也是我们这次访问的目的之一。我们来看一看，感到很有收获。我们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存在着广泛交流和合作的余地。

午餐后，邓小平由威尔逊陪同，参观了波音飞机公司装配厂。巨大的波音747客机和先进新颖的技术设备，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月5日上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一行结束了对美国8天的正式访问，乘专机离开西雅图经日本回国。

伍德科克代表卡特总统向邓副总理一行告别，他说邓副总理的访问使两国间建立了和睦关系，并"希望你们很快再来美国"。

2月6日下午，邓小平一行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开始对日本进行短暂的非正式访问。

日本外相园田直在机场迎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时说：我每天从日本报纸上看到你们在美国的活动情况，感到很高兴。

2月7日，邓小平先后同大平正芳首相和前首相田中角荣、福田赳夫进行了会见，并邀请他们早日访华。

大平首相对邓副总理回国途中特意来看望老朋友，感到很高兴。邓小平向大平正芳通报了访美的情况，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旧友重逢，倍感亲切。通过会谈进一步

加深了我们的相互理解和信赖关系。我深信,中日两国领导人经常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的。中日两国关系的基础是牢固的。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在中日和平友好的基础上,得到重大发展。”日本方面表示,中日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希望两国经常保持接触,特别是在四个现代化问题上,希望日中加强合作。

2月8日,邓小平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回到北京,受到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邓颖超、王震、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中国高级领导人到机场隆重迎接邓小平访美归来,表明了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和对邓小平访美取得的重要成果表示满意。

邓小平这次对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国新闻媒体纷纷予以重点报道,在美国更是掀起了一股全国性的“中国热”。在历时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地与卡特总统以及其他美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经济、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并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访问期间,2000多名新闻记者追踪采访和报道了这一历史性事件,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全部变成了“邓小平时间”。可以说,在中美关系史上,“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

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在一篇题为《历史性的访问,深远的影响》的述评中,谈了两点最突出的看法:第一,两国共同关心霸权主义对太平洋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第二,邓小平所到之处都感受到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是美国人民一致的愿

望，所有的人都赞成两国关系正常化。对广大的美国人民来说，邓小平的访问带来了愉快和欢乐，邓小平的传奇性经历、他的政治家风度和令人喜爱的性格给这次访问增加了光彩。《亚特兰大宪法报》的哈尔·古利弗在评论中高度赞扬了邓小平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所表现的风采。纽约州参议员莱斯特·沃尔夫说："副总理肯定给美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的历史性访问，对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影响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格局的改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在邓小平结束访美3个月以后，哈默博士私人的波音727飞机就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美国石油大亨的私人飞机在共和国首都降落，这本身已是一条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当时的中国刚刚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许多外商还在观望等待，而哈默却带着20多位专家来华。仅在一周之内，哈默在北京就与中国有关方面签署了杂交稻种、化学肥料、石油勘探、煤炭开采等初步协议，并会见了中国政府八个部的领导人，打破了外国人同新中国做生意的以往纪录。

哈默本人也很高兴，他感慨地说：当我来到中国，看到它的无限机会和资源，感到整个新的开始的气氛，我心里的感觉就像我23岁时在列宁的苏联感到的一样！

精明的哈默抓住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先声夺人地叩响了紫禁城的大门，他不愧为一个"勇敢的人"。由他投资6.5亿美元同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共同开发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年产原煤1500万吨，是中国同美国达成的最大合资协议。

这座在当今世界上数得着的大型煤矿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只用了26个月，成了中国奉行对外开放的一个成功范例。

有人评价说:哈默是西方最善于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的人。

哈默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的决心与行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不断发展、能源前景广阔、强大而进步的中国。它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欢迎各友好国家到中国投资,促进中国经济贸易的繁荣。我对中国很有信心!

是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企业家都看得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经济互补性之强自不待言,发展两国经贸、科技交流与合作前景远大。

当年邓小平访美时就曾对美国新闻媒体说过:未来的中美贸易额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是几百亿美元!

如今,邓小平的预言早已实现: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美国飞机的最大买主,目前总计购买了367架。中国还是美国小麦的最大买主,尽管中国粮食连年丰收。

今天的美国,已成为对华第二大投资国,目前累计投资项目达2.3万多个,协议金额超过368亿美元。这些项目对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实现明天目标的唯一限制是今天的犹豫。"至理名言,发人深省。

不难设想,假如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个历史性的转折,没有邓小平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果敢决策,就不会有中美经贸的骄人成就和光明前景,也不会有今天中美两个大国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多少年以后,当我们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不为邓小平这位世纪伟人的美国之行发出由衷的赞叹!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复杂且具多面性的。

邓小平访美在全世界大多数人看来，都是值得称道和赞扬的历史性事件。然而，也有人对此感到紧张、愤怒、沮丧。

莫斯科和河内的烦恼与恐惧，便是这类沮丧情绪的集中表现。

1月27日，即邓小平访美的前一天，塔斯社就报道大批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并对此表示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的文章，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关系每发展一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局势就变得更具有危险性。

其实，还在两个多月以前，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及途经仰光的时候，就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苏联）和小霸（越南），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但河内置若罔闻，对金边大打出手，其气焰之猖狂，令全世界震惊。

从1978年岁末到1979年初，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的集结调动，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中越之间是否会有一战？成为国际舆论的热点问题。

“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曾是如此密切的社会主义兄弟邻邦，缘何竟至兵戎相见？这事还得从历史讲起。

位于中南半岛东部、呈伸长的“S”形的越南，其民族、地缘、历史，都与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本世纪2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对越南人民的反法抗美斗争给予了无私的支援。1924年，胡志明在中共的帮助下，在广州成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志明再次来到中国，以八路军少校军官身份指导越共的海外部工作。1940年，范文同、武元甲还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越共把中共的游击战争思想、人民军队建设原则、统战理论和人民民

主政权建设经验同越南实际相结合，终于取得了越南“八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1950年1月18日，两国正式建交。越南政府把这一天定为“外交胜利日”。同年年初，胡志明秘密访华，请求中国支援越南的抗法斗争。为此中国派遣了以韦国清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并向越方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1954年5月，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配合指挥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奠边府大捷”，全歼法军精锐1.6万人，为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61年，美国扶植越南傀儡政权，发动了所谓“特种战争”。1964年制造“北部湾事件”。1965年对越发动局部侵略战争。

在此后的10年间，中国政府和人民节衣缩食，克服种种困难，甚至不惜付出重大的民族牺牲，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累计向越南派出各类支援部队32万多人，其中4200余人身负重伤，1100名中国烈士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其中仅军援一项就足够装备一支200万人的陆海空军，包括213.8万支枪，7万多门大炮，12440万发枪弹，1807万发炮弹，176艘舰艇，552辆坦克，320辆装甲车，170多架飞机，1.6万辆军车，18240吨炸药，10万部电机，1117万套军装……办公用具、日常生活用品几乎无所不包。经济援助主要有500万吨粮食，3亿米布匹，3万辆汽车；中国援助越南修建了1231公里公路、476公里铁路、300公里输油管道，输送汽油、柴油130万吨，修建包括重机枪厂、12.7毫米高射机枪厂、枪弹厂等军工厂在内的成百个工业企业。在中国急需外汇用于国家建设之时，还援助越南数亿美元的现汇，供其机动使用。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我国转运给越南的军事物资，则免收过境费8300万元。如果考虑

到10年抗美援越在时限上几乎与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重合，则中国为此付出的牺牲和代价则更为巨大。

1975年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对毛泽东主席说：“如果我们没有你们这个巩固后方，没有你们向我们提供的路线，没有你们的援助，我们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一直以为，能向我们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攸关援助的，是中国，而不是苏联。”直到1977年11月20日，他还说过：“越南党和人民为有中国党和人民这样亲密的战友感到自豪。”

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后，本应利用战后和平与良好的周边环境，利用大量外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但是，在越共四大上，确立了联苏、制华、侵吞老挝和柬埔寨的侵略扩张政策。

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得到苏联的积极支持。仅1976—1980年的经济援助就达37亿美元，并于1978年11月3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由此获得了政治上控制越南、军事上占据金兰湾、岘港等7个军事基地的权利。从而在东南亚形成了苏越联手称霸、威胁中国安全的局面。1978年12月25日越南士兵10万人，兵分7路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7日占领金边，1月8日建立了以韩桑林为首的傀儡政权。

有苏联人撑腰，越南当局在反华问题上也越走越远。首先是大造反华舆论，把中国树为“头号敌人”，以此作为扩军备战的理由。1977—1979年，每年军费支出都占财政总支出的40%以上，并且制定了全国军事化的战略目标。从1974年起就有目的地制造边界事件。

1978年，发生边界事件1108起，仅1979年头一个半月就达129起。其次是残酷迫害、驱赶华侨。中国在越南有侨民100多万人，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华侨在越南反法、抗美斗争

中，与越南人民一起英勇战斗、流血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越南当局为达到反华排华目的，诬蔑华侨是“第五纵队”、“吃饭的包袱”，对华侨采取剥夺和迫害的政策。从1977—1979年6月越南推行“净化”边境政策，驱赶难侨100多万人，其中有24万人流入中国。越南从难侨身上勒索的财产总值高达30亿美元。越南在驱赶华侨的过程中，采取了种种非人道的野蛮手段，造成数以万计的难侨死亡，并在中越边境屡屡制造事端，袭击我边防部队，打死打伤我边民多人。

对于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和反华暴行，中国党和政府曾多次提出警告和抗议，但越南方面置之不理，反而把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忍让视为软弱可欺，反华活动愈演愈烈。自吹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宣称“一个越南兵可以对付30个中国兵”，照此推算126万越军可以对付3780万中国军队！也正是这种可悲的自大与自狂，把越南推向了战争。

早在1978年四季度，越南情报机构就注意到中国在云南广西集结了大约20个师的精锐部队，认定中国有随时重击越南的能力。而邓小平也连连代表中国政府发出要“惩罚”越南的警告。越南人口头说是“无所畏惧”，实际上已进入临战状态，所有北线部队进入一级战备，通讯兵部队要求通讯兵“人不下机器，耳机一直戴着”。高炮部队进行了“一级战斗演习”。越军王牌的“升龙”空军师加强飞行作战训练，特别是夜间飞行训练和大、中、小机群的战斗演习。越军总参谋部的汽车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随时准备向各地运送作战干部。炮兵和火箭部队变换阵地，调动频繁。

1979年元旦，越南北部边防部队接到战争警报，说中国军队将发起进攻。越军前线阵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一场虚惊。

1月5日，又是战争警报。又一夜徒劳的严阵以待。

再警告：1月10日。再绷紧疲劳的神经。

此后几乎是逢五逢十就折腾一次，中国人何时教训"小霸"？这成了一个谜。越南人屡备屡空，北部前线部队的综合疲劳症和部分精神不正常已经影响了士气。

1月28日，越军再度拉响战争警报，中国军队仍然没有动静。而这一天，邓小平却启程访美。接下来的信息，使越南人更加心慌意乱。

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被问及：由于柬埔寨的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共产党邻国的紧张关系，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答：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几天后在东京，邓小平对田中说：对侵略者不给予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对大平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对记者问及中国军队在边境一带的集结和调动，邓小平坦言确有其事，但什么时候动手，还得等着瞧。不过，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当邓小平同卡特谈起"教训越南"的话题时，卡特曾经婉转地谈到美国在越南的"教训"。美国人的侦察卫星已经清楚地了解中国军队的调防，卡特此言当然是有所指的。

2月8日，时事社东京消息：几天内中国可能会确定对越南的战略。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这条消息立即成为外电报道的热点。

中国方面临战换将，自然是经过一番利弊权衡、反复认真考虑的。

提起王必成，人们不会忘记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当时，华东野战军决定集中主力5个纵队16个师，采取中央突破的方法，以4个纵队分别阻击和牵制其他各路敌军，保障主力歼敌。5月13日夜，第六纵队在司令员王必成的率领下，疾行200余里，从鲁南平邑以南地区北返，奇袭垛庄，切断敌军退路，完成了对号称"御林军"、名列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的最后合围。经过激战，至5月16日，这支蒋介石的王牌军便被全歼，师长张灵甫也被击毙。此举为打破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杨得志当年抢渡大渡河的英雄壮举和气慨，堪称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毛泽东《长征》诗中"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豪迈诗句，便是对那幕惊天地、泣鬼神战况的精彩描述。

杨得志、王必成，两员虎将，各有千秋。知己，王必成更熟悉昆明军区的部队；知彼，杨得志更了解越军作战特点。

最后的抉择，是杨得志出任前线总指挥。

戎马一生的杨得志转战南北。他曾继彭德怀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回国后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74年初，被毛泽东召到北京。毛泽东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杨得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从冰天雪地的朝鲜经黄河、长江一路南下，而今来到亚热带山岳丛林的西南边陲。此次执掌由几个大军区调集的数十万大军，在全世界瞩目下去同作战经验丰富的越南军队较量，杨得志深知责任重大。

对越南，杨得志并不陌生。1967年援越抗美，他曾以友好代表

团团长的身份访问越南北方，详细地考察了军事形势，遵照党中央指示，为抗美援越呕心沥血。当时他绝对不会想到，12年后竟有一场战争发生在中越之间。凑巧的是，1967年和1979年都是羊年，只不过杨得志执行的使命截然相反。外电评说很轻松："看来杨得志司令员对越南的作战样式和'招数'具有相当的知识。"究竟情况若何，只有当局者心里清楚。

2月10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称：中国在边境一带集结了16万军队，700架飞机和大量装甲车、大炮，上星期有充分证据表明，北京很可能把"教训一下越南"的扬言变成行动。

越南方面也正在密切注意着中国军队的动态，迅速在边境防御网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导弹发射场，并把一些米格－21飞机从南方抽调到北方。

同一天，日本《每日新闻》的分析引人关注：据一直在追踪中越边境军事形势的美国政府人士说，看来，中国已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现实可能性。中国是否开始大规模进攻，要看今后一周的动向而定。如今后一周不对越开始大的攻势的话，以后相当期间，发动这样攻势的现实性就将变得微乎其微了。并且分析说，中国军队将选择两条路线进攻：1. 从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这条路；2. 在此西北约100公里，与越南高平连接的公路。这在美国专家之间已成为固定的看法。

战略上无诈，中国要做的全世界都知道，似乎犯了兵家大忌。然而中国就是要这样，堂堂正正，师出有名，出其有意，攻其有备。

越南霸权主义者欺人太甚，中国还击，是谓惩罚！

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文，明眼人一望而知，这已经毫无保留地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

中国要打？不错！中共中央2月14日正式下发了对越进行自

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

《通知》指出:近来,越南配合苏联在我边疆地区挑起冲突,恶化两国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破坏我领土安全和国家威信,危害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事实反复证明,同越南侵略者打交道,委屈已不能求全,忍耐已被当作软弱可欺,劝告、警告一概变成了耳边风。……他们欺人太甚,我们忍无可忍。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进行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战斗,给越南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都是根据这一目的确定的。我们决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决不允许别人侵占我们的一寸土地。我们的这个宗旨,早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和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中得到确实无误的证明,为全世界所周知。

中国对越作战,苏联可能是什么反应?外电认为:在中苏未来的军事冲突中,苏军占有明显的优势,苏联的战略战术及核力量都具有压倒优势,苏联的海、空军实力也远在中国之上,仅一个太平洋舰队就超过了中国海军的吨位总和。

中国虽有几百枚核弹头和战略导弹,但它的武装部队装备太差。

《纽约时报》刊出米德尔顿的文章《苏在中国边境上可以有多种选择》:苏军向中国进攻最有吸引力的路线,是西北部的准噶尔盆地,但也是最没有好处的进攻路线,这里没有什么工业目标和政治目标。而满洲则是一个始终吸引着苏联入侵的地区,苏联在西伯利亚东部部署了44个精锐师。满洲如同德国的鲁尔一样,是非常有价值的争夺目标,有中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公司,沈阳飞机厂是最

大的军用飞机制造厂，大庆油田对于中国的经济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苏军进入这一地区，由于当年歼灭日本关东军的经历，俄国人将在熟悉的地形上作战。

历来重视军事装备和综合国力分析的西方战略问题专家，对中苏战端的预测，大多持悲观态度。

对此，中国的方针是：根据事态发展，将充分揭露，据理驳斥；坚决顶住，决不示弱；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做好充分准备。

据当时权威人士预测，苏联的反应无非有三：(一)指责；(二)恐吓；(三)局部入侵。一旦发生局部入侵怎么办？

据一般估计，中苏边境的苏军完成战争准备，至少需要两周以上时间。何况，中苏友好条约临近期限却未宣布废止。这多少也是对苏联出手的限制。据此，东北、华北、西北的“三北”边防部队进入高度战备状态，以防不测。

中国决心不变。前线指挥官杨得志如期下达攻击命令。

预料中的战争终于爆发。

北京，平静如初。上下班的市民脸上现出兴奋的紧张，人们急迫地希望了解最新战况。

除了作战指挥机构，在北京，外国人比中国人忙。加急电报、长途电话、国际传真，争分夺秒。外国记者四下穿梭，面对守口如瓶的中国官员，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希望掏出“干货”。

那扣人心弦的一个月，中国邮电业务收入大增，报纸发行量也创下新记录。

2月17日，美国，纽约，联合国大厦，一派忙碌。

瓦尔德海姆秘书长破例于中午赶回联合国总部，当上午听到中越爆发战争的消息之后，便投入了紧张的“裁决”和“灭火”工作。

看来当地球村的村长并不是件轻松浪漫的活儿。

下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分别约见瓦尔德海姆和安理会本月主席阿卜杜拉·比沙拉,面交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的声明。

越南人晚了一步。当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紧急约见瓦尔德海姆时,电文还在翻译中。何文楼坚持要在秘书长的总部办公室会见,以使瓦尔德海姆能立即着手做何所期望他做的事。下午5时45分,何文楼提交了越南外长阮维桢致瓦尔德海姆的信件。

信称:"秘书长先生:我荣幸地向您通告,1979年2月17日,好几个中国步兵师、坦克师、炮兵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对越中边境整个全线发起了大举进攻……"末了,越南强烈要求联合国谴责中国的行动。

瓦尔德海姆面无表情,在他手中还有一份文件,那是许多国家强烈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的罪行,要求越南无条件迅速撤出柬埔寨的议案。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战乱频仍,处理这类事件,秘书长深谙程序。眼前的事实是,越南两面出击,占了便宜卖乖,吃了亏就大喊大叫,秘书长又遇到了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战况,比越南人想象的要可怕得多:

2月17日凌晨,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17个师、22.5万人的中国军队,以12个师的兵力,在国境线上全线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开始进攻。

中国军队向高平、谅山、老街方向投入大军,兵分14路向越南境内穿插推进。

2月18日午后,中国军队在老街、高平、同登等地的进攻,受到越南军队的抵抗。2月19日至20日,谅山正面加强了一个师及40辆坦克,高平正面加强了一个师及40辆坦克,老街正面加强了

两个团及40辆坦克，再度展开猛烈攻击。

20日，中国军队占领老街，包围同登。其后，中国军队猛攻同登、高平。24日占领同登，27日占领高平。

双方在谅山的战斗最为激烈。中国军队在陆续投入8个师的兵力之后，于3月4日占领谅山。

谅山，越南首都河内东北部边防重镇，距河内130公里，就地形而言，其间已无险可恃，有铁路和公路直通河内。

在河内的越南邮政总局旁边，挂起了越南北部边界的大比例尺地图，上面标有中国军队的最新进展。

河内火车站挤满了急于离开首都的人群。

居民已开始排长队抢购食品，储备日用品。

2月21日，两名美国参议员飞抵越南，翌日分赴老街和谅山实地观察。他们看到大批越南难民从两市撤离。在老街通往内地的公路上，大批越南伤兵躺在公路边，等待运往后方医院。

不出所料，苏联作出了反应。2月18日，苏联官方发表了声明，称"苏联将履行根据苏联和越南友好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当天，苏联军方增加了沿中苏边界的侦察飞行次数，在南海靠近越南海岸的苏联间谍船数量也有所增加。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军事调动。2月24日，两架苏联运输机才抵达河内机场，卸下首批苏联军援物资。越南人对此大为失望，原先想把苏联人卷入战火的计划看来已是泡影。国际问题分析家们注意到，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其规模和速度甚至远远不及它对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紧急空运。

美国的立场耐人寻味。

战争一爆发，美国国务院就发表声明：在亚洲共产党国家之间的战争中，他们不偏袒任何一方。

美国国务卿万斯会晤中国大使柴泽民，要求中国撤军。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称:不管在公开还是在私下场合,我们都要求中国撤军。

美国政府发言人否认苏联指控卡特总统事先对邓小平表示赞成中国进攻越南。并且宣称,美国正在劝告中国、越南和苏联都保持冷静。

2月24日,共同社记者报道,中国还需要再给越南一点"教训"。但是,中国的还击有三条原则:一、有限的;二、不长期化;三、不扩大。也不会像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停火时那样,后退那么多。

中国军队虽然近30年没有打过大仗,但经过20多天的实战,已逐渐适应现代丛林战,对打破越军的抵抗也愈来愈有章法。

数十万中国军队继续推进,战争似有升级之势。

越南方面风声鹤唳,一片惊恐。越南外交部3月5日召集各国驻河内外交使团,告知"准备应付紧急事态",并建议如下:

一、准备防空壕;

二、准备食品、罐头、煤油、防火器材、药品等;

三、遣送老人、妇女、儿童回国,或暂时安排到第三国去避难等。

同一天,越南当局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要求男性从18岁至45岁,女性从18岁至35岁的所有公民条件具备者,都要参加民兵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大有拉开架式决一死战之势。

然而中国新华社却于3月5日奉命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对越南侵略者进行自卫还击,已经达到预期的目的。自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并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中国方面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

越南人没有回过神来，全世界也感到意外。

中国撤军，有条不紊。至3月16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离完毕，回到中国境内。

在整个自卫还击作战中，中国军队连续打下了谅山、同登、高平、复和、七溪、广渊、下琅、脱浪、和安、禄平、东溪、重庆、茶灵、通农、朔江、老街、柑糖、孟康、坝洒、沙巴、铺镂、郭参、封土等20多个越南城镇和战略要地。在这些地区给越军以歼灭性打击，歼灭越军1万余人，俘虏1650人。狠狠地教训了"小霸"，打破了"第三军事强国"的神话。打出了中国的军威和国威。

3月25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在《给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和民兵民工的慰问信》中指出：

> 这次自卫还击战，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维护了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保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通过这次战斗，锻炼了我们的军队，涌现了大批卓越的领导干部和英雄战士，对于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提高我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历时28天的自卫还击作战中，参战部队立功的单位达21400多个，16230多人立功，授予荣誉称号的单位131个，授予荣誉称号的个人195人。

邓小平在评析这场战争时指出：经过这次自卫还击战，说明我们的军队仍然不愧是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保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长城。

和平与战争，人类社会两大相反相成的主题，同样惊心动魄，同样扣人心弦。在1979年那个革故鼎新的年头，或许正是由于它的洗礼，历史的转折更显得色彩斑斓。

## 7—2　红星事件轰动全国　八字方针跃进止步

1978年的中国，好戏连台。

走出磨难的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曙光漫上天际时大地的骚动”！

万马奔腾，三羊开泰。年末岁首轮回，又将是一番新气象。

刚开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一段日子，华国锋的情绪很有些低沉。全会不仅打乱了他原先设定的议程和内容安排，而且来了180度的大转弯，改弦更张，清理旧帐，重心转移，人事变更，……这么多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他事先竟然不得要领。

这天，气温又下降了许多，大地上白茫茫一片，刺骨的寒风一阵阵地刮过。此刻，凝视着窗外严冬景象的华国锋也很不平静。令他激动的原因，是秘书刚刚送来的一封信函。

这封信是中央党校学员王立本(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于1978年12月29日写给他的。时间恰好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一周之后。几经周转，到华国锋手上已是1979年的1月上旬了。

王立本在信中就北京红星养猪实验场陈列华国锋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椅子等物品提出批评。认为这样做不好，不利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应当取下来。

华国锋读罢信颇为感慨。说实话，在当时，一个小小的党校学员敢给“英明领袖”提意见，不能不说是个大胆的举动。

自从1976年10月6日那个翻天覆地的行动取得胜利以后，华国锋便顺理成章地将党、政、军权集于一身：中共中央主席、国务

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那时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都反复宣传："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华主席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华国锋同志是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华主席的英明领导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一句话，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人民的好领袖。

在许多重要场合，华国锋的巨幅像片都与毛泽东的巨幅像片并挂。神州大地到处传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山里有个华政委"。这首歌与《东方红》的意境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旨在烘托"英明领袖"的高大形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陆续收到党内外一些人的来信，建议在各种场合，凡是有华国锋同毛泽东的像片并列挂的，把华国锋的取下来。胡耀邦把原信转给华国锋，华划了圈。

在12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设立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确定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汪东兴，华国锋是信得过的。当年在延安时，汪东兴就凭着一种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献身精神，深得毛泽东喜爱和信赖。这位在毛泽东身边干警卫工作成长起来的高级干部，对党内核心机密了若指掌，特别是对党内上层人物的历史档案相当熟悉。这使他在政治的波涛中，往往处于十分有利的优势地位，虽然历经路线斗争的风暴侵袭，但他却安然无恙，一帆风顺，从毛泽东的警卫员一直做到了党中央的副主席。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字仅次于叶帅，位列第三。事实上，华国锋更希望这位忠贞不二、思维敏捷、性格沉稳并执掌八三四一部队的人作自己的搭档。

出于职业的习惯,汪东兴除了与华国锋外,很少与其他人来往。他认定华国锋既然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就必须无条件地维护华国锋在党内的领袖权威和核心主导地位。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汪东兴因阻碍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思想僵化而受到指责。华国锋对王立本的信,想找汪东兴谈谈。汪东兴并不觉得王立本的信有什么来头,不值得大惊小怪,完全可以因势利导,即是由华主席亲自写信给他,就说支持他的意见,看别人还有什么话可说。

自打1979年新年伊始,以陈云为首的中纪委就召开了一个历时18天的长会。陈云在会议上强调: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有利于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是全党最大的事情。但是,近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的破坏是很大的,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现象。

刚刚恢复工作的黄克诚在讲话中也号召,要同败坏党风的人、组织和现象作斗争。他强调说:

> 这种斗争,不是靠发个文件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斗争还是很严峻的。过去毛主席要求我们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现在还要不怕撕破脸皮。

他们这些人如此下气力地抓党风党纪,不会是没有所指的。最近《人民日报》那篇题为《全党为整顿党风、严肃党纪而战斗》的社论,亦很耐人寻味。社论认为,"维护党规党法,是要经过斗争的。并不是每一个党员都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党性不纯的人,不能完全按党规党法办事。党的某些领导干部由于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受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也会无视党规党法。钻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

党规党法，破坏党的纪律。”特别是那句“任何人，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资格多老，都不允许凌驾于党规党法之上”的说法，让知道内情的人一读，就很明了其中的意思。

以往，在党的文件和宣传报道中，“华主席”三个字都必须置于“党中央”之前，正式的说法是：“华主席、党中央……”，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不再把“华主席”放在党中央之前了，只提一个“党中央”即可。

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指示秘书给王立本复信。信中当然是高度评价了王立本的意见，并称已托北京市委领导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们做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这一举动在首都各大报刊披露之后，立刻成为轰动全国的一大新闻。

消息传到中央党校同样产生了热烈反响。俗话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胡耀邦看到这封信后，也着实费了一番心思。

这位心直口快的中宣部长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就个人崇拜，对华国锋提个醒。第二天，他亲临中央党校举行的毕业典礼大会。在讲话中，他首先赞扬王立本关心党的事业，然后指出要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看我们党内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他情绪激动地说：

> 这些封建等级观念残余，迷信救世主，迷信个人的做法，与我们无产阶级的领袖观念，与我们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华国锋同志还不到60岁。如果现在就把他每到一地用过的、坐过的、住过的东西都保存起来，陈列起来，那要修筑多少纪念馆？所以要不得，要不得啊！改正这些东西，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破除这些东西的重要意义，你们将来会看得很清楚的。

隔墙有耳。胡耀邦的讲话很快就传到了华国锋等人那里。陈永贵听了秘书的汇报后气得直跺脚:胡耀邦这些话,纯粹是胡说。照他这么解释,韶山毛主席故居,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还有许许多多革命先烈的纪念地,统统都应该取消和改掉。我真不知道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他到底要干什么?联想到在不久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上,赵紫阳、万里等人对大寨经验的批评,他们不学大寨,反而搞什么"休养生息"、"放宽政策",实行包产到组,甚至还要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分明就是不听党中央、毛主席、华主席的号令,明目张胆地复辟资本主义嘛!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没有再提"农业学大寨",他早就窝了一肚子火,此刻对胡耀邦的发泄,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与陈永贵相比,吴德、纪登奎的心绪未必好多少。

在1978年11月10日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竟成了第一议程。与会者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呼声,使吴德坐卧不安。身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天安门事件首当其冲的角色,吴德成为众矢之的是预料中的事情。尽管在强大的压力下,吴德向中央提交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告,但接下来对"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的指责,令他感到难以招架。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他就被免去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该职由林乎加担任。没了实权的吴德当然察觉到了诸多不利。

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是极力反对为刘少奇平反的。他对陈云那段"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的评论十分反感。为此,他曾与陈云当面发生了争执。后来,华国锋从中进行周旋,主张对刘少奇的案子继续进行复查,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没有对刘少奇的问题作结论。但是,陈云却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尽管纪登奎和一些人投了反对票。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不久，纪登奎也被免去了在北京军区所兼任的职务。

转眼间农历己未年春节来临，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春节，气象万新，普天同庆。

1月27日，首都党政军民各界近3万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春节联欢晚会。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颖超、纪登奎、苏振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锡联、胡耀邦等人出席了联欢晚会。当他们来到群众中与大家互相祝贺、共度佳节时，许多人高声向华国锋等人问好。华国锋也连连说："同志们好，祝大家春节好！"

大厅里灯火辉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晚会节目丰富多彩，华国锋的情绪也不错。

突然，纪登奎看到身后的胡耀邦和邓颖超快步走上前去，紧紧拉住一个满头白发的女人攀谈起来。叶剑英对华国锋说："我们去看看那几个受冤的苦主吧！"

当他们走到那几个人跟前时，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人都惊呆了，原来，这几个人是彭真、薄一波、陆定一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

王光美看到华国锋等人，松开了胡耀邦的手，有些犹豫地向前挪了一步，欲伸手又不敢，一下子给僵住了。

华国锋先是一怔，转而却把手伸向了彭真和薄一波。这两位山西老乡当初他也是很不愿意接触的，此刻竟然由华国锋主动上前握手，并且连声说道："你们吃苦了。"

"华主席，你不认识她吗？"胡耀邦指着王光美向华国锋说道："她就是王光美啊！"

就在华国锋与王光美握手的瞬间，记者为他们拍下了这一历史性的镜头。

当王光美泣不成声地恳请华国锋为刘少奇冤案作主时，华国锋说：你再等等，相信党和人民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今天是春节，应该高高兴兴，欢天喜地嘛。

随后，叶剑英等人也依次与王光美握手致候。从叶剑英等人与王光美的交谈对话中，纪登奎得到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他们是一定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就连今晚的会面也未必纯属巧合。

彭真还是那么硬朗。他对记者说："我充满了高兴和感谢的心情。我将能重新为党为人民工作。我愿意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极为残酷的迫害，但他斗争精神却丝毫没有减退。

春节刚过，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越迈越大。2月6日，以林乎加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邓拓、吴晗、廖沫沙平反昭雪。这实际上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虽然中共中央直到8月份才正式宣布批准北京市委的这项重大决定，但是为"三家村冤案"平反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和冲击，已使持"两个凡是"者防不胜防了。

1979年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因患心脏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67岁。他去世的消息直到2月11日才向外界公布，2月12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中部刊登了苏振华的大幅遗像和庞大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新华社的报道说："华国锋同志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对苏振华同志的疾病治疗极为关怀。"2月13日，华国锋专程前往海军礼堂向苏振华遗体告别。

说心里话，华国锋对苏振华的病逝确实感到十分悲痛。

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苏振华坚决站在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边，为粉碎"四人帮"、摧毁"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做了重大贡献。苏振华也因此赢得了华国锋的信任。

1977年3月，苏振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来对待华主席，我们要像紧跟毛主席那样紧跟华主席。"他从上海调回北京工作时又说，他这次到中央来，是华主席要他回北京，帮助华主席掌握军队的。苏振华的去世，使华国锋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把苏的丧事办得隆重体面，亦是寄托了复杂的哀思。

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彭真平反的通知，推倒了强加给彭真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在紧接着召开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彭真当选为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华的山西老乡陈永贵，此时正面临后院起火的危机。山西省的报纸和其他消息传媒，已经开始透露出一些于大寨和陈永贵不利的东西。

不唯如此，从1979年2月11日起，《人民日报》还开辟了一个"怎样加快农业发展"的专栏，连续发表多篇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文章，比较系统地反思极左错误对农业和农村工作造成的严重危害，对大寨经验的公开批评也相当尖锐。率先在这个专栏发表文章的也是山西。2月14日，中共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在该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旗帜鲜明地清除极左的流毒》的文章。

看着这些文章，陈永贵心里好一阵难过，这农业战线的旗手看来是干不下去了。

随着农村形势的急剧变革，大寨英雄陈永贵的处境愈发困难。继续由他主管全国农业工作是否合适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之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清除经济工作中"左"的政策和"洋跃进"的做法，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实事求是地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新路子。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既是对领导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检验，也是对领导者治国理政才能的检验。

谈经济工作，中共有两位行家里手，一位是陈云，一位是李先念。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曾就经济建设提了五点意见：一是先把农民这头稳住，解决好农业问题，天下就大定了；二是基本建设要循序渐进，否则欲速则不达；三是给各省市一定的机动财力；四是生产和基建不能有材料的缺口；五是重视旅游业的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些意见都很中肯。

李先念也在会上提醒全党：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比例失调必将加剧，中央应当明确一下，1979、1980两年有调整任务。

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制止"洋跃进"，调整国民经济建设方针的思想。年初，陈云在审阅国务院关于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安排草案时就两次批示：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少某些项目，也要保证计划的真正可靠。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就经济问题提出了六条意见：(1)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2)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3)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情况是相当严重的。(4)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5)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6)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

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决定成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负责处理财经工作和经济调整的各项事宜。

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审议陈云、李先念的建议，讨论国家计委修改过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

陈云在3月21日发表的讲话很尖锐，说：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9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60年代初搞三年调整就是下，钢最低时下到600万吨，今年钢不是提3600万吨，也不提3400万吨，提出3200万到3300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搞3200万吨钢编计划。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

稍事停顿，陈云又说：

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程世清，全国那时搞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交15亿斤粮食。那时，全国每年进口粮食107亿斤，江西全年只产197亿斤稻谷，折合133亿斤大米。他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江西老百姓只剩下90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说到这里，与会者哄堂大笑。

接着，陈云话锋一转，马上进入正题：

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1700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2000年钢的产量定多少合适？还有21年，我说达到8000万

吨就不错了。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问题是,1985年搞6000万吨钢根本做不到。……如果将来超过8000万吨,或者超过很多,阿弥陀佛!

这一下,把"洋跃进"的问题点了个明白。

邓小平对经济专家陈云的一番讲话深表赞同,他强调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要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拥护,经过反复酝酿和慎重考虑,在党的最高决策层初步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4月5日至28日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同志和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会议分析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检查了1977—1979年经济工作的新失误。

这一次唱主角的是李先念。作为老资格的财经问题专家和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讲话无疑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他在讲话中毫不掩饰地披露了一大堆令人吃惊的问题和数据,使与会者对"洋跃进"的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976到1978这三年,在净进口粮食265亿斤的情况下,还挖了粮食库存几十亿斤。1978年,花21亿美元进口粮、棉、油、糖,占进口总金额的五分之一。农业投资所占的比重,这三年基本上没有提高。

——近三年,重工业的投资比重没有降下来,1978年是55.7%,轻工业只有5.7%,还低于"一五"期间的水平。

——现在,全国发电能力约缺1000万千瓦,有20%左右的工业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大批工厂经常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全国用煤多的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煤炭工业的

发展速度。石油工业后备资源不足。

——加工工业盲目发展，全国机械工业的加工能力，超过了可能提供的钢材数量的三四倍。交通运输紧张情况没有缓解，1978年仅港口积压货轮超过规定期限一项，就损失8700多万美元。

——1976年的积累率为31%，1978年提高到36.5%，高于1958年"大跃进"的水平。

——现在，全国大约有2000万人要安排就业，今年急需安排的就有800多万人。大批人口要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团结。

——到1978年底，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比较混乱，生产秩序不正常。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24.3%。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浪费惊人。1978年基建投资比1977年增加31.6%，而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却减少了18.2%，投产的单项工程减少了29.1%。

——流通领域中环节多，周转缓慢，物资积压严重。

——财政赤字扩大到100多亿元。

……

在持续20多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对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正式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

在此之后，"洋跃进"被制止，经济工作中长期形成的"左"的一套东西开始被清除。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在历史转折的风口浪尖，任何犹豫和闪失都将铸成大错。

## 7—3　一条血路创特区
## 一桌火锅唱大戏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100多年前，那位留着大胡子的卡尔·马克思曾以他犀利的思想和智慧的语言论断："由于开拓了世界的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渗透，这是任何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不可分离的命题。

100多年后，又一位历史巨人作如是说：

> 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了以后，明朝衰落了。以后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历史证明：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

如果说，滥觞于安徽凤阳小岗18户农民秘密分田单干的"大包干"，揭开了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序幕的话，那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无疑发轫于沿海经济特区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刚刚走出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当人们停止内乱而把目光投向世界时，看到的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中国经济发展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70年代末，

下降到2.5%。

1960年，中国的社会生产总值与日本大致相等；到70年代末，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

是没有机遇吗？

否！只是我们没有把握住。

1956年至1960年，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的第一次产业大调整。当时的日本和联邦德国抓住契机，从战争废墟上爬起一跃而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而中国，正在热火朝天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68年至1972年，第二次国际经济的产业大调整来临，亚洲"四小龙"在国际经济的海洋中游泳，成就斐然。中国却关起门来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

客观地说，我们也曾经有过一段"开放"的"小步舞曲"。

那还是在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发生的一件事情。

当时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到广东沿海某镇视察民情，可是映入他眼帘的一幕却是如此让人难过。

一家米厂门前，伫立着一长队瘦弱饥饿的百姓，他们是在等待购买米厂出售的糠皮——这东西在当时被称作"营养食品"，用它做成的"糠饼干"，只有浮肿病人才能买得到。

半晌，粮店里伸出一张木牌："今日售完"。

失望的人群"轰"的一下都散开了，只见一个50多岁的老头从人堆里跳出来咒骂："社会主义好，肚子吃不饱！好个屁！"

几个臂戴红袖章的人立刻向这老头扑了上去。

巧的是陶铸的小车正好"嘎"地停在喧闹的人群边。

见是陶书记，当地干部慌忙迎上前去解释道："对不起，书记同志，这是个——疯子。"

陶铸摆摆手，示意放开“疯子”。他要仔细听听“疯子”还会骂些什么。大概是不大听得懂客家话，陶铸转过身来对同车的一位地委干部说：“好像他提到陈济棠呢，说了些什么？你叫人翻译翻译。”

陈济棠，乃是30年代广东有名的反动军阀，曾是共产党的死对头。怎么说呢？这位干部感到棘手。

“嗨，叫你说，你就说嘛！”

“他说陈济棠比共产党好，有钱又有粮。共产党来了，什么也没有——当然是疯话。”说罢，又有些担心地望了望陶铸。

“嗬！”陶铸并没有动怒，反倒对这个问题颇感兴趣：“还说些什么？”

这位干部趁机“介绍情况”道：“那时，从深圳到香港是不设防的，老百姓挑了担子就可以过河去。陈济棠鼓励老百姓把珠江三角洲的农产品，如蚕丝、水果、糖，都经过深圳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来吃。”

“嗬，老百姓有洋饼干吃，陈济棠比我这个共产党人会动脑筋。”

那个“疯子”还指着一幢瓦房告诉陶铸，“陈济棠那年，我全家种了一亩甘蔗，还有几棵桑树，就赚下这幢瓦房——是我和儿子去香港做生意赚下的。”

陪同的地委干部脱口说道：“陶书记，放着一个宝葫芦在我们身边，都没有利用上呢。”

陶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利用香港的问题，你们研究一下，赶快给省委写个报告。”

说干就干，事不迟宜。这个报告，后来由佛山地委分管外贸的副书记张勋甫于1961年9月5日，向中央及省委有关人士作了汇报。

佛山地委的报告请求减少该地区大米派购任务 2 亿斤，将珠江三角洲的 8 万亩土地用来种植水果、发展农副产品，经深圳出口香港赚取外汇，利用外汇在香港市场上买回佛山地区紧缺的粮食。他们算了一笔帐：2 亿斤大米换的外汇，可以买 5.7 亿斤小麦，这一下子就赚了 3 亿多斤粮食！

当其他地方的老百姓还在为战胜饥荒而奋斗之时，吃"洋面粉"的佛山地区老百姓，却很快结束了饥馑的日子。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利用香港的市场获得的成功。然而，囿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即使是陶铸和他的那些思想灵活的助手也只能把这种"开放"限定在给老百姓解决一时的困难上，没有也不可能把借助香港、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来认识。

说到对外开放，陶铸等人忘不了 1956 年夏秋之际的一段故事：

1955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了盛况空前的亚非会议。这是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与亚非人民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的国际性会议。会议以后，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亚非国家的资产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其中的不少华商巨富，纷纷将资金转入较为自由、稳定的香港避风。一时间，数百亿美元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潮水般地涌入香港的银行。出现了香港人称之为"水浸银行"的现象，香港的银行家不得不将沉积的巨资，以极低的利息贷出。香港的企业家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大量借用低息贷款，去建大楼、办工厂、开商店，结果是不尽财源滚滚而来。

目睹香港的这种情况，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等坐不住了，立即向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作了汇报。陶铸觉得机不可失，遂

与省委书记林李明议定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计划利用香港银行低息货款，发展我国南方的工农业生产。

不久，毛泽东南下广州，机会终于来了。

那天中午，一艘不大引人注意的游艇驶入了珠江，然后向着珠江与大海的接口处驶去。

艇舷边，站着一个身材伟岸的人。他，就是中国人崇敬的毛泽东。

阳光灿烂，水天一色，江波浩渺，对游泳有特别嗜好的毛泽东，有些按捺不住了。他转头对身旁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就在这儿下水，怎么样？"得到同意后，警卫人员赶忙去准备。

毛泽东又看看身边的陶铸："你也去游一游吧，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哇。"

陶铸连忙摆手："主席，我不会。"

"你们祁东人是旱鸭子。不会，那就没这个福份了。"毛泽东很风趣，转身招呼警卫人员："我们下！"

寥廓江天，风平浪静，毛泽东仰面浮在水面，屏息凝思……

昨天，在他下榻的小岛宾馆，陶铸、林李明，还有饶彰风、黄施民，向他汇报了向香港银行贷款发展内地经济的打算，当时他没有做声，只是一个劲地吸烟。

这件事，得好好考虑。

不久前他刚刚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论十大关系》，批评了那种对发展沿海工业采取的消极态度。形势大好，只争朝夕！

30分钟后，他回到游艇。当警卫人员刚把一条大毛巾盖到他身上时，他告诉陶铸、黄施民等人：外国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办一个工厂所需的钱，贷款也好，投资也好，两三年内就可以赚回一个工厂，再还给人家……机遇难求！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

我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

广东省委很快写好了这个报告，并立即呈送毛泽东。毛泽东也把广东官员的打算提到最高决策层进行了商量。

但此事到这再没了下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泥牛入海无消息。罗湖桥对面的香港一天天地发达起来，中资银行也眼巴巴地静观游资流入他人腰包。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就这样令人扼腕地错过了。

岁月悠悠，转眼 20 年过去。

此时的香港已成为与纽约、伦敦齐名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20 年间香港创下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先是成衣出口居世界第一，接着是玩具出口居世界第一……

当河南岸的香港人，忙着夺取世界贸易市场上一个又一个第一，赚取一笔又一笔外汇，矗立起一片又一片摩天大厦时；河北岸的同胞却在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政治运动，一批又一批地抓“阶级敌人”。

结果是令人痛心的。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1978 年，深圳罗芳村人均年收入人民币 513 元，而与之几百米外的香港较寮村，人均年收入 7.8 万港元，相差 150 多倍。

事实是无言的证人。

当社会上纷纷议论“信仰危机”、“信心危机”、“信任危机”和“球籍”问题的时候，中共高层领导者们也在思考：怎样给历史一个回答？

我们并不特别缺乏机会，但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一连串的遗憾！当中国进入又一个历史转折的时期，面对新的经济发展机遇和挑战时，再也不能坐失良机了！

1978 年新春伊始，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委派

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赴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考察,要求写出有根有据、有开拓性见识的考察报告来。4月初,这个考察组抵达港澳,投入了紧张的调研工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夕,对资本主义阵地作的具有探索性的最早侦察。

香港同胞告诉考察组的官员:香港一没有耕地,二没有原料资源,就是靠引进先进国家的设备和技术,很快获得了发展。中国为什么不学香港?

5月初,由谷牧副总理率领的中国对外经济考察团飞往西欧。这个考察团的成员有轻工部的杨波、水电部的钱正英、农业部的张根生、计委的王全国、北京市的叶林等10余人。派出这样阵容庞大的经济考察团到西欧国家考察,这在新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史上并不多见。向世界走来的中国,自然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国家都以相当高的规格和礼仪,接待了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经济考察团。

考察团在西欧各国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给每个团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经营管理方式带来的高效率和高速度,令考察团成员感触最深。

受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考察团,在谷牧一行从西欧返回的前几天回到北京,并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反映了与西欧经济考察团同样的感受,字里行间溢满了改革开放的呼声,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把宝安等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

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并且作了指示:"总的同意",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廓清了制约经济

发展的雾幛，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

1979年1月，广东省委在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期间，首先提出了要在广东创办特区的设想。广东省委的一位领导同志去汕头传达全会精神，回来后向省委汇报时，提出了一个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解放思想，提议广东应当拿出一个地方对外开放。最好从汕头开始，那里有海港，历史上也是开放的，而且地理位置偏在一边，即使出点毛病影响也不大。他提出在汕头建立一个像台湾所搞的那样的出口加工区。省委讨论后，认为要搞全省搞。除了重要侨乡汕头外，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和珠海也可以同时搞。

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这年1月，在一份反映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材料上，邓小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显示了中央对于广东可以先走一步的意向。

1月31日，李先念、谷牧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交通部负责人彭德清、招商局负责人袁庚，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和打算。

2月2日，在谷牧主持下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商议交通部香港招商局提出的在蛇口地区开设工厂的问题。谷牧说：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先念同志也对交通部的汇报作了指示，请大家共同商议。

会上，袁庚对香港招商局107年的历史作了回顾和对比。

香港招商局，曾是清末最早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的一个分支机构，由李鸿章创办于1872年。本世纪20年代末起，国民党政府将它改为国管，归属交通部。抗战期间，中国招商局曾迁至香港。1950年，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招商局宣布起义，驾驶13艘商船回归

大陆。以后便成为新中国交通部的驻香港商务机构。

从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不开放，在港的14家中资银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从东南亚拥来的大量资金从门前流过，而香港的一些小银行，如恒生银行，抓住机遇，大胆贷款，迅猛地发达起来。

袁庚通过香港其他英资财团的发展，具体阐明我们曾经错过了怎样的大好时机。他不无感慨地说："目前香港中区地价之贵，仅次于东京银座，一平方英尺要一万五千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英尺也要500元以上。加上银行利息高、劳动工资高，招商局要落实中央领导《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有不少困难。我们在反复分析和研究了香港的经济情况后，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并与广东省委交换了意见，有了共识：就是要充分利用广东省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力；又利用香港及外国的资金、技术、图纸、资料、专利、全套设备，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内地和香港的有利因素，排除了在香港办厂的不利因素，这是任何香港财团都不能和我们竞争的。""土地、行政、企业主权全是国家的，广东省派行政管理人员。工厂的管理完全用香港的办法办，由招商局管理。产品从香港出口，偿还外债和外商投资；劳动力由广东省解决。工人工资，原则上参照香港，照顾国内，不超过200元人民币。""这个工业区的建成，不用财政部、银行一个钱，要求财政部免税10—15年，以后全部交给国家。"

袁庚提出："我们第一期上马的有五六个厂，如拆船厂、钢丝绳厂、集装箱厂、油漆厂、无线电导航装配厂及玻璃厂等，目前用地300亩，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这是微不足道的。"

在国内划出一块地方，让驻港企业来开发、建设、经营，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没有过，谁都没有经验。究竟该怎么搞？参加会议的

不少人都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谷牧在会议的最后说："不要再议论了，原则已定，大家要支持，总共就300亩这样一块地方。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现在就这样按先念批的'照此办理'起来。"他要求袁庚"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再作具体商量。总之，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3月，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为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的深圳市。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杨尚昆，汇报了要发挥广东优势的设想。着重谈到要"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资企业和旅游事业。"

在中南海，这两位广东省委领导人见到了邓小平。

他们沿着一条修剪整齐的绿荫小路边走边谈。

"小平同志，还记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吗？"

"记得的。"邓小平稍稍停了下脚步："在延安嘛，在毛主席的窑洞里。"

"那天好像还是朱老总烧的菜呢……"

"记得，他的四川口味弄得不错。"邓小平颇有兴趣。

"那地方我好些年没有去过了……"省委书记动了感情，"当初那么小小一块边区，没想到就打出这么大一块江山……"

"不过，那儿至今还很穷，老边区应当富起来。"说到这里，邓小平的脚步忽然停住了："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

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特区？！”广东的两位领导人一下子还没有领悟过来。

“对，办一个特区！”邓小平语气坚定地说：“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个伟大的决策就此诞生。

“杀出一条血路”，措辞竟是如此冷峻雄浑！当东欧国家出现严重危机，社会主义面临严重挑战之际，中国能否战胜风暴袭击，走出一条成功的路子？

这需要探索，需要试验。改革开放需要一个排头兵。这个试验点和排头兵幸运地选中了与资本主义对峙前沿的深圳。

广东省只是提出对外开放、发挥广东优势的设想，而邓小平却高瞻远瞩，第一个提出了建立特区的思想。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福建省也提出要搞对外开放，中央同意了两省的意见。

1979 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后来又成立了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从最高决策层到具体运作的特区人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积极进取。

一场“杀出血路”的战斗，迅速在深圳打响。

武汉长江大桥。

一列列满载士兵的列车风驰电掣般冲过。

长长的列车上，摆满了推土机、压路机、载重汽车……

目标——深圳。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分别从辽宁鞍山、陕西汉中抽调两个师，日夜兼程开赴深圳。

北京、上海、辽宁……来自全国各地的108位工程师正在打点行装，他们将聚义深圳，一展才华。

省会广州，一片忙碌。广东省委升起中军帐，由任仲夷、吴南生坐镇广州。前线部署：从广州抽调原省外经委主任张勋甫，从江门等地抽调曹喜芝、贾华分别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副书记，急赴深圳河边组建前线指挥部。

在深圳，曹喜芝等一到就去新园招待所看望了第一支开进深圳"拓荒"的队伍，这支50人的队伍刚刚由惠阳地区抽调过来。

"知道是来办特区吗？"曹喜芝问其中一位年纪稍大的人。

"知道，"他叫迟心平，后来的第一任深圳市园林管理公司经理。"是来吃苦的。"

"嗯，吃苦，好的，要有这个准备。特区怎么办，知道吗？"

"这个……一切有党安排。党叫干什么，咱就干什么！嘿嘿……"

"老伴呢，问过你干什么来了吗？"

"问过，她以为又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叫我搞完了早点回家去。"

"不过，"曹喜芝说："我同你们一样，对中央的伟大部署，领会得也不深、不透。俗话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慢慢咱们就会摸出一条路子。省委的同志对我说过，将来建的城市，会比惠阳还漂亮……"

"曹书记，将来……可以带老婆来吗？"一个皮肤黑黑的青年队员忍不住问道。

十几条汉子"轰"地都笑了起来。

"这小子，屁股还没坐热就想着带老婆了。"

……

"可以带"。曹喜芝肯定地说:"这个同志不错嘛。有长远思想,你叫什么名字?……郑家光,听说你会写文章。不过现在不可以,家属也不准来探亲,没房子住,知道吗?干多久,我也说不清,四个月,也许一辈子!"

第二天,市委书记张勋甫和副书记曹喜芝在深圳转了转。

这是一个只有2万多人口的小镇。一条十字形的街巷,点一支烟不等燃完便可以兜遍全镇的弹丸之地,仅有的一幢五层楼已是鹤立鸡群的"摩天大厦"。

在九龙海关,两位书记看到的是木顶砖墙的办公室和铁皮搭成的低矮的关员宿舍。沿铁路线有一溜仓储房,那儿关着从内地运来的猪、牛,散发着强烈刺鼻的臭味。

全镇只有几十家小工厂,生产小农具、小五金,比手工作坊强不了多少。

科技人员一共27名,只有2人是中级职称。

真可以说是一张白纸!

"杀出一条血路",绝非一句轻松的口号。

夜幕降落,罗湖桥下野草丛生的河沿飞出几只受惊的野鸭子……

当他俩回到小镇时,只见一队队荷枪实弹的边防军人跑步而过;紧接着,又有几股持枪带棍的民兵急步跟进。

气氛一片紧张。

副书记贾华低声告诉张勋甫和曹喜芝:"据可靠消息,今夜有大批人偷渡。"

就是这么个地方,张勋甫、曹喜芝、贾华和50名被称为"开荒牛"的领导骨干,来到了深圳,他们要在这里杀开一条血路,树立一座丰碑。

创业的艰辛，唯有创业者体会最深。

首要的问题是资金。

在市委会议上，谷牧发了话："国家目前很困难，拿不出更多的钱给你们，就给你们这 3000 万元贷款，先从罗湖小区搞开发，你们凭本事起家去吧。"

3000 万元办特区，真是叫做杯水车薪。

于是，深圳的创业者们动起了脑筋。

隔岸观望的香港人见深圳拉开了大规模土建工程的战幕，不由得议论纷纷：

"共产党要在深圳办特区啦！"

"特区是干什么的？是不是要把脚伸过来？"

"没听说，倒听说是要颁布优惠政策，吸引我们过去投资。"

"哼！想钓我们的鱼呢。共产党的苦头我们公私合营时就吃够了，不吃了。"说归说，做归做。深圳的热闹劲逗得他们心里直痒痒。

"欢迎，欢迎！"罗湖桥头现在露出了笑脸："手续简化，欢迎你到特区来，我们提供一切方便。"

渐渐地，走过罗湖桥的香港人越来越多。

香港不许吃狗肉，于是深圳狗肉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一些几十年未开过"荤"的"狗肉爱好者"，成群结队地在狗肉铺前排起了长队。

深圳市外经办把香港六大商会、五大银行、工商界人士，以及无线电台、丽的电视台（后改叫亚洲电视台）等传媒机构都请过河来，宣传特区的优惠政策：

凡来深圳投资的，一年免税，三年免半税，还可以免税进口必需的生产资料。深圳的地皮有的是，特别优惠。深圳的劳动力便宜，

只有香港工人工资的几分之一……

深圳的官员向香港人滔滔不绝地介绍:“我们就是有意要形成一个优惠的成本低谷,让你们到深圳来发财,使资金从香港、从国外,将来还要从内地源源流来,怎么样?你们来不来?”

游说见效了。

第一批香港“敢死队”在深圳戏院门前撑起的一把遮阳伞下,同市外经办签订了一批办服装、手袋、五金、编织等加工厂的合同。

香港人在深圳办的第一家宾馆——竹园宾馆刚刚签约不久,另一家由香港海通公司与深圳饮食公司合办的友谊餐厅,已赶在竹园前面抢先开业。

接着,英国人来办夏巴汽车公司,香港人来办中冠印染公司、华侨电子厂(后来发展成康佳公司)、东湖宾馆、嘉年印染厂……

美国百事可乐国际公司太平洋地区总裁切尔·莫尔顿,一位26年前在朝鲜战争中与中共交战的前美国军人,与中方代表何耀签订了第一家中外合作的工厂合同。

招商有了起色,问题接踵而至:地不平,路不通,没有电,没有水,基础设施太差。没有“三通一平”,鸟飞来了还可能再飞走。

算计下来,每开发一平方公里适合于投资的地区,需投入人民币1亿元!这么多钱,从何而来?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骆锦星,罗湖小区建设指挥部的副指挥,一位平日连油盐柴米都交给老婆的汉子,突然感到了金钱的力量。

他抓起一把泥土,疏松的黑土从指缝间无声地落地……

“地”,如同一道闪电在他眼前一亮:“我们租地给外商,租出地不就有钱了?”

如果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价格租出,罗湖小区0.8平方公里

的土地，租出去就是40亿元。拿这40个亿，再去通电、通水、通路……通什么都有钱了。再说，外商租了地，自然就要盖大楼，办工厂、开商店，几十年后再收回土地，岂不是分文不花就造了一个罗湖商业区?!

闹了几十年，怎么就没想到这些不起眼的旷野可以换作成捆成捆的钞票？可是要把土地租给“洋鬼子”，租给“资本家”，老祖宗有没有说法？

骆锦星借来了一大堆马列著作。说实话，他心里有些害怕，怕再来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卖国”的罪名担当不起。用他的话说：“我只是希望祖师爷对租地有论述，只要他们说了可以干，我就不怕了！”

论据找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过关于地租的理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时，就主张借资本主义之力来发展自己：“不怕地租出格罗兹内的四分之一和巴库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1944年，斯大林曾对手下的人说，苏联有三分之二的大型工业企业是用美国的技术援助建成的，在此之前，聘请的美、德、意专家就有两万多人！

原来，无产阶级导师从来就主张开放，学习和借鉴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优秀成果。

“卖地！卖地！”那时深圳人还不懂得“出让土地使用权”或“土地有偿使用”一类准确的法律用语。

第二天，深圳特区便传出一个激动人心的说法：“祖师爷说过，可以出租土地！”

“还是把土地出租改成土地有偿使用吧！”一位深谙中国宦海之道的市委领导者建议，“这样，宣传起来好听，报到上面也好通过

一些，事情呢，还是一样的。”

就这样，最早的土地出租在深圳出笼。

消息传到河南岸，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明报》纷纷大加渲染。人们喜形于色：真便宜！将来地皮肯定看涨，不买就可惜了。

最早签约的香港德兴公司，租地 5000 平方米，建德兴大厦。

接着，香港中国海外投资公司租地 3000 平方米，建海丰苑大厦。

两年功夫，仅房地产公司，就吸引外商在罗湖区投资 40 亿港元，我方收得“土地使用费”2.136 亿元。

这一下，搞“三通一平”，建工业区，都有了钱。

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人的精明，在深圳这块热土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就在深圳市“卖地”半年后的一天，湖北人尚志安找到深圳市政府，说他不要政府一分钱，只要给政策，他就能在荒山野岭的上步，替深圳开辟出一个工业区来！

尚志安有多大能耐？还是会变戏法？不用钱造工业区，岂不是天方夜谭？

精明的尚志安自有高招：借鸡生蛋！借钱生财！

习惯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恪守“不要向别人借钱，也不要借钱给别人”信条的人，无论如何也不敢像尚志安那样，一张口就向银行贷款 2300 万元。

2300 万元建工业区是少了点，但可以先搞预售，谁要买厂房，先交预付款。拿了预付款再去建房子，这幢刚建好，下一幢已开始预售了，不停地预售，不停地收钱，“雪球”越滚越大。

竞争，拉开了银行之间的“存款战”，也使银行内部体制发生相应变革。很快，建行手中有了雄厚的资本。

银行有了钱，贷给谁？不贷给谁？

《马太福音》里说："让富有的更富有，让没有的更没有。"这句话被控制论称之为"马太效应"，用来形容"正反馈"。而在银行家眼里，这句话可以变成"谁的实力强，效益好、信誉佳，我就贷款给谁；反之，实力弱、效益差、没信誉者分文也不能给。"

深圳人感慨地说：这么一来，穷了的，难得富；富了的，容易更富！

经济规律近乎冷酷的结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于是，吃大锅饭、搞供给制，囿于计划经济体制……都成了明日黄花。

抵押贷款，风险经营，目的就是要使"钱生钱"。靠着这种良性循环，深圳的银行仅在10年之内就向企业贷款150个亿元！

深圳的"拓荒牛"们，在创办经济特区之初，就敢于到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去搏击风浪。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深圳人开始领略了市场经济的无限风光。

邓小平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1979年11月26日，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主编弗·吉布尼时指出：中国现在按照国际合作的精神，采取了一个向世界开放的政策。这是第一次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方针和政策用"开放"的概念进行表述和概括，从而对加快特区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了总结闽粤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准备试办出口特区执行情况，讨论和研究当时提出的问题和措施，党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谷牧于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广东省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福建省马兴元、郭超等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港澳工委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看到，深圳、珠海两个特区正在积极筹建，深圳的蛇口

工业区已开始施工,速度较快;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开始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实践证明,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还对特区建设提出了一些对策和措施。最后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特区建设"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这次会议还原则同意广东省起草的《经济特区暂行条例》,待经进一步修改后报国务院。这份《纪要》把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指示》的文件(中发[1980]41号)。正是这个文件,我国的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从最初提出办"出口特区"到定名为"经济特区",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它表明:我国要办的特区,是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而不是单一经营工业的出口加工区;同时,我国要办的特区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它只是在经济上采取更加开放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来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政治上的特殊形式,即既不是像未来的香港、台湾,也不是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或殖民地。

5月,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成立,代表省人民政府对三个特区实行统一管理。在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持下,经过反复研究,初步确定了三个特区的面积范围和经营方向。

广东、福建的开放经验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肯定,更加坚定了两省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中央领导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认识也前进了一大步。

7月24日,国务院202号文件批转《海南岛问题座谈纪要》,决定在进出口贸易等涉外经济活动中,"可参照深圳、珠海市的办

法，给予较大的权限”，从而拉开了海南岛对外开放的序幕。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予以公布，正式批准了建立经济特区。此亦为中国法定建立经济特区的时间。

10月12日，国务院又正式批准在厦门市西北面的湖里地区，设置厦门经济特区。至此，广东、福建的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步入了有序运作的快车道。

为了学习和研究世界各国的贸易制度、投资制度和开发经验，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邀请，当时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率领一个由市长、财政、税务、法律工作者9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国考察。1980年9月下旬出发，11月初结束，历时40多天。先后到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日本、美国、英国、墨西哥、瑞士等国家和地区。考察的对象，有的叫出口加工区，有的叫自由贸易区，有的叫自由港。这些国家举办经济性特区有很多经验，江泽民当时归纳为：第一，立法比较健全，涉外法规、条例成龙配套，可操作性强；第二，有一个开发的总体规划，然后一片一片由小及大地干；第三，管理体制比较灵活，地方和企业有很大的自主权，办事效率高；第四，注意人才培训；第五，有优惠政策。

这次考察收集了一大批材料，了解了国际经济发展状况，获得了不少有益于我们建设特区的知识和经验，增强了创办经验，许多外国好的经验被吸收进这次会议作出的决定。例如，国外办特区，中央政策授予地方政府以必要的权力，包括某些立法权。这次他们就建议人大常委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常委会制订所属特区的单行法规。

继深圳经济特区首先动工建设后，1980年10月，珠海经济特

区正式开始动工兴建;1981 年 10 月,厦门经济特区开始兴建;1981 年 11 月,汕头经济特区也开工兴建。至此,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全面展开。

对于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有的人将经济特区与旧中国的租界进行简单类比,说这样下去势必"国将不国"。有的人到特区参观后感到愤愤不平:"当年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今天,资本家又夹着皮包回来了……"还有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喋喋不休地谈论特区姓"社"还是姓"资"。

"中国,是一个搬动一张桌子都得流血的地方。"正是有鉴于此,人们不难对"杀"出一条血路的意义获得深刻的认识。

当蛇口人第一次大胆地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第一次按照国际惯例引进外商和外资,实行全新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它给中国社会与经济带来的影响,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都是功不可没的。

这组数字也许有些枯燥,但它无疑是辉煌而又夺目的:深圳特区自创办以来,主要经济指标每两年至两年半即翻一番;1979—1991 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45.36%;国民收入年均递增 44.03%;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61.65%。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起飞时期的发展速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深圳速度"给予中国改革开放的启示,恰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所言:"中国不能没有深圳——深圳有希望,才能推动中国的成功!"

深圳出口总值从 1980 年的 900 万美元发展到 1991 年的 34.46亿美元,年均递增 63.71%;利用外资占全国的 1/7,三资企业密度居全国之首;出口创汇总量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大中城市

亚军；人均创汇额名列全国榜首。

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大建设局面，国营、集体、个体、合资、独资企业如雨后春笋似地冒出来，百万劳务大军有如狂涛叠浪涌入深圳，逼出了一个“劳务市场”；用工制度的改革彻底砸碎了“铁饭碗”；老板与职工，可以双向选择，互相“炒鱿鱼”。

——建筑业的高速度和高效率，逼出了一个“原材料市场”，传统的国家物资调拨和建材部门独家经营的局面不复存在。

——特区开发所必然出现的人口骤增，一度造成供求关系失衡，逼出了一个“生活资料市场”，如今，市场调节价格比例已占98%以上。

深圳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轨换型的。他们靠着一个“闯”字。

——眼睛向内，“内联”：依托内地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在深圳联合办厂，眼睛向外，“外引”：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引外商来深圳合资或独资办厂。

——组建自己的“托拉斯”：大胆突破传统外贸管理体制束缚，从“借船出海”到“买船出海”。

深圳人率先在全国显示“小康”的雏形：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万元，仅1979—1991年的12年间就上缴国家财政和税收达200亿元人民币；国有资产达250亿元，同时，安排内地劳动力就业100多万人，向内地汇回劳务费达55亿元。

井冈山老区一位贫困乡的乡长说：“每年开春农家买化肥的钱，基本上是靠在深圳打工的女儿汇来的！”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深圳人创下了上百个“全国第一”的惊世骇俗之举：

——1984 年 5 月,刚刚富裕起来的深圳万丰农民集资参股办工业村,构建了一种以共有制为基点的全新的农村经济体系“万丰模式”,成为中国第一个实行股份制的农村。

——1985 年 11 月,中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在深圳诞生。

——1986 年 2 月,深圳市政府率先在全国实行向社会公开招聘局级领导干部的举措。

——1987 年 12 月,中国首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活动在深圳会堂举行。

——1990 年 4 月,深圳市政府宣布首次向国内外公开出售 4 家国有企业。

……

每一次冲击,都将改革之剑直指旧体制的防护墙,都为催生新体制和发展生产力迈出了一大步。血路,就是这样一步步地“杀”出来的。

深圳人关注特区的命运,邓小平同样关注特区的命运。正如他老人家所说:“办特区是我首先提议,经中央批准的,办得怎么样?我当然要来看看嘛!”

1984 年初春的一个夜晚,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深圳狭窄的老街,停在深圳迎宾馆的门前。一个穿着黑呢大衣的人走下车来,向门卫递上介绍信——“中共中央警卫局!”

门卫立即进入岗亭,拿起话筒。

“接待处张荣吗?中央来人有急事找你。”

接待室,穿黑呢大衣的人对张荣说:“请记录一下,我口授。”张荣有些紧张,顺手拿过一张纸。“告深圳市委,邓小平及杨尚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将于 1 月 24 日抵达深圳。”

邓小平要来特区,深圳人翘首期待。

1月24日，邓小平等人乘坐的专列急驰深圳。

车到深圳，深圳市委负责人梁湘、周鼎等人在车站迎接，然后陪同乘车驶往宾馆。一路上，邓小平几次掀开窗帘，看到车窗外繁忙的工地和拔地而起的高楼，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当天下午3点，迎宾馆6号楼会议室，深圳市委向邓小平汇报情况。

市委书记站在特区规划图面前，把特区五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情况详细作了汇报。然后便请邓小平作指示。他们迫切地希望邓小平对特区的建设与发展作出评价。

“你们讲，”邓小平说：“我听。”

老人家没有表态。

下午4点50分，邓小平等乘座大型客车来到正在兴建的罗湖商业区。他登上刚刚竣工开业的22层国商大厦天台，近处的深圳全景，远处的香港，尽收眼底。远望南方的香港，他陷入了沉思，他对旁边的人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一路上，他仔细地看，仔细地听，仔细地思考……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来到富甲一方的渔民村。看到渔民村双层的小洋楼，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和高档不锈钢炊具，人均月收入四五百元，全村户户是万元户。邓小平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呢！全国农村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一百年！”

下午，邓小平又参观了深圳中航技术进出口公司。当他发现电脑能同人下棋，眼中闪出年轻人的光芒，立刻坐下来同电脑对奕，原定安排15分钟参观时间，延长到近一个小时。

“深圳已经搞起来了嘛！”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

薄暮降临时分，邓小平饶有兴致地回到桂园别墅。

夜深了，桂园别墅的小楼上仍然灯光闪亮。深圳人也在猜测：

邓小平为什么没对深圳五年来的“大胆尝试”发表意见?

第二天一早,邓小平的小轿车驶出桂园别墅,向蛇口开去。他没有留话,这使原先人们心中的那个问号又沉重了许多。

不久,从珠海传来消息:邓小平到了珠海,并给珠海题词“珠海特区好”。

紧接着,又传来消息:邓小平已到广州。

此时已到大年三十,除夕将至,人人都准备过年了。但人们更关注的是小平此行的回音,不少人向梁湘打听消息,梁湘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距离,珠海题了,好,应当向别人学习,气不能泄!”

大年三十中午时分,电话铃声急响——广州长途!一直守候在电话旁边的副市长邹尔康拿起话筒。

“题了!副市长,题了!”话筒里传来接待处长张荣激动的声音。

“题了些什么?喂,你说慢点。”

“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

题词是: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　小　平

1984 年 1 月 26 日

1 月 26 日,是邓小平在深圳的日子。

1984 年春节的深圳,一派喜气和欢乐。许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竟不是“拜年”“恭喜”,而是兴奋地说:“题了,题了!”

事后,有人评析道:也许,当邓小平踏上深圳土地的第一分钟,就已经在考虑如何评价深圳了。但是,他不说,在心中反复酝酿,最后才一下倒出来。

这是不一般的题词，而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效进行一次高度概括的历史性总结！深思熟虑，坚定不移。

八年后，当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又一个紧要关头之际，邓小平再度巡视深圳。当人们提及这件曾给深圳人巨大鼓舞、具有历史意义的题词一事时，邓小平即刻将题词一字一句地背出来，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

邓小平关切深圳特区，其实质是对中国改革前途的关切！

试办经济特区初战告捷，犹如一股春风扑面，全国为之振奋。

1984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6 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 14 个港口城市，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 年 2 月，中央又正式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式的文明富裕经济区，以带动内陆经济的起飞。

1988 年，正式确立海南省办大特区。

1992 年，上海浦东区开发、开放。

至此，一个全方位、多层面对外开放的大格局终于形成。

金蛇狂舞，巨龙腾飞。一个百年不解之"谜"随着历史的转折而显现出它真实、诱人的无穷魅力。

如果说特区建设是一条荆棘丛生、关隘重叠的"血路"；那么，从一桌温馨融洽、气氛热烈的羊肉火锅而萌生的"中信公司"，则有着另一种大相径庭的情趣，尽管两者在某些方面存有同质的内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王震在一次谈话中认为，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做

到人尽其才，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们对请荣毅仁这位熟悉经济、富有企业管理经验的工商界知名人士出来工作，均表赞成。

叶剑英与荣毅仁早有交往，对荣一向很看重，粉碎"四人帮"后，曾好几次找荣毅仁交谈国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叶剑英就和邓小平商量了——提名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于王震，他一度与荣毅仁是邻居，1972 年时他们都住在北太平庄，那时王震刚从江西回京，在这里住了半年多。当时两人都没有什么工作，散步碰到时经常交谈。王震对"荣老板"的才干十分赏识，还常常拄着拐杖到荣家串门。

荣家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首户之一，历来受中共领导人的重视。1950 年春末夏初，毛泽东曾在寓所宴请首次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代表，其中就有荣毅仁。毛泽东在席间鼓励他们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誉，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此话寓意深长。1956 年实行三大改造，毛泽东告诫民族工商业者不要忐忑不安，不要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全部改用抽水机更好。社会主义前途宽广，眼光放远一点，不要怕社会主义，将来一定可以参加工人阶级的行列。从而使许多工商业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言必信，行必果。荣毅仁在社会主义改造和支援国家建设中表现好，毛泽东没有忘记他，特地指命上海市市长陈毅做工作，推选荣毅仁做了上海市的副市长。后来搞整风反右，也是毛泽东指示上海方面对荣加以保护，使荣顺利过关。有人说"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堪称"半个世纪的深情"，恰如其份。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在思考改革开放大

政方针的时候，自然也会注意到发挥像荣毅仁这样有名望、有影响、有才干的工商界人士的积极作用。重新使用这些人，决非只是权宜之计！

现今荣氏后裔侨居海外者逾200人，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巴西、德国、澳大利亚、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和荣毅仁同辈的荣尔仁、荣鸿仁分别在美国和澳洲经营工商业，荣鸿元在巴西经营面粉业，荣鸿庆在香港经营纺织和地产业，他们在当地工商界都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其子侄辈也大多成就不凡，如香港南洋纱厂总经理、香港纺织业联合会主席荣智汉，美国及香港益雅基公司董事李乐莘，德国尤尼可可公司经理荣智美，巴西环球公司总裁荣智宽，核能安全专家沙曾鲁，电子专家荣智鑫，电脑专家方复，眼科专家李振宇……通过荣氏家族在海外的关系和影响，可以为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起到积极作用。

1979年1月16日，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五人接到通知：邓小平同志明天会见他们。这个邀请令五位渴望报国的老人兴奋不已。傍晚，他们相约在胡厥文家中，商讨与邓小平见面时的谈话内容，研究他们关于国家建设的建议。随后，古耕虞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

荣毅仁根据荣家办实业的传统、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海外众多亲友的有利条件，经与从上海请来的工商界旧知探讨，他选择了创办带有风险性的、当时人们还很陌生的国际信托投资事业。这种发展经济的战略眼光，显示了荣毅仁精明务实的独到之处。

1月17日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五位原工商界代表人士亲切座谈。他向大家阐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了大家的意见。邓小平坦诚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邓小平的一席话使这几个人深受鼓舞，他们坦诚进言，气氛十分热烈、融洽。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启用人才，应该把有真才实学的人找出来，合作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邓小平表示：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希望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国内的人，还有入了外籍的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当话题转入为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时，古耕虞递上了他事先写好的书面建议。邓小平一边接过建议书，一边肯定地回答道："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赚取外汇，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接着邓小平以亲切的语调，对荣毅仁表示了这样的期望：摆脱一些其他工作，集中力量从事祖国的经济建设，围绕开放、创汇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希望创出一条新路来。邓小平明确提出：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他还指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荣毅仁具体联系。

对于荣毅仁拟办中信公司的打算，邓小平说："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的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订，否则就不签。应该完全排除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中共中央的召唤、邓小平的点将，使荣毅仁等人感奋不已。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拨乱反正已经开始，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这番讲话，的确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

亲密无间的交谈使人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已到中午时分，邓小平热情挽留大家用餐。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与邓小平亲热地互相搀扶着来到餐桌前。他们围着一个热气腾腾的涮羊肉火锅，边吃边谈。席间所谈之事，对日后竟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古耕虞将这顿午餐形象地称为"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这次会见后不久，荣毅仁关于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公司"）的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领导人都在报告上批示同意。在这之后的几次大会上，邓小平见到荣毅仁时，常常关心地问："公司筹办得如何？"叶剑英也常常过问此事。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和关怀，更加激发了荣毅仁的报国之志。

在一次荣毅仁向邓小平汇报了公司筹备情况之后。邓小平明确表态："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新中国第一家从事引进外资、举办信托投资并经营外汇的金融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979年7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10月4日，中信公司董事会正式建立，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一次董事会。叶剑英、王震、谷

牧等人都来到人民大会堂，与董事们见面，并与大家合影留念。从此，一个全新的行业便在中华大地上迅速崛起。

中信公司系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是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业务机构。总公司设在北京，下属机构主要有香港分公司和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公司的基本任务和经营范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他有关法令、条例，在互利原则下，吸收和运用外国资金，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吸收信托存款；引进技术和设备；对国内进行建设投资，组织中外合资企业以及技术合作、合作生产、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还经营租赁业务，与投资企业有关的进出口业务；进行房地产投资，建造并经营外事服务用房等。公司成立时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其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由国务院委派董事长、副董事长、常务董事、董事若干人组成。第一届董事会由44人组成。荣毅仁、雷任民、吴志超、陈树梓、王兼士为常务董事，荣毅仁任董事长，雷任民任副董事长。公司总经理由荣毅仁担任，雷任民、吴志超、陈树梓为副总经理。公司其他董事有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其他工商界代表人士、港澳工商界人士、著名法律学家、经济学家以及著名爱国人士等39人。

1980年夏，叶剑英为国际大厦的奠基题写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0个半寸见方的楷书。当时叶帅已很少给人题字，但中信要建北京第一座主要供外商使用的写字楼，叶帅仍挥毫支持。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搞国际信托投资事业，其困难和阻力不难想见。国际信托投资原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需要按照市场法则办事，因此，中信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和麻烦不可避免。有好多次荣毅仁碰到较大难题时，就向邓小平写信，每次邓小平总是在信上批示让有关部门为之开放绿

灯。中信的发展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悉心关怀，从而为中信大展雄风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信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冲破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从根本上讲，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结果。中信公司成立以后，在国外发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自办银行、房地产商品化和收购香港银行、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我国发射、收购香港公用事业的股权等等方面敢为人先，吃第一只螃蟹。如果没有当初那台“火锅大戏”，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

邓小平对中信公司的发展很关心，1984 年 10 月中信成立 5 周年时，他亲笔题字：“勇于创新，多作贡献”。10 月 6 日，在中信公司举办的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上，邓小平会见了参加讨论会的中外代表并作重要讲话，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是的，中信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也是邓小平经济“新政”的硕果。

当初只有 2 亿元资本，十几个人的中信，如今已发展为 3 万多人，总资产超过 500 亿元的特大企业集团。“CITIC”（中信公司英文缩写）在全世界也享有盛名，荣毅仁担任国家副主席以后，新加坡的一家报纸也仍然称荣毅仁为“CITIC 先生”。中信公司在为国家争取资金、发展实业、创造财富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成就骄人。

而由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等人创办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充分发挥了他们和广大原工商业者的才能，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周叔弢在天津成立的“建华经济技术咨询公司”，亦为天津引进外资、建设市政、发展经济尽心效力。在荣毅仁等原工商业者知名

人士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原工商业者和民主党派成员也积极为四化建设出力献策。

荣毅仁曾经这样说过："人家都奇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这玩意儿(社会主义)，我就是要搞这玩意儿。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走这条路才是出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信公司的诞生与崛起，广大原工商业者纷纷为四化大业用心尽力，更使人们深刻地领悟到邓小平理论的强大穿透力。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中华腾飞而共同奋斗，这需要睿智的谋略与过人的胆识。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发表讲话说："现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联系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个政治结论，正是调动民主党派和原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关键所在，由此进一步形成了同心同德奔四化的良好氛围，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至为深刻的。

中国，终于走出了沼泽地！

## 7—4　"四类分子"摘帽<br>"三家村"人平反

帽子——

舒适、暖和、美观、端庄、潇洒……

都想戴！

"四类分子"帽子——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

谁愿戴？

“四类分子”帽子一经戴上，非但不能取掉，而且还有世代相传的可能。安徽巢县槐林公社抑山大队就有一个地主分子死后把“帽子”传给三儿子，三儿子死后“帽子”又传给小儿子。该县不少地方都存在着子顶父、妻顶夫、媳妇顶公婆的“四类分子”传代现象。

河南新乡地区原阳县师寨公社地、富分子死后由其子弟继承“帽子”的达43人。该公社解放以来历经七次划定成分，结果是“四类分子”越来越多，专政对象越搞越乱。四类分子的帽子一戴，便成了专政对象，其子女亲属也受株连，升不了学、就不了业、当不了兵、入不了党，子子孙孙都没什么指望，成了不可接触的阶级异己群体。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四类分子”就是首先打击和监控的对象。这些人及其亲属自然也被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阵线的变化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势在必行。中共中央考虑到在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主、富农分子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决定给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摘帽，对地富子女的成份也须作出重新规定。于是，便有了一个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摘帽”行动。

1979年，对于“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年头。1月，中共中央下发了给地富分子摘帽的文件。

中共中央的文件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农村社员，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

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其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对城市的"四类分子"的摘帽及其子女的问题，也应按中央决定的精神处理。摘帽后的人应按其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为社员、工人等，同人民群众一样享有公民权。

毫无疑问，给"四类分子"摘帽，是适应情况变化的一项重大决策。为了保持社会政治安定，顺利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村以及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历史经验证明：反动的血统论，把地、富的子女甚至第三代、第四代也当作地、富分子，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蓄意在人民内部制造分裂，摧残年轻一代的身心。认真落实好这部分人的政策，必将进一步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历年戴帽的"四类分子"达3279名，他们的直系亲属则为2.3万人，其中在外地工厂、机关工作的有5800多人，在台、港、澳的有160多人，在国外的有70多人。由此可见，摘掉一顶帽子，调动几代人的积极性。这项政策大得人心，它使数以千万计的人解除了头上的"紧箍咒"，成为人民中的一员。

与此同时，摘帽行动又向纵深发展。

从1979年1月起，中央决定为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随后，又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此外，还落实了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的政策。

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制定的一项对起义、投诚人员的重要政策。但由于过去长期受

“左”的错误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党的这一重要政策没有得到认真落实。“文化大革命”中对起义、投诚人员加上“假起义、真潜伏”等罪名，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为此，中央决定，对冤案要昭雪，假案要平反，错案要纠正；凡因历史问题或主要因历史问题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或其他帽子的，一律摘掉；被关押、劳改的予以释放，被管制的予以解除，对他们都要恢复公民权，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因追究历史问题被开除公职的，能工作的分配工作，恢复工资级别，对他们的家属子女不得歧视，他们的入党入团、参军、升学就业等不受影响。仅此一项，全国又为40万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

摘帽行动继续深入。从1979年11月起，中央开始着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开来。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现在应当将这一部分劳动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份。这一下，使71万小贩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区别出来，调动了这部分劳动者及其亲属的积极性。

12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五部门《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规定》指出，在原工商业者中，不要具体划分谁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谁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从1979年7月起，他们填写现在的成份时，是干部就填写“干部”，和工人一样参加劳动就填“工人”。今后在政治上应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摘帽行动也惠及知识分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申知识分子

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应当为他们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这是1979年1月全国高校科研工作会议的共识。

党和政府重视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注意从政治上关心和培养知识分子。博士、硕士、学士，成为学历教育的标尺；教授、讲师、助教，各就各位，各得其所。知识分子重新成了“香饽饽”。

1979年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接下来，资本家也尝到了落实政策的甜头：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安排适当的工作；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不再受歧视。

少数民族也是一个重要方面。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提出：“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期间以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都应根据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为四类分子摘帽的过程中，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死刑案件也全部进行了复查，对其中造成冤杀、错杀的案件，按照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给予改判纠正。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有10402人，加上其他案件，共判处23912人死刑。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特别是以反革命定罪而冤杀错杀的很突出。这是冤假错案中后果最严重的一部分。中央指出，决不能使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人冤沉大海。对此，各级人民法院做了大量认真的纠正、改判或平反工作。

上述这些政策的调整和落实，正确地处理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1979年1月起，中共中央开始大张旗鼓地为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拨云见青天，万民获新生。

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大右派”、“国民党少将”葛佩琦的平反经历颇有典型意义。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山东省平度县人。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新生报到时因拿不出高中毕业文凭而险些被逐出校门。恰好当时有一个叫葛佩琦的新生，报到后未来上学，在一位古道热肠的老师关照下，葛畔珩顶替葛佩琦上学，姓氏不变，名字改为“佩琦”即可。这才真叫天无绝人之路。

在北大，葛佩琦是活跃分子，“一二·九”运动时是北大学生会执行委员。后来参加“民先队”，当选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抗战爆发，葛随进步学生南下，成为南京的“平津流亡同学会”的领导人之一。

1938年3月，葛佩琦在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担任政训处长。同年7月，他在洛阳秘密加入共产党。从此，便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他出生入死，拎着脑袋干革命，向党组织提供了许多敌人巢穴的重要情报。他机智地瞒过了敌人，后来竟做到了国民党的“少将督察”、“东北通讯处处长”。

不幸的是，全国解放前夕，与葛佩琦单线联系的李年和组织关系领导人赵某先后被捕，他与地下党失去联系，其秘密党员身份也不能得到证明。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学过物理的葛佩琦成了该

校的一名物理讲师。尽管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这需要调查,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问题。

1957年整风,葛作为"非党员",参加了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一位曾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老共产党员来说,他在解放后被关在党的大门之外,焦躁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在5月的学校整风座谈会上,他提了一些意见,有的话有错误,甚至是出格的。假若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完全用不着大加挞伐,群起而攻之。

但事情的发展偏偏不是如此。

5月31日,《人民日报》七版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整风座谈会的报道,其中醒目地摘登了"工业经济系物理化学教研室讲师葛佩琦"的发言记录。这个发言纪录未经本人审阅,而且掐头去尾,读来很不通顺。

6月5日,《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形式,在七版发表了《我反对葛佩琦的观点》一文,开始了对葛进行指名道姓的批判。6月6日,《人民日报》刊出《老百姓没有委托葛佩琦发这样的言》、《葛佩琦的发言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等三篇批葛文章。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也就在当天的同一张报纸上刊登了《要跟葛佩琦划清思想界限》等三篇批葛文章。

此后,《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批判葛佩琦,各省市的报刊也纷纷转载"葛佩琦反共言论",并大量发表批葛文章。

就这样,葛佩琦成了当时妇孺皆知的"大右派"。最有力的定罪依据,是《人民日报》刊登了葛"要杀共产党人"的言论。尽管他再三声明否认,并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更正,却无人理睬。

不久，问题升级。1957年12月，葛在人大当场宣布被逮捕，一副冰冷的手铐锁住了他的双手，原因是担任过“国民党少将”，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此后，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直至1975年12月，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葛作为“国民党少将”，也在其中。

1976年初，他回到北京，由有关部门安排，住进了北京东城区的一家大杂院，每月靠街道办事处发的20元生活费度日。他的视力极差，身边没有子女，生活极不方便，幸有隔壁一家好心的炳洲、炳海兄弟俩的照应，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出狱之后，葛佩琦都在为他的冤案申诉，但无人理睬。

1978年底，葛佩琦的眼睛动了手术，但并不成功。戴上一副1800度的散光老花眼镜，视力也只有0.1。

靠着那一点点微弱的视力，倔强的葛佩琦天天外出上访。跑了多少路，遭了多少人冷眼，写了多少份上访材料，他都已记不清了。大杂院的邻居只见他通常是一大早出门，很晚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终于有一天，葛佩琦跌跌撞撞地回来，脸上浮现出从未有过的笑容。当炳洲问他有啥高兴事，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含泪说了一句：“胡耀邦总书记关心我的事儿啦！”

葛佩琦一世冤屈，一日昭雪！他的遭遇太不幸，但在他蒙冤22年之后，总算赶上了幸运的时代。

1978年底，他来到中央组织部上访，那时担任部长的正是胡耀邦。在了解他的冤情之后，胡耀邦让宣教干部局的有关负责人接待他，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

但是,他的"大右派"名声毕竟太大,那句所谓"要杀共产党人"的言论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三尺冻冰,非一日可以化尽。一年多过去了,他的脚几乎要把各个上访站的门槛磨出一个凹坑,然而他的冤案仍未解决。

最困难的时候,他又想起了胡耀邦。

1980年4月2日,葛佩琦带着有关材料和写给胡耀邦的信,来到胡耀邦家的门口。

不巧的是,胡耀邦不在家。接待葛佩琦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同志:"请你把材料留下,我负责转送。"

葛佩琦连声道谢。

"请你把电话号码留下,一有消息,我打电话通知你。"

"我住的是大杂院,我没有电话。"

"那就辛苦你再来一趟——明天下午5点,好吗?"

葛佩琦答应了。

第二天,葛佩琦准时来到胡耀邦家门口,刚按电铃,那位老同志便出现在他面前。顺手交给他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用毛笔写着"中组部陈野萍部长"。下方的落款是"胡耀邦"三个大字。

喜出望外。葛佩琦紧紧地抱着这个大信封回到他那间破旧的小屋。牛皮纸信封里装的是葛佩琦送去的材料和信件,他发现,原先因匆忙而错把日期写成"一九八〇、三、二",而胡耀邦用铅笔把其中的"三"字改成了"四"字。虽是一字之改,但已说明胡耀邦对葛案的悉心关注。

拿着这个大信封,葛佩琦来到中央组织部,在那里受到负责人的亲切接待。此后,葛佩琦的冤案平反在三年之内,连闯三关:

第一关,1980年12月15日,反革命冤案得以平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当天郑重宣布:经过多方核查,原判葛佩

琦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原判；（二）宣告被告无罪；（三）发还查抄财物。

接过宣判书，葛佩琦热泪盈眶。他头上的两顶“帽子”，终于揭去了一顶。这顶“帽子”让他无辜蹲了18年大狱。

第二关，1982年3月18日，错划“右派”得到纠正。

经过非常仔细的调查，终于从档案材料中找到了葛佩琦在1957年6月9日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在信中，葛明确指出，他没有说过要“杀共产党人”那样的话，要求改正。

这封信被压了下来，《人民日报》没有更正。25年过去，方才为世人所知，而葛本人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北京市委批复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关于葛佩琦的复查结论：“撤销1957年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从1978年10月起恢复原高教6级工资待遇。”

第二顶“帽子”也去掉了，他无“帽”一身轻。

第三关，1983年5月，恢复党籍。

经北京市委组织部审核、批准，葛佩琦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38年起连续计算。

“三八式”的老布尔什维克！这才是葛佩琦的本来面目。此时的葛佩琦已是72岁的老人了。

面对一生坎坷，葛佩琦曾写下一段真诚大度、发人深省的话：

> 倘若过去的一切能给将来以经验和教训，倘若我们的不幸和委曲能换取后人的成熟，那么我的痛苦是值得的，我的欣慰将是永久的。

据统计，到1980年5月，被摘帽的“右派”达54万余人，剩下1万余人继续甄别，最后的结论是96人确定不予平反，其余全部

摘去“右派”帽子。换言之,铁定的右派只占被打为右派总数的万分之二还不到!

但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使全国300多万干部获得政治新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深入,也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条件。

在与“文化大革命”关系最直接的冤案中,“三家村”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十年内乱就是从“吴南星”3人的悲剧拉开序幕的,对“三家村”的平反,无疑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大事情。

人们不会忘记,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之后,厄运也就降临中华大地。随着大批判的不断升级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邓拓、吴晗、廖沫沙首先成为“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三家村反党集团”。

当时的一首流行歌中唱道: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三家村”人的命运无疑浓缩了那个动乱年代的民族不幸。如今读来,仍是那么令人心碎。

那时节,举国上下,口诛笔伐。大字报、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根本不容许,也根本不可能作任何辩解,“吴南星”3人迅速被逼上了绝路。

1966年5月1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文中竟然血口喷人地宣称:邓拓是“叛徒”!这对于一个为党奋斗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来说,不啻一记闷雷轰顶。

5月17日深夜,邓拓拿起那支驰骋了几十年的笔,给他的老领导人彭真、刘仁写了一封长信,对报纸上的诬陷和诽谤进行了辩

驳，字字句句浸透着他对党、对革命事业和人民的赤子之情。但眼前的时局，他是无力抗争也无力应付下去了，若继续抗争，随之而来的将是人身摧残和人格侮辱。惟有拼将热血以明心志。于是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在留给妻子丁一岚的绝命书中，邓拓写道：

我因为赶写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得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恪守这一崇高信条的邓拓怀着一腔激愤，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了最后一次抗争，实现了他曾立下的誓愿——“临危一命轻”。此时是公元1966年5月18日。

吴晗一家的命运更惨。

自从批《海瑞罢官》以来，对吴晗的批斗逐步升级，先是“文斗”，继之是“武斗”。肉体摧残，人格侮辱，精神折磨，并没有使吴晗消沉。他对女儿说：“我只要不死，就要与姚文元斗争到底。”

但江青一伙就是要置吴晗于死地。1968年3月，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以“叛徒”“特务”为名，下令将吴晗逮捕审查，从此吴晗成了囚徒。狱中非人的虐待和毒打审讯，使吴晗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由于重击造成的内出血，使他连呼吸都十分吃力。1969年10月11日，这位正直善良的著名学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口吐鲜

血，猝然谢世，时年60岁。

吴晗就这样悲凉地匆匆离开了人世。可他哪里知道，他那可爱的孩子已成了可怜的孤儿，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因受株连已先他而去世半年之久。他更不会知道，他那可爱的小女儿，也最终惨死于黎明前的黑暗。

"三家村"人中，只有廖沫沙是唯一的幸存者。这位宁死不弯铁骨铮铮的共产主义战士历经磨难，终于迎来了洗冤昭雪、彰善惩恶的一天。

1978年12月，邓拓的夫人毅然提笔写了一份关于邓拓与三家村冤案的申诉材料，交给了邓拓生前工作过的《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社接到丁一岚的申诉材料后，十分重视，决定将材料迅速上报党中央。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指示北京市委负责这件事的调查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北京市委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三家村反党集团"案是一起重大冤案。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委决定，首先在1979年1月的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为"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所谓主要反党阵地《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和《北京晚报》等单位平反。

1979年2月，导致"三家村"冤案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重新在北京上演，首都各界人士为之拍手称快。

1979年2月21日，对"三家村"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新华社消息：粉碎'四人帮'后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出的一个大冤案。"播音员铿锵明快的声音，宣告了"三家村"冤案的彻底昭雪。

同年8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议，批准了北京市委为

“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

9月5日和14日，中共中央分别为邓拓、吴晗举行了追悼会。在邓拓的追悼会上，刘澜涛的一幅挽联表达了人民对这位战士的敬仰和怀念：

四十年出生入死挥笔扫千军传播马列鞠躬尽瘁昭日月，
两百天血雨腥风横眉对群丑壮志愈坚忠魂永在仰高风。

廖沫沙的一首诗愤怒声讨了林彪、江青一伙人的倒行逆施，表达了对战友的痛悼之情：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威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海瑞罢官成惨剧，燕山吐凤化悲音，
毛锥三管遭横祸，我欲招魂无处寻。

在吴晗的追悼会上，许多人挥毫泼墨，抒发了对一代学者、战士的深切怀念：

学者良吏，懿哉吴公。
滇南燕北，儒林所重。
孝闻气节，海瑞襟胸。
如椽史笔，敢领刚峰。
惨罹文网，真理是从。
刀丛剑树，横眉四凶。
中华英烈，岱岳青松。
浩气长存，百代儒宗。

“三家村”沉冤终得平反，神州大地重现春色。邓拓、吴晗若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无限欣慰的。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张志新的冤案是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重大案件。

"时间和实践将公正裁判","用胜利迎接春天!"在张志新殉难一年半之后历史印证了她的预言。

当时,辽宁省营口法院的一位领导同志,亲自详阅了原盘锦地区司法部门判处张志新无期徒刑的案卷,一边看一边掉泪,连说"人材难得"。在他的建议下,营口市委讨论决定:撤消原判。他们向省里有关部门汇报了此事。省委决定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彻底复查这一案件。

1979年3月9日,省委常委认真听取了联合调查组的汇报。大家听后很激动,称赞张志新具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具有无产阶级的浩然正气,是可歌可泣的英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张志新案件是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

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平反大会,宣读了《中共辽宁省委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省委书记徐少甫讲了话,他高度评价张志新烈士的革命品质,号召全省党员向她学习。烈士的家属、亲属也出席了大会,受到省委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慰问。与会者无不为烈士的惨死而悲愤,无不为张志新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而欣慰。

4月4日,是烈士殉难四周年的日子,省委宣传部在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四周摆满了花圈。烈士的母亲郝玉芝在墓碑上题词:"探求真理,贵在实践,忠骨毁灭,浩气长存。"有的人当场献词,悼念张志新烈士。人们怀着深深的敬意肃立默哀。历史庄严地宣告:张志新无罪!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索菲亚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5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张志新烈士的事迹之后，首都其他报刊和各省市的新闻媒体对此案也纷纷作了宣传报道，使这起奇冤大案的平反昭雪迅速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6、7两个月的《人民日报》、《辽宁日报》和其他许多报刊又陆续刊登了张志新献身真理、坚持斗争的详细情况，同时也大量报道了社会各界的反应。

6月27日，《人民日报》以《人民的义愤》为题，报道了张志新为真理而献身的事迹在群众中引起的巨大反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报社就收到读者来信、来电500多件。“他们同声赞颂张志新同志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思想品质和大无畏精神，同声声讨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的滔天罪行，对杀人凶手表示了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要求一定要严惩冤案的主谋者。……”

7月2日，诗刊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联合举行了一台“向张志新烈士学习”的朗诵演唱会。参加演出的有来自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湖北歌剧团、海政歌舞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13家文艺单位的著名演员和艺术家。他们当中有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黄宗英、田华、王玉珍、吕文科、王冰、殷秀梅……烈士的妹妹张志勤也应邀参加了演出。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人们以各种不同方式抒发了对烈士的崇敬；人们在呼唤，呼唤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呼唤正义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人们在沉思，如何防止和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

诗人朔望的一首长诗：《只因——关于一个女共产党员的断

想》，在人们心中回荡：

……

只因你是光明，我们痛恨一切黑暗。

只因你的大苦大难，中华民族其将大彻大悟！

历史的长河，生生不息，昨天已经消逝，但它警醒世人，告诉未来。让过去的永远过去，请记住历史巨人那句语重心长的话：团结一致向前看！

## 7—5　小平南巡清除"凡是"<br>叶帅讲话柳暗花明

阳春布德泽，

万物生光辉。

1979年的中国处处盎然生机，改革开放以锐不可挡之势向旧秩序发起大气磅礴的冲击。但是，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时局的发展却十分冷静。他注意到主张"凡是"的那几个头面人物并没有偃旗息鼓，还在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影响，阻碍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不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势必干扰他的整个战略部署。

随着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组织路线的问题也愈来愈突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的论断总是那么精辟。前不久，胡耀邦提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对所有遭到迫害的老干部，不仅要彻底平反，恢复原职，而且要加以重用，不得给予任何歧视。邓小平认为在新老干部青黄不接之际，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6月中下旬要开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不妨先解决几位老同志的职务问题。

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与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人已就

彭真、薄一波官复原职形成了一致意见。但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人事任命时，却出现了冷场。有人对彭真和薄一波官复原职是否合适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其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也有人对此项人事安排持有异议。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据理力争。他坦言：彭真、薄一波官复原职天公地道。有人提出这类本不该提出的问题，没有什么其他解释，只能说，这些同志头脑里"四人帮"的余毒还没有肃清，希望这些同志自觉起来革命，主动作些肃清工作。

胡耀邦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赞同。尽管还有不同意见，但并不影响预定议程和人事安排方案的通过。

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个法律。强调以法治国，这是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重要结论。引人注目的是，由刚刚复出不久的彭真作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更加反映出加强民主与法制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人事任命，彭真、萧劲光、朱蕴山、史良补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云、薄一波、姚依林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就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在7月1日下午举行的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李先念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姚依林兼秘书长，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为委员。这个强有力的班子显然是为进行国民经济大调整，否定"洋跃进"而采取的组织措施。

7月2日，五届政协二次会议宣告闭幕。会议增选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得到加强。

对于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复出担任要职，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戴。但是，对于"两个凡是"来说，把"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否定得干干净净，还难以接受的。

经过这次交锋，邓小平更看清了问题的症结，就在他着手考虑下一步打算时，家里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他的健康，都催促他到安徽黄山休养休养。

黄山是声名遐迩的旅游疗养胜地。古人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出去走走，放松放松，未尝不是好事。拗不过大家的规劝，邓小平答应7月中旬到黄山休养。

"名山如高人，岂可久不见？"

不过，邓小平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安排，那就是利用这次南方之行的机会，了解沿途省市的改革和发展情况，进一步清除"左"的流毒和"两个凡是"的影响。

7月的黄山，正值旅游旺季，山下广阔的江淮农村正在躁动着改革的热潮。似乎为了要证明什么，75岁的邓小平一定要亲自攀登这座高山奇峰。

7月12日上午，邓小平和家人在安徽省委副书记王光宇等人的陪同下，一起踏上百步云梯，迎着朝阳，向光明顶进发。

当时到黄山的游客很多，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得知邓小平登黄山的消息后，都非常盼望在此胜地见一见这位伟人。这下子，又使省委办公厅警卫处周爱义处长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在登山过程中，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邓小平就连忙停到路边，并招呼随行人员："让一让，请他们先走。"但是，这些游客往往

赶到他身边就不走了，有的还同他交谈起来。

邓小平精力旺盛。他打桥牌有一个信念："打牌要和高手打，输了也有味道。"只有征服强手，胜利才有意义！眼前海拔1800米高的黄山就是一个强手的象征。峰回路转，拾级而上，一登一陟一回顾，几多感慨在心头。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有言："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青松苍劲，烟云浩渺，山石奇特，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情景交融，浑然一体……难怪陈毅元帅到此也书下"天下第一山"的匾额。

当天晚上，邓小平宿住玉屏楼。这里建筑壮观，不少革命前辈游黄山后都在此处留有诗文墨宝。

60里行程，邓小平全无疲惫之感。下得山来，他对安徽省委常委们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十分高兴：邓小平身体真是健康，这是国家之福啊。

但是，邓小平想得更远，作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毕竟已经老了，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尽快实现干部年轻化，必须尽快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

邓小平在黄山接见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成员时，要他们解放思想，要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发展山区经济，发展黄山的旅游事业。要增加山区人民的收入，改善山区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个地方可以先富起来，一部分人也可以先富起来，要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邓小平的黄山之行，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支持。下了黄山，邓小平又去了上海，去了山东，去了天津。一路上，他掰着手指和当地领导干部算经济发展帐。一路上，他对拨乱反正、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发表了重要谈话。

在泉城济南，他在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等人的陪同下，游览了著名的趵突泉等济南名胜。“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今日到此一游，果然名不虚传。

邓小平在同山东省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对持“两个凡是”者的一些所作所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对刘少奇平反的问题，邓小平说希望他们为此作点贡献。

北京，是中国政治的中心，然而，许多影响全局的事情并不一定首先能在这里出现。有人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解决高层政治问题先从南方做起，几乎已成惯例。

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为解决拨乱反正的阻力问题积蓄了新的力量。回到北京后，又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

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代表时发表题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重要讲话。他十分严肃地指出：

>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

接着又明确讲到：

> 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

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组织路线，这是邓小平讲话的核心，也是他此次南巡深思熟虑的问题。他对海军将领们说：

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

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

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的。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1975 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

邓小平最后强调：

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

邓小平对海军高级将领的这番讲话，明确提出了要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这同华国锋自诩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的说法明显不是一码事。把搞"两个凡是"的人与林彪、'四人帮'相提并论，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接班人的状况事关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党的组织路线，尤其是在党中央最高决策层的组织路线，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斗争和考验。

接下来的重要议题，就是十一届四中全会所要通过的人事安排和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稿的起草。这一次的重要人事安排，是彭真和赵紫阳进政治局，同时还要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等12人为中央委员。这是一个大动作，"文化大革命"中首批打倒的"彭、罗、陆、杨"官复原职，而且委以重任；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波、刘澜涛、周扬和洪学智这些人都曾被认为有"严重问题"，现在也要进入中央委员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所剩无几，且有彻底推翻之势。

对此，有人竟然不理解。

陈永贵就曾对一位刚刚复出的老同志说过：现在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些人搞多中心即无中心，这是在欺负华主席

老实。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不管是邓小平还是你们这些人，都不会重新站出来，更不会有今天。所以，人应该有良心，要维护华主席的接班人地位。

这位老同志也很严肃地开导他：现在我们执行的是根据中国现实所重新确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完全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互相交心，达到新的高度的团结。不能把华国锋同毛主席简单相比。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功劳高大无比，他缔造了我们的党、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可以犯些错误，但我们这些人绝不能重蹈他的错误。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平反。只是由于全党的努力，由于中央大多数人的力争，这些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眼前的这个现实。

华国锋对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坦率地提出了异议。虽然政治局的几位元老都主张让年轻一点的人干，以解决中央班子的老化问题。可是，赵紫阳并不比自己年轻，而且资历也不相上下。在政治局会议上，他表示同意让相当一批老同志重返领导岗位，但对赵紫阳的工作，陈永贵、吴德、纪登奎、汪东兴等都有看法，大家对他有反映。进政治局，他还不成熟。

可是，那几位元老却毫不让步。要说有反映，党内党外对你华国锋的反映也很多。赵紫阳在四川搞得不错，给你配备一个农业专家不好吗？老同志们给你提意见，是想真心诚意帮助你。培养接班人问题已刻不容缓，否则，我们这些老同志也没法交待啊。

叶剑英的讲话稿起草，也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鉴于他的讲话要对30年来的历史作一个基本评价，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要有一个初步的论定，所以，起草小组必须谨慎行事，精心构思。

为了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8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

组部《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处理意见》。《意见》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前老案的处理，仍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全错的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

8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涉及到有关中央文件的处理办法的通知》。《通知》规定，中央过去所发文件的内容、提法和决定，同中央新发文件、讲话内容、提法和决定相矛盾、相抵触的，一律应以新的文件、讲话为准，旧的文件或其中的有关部分自然失效，不必再一一宣布撤销。这个《通知》表明，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的升迁和彭真、王鹤寿等12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胡耀邦、赵紫阳二人显然已是高层人事变动的热点人物，所谓的接班人，看来非此二人莫属。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金秋十月的北京，沉浸在希望和欢乐之中。

9月29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热烈庆祝建国30周年。参加大会的共有一万多人，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

叶剑英那篇经过胡乔木等人精心推敲的讲话稿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 正是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才冲破了前进道路上的无数艰难险阻，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进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发展称为毛泽东思想，并且认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

大会堂里的人们耐心地品味着叶剑英的报告，眼睛盯着台上一些久违了的面孔。想想那些十分激烈的批斗场面，时间和空间交错重叠的蒙太奇，仿佛把所有的故事向人们道了个明白。

人们听到叶剑英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作了如下评价：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叶剑英在历数林彪"四人帮"的罪状后提高了声调：

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

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叶剑英刚念到这里，华国锋拉过话筒插了一句："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时是出了大力的。"顿时，全场响起一片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

叶剑英的嗓门又提高了：

决不能贬低集体，贬低群众，任意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在各级组织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许任何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个党员，从国家领导人到每个公民，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

庆祝大会结束，人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出人民大会堂。此时，正值夕阳西下，落日余辉映红了天际。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二天，新华社在转发叶剑英国庆讲话时，专门就讲话引用这句出自南宋诗人陆游的《游

山西村》的著名诗句加了“辞语解释”。

当人们思路闭塞而立刻有所领悟的时候，当人们对一件事情无从措手而忽然找到解决办法的时候，引用这段千古名句堪称恰到好处。细读陆放翁原诗，妙就妙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后，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淋漓尽致地道出了人在绝望中重获生机的喜悦之情。用以诠释历史的转折，其意蕴自然是再贴切不过了。

10月12日，华国锋乘专机离京前往乌鲁木齐，即将开始对法、德、英、意四国进行国事访问。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前往机场送行。同日，国务院发表公告，宣布在华出访西欧期间，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这次访问是新中国成立30年来，政府首脑对西欧国家的第一次国事访问，其战略意义和政治外交影响都很重大。在历时20多天的访问中，华国锋受到了四国政府的隆重接待，而他对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是眼界大开，受益匪浅。

就在他离京出访的20多天里，邓小平等人加紧了五中全会的筹备工作。此时最棘手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刘少奇平反，这个共和国历史上的头号冤案一旦昭雪，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就被彻底否定了。

中纪委和中组部复查组经过认真周密的核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作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报告”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符合事实。但仍有人对刘案平反持有异议甚至反对。

情况表明，为刘少奇彻底平反仍有严重障碍，而且也是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贯彻执行的严重障碍。不从组织上动“手术”，则不能顺利地进行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因此，邓小平、

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人商议要在五中全会上对组织人事方面进行调整充实,同时成立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要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严格党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

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一个《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报告的主题之一是要"认真选拔接班人"。邓小平强调,对于受"四人帮"思想体系毒害很深的人,决不能选拔为接班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会有大批这样的人上来接班,会给我们党、我们国家带来灾难。现在我们不是把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好多案都翻过来了吗?如果让那些人来接班、掌权,他们还是要翻了回去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帐。

11月7日,华国锋结束西欧之行回到乌鲁木齐。当他笑容可掬地走下飞机舷梯时,受到了新疆党政军负责人的热烈欢迎。三天后,华国锋乘专机回到北京,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到机场迎接,热烈祝贺访问取得重大成功。

12月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应邀来华进行正式访问。

在会谈中,大平正芳表示,日本政府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优先考虑的"石臼所港建设项目"、"兖州—石臼所铁路建设项目"、"北

京—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广州—衡阳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港扩建项目”以及“五强溪水电站建设项目”，准备进行力所能及的合作。对北京现代化医院的建设计划，也准备予以积极的合作。

邓小平又与大平正芳单独举行了推心置腹的会谈，促使中日两国政府在文化交流和勘探开发渤海南、西海域石油资源等方面达成了协议。日本方面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合作意向，也写进了中日联合新闻公报。邓小平在国务活动中的老道和干练，使华国锋不得不佩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年来的巨大变革，已经表明中国正按照邓小平所构想的发展战略向前迈进。

正是“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纵目。”此时的中国，又叩开了1980年的大门……

# 八、1980：政坛风云激荡

1980年的中国政坛，随着历史的转折显现出深刻的变革。共和国第一冤案平反昭雪，否定“文化大革命”顺理成章。

历史转折的惊涛骇浪，对每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

“两个凡是”者逆流而动，做了转折路上的绊脚石。华国锋难当重任，“接班人”名不符实。

“绵里藏针”，邓小平运筹帷幄；

稳妥得体，众元老鼎力配合。

胡耀邦、赵紫阳党政挂印。

政治局人事变动。

沧海桑田，

人间正道。

## 8—1 冒风险为少奇平反 除障碍“凡是者”辞职

历史的回顾，往往是苦涩的。

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因。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

年》一文,在解释为什么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就说:"刘少奇不但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他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我们不少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手里。只有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才能够清除出刘少奇叛徒集团,才能使亿万群众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论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伟大,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看法":打倒了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主办中国"第一个大专案"的江青在1968年9月16日拿出刘少奇的"罪证"材料后,曾作过如下批示:"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字里行间,浸透着与刘少奇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林彪、江青一伙罗织罪名,极尽诬陷之能事,拼凑了一本厚厚的刘少奇"罪证"。林彪看了这个所谓的"罪证"材料之后,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还特地"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也摇头晃脑地说:"你不要看这么一本啊!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这一本搞了一年多啦!……这样一本东西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不久,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溘然长逝。

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朵白花，没有一寸黑纱。一辆戛斯69吉普，载着这位骨瘦如柴、头顶一尺多长白发的前国家主席驶向火葬场。除了中央专案组人员之外，没人知道他是谁，他的骨灰寄存证上写着："刘卫黄，71岁，无业。"

千古奇冤，骇人听闻！

刘少奇被残酷迫害致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被判刑的就有2.8万多人，被批斗、关押的更是难以计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的孝子贤孙"等等五花八门的罪名，使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的人受到牵连、迫害。

为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大冤案平反，关系到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关系到前国家元首的荣辱是非，也关系到拨乱反正的根本大局。

自从王光美在羊年春节联欢会露面之后，敏感的人都意识到为刘少奇平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事实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要求为刘少奇平反的呼声不断高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项工作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同年3月，中央组织部在对王光美的问题经过复查后作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

3月5日，中共河南省委派专人将刘少奇的骨灰盒从开封取出运回郑州，由省委书记兼省纪检委筹备组长赵文甫妥善保存。中共河南省委将刘少奇在开封病逝及骨灰寻查的有关情况向中共中央和中纪委写了报告。

6月，王光美增补为五届政协委员。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光美与其兄王光英在政协会议上的照片。

7月，王光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职务，主要负责国内外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她和她的四个孩子也住进了一座新建的公寓大楼。

11月，复查组经过周密认真的核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作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报告"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符合事实。

11月19日，中纪委特派徐岚前往河南了解和核实当年刘少奇被武装监护、惨死在开封的情况。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和中纪委继续抓紧做有关人士的工作。

为了解决障碍，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同华国锋、汪东兴面对面地进行了交锋。

邓小平等人对不理解抵制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阻挠为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6名常委中，4比2的格局，明显使华、汪陷于孤立和被动。尽管如此，汪东兴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

在这种情况之下，常委中有人提出建议：如果汪东兴等人觉得无法与政治局其他人合作共事，倒不如痛痛快快地辞职！

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华国锋见状便明确表态，同意为刘少奇平反，对十一届五中全会将要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也表示赞同。华国锋的转向，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分别派胡耀邦、邓颖超、黄克诚、韦国清等人与吴德、纪登奎、陈锡联谈话，指出他们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让他们正式向中央写检查，并建议他们提出辞职。

为了确保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必要就加强党的建设、纠正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良现象作出明确规定。根据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意见，胡耀邦、胡乔木、宋任穷等人组织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准则》把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作为最根本的一条规定，提出必须反对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一是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二是要反对和批判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决不允许对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采取对抗、消极抵制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这样一来，那些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人就成了众矢之的。

《准则》规定：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讲真话，言行一致。

《准则》中还强调："建国以来的冤案、错案、假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翻。"作出这条规定，对正在进行的为刘少奇平反一事显然具有重大意义。

经过一番紧张有序的工作，汪、纪、吴、陈这四个人辞职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中纪委成立一年来的工作，确定了1980年的工作任务；会议还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并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几个重大是非问题(即刘少奇冤案和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为全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作了必要的准备。

会议提出，纪检工作"特别要注意维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党的重大决策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要把保证全党政治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及行动上的一致,作为搞好党风、严肃党纪的首要任务。”

在1月2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突出强调了加强党纪,特别是党的政治纪律的重要性。社论指出:“党的纪律是党的战斗力的保证。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踢开党委闹革命’,实际上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以帮代党。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恢复党的战斗力。为此,我们要重申和加强党的纪律。我们党的纪律的根本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句话里,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我们党是容许党员向党组织,一直到党中央,提出不同意见的。但是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上,却绝对不容许各行其是,不论是哪一级党组织,也不论是资格多老、地位多高的党员,都不容许这样做。……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继续闹无政府主义和对党两面三刀的人,决不能失去警惕,必须坚决地按党的纪律严肃处理,一定不能手软,该下手的就要下手。”

从中央高层来说,这次中纪委会议抓党风党纪以保证党的路线贯彻执行确实至关重要,对于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将要采取的组织措施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人民日报》那篇措辞严厉的社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长篇讲话。他首先讲了80年代的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三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接着又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四个前提: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最后又专门讲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

他在讲话中明确宣布中央不久就要为刘少奇恢复名誉。邓小平深知：刘少奇冤案平反、关系到方方面面的敏感问题，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都十分重大。要彻底改正这桩大冤案，面临的风险和压力都相当大，这首先要求加强党的纪律，维护中央领导的权威，以保证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对于那些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人，虽然没有发表详细的意见，但在论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时，邓小平指出："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

2月12日、13日，胡耀邦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刘少奇"不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而是我们党和国家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相反，那个康生是个坏人。"这些政治吹风，更使外界对十一届五中全会表示了极大关注。其时，消息灵通人士有关汪、纪、吴、陈等人犯有严重错误、将要受到组织处理的说法早已不胫而走，人们都在等待最终结果的出现。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北厅举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议题和文件，其中，为刘少奇平反和汪、纪、吴、陈辞职，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华国锋在会议上首先表态支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此，邓、陈、叶、李等常委和多数委员向他投以满意的目光。

接着，其他委员纷纷就有关议题发表意见。在触及汪、纪、吴、陈辞职这个敏感问题上，陈云、彭真等人的发言十分尖锐。陈云说：

当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有些人至今仍在坚持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观点，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甚至背后串通，两面三刀，制造混乱，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地寄到中纪委……

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建议政治局会议能够免去汪东兴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职务；免去纪登奎、陈锡联二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免去吴德的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党组副书记职务；同时遵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提请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免除纪登奎、陈锡联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吴德担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

上述发言和提议着实让在场的一些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是非荣辱在此一刻，前途命运与之一系，岂能不令人紧张?!

轮到汪、纪、吴、陈表态了。

汪东兴知道大局已定，此刻再说什么也是白搭。

纪登奎、吴德尽管内心并不情愿，还是口头表态愿意辞职。

只有陈锡联的表态最干脆："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别说辞掉职务，就是要我这颗脑袋，我也心甘情愿，就请大家批准我们辞职

吧。”

这种局面当然是邓小平等人期望已久的。以这种文明、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需要，也是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有序的表现。搬掉这几个拨乱反正的“反对派”，对于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甩开膀子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都是一件好事。

政治局表决结果，政治局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多数票同意他们四个人立即辞职，并提请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

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这篇文章很有针对性：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必须排除来自“左”和右的干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深得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但也必须看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很深。“至今还有一些同志未能摆脱它的影响，对党的政治路线表现出一种动摇不定、犹豫观望的精神状态。还有极少数顽固坚持林彪、‘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人，对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心怀不满，肆意攻击诋毁。他们非难党的政治路线的论调，不是别的，还是林彪、‘四人帮’挥舞了多少年的大棒，即所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等。这些都是胡说。我们什么时候也没有主张过‘阶级斗争熄灭论’，只是宣布再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不应当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我们的根本任务早就应当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今后的阶级斗争完全应当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的决策是非常坚决的，再也不能有任何疑虑和动摇。经受了多年折腾、吃了很多苦的人民群众，也不允许再走回头路了。”

在中直机关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学习贯彻邓小平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成为会议主题。会议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中直系统各级机关党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教育全体党员,在执行党的路线时,要做到'坚定不移,贯彻始终',并把它作为党的组织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中直机关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行政领导工作的党员,都要带头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组织对于不积极执行的要进行教育,对抵制的要严肃批评,对坚持不改的要报告上级党委严肃处理"。

所有这些都表明,为了确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形成一个适应现代化建设新形势需要的中央领导核心。

2 月 15 日,是农历大年三十,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军民 3 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共度 80 年代的第一个新春佳节。叶剑英则在广州参加了当地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出席联欢晚会的领导人名单中,人们发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这些十分熟悉的名字都不见了,早先的谣传看来已是明白无误的事实。

只是人们尚不清楚也不敢想象这几个人与华国锋究竟有着什么联系。猴年春节,一派喜气,当年推出的第一枚生肖邮票如今已增值上千倍,80 年代第一春,的确是个好兆头。连续几天,华国锋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一道频频在公开场合与各界人士联欢、座谈,显示出团结、稳定的态势。

2 月 22 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元石的文章:《共产党员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文章说,共产党员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规矩,是共产党员高度党性原

则的表现。现在,"有的党员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很深,思想、立场、感情不对头,还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认为中央的路线、政策'偏了',因而产生抵触甚至对抗的情绪。……更有甚者,有少数党员竟然违背党的纪律,搞非组织活动,公开煽动反对党的路线"。文章指出:"轻易地怀疑中央的路线'偏了',不愿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大错特错。""只有在政治上把个人的愿望同党的理想融合一体,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同党一起奋斗的人,才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否则,他将失去共产党员的资格。"两天后,《人民日报》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与此同时,万众瞩目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也已进入了第二天。

五中全会是2月23日开幕的。先是举行了一天的预备会议,分组表决通过了大会的各项议程和有关事项。然后转入正式会议。

2月24日,叶剑英在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就会议要讨论成立书记处的问题发表了一个很有份量的讲话。他指出:

> 我同意成立书记处的决议,也同意决议中提出的书记处的职权范围。虽然我觉得职权范围稍小了一点,但目前只能如此。
>
> 我认为,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它的工作范围将来可以稍为扩大一些,而且应该扩大一些。
>
> 中央书记处,我考虑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的。书记处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年轻。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中年人的明天,因此他们要准备培养精干正派的青年人接自己的班。
>
> 按照列宁的学说,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同志组成的。我们讲中央书记处接班,是接集体的班,而不是接哪一个人的

班。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解决,他只看上一个马林科夫,但很快就被赫鲁晓夫篡了权。我们党"八大"以后成立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书记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搞了一个"中央文革",把书记处冲掉了。我们党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但在实践中也没有解决好。毛主席他老人家对集体的交班、接班问题考虑得少,而是侧重于个人的交班、接班。"九大"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林彪摔死了,又提出王洪文当接班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失败的,这个教训我们要牢牢记取。

在场的华国锋听到这段讲话自然有所不安,似乎叶的讲话是冲着他来的,但其中的含义又令他捉摸不透,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

我们现在重新建立书记处,既是组织上拨乱反正,恢复我党的传统,又是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中央书记处是培养锻炼党的高级干部的场所。通过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实践,书记处的成员就能够了解全面的情况,熟悉中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锻炼独立处理国家大事、应付事变的能力。将来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先在书记处工作一段时间,就比较容易驾轻就熟。

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不是中央政治局的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常委、政治局处于第二线。这样做,除了有利于解决接班人问题外,好处很多:(一)可以使中央政治局和常委同志集中精力,研究国际国内大事,更好地解决国内外的重大问题,使中央工作更加主动、更加有预见性。(二)中央领导同志能有更多时间、更多机会下去同地方接触……(三)便于中央科学分工,抽出一些领

导同志到外国参观学习，把外国的经验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更好地知己知彼，领导四化建设，在经济上、文化上较快地赶上和超过发达的国家……

要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从来就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经验，个人不过是集体的一员，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拿书记处来说，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关系，都只有一票，要互相支持，互相谅解，识大体、顾大局，和衷共济，同心同德。

重大问题应当由书记处这个集体，而不是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作出决定。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个天才，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惨痛教训的……

华国锋听完叶的讲话，也不禁暗自思忖，要说书记处的特点之一是比较年轻，但事实上提出的 11 个人选中，没有一个比他年纪小，宋任穷大他 12 岁，胡耀邦大他 6 岁，最年轻的赵紫阳也比他大 2 岁多；说毛泽东选接班人侧重个人的交、接班，故尔两度失败，那第三位接班人会怎样？书记处不是常委、政治局的书记处，而是中共中央的书记处，是第一线，那党的主席不就架空或成了摆设？这一套东西早就被毛泽东经过实践证明行不通而取消了，如今却成了拨乱反正的产物……

困惑之余，他打算找叶帅谈谈心里话，毕竟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互相密切合作，应该说是可以坦诚相见的。没想到，叶帅竟然先一步要找他谈话。当然，华国锋知道叶剑英的意见并不仅仅代表他本人，而且也代表了邓、陈、李等人的意见。经过叶帅一番开

导,华国锋的一些疑虑被打消了,并表示服从中央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个人意见保留。

在讨论批准汪、纪、吴、陈辞职和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时候,气氛尤为活跃。发言踊跃,言辞激烈,争论不少。绝大多数与会者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支持中央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虽有那么几个人仍然试图抗争,但终究大势已去,没能翻起大浪。

在全会即将进行选举和表决时,中央办公厅曾给汪、纪、吴、陈等人发了通知,但除了陈锡联外,其他三个人都请了病假,没有参加对几个决议和文件的表决。

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宣布胜利闭幕。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的所有重大问题均获批准通过。

3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全会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

一、提前召开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二、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三、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所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四、决定免除或提请免除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五、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

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十一届五中全会所批准的上述重大举措标志着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拨乱反正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汪、纪、吴、陈的辞职"和中央高层的人事变动,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对于汪、纪、吴、陈辞职,陈云在五中全会上曾经发表过颇得人心的意见:

> 我同意他们提出的辞职。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一定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看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就犯错误的同志来说,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我说,应该想一想,想什么问题?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同志看了犯错误的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出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查没完没了,批判没完没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开不下去,大家散会,完不了也只好暂算完了。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这种检讨没完没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陈云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因而对汪、纪、吴、陈的具体问题没有公开见报,也没有对他们采取扭住不放或一棍子打死的政策。

4月1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根据华国锋的提

议,决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副总理职务。同时,接受吴德辞去本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并报全国人大下一次会议追认。

至此,"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所提出的这项战略任务已见成效。

更为重要的是,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纠正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在事实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所谓的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心内容,进而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扫清了道路。

"重回首往事堪嗟,
向前看壮怀激烈。"

## 8—2 追悼少奇庄严隆重 取消"四大"异口同声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之后,朝野上下反应平静。尽管它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都很强烈,但并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出现"翻江倒海卷巨澜"的局面。

拨乱反正,顺乎民心。

3月8日,刘少奇在延安的旧居经过整修,重新开放。

3月12日,《人民日报》等首都大报全文刊登了刘少奇1940年7月1日发表的文章《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并且配发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一道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体人员的照片。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为"新华社记者"的文章

《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并为这篇文章加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编者按："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参加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对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刘少奇同志是在身患重病，并遭受敌人迫害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离开上海去长沙养病的；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我党又利用上层关系营救保释。邓中夏同志在广州欢迎刘少奇同志的群众集会上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这篇文章首次在全国、全世界公开为刘少奇平反的事实真相，因而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人民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家侯一民1961年创作的大型油画《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再现了刘少奇当年领导安源大罢工的风采。

张爱萍的词作《西江月·大白》也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刊出：

许身乾坤扭转，　奔走马列为家。
修养真谏不谢花，襟度涵育无邪。
雷霆万钧地震，　人坠九狱渊崖。
青史明镜映丹霞，奇冤大白天下。

对那篇文章所写的内容，华国锋早就从中纪委的复查报告中知晓。3月16日下午，当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副会长访华团成员向华国锋问及此事时，他很坦然地答道："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调查的结果，就是这么回事。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主要是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3月17日，《人民日报》在与上一次版面位置相同的地方，又

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报纸加的编者按称:"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等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具体领导武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而英勇的斗争,曾夺回被英帝国主义占领了几十年的'租界'。至于当时湖北省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和纠察队缴枪等问题,责任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刘少奇同志在武汉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从未被捕过;从武汉去庐山养病,党中央是知道的。林彪、江青等一伙诬陷刘少奇同志'内奸、工贼',完全是蓄意罗织罪名。"

3月22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新华社记者"的文章《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受党中央的派遣,在反动势力十分疯狂,环境十分恶劣的东北,同其他同志一起,发展革命斗争,艰苦卓绝,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这期间,刘少奇同志是被捕过,但他始终坚不吐实,反动派的法院只得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根本不存在叛变的问题。一九三〇年四月,满洲党、团省委遭到大破坏,是由于当时在团省委工作的杜兰亭被捕叛变而造成的。刘少奇同志那时已由党中央调回上海工作。林彪、江青等一伙用移花接木、逼供伪造等手段,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叛徒',完全是蓄意栽赃。"

这三篇文章,完全推倒了原来扣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但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华国锋对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的一段讲话记忆犹新:刘少奇不是我们人为地能够批倒的。历史上几次被捕,出来得都不那么像样,向敌人求活命,就是我们所说的叛徒啊。以后钻进共产党,充当内奸、工贼。他的情况,过去我们都不晓得,是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

揭发出来的……华想到这些，心里好久都不能平静。

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居然是由"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个中缘由令人费解。但是，能把这三顶大帽子戴到刘少奇头上，却是与宪法中的"四大"自由不无关联。

所谓"四大"，也称"大民主"，亦即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四大"始创于1957年的整风运动。当时为了贯彻中共八大路线，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一些干部在思想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并规定："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不要开批判大会或斗争大会"。

但是，整风运动开始后，社会上有人提出要"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党的领导不适当地支持了这个建议，一时间造成了全国紧张的政治动乱气氛，极少数右派分子用"大鸣大放"的办法向党进攻。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是，当时采取了"四大"的方式反击，从而造成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毛泽东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结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时，肯定了"四大"，认为这是对中共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的发展"，是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好形式。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

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但是,在此后的20多年间,"四大"并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相反成了乱党、乱国、乱民的祸害。

"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的大清查、大揭发、大批判,致使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任意鸣放。小道消息、道听途说的东西,一经"四大"浸泡,便成了铁证如山的"钢鞭材料",再加上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和"一边倒"的舆论宣传,白的也能变成黑的,无中可以生有,不愁打不倒选定的任何斗争对象。什么民主,什么法制,统统不起作用,一旦被栽赃诬陷,即便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当年就是张春桥指使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组织5000多人的游行示威,到处张贴、散发传单,把大标语醒目地贴到了天安门城墙上,首先将刘少奇的问题公布于社会,进而形成了全国性的大讨伐、大围攻。

对于这个祸国殃民的"四大",人们早已深恶痛绝,现在要还历史一个清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彻底否定这种"大民主"。此外,还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那些热衷于西单民主墙,宣称"争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的所谓民主人士,也在利用宪法所规定的这项权利,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发表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相悖的言论,散布"自由化"观点。要回击这股逆流,也必须从根本上取消"大民主"赖以存在的法律依据。

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取消"四大"的决定,无疑是实现民主和法制的一个重要举措。在取消"四大"的问题上,遇到的阻力明显地要小得多,特别是许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深受其害的人都极

力支持这项决定，从而使否定“大民主”很快形成共识。

如此看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把取消“四大”与平反刘少奇冤案同时推出，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安排。尽管“文化大革命”中，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关于刘少奇“问题”的种种“鸣放”充斥城镇乡村，但现在将“四大”定位于荒谬，那么它所制造的影响也就没什么意义可言。

3月23日下午4点50分，华国锋、邓小平、彭真、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要接见出席中国科协“二大”的全体代表。

在接见代表之前，胡耀邦在休息大厅里同华国锋随便聊了起来。

“华主席，关于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么样啊？”胡耀邦问。

“好，好，很好！”华国锋脸上堆着笑容。

“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大权，批了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发表了数百万、上千万篇文章，我们只用三篇文章就把他们彻底推倒了。”胡耀邦的语调有些激动。

华国锋听罢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邓小平、彭真也走进了休息大厅。

胡耀邦见华国锋和邓小平都在，便询问何时为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

邓小平胸有成竹地答道：“莫慌！莫慌！追悼大会只不过是个形式。而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拨乱反正，让大家都看清林彪、‘四人帮’的本质嘛。”

此前，为了认真传达好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中共中央于3月19日专门下发了一个通知。通知说：刘少奇是我们党和国家有崇高威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或修正主义头子是不符合

实际的;"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等项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蓄意制造的我党历史上的最大冤案;为刘少奇平反昭雪,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是一个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党;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记取民主和法制受到破坏的沉痛教训,使类似事件永远不致重演。

从4月份起,首都各大报刊又陆续发表了一批为刘少奇辩白的文章。《人民日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不容混淆》、《重读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把我们的党建设好——纪念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追念刘少奇同志》等重要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这些拨乱反正的文章相继推出之后,为刘少奇平反的舆论已造成声势。接下来,何时举行追悼大会便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考虑的问题。

在4月初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胡耀邦又一次提出了为刘少奇隆重召开追悼大会的问题。具体时间倒好商量,但按什么规格来办,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华国锋不主张搞得过于隆重,说:追悼大会只按一般规格就行了,不必再降半旗,像刚刚死去的国家元首那样,因为这毕竟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嘛。

"不行!"邓小平很干脆地说道:一切按国家元首逝世后的待遇搞,要组成最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地点选择在人民大会堂,其规模和周总理的一样。我们既然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要拿出真正的大气势来嘛!

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一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华国锋只得收回自己的意见。

悼词由谁来致？

按理应该由华国锋来致悼词，他是党中央主席，这么隆重的追悼大会，由他出面致悼词完全应该。可是他却提议由叶剑英主持追悼大会，刘少奇是国家主席，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主持大会当然是最高级别的了，悼词嘛由邓小平来致。

华国锋的心思陈云一看就明白，所以他转了个弯，说：少奇同志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嘛，由你主持追悼大会最合适。至于悼词，我倒同意华主席的意见，就由小平同志来致。你这个当年少奇司令部里的副帅给主帅致词，情理上也说得过去嘛，对不对？

最后这句开玩笑的话，把在座的人都逗乐了。为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宜，也就这么定下来了。

4月8日，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国民经济的执行和安排情况，通过关于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讨论婚姻法修改草案。

这些议题大都有一套比较固定的程序，委员们也不觉得怎么新鲜。

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向会议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即取消这条条文中有关"四大"的规定，并作为人大常委会的议案提请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决定的建议。

这个建议立即在委员当中引起热烈反响。事实上，在去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就有不少代表个别或联名向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在去年年底举行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许多委员在讨论"西单墙"的问题时也提出了这一要求。

在人大常委会委员中,有许多人对"四大"的危害体会很深。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耸人听闻的大字报简直就像邪恶的魔鬼,闹得人心惶惶、乌烟瘴气。大字报、大标语又不兴落名,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越损越带劲。委员们谈起那些令人心悸的故事,无不义愤填膺。

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说:"取消'四大'完全必要。第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证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权利……"

"就是嘛!有人搞'四大',我们自己却搞不了'四大'。这恰恰是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权利。"有人插话道。

"第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可乘之机。"曾任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杨秀峰讲起话来不离本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号,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坏人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魏京生之流就是这样干的。"

"可不是吗?魏京生钻的正是'四大'的空子!"

"照我看,安分守己的人是不会搞'四大'的,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才善于搞'四大'。"

"阴谋家也总是利用'四大',来做文章的!"

"我一看见大字报、大标语就感到头皮发麻,这种'大民主'早就该取消!"

……

与会者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杨秀峰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第三,把'四大'写进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它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生

产秩序、生活秩序和教育科研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第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革命到'西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对！魏京生案件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四大'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胡愈之说道："从实际来看，'四大'不但不利于发扬民主，而且还破坏了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被利用来搞所谓大民主，宪法被践踏，公检法机关被'砸烂'，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

经济专家许涤新说："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来看，'四大'实际上是野心家、阴谋家打击好人的工具，是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四块石头，四根铁棍子。十年的实践证明，搞'四大'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得到保障。"

"大家忙着搞'四大'，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业务、搞生产，势必使生产受到破坏。林彪、'四人帮'利用'四大'制造派性，天天大吵大闹、大批斗、大围攻，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总而言之，'四大'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如果不取消，对国家和人民都不利。"

"对！我们那个地区，有的人现在还在利用大字报扰乱人心，破坏安定团结搞四化。我们要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样就可以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四大'攻击干部、诬陷好人，扰乱思想，破坏革命和生产。"

戏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用清脆的声音说道："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四大'搞破坏的流毒和影响还很深，不能低估。我们要认真进行宣传教育，做好思想工作，进一步澄清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她的话音刚落，又有一位委员接着说："还要注意一点，社会主义民主与'四大'，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在宪法中取消'四大'的规

定,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公民得到应有的民主权利。”

经过委员们认真热烈的讨论,赞成本次人大常委会议把中共中央建议的内容作为一个议案,提请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决定。

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题,就是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副总理职务和接受吴德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委员们对这三个人的辞职都很关心,中共中央为此做了认真细致的工作,向他们介绍了纪登奎、陈锡联和吴德等人所犯的错误,印发了他们的检查,从而使中央的决定得到了委员们的理解和支持。

在最后一天进行提案表决时,除宋庆龄等人因“身体不适”,没有参加大会之外,到会委员以绝对压倒多数通过了提交表决的各项议案。

宋庆龄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堪称德高望重。她虽然没能参加表决,但表示尊重大多数委员所通过的各项决议。

在民主党派中,有的人士对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持不介入的态度,这在当时亦是不难理解的。

5月15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的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发出公告:

“为深切悼念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定于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同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在此之前的5月13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派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步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中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凌华春,与刘少奇的亲属一起,前往河南迎取刘少奇的骨灰。5月14日下午,河南省暨郑州市举行了隆重的骨灰迎送仪式。

5月14日下午4点,运送刘少奇骨灰的专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彭真、乌兰夫、韦国清、方毅、倪志福、彭冲、宋任穷、谭震林、薄一波等在舷梯旁迎接并护送刘少奇的骨灰前往人民大会堂。

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社论。社论指出:平反刘少奇同志的冤案,是恢复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主要领导人的名誉,是恢复受到刘少奇同志冤案牵连的千千万万干部、党员、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的名誉,也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恢复我党和我国政治生活的本来面目。把刘少奇同志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党内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总代表",不仅冤枉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歪曲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真相,打击了为数众多的党员和社会各阶层群众。无数忠心耿耿的革命干部和英雄模范被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黑干将"、"黑爪牙"、"黑样板",无数勤勤恳恳的工人党员、农民党员,被诬陷为"刘修党员"、"生产党员"、"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许多专家、教授和长期同党合作的民主人士,被诬陷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连千百万勤奋学习的青年学生,也被诬陷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黑苗子"。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都被诬陷为"刘少奇的黑线专政"。是非颠倒、黑白混淆,造成了全党和全国政治生活以及经济文化生活的极大混乱,造成了一代人思想上的迷惘,使全国人民直到今天仍然到处感觉到由此而产生的损失和困难。

社论还指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是我们党历史上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要公开平反像刘少奇这样重大的冤案,不仅是一个难以作出的决定,而且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首先,刘少奇同志一案是不是冤案,并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轻易判断的。从怀疑这案有错,到判明纯属冤案,不能不经历一个认真调查、反复核实的过程。""其次,要不要公开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简单。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中央在考虑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到它的后果。"

事实证明,"刘少奇同志的案件既然是假的,就必须宣布是假的。如果中央明知是假的,由于计较暂时的利害得失,秘而不宣,不予平反或不予公开平反,那就背离了自己宣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要失信于全党,失信于全国人民,失信于全世界。因此,中央宁可承担可能由此产生的某些风险,也不能不下决心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这是一个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党的唯一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中全会宣告这一决定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当人们获知中央将隆重追悼刘少奇,并读到这篇社论时,必定是百感交集。从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开始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80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转瞬整整14年过去。

5月17日这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哀乐低回。下午3时,参加追悼会的人们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他们胸佩白花,臂缠黑纱,肃穆地进入会场。万人大礼堂的正门口,悬挂着用黑纱制成的大幅横标,上面写着:"深切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会场主席台正中,安放着刘少奇的大幅遗像。遗像前摆着覆盖了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刘少奇的骨灰盒,周围摆满

了松柏和长青树。

会场里陈放着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送的花圈。

王光美率亲属献的花圈，放在骨灰盒前。

参加追悼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邓小平、陈云、宋庆龄、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李德生、余秋里……陈永贵也参加了追悼会。当他接到通知时，不免有些感到意外。五中全会以后他几乎不再公开露面，这次出来，或许是个好的兆头。

追悼大会按照拟定方案，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这是我党和我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党采取这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场，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这时，站在刘少奇巨幅遗像下的王光美已经泣不成声。这种最高规格的追悼大会和对刘少奇的高度评价，使王光美及其子女亲

属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象,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造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邓小平致悼词后,全体与会者向刘少奇遗像三鞠躬。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乐曲声中,大家依次走到王光美及亲属跟前,同他们握手慰问。

在与王光美握手时,华国锋伸出双手握着王光美的手说:"光美同志,请您节哀。"

"华主席,我们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以后,已经挺过来了,再大的困难也压不垮我们。"

华国锋没来得及仔细品味王光美的话,一脸严肃地挨个与刘少奇的亲属握手。

邓小平稳步走过来了。王光美握住邓小平的手,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中国革命离不了你!"

邓小平神情庄重地对她说:"是喜事,是胜利!"

言简意赅,黄钟大吕!

彭真在与王光美握手时,禁不住又是一阵热泪长流。此刻,万语千言也难以表达彼此的心声,道一声节哀、珍重,余言尽在不言之中。

轮到陈永贵和王光美握手时,他只是微微碰了一下便离开了。在那一瞬间,他似乎悟出了"刘少奇是人不是鬼"的寓意。

追悼大会结束。人们缓缓走出人民大会堂，此时正是夕阳西下，彩霞似锦。

刘少奇生前曾多次表示：他去世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和他的亲属尊重他的遗愿。中央书记处将散撒骨灰的任务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执行。

也许是一种巧合，5月19日的《人民日报》，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发布了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的消息。这枚洲际导弹的试射成功，标志着中国的核力量又有了质的飞跃！

5月19日上午，刘少奇的骨灰在治丧委员会代表和刘少奇亲属子女的护送下，从北京乘专机抵达青岛。飞机在青岛流亭机场降落时，山东省、青岛市、海军司令部、北海舰队的负责人前往迎接。然后，护送骨灰的车队离开机场，直接开往青岛港三号码头。

北海舰队派出1艘导弹驱逐舰和4艘护卫炮舰执行散撒骨灰任务。按照国家元首的规格和礼遇，在军港，解放军官兵和众多的人民群众为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作最后的送行。

11点45分，军舰在绵绵细雨中缓缓离港。出港后编队快速驶向黄海海域。午后1时许，在哀乐和21响礼炮声中，刘少奇的骨灰开始撒向浩瀚无际的大海。此刻，满天阴霾，飘飘洒洒的雨点，恰如天公挥泪，湿冷湿冷的海风也在悲鸣呼号。

军舰的后甲板上挤满了人。刘源打开骨灰盒，王光美最后一次亲偎着骨灰袋，缓缓地打开袋子，看见了洁白如雪的骨灰，泪如泉涌。黄海大公岛的附近海域，王光美撒下了第一把刘少奇的骨灰。接着，她捧了一把骨灰交给了小女儿刘潇潇……她失声痛哭！尔后，刘少奇的子女和亲属，以及原来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人员和刘少奇老战友的孩子依次散撒。随着刘少奇的骨灰和鲜花不断地抛

进大海,人们俯身在船舷边,凝望着,呼唤着,哭泣着。哭声和呼喊声,风声和海浪声,震撼着天水茫茫的黄海……

中共中央郑重地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举行如此隆重的治丧活动,不仅是一种必然,也不只是感情激动爆发的最后时刻,而是对十年浩劫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还是那位世纪老人看得深刻:为刘少奇平反"是喜事,是胜利!"真的,天似有情天亦喜——下午,军舰返航,青岛天色转晴,疏云艳阳。

## 8—3 入主国务院新总理亮相 解除职务"永贵大叔"赋闲

"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

唐代诗人王勃的这一名句虽是咏风,倘若用以喻事,则又是另一番意境。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中共上层进退去留的引人注目之处,除了汪、纪、吴、陈辞职之外,就是两位新进常委:胡耀邦、赵紫阳。

翻开两人的简历,都有不俗的表现:

胡耀邦 1915 年 11 月 20 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 年加入共青团,1933 年转为中共党员。14 岁离开家乡到红色根据地参加革命,从做儿童工作直到任中央苏区少共中央秘书长。1934 年参加长征,任中央工作团团员,军队团的总支书记。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纵队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担任过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团中央书记,陕西省

委第一书记。粉碎"四人帮"以后,先后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等职。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非凡的革命胆略和勇气,深得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戴。

赵紫阳,河南省滑县人,1919年生,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冀鲁豫根据地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1971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不久又调回广东省委任书记、第一书记。1975年后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在四川率先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特别是四川的农村改革和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赵本人也因此而在四川享有盛誉。

十一届五中全会过后的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常委分工。在开会之前,李先念向华国锋介绍了准备讨论的内容,其中有一项,就是关于党政分开和政府总理的人选问题。

会议开始后,常委们对党政分开讨论热烈。

叶剑英说:五中全会的公报一发表,立刻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对那四个犯了错误的人,处理也比较适当,符合安定团结的大局,下一步是考虑如何使常委们更好地分工,以便发挥每个同志的作用的问题。根据党政分开的原则,我认为华主席不宜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把这个职务让给更合适的同志来担任。

华国锋问:"那么,谁更合适呢?"

"我看赵紫阳同志就比较合适。"邓小平马上答道。

其他几位常委也赞许地点了点头。

华国锋一看阵势,心里清楚了三分,他面无表情地说:如果大家一致同意,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不过,这件事还得由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在人大常委会讨论批准之前,对外我还是名义上的总理,对内由赵紫阳同志全部负责。这样,工作搞得好与坏,我就不再负责任了。

"这样说不大合适吧。"陈云看了一眼华国锋说到:你毕竟是党的主席,工作是大家分头干,班子里你是班长嘛,怎么能说没有责任呢?再说,党中央主席不宜兼任国务院总理,这早已是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为什么毛主席在50年代坚决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就是为了党政分开,腾出主要精力来学习,来抓中心工作,也就是他常说的国内外大事。现在,常委们都一致希望华主席能尽快熟悉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过程,多积累一些经验,避免走弯路。所以要尽可能地为你分担些工作,这是好意。

陈云的话滴水不漏,华国锋听起来也觉得在理。

胡耀邦见机又说,自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班子一直实行分工合作,集体领导的原则,所以各项工作都进行得不错。他希望华主席能从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华国锋知道再持异议也无济于事,便表态道:"请同志们放心,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也会很好地遵守党的纪律。既然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么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赵紫阳见暂代国务院总理的事这么利索就定了下来,多少有些意外。一想到那些在他头脑里思虑良久的改革措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兴奋之情也溢于言表。

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培养和选拔接班人,是"一项重要的迫切的战略任务"。选拔接班人最重要的是,"看他在实践中的表现,是不是真心实意地拥护和坚定不移地贯彻

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3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提出的十二条对于加强党的建设至关重要。《准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新闻媒体早在五中全会之前就已透露,但将它全文公诸于众,又是一个举措。《准则》提出“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性,根绝派性”等条款,对身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似乎并不有利。例如,《准则》提出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那种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巨大障碍”。

“在常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

“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许用剥削阶级的阿谀之词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不许歪曲历史和捏造事实来宣扬领导人的功绩。禁止给领导人祝寿、送礼、发致敬函电。对活着的人不许设纪念馆,对已故的领袖们不应多设纪念馆。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街名、地名、企业和学校的名字。除外事活动外,禁止在领导人外出时组织迎送,张贴标语,敲锣打鼓,举行宴会。”

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之后,很快担负起第一线工作,而政治局、中央常委居于第二线的构想也逐步付诸实施。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一上来,就在党务、政务活动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

4月14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率领意共代表团访华,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前往机场迎接。贝林格在京期间,除分别与华国锋、邓小平会见之外,主要是与胡耀邦打交道。胡

在与贝林格会谈和会见意大利记者时所表现出来的善辩、机智和敏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紫阳4月16日被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副总理。五天后，《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发表了他在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题为《研究新问题，把经济改革搞好》，虽然是一个多月前谈的四川改革，但其中的不少改革思路对于全国来说也有借鉴意义。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赵紫阳在内定为政府总理之后，便摆出实行经济改革的姿态，显然是想有所作为。

此时的中国大地，正在掀起改革的大潮。被称为"象牙塔"的高等学府和社会精英的大学生，也融入了时代变革的主旋律。

清华大学化学化工工程系七七届二班同学提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集中地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一种同心同德，振兴国家的心态。

对这个被新闻界誉为"80年代最强音"的口号，以及清华大学化工系77—2班学生讨论的情况，邓小平在1979年底就已知道并予以肯定。1980年3月20日，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个行动口号的提出。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报道了这条消息。

对于发出这个时代强音的35位清华学子来说，他们是在历史的转弯处进行痛苦反思之后，找到了一条符合现实逻辑的自强之路。而对于一个正在走出当代迷宫的民族来说，这无疑是道出了一个历史转折的真谛。

4月17日，《人民日报》又详细报道了这个口号提出的过程。此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便成了一个响彻神州的口号。

这个口号使人想起了邓小平的"先干起来再说"。

知识界和少数先行者的振臂疾呼，反映了从上到下变革图强

的迫切愿望。

4月26日，中纪委座谈会在说明全党极为重视贯彻《准则》时，也特别强调指出：广大党员要从自己做起从每件事做起。不尚空谈，求真务实，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

5月5日，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主席铁托逝世。对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反应十分迅速，吊唁活动及派代表团出席葬礼都是异乎寻常的高规格。当天晚上，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一同前往南斯拉夫驻华大事馆吊唁。华国锋在留言簿上题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法西斯战争的著名英雄、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南斯拉夫人民敬爱的领袖、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铁托同志永垂不朽。"高度、全面地评价铁托的一生。

邓小平的题词则很简练："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中国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他！"把握分寸，不溢美。

第二天上午，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飞赴贝尔格来德，参加铁托葬礼。到达贝尔格来德后立即前往联邦议会大厦，会见南联盟领导人。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又把前一天的题词在铁托吊唁簿上重复了一遍。在南期间，他分别会见了罗马尼亚、朝鲜、赞比亚、意大利、孟加拉、印度、日本等国家的领导人，外事活动安排很紧凑。

华国锋此次出国没有公布由谁来代行总理职权。但是5月9日赵紫阳副总理会见日本著名物理学家茅诚司的消息和照片，似乎又让人明白了这个问题。

5月11日晚，当华国锋回到北京时，邓小平、彭真等人到机场迎接。一切都安排得紧张、有序、得体。

接下来便是主持刘少奇的追悼大会。两起重大的丧事活动，简

直让华国锋累得够呛。那天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他碰到了陈永贵。他见陈永贵心绪不大好，也没来得及仔细询问。

但是，他知道最近一个时期，从山西到北京，对大寨和昔阳的批评越来越激烈。4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西省委严肃处理诬陷迫害李桂花事件的消息，宣布开除《山西日报》副总编宋莎荫、《山西日报》摄影部主任王祥云的党籍，并建议司法机关追究王的法律责任。宋莎荫是当年写《大寨之路》的作者之一，这篇文章曾使大寨蜚声海外。李桂花事件的起因，与大寨有关。此案是在中纪委的参与下处理的，《人民日报》还为此发了编者按，事情也就不那么简单。他想为大寨和陈永贵说几句话，但又觉得有点力不从心。

对于陈永贵来说，并不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他不像一些人那样精于宦海，也不像一些人那样善于见风转向，随机应变。作为一个勤劳本分、对党和毛主席忠心耿耿的劳动模范，他的本质是好的。大寨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做过"左"的事情，但也并非全都出自陈永贵的本意。邓小平说他不是"四人帮"的人，这使他感到放心不少。一个农民，只是由于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才跻身政坛高层，许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此时，他想得也很干脆，不行就回家种地，在虎头山创业照样有作为。

刘少奇的追悼会虽然开过了，但大张旗鼓地宣传刘少奇的活动并没有结束。《人民日报》随后又发表了《湖南人民深切怀念少奇同志》、《卓绝的贡献，学习的典范》、《少奇同志，河南人民怀念你！》、《恢复历史面貌，重现光辉一生》等一系列文章和报道。

根据中日双方的商定，华国锋将出访日本。日本方面也早就传来信息：他们热烈地期待着中国政府总理对日本的正式访问。

5月27日，华国锋启程飞赴东京，这一次同样没有向外界说明由谁代理他的总理职务。

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在“六一”茶话会上发表讲话的是赵紫阳。他号召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放在重要位置，要关心‘小雷锋’、‘小虎子’、‘小红花’的健康成长。”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一代新人。

同日，华国锋结束访日回到上海。在上海，他视察了宝山钢铁总厂。对宝钢，他是有感情的，当初对上这个项目，他曾寄予了很大希望。实行经济调整，宝钢继续上马，总算是保住了一点成果。说他对宝钢建设十分关心，倒也是情理中的事。

离开上海后，华国锋来到江苏视察。江苏省对他的到来十分重视，又是夹道欢迎，又是专场演出，还把全省100多位县委书记集中到南京。他的光临，使南京的官员好一阵忙碌，南京市民也因一些路段进行清道或禁止通行而感到不便。

当他回到北京，已是6月4日。邓小平、李先念、彭真、赵紫阳等人都到机场迎接，祝贺他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他知道邓小平正在组织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邓小平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张，他是极力反对的。

但是，情况的发展对他愈来愈不利。

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标题是《量力而行是基本建设的重要方针》。社论说，建国30年来，我国基本建设发生了两次大的起落，一次发生在1958～1960年，另一次发生在1970～1978年。其中，1978年积累率高达36.6%，基本建设规模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峰，结果是欲速不达，不得不作再次调整。“这个严酷的事实说明，那种只凭主观意志办事，不顾客观条件，只讲需要，不看可能，只图虚名，不考虑实际经济效果的做法，是极为有害的。如果再不改弦更张，量力而行，那么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越来越低。那才是误国误民，遗患子孙后代。”

看起来,他担心的事情将要发生了。

不出所料,6月12日,《人民日报》又推出一篇题为《欲速则不达》的社论。认为"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水多加面,面多加水,过去我们已经吃够了苦头。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应当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终于,一篇震惊全国的文章,把大寨和昔阳的问题捅了个底朝天。

6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长篇文章。文章说,"西水东调","是一个不顾自然条件,不讲经济效果,只凭某些人主观意志,硬抢别县的水源为己有的劳民伤财的工程。决定缓建后,广大群众、工程技术人员说:'早就该这么办!'"

所谓"某些人",明显是指陈永贵和当时山西省的负责人。但是,问题也牵扯到华国锋,因为他对这个工程是支持的。

《人民日报》为这篇长文配发了题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的社论。

"西水东调",就是从昔阳县境西部截住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从地下引向东流,经过昔阳县的5个公社,改入海河水系。这样,可使昔阳发展为7.42万亩水地,改善1.58万亩灌溉面积,共计9万亩耕地。

文章指出,这项工程的主要特点是:规模庞大,施工艰难;浪费巨大,劳民伤财;资源利用极不合理。并分析了"西水东调"工程上马的原因:"是在'想新的,干大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干起来的,是昔阳个别领导人凭借自己的权势主观决定的,而且是得到批准和支持的。"

据说记者前去调查时,适逢电影《泪痕》在当地上映。有人议论

道，电影反映的好像是这里的事。当然这也许有某种偶合之处。“值得深思的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明明是劳民伤财而要硬干下去的事？这个工程从提出到批准的过程，使人感到这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却可以从中嗅到一种带有浓重封建气味的东西！”

看到这张报纸，陈永贵差点没气晕过去，没想到日夜操劳，勤勤恳恳，竟落了这样的结果。

更让他恼火的是那篇《社论》。经过一番对“西水东调”的分析后指出：

> 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战线拨乱反正，革除积弊，是有很大成绩的。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传达了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和规定，社队的自主权开始受到尊重，各种生产责任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开始得到贯彻，社员的家庭副业、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受到保护，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整个农业经济活了。这是农业生产大有希望之所在。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再也不能搞林彪、“四人帮”那套极左的东西，再也不能用一个模式来套所有的社队，再也不能搞“西水东调”这种劳民伤财的农田水利工程了。
>
>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技术人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干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们的封建家长式统治。
>
> 家长式统治是一种封建思想。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虽然封建制度早就打倒了，但是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的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

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带有封建色彩的东西。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得好得多。

最后这一段,好像也是冲着华国锋来的,因此当他读完这篇社论后,总觉得不是个滋味。粉碎"四人帮"后他所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这是他"抓纲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他高举毛泽东旗帜的重要表现。为了树昔阳这面旗帜,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关心,搞"西水东调"有利于昔阳的农业发展,未曾想出现这么多问题。不过,当他把社论同农村改革的深入和五中全会前后的争论联系起来时,便很快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报纸上现在宣传的是凤阳经验,大包干已有燎原之势。

6月30日至7月4日,华国锋由辽宁省党政军负责人陪同到旅大市视察。在那里,他参观了大连新港,视察了当地的工厂和部队,并登上519号导弹护卫舰,参加了该舰的航行。在他视察期间,当地报纸天天套红大肆宣传,他的照片大量刊登。5天之内,他题字7次,题词2次。这次旅大之行,风风光光。

7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醒目位置报道:"《山西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总结推广大寨、昔阳经验的严重教训。"并摘要转载了这篇长文。

在此之前,《人民日报》于7月8日曾发表过一篇《说假话者戒》的评论员文章,严肃批评了昔阳自1973年到1977年的粮食产

量虚报问题。

这一连串的曝光，使大寨、昔阳面临更加尴尬的局面。老家的乡亲给陈永贵捎话，劝他急流勇退。胡耀邦也找陈永贵谈话，要他争取主动。

华国锋知道陈永贵的困难处境，但此时他自身难保，实在是爱莫能助。

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中强调：报纸上要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工、农、兵、知识分子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成就，多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决议，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意义的活动和讲话。

中央发出这个指示，选择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机，其意义和作用将在以后的政制变化中显现出来。

8月下旬，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将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决定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调整国务院领导成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人事变动的方案。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一个长篇讲话，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一上来就宣布：

> 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同志接替；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同志和我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王任重同志因任党内重要职务，也不再兼任副总理。陈永贵同志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中央决定同意。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人选，经过与有关各方协商，也准备建议做一些变动。

关于考虑调整人事的原因,邓小平讲了四点,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他说:

我在今年一月十六日的讲话中说过,对"四人帮"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拔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耍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

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人来说,邓小平的这段讲话不啻兜头一盆冰水。

只听他那四川口音继续在大厅里回荡:

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

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对其他领导人的纪念,有时也带有个人崇拜的成分。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利于扫除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这个指示还为纠正这一类缺点，作出了若干规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还要说到，1958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听到这里，华国锋的脸上一阵发烫。邓小平明摆着是在公开批评他，那些在粉碎'四人帮'后没做好的事，现在都成了批他的把柄，他说不清是委屈还是恼火，总之是很不舒坦。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前夕，国务院公布了对"渤海2号"翻沉事故的处理决定。

"渤海2号"是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的一艘钻井船，于1979年11月25日凌晨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途中翻沉，死亡72人，直接经济损失3700万元。这是建国以来石油系统最重大的死亡事故，在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重大事故。

造成"渤海2号"翻沉的主要原因，是海洋石油勘探局在接受石油部命令"渤海2号"紧急迁移井位的难于完成的任务后，采取了违反拖航安全的错误做法，冒险降船、拖航所致。

事故发生以后，有关领导人不是认真吸取教训，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而是掩盖矛盾，逃避责任，声称要把"丧事当作喜事作"。又是评英雄，又是摆酒宴，鼓吹"渤2"不怕牺牲的精神，开展大总结、大评比、大宣传、大表彰的活动。这种轻轻松松"交学费"，视工人生命如儿戏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

国务院的处理决定说：事故发生8个月以后，石油部仍然没有严肃对待。只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严厉督促，全国总工会和社

会舆论同声指责，石油部才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比较深刻的检查。

决定认为："渤2"事故的发生，石油部领导人负有不可推诿的重大责任；国务院领导人对这一严重事故处置不当，也是重要失职。

据此作出决定：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除宋振明石油部部长职务；给康世恩副总理记大过处分；对死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他们的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

《人民日报》8月27日发表长篇社论《深刻的教训》。社论说："渤海2号"事故发生已9个月了，到今天才得到处理，这说明有些问题处理起来还不那么容易。"渤2"问题和此前昔阳的"西水东调"问题，都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解决的。"渤2"事故最重要的教训，就是骄傲不得。一旦骄傲，"一言堂"就出来了，唯心论、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多起来了。社论对那种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一贯正确"的地位，而不尊重科学，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指责。

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之前采取这一举措，无疑极大地增强了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一位读者写信反映："仅仅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全国人民受到了两次震惊。"一次是7月22日报纸披露了"渤2"事故，一没讲遇难者"临危不惧、英勇搏斗"的"英雄"事迹；二没谈"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而是把这起重大事故原原本本公诸于众。还看到要求对有关领导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呼声，读者难免为之一惊。第二次就是国务院处理了副总理、部长这样的"大官"，这是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类似"引咎辞职"在中国绝无仅有，副总理因过失而受到处分更无先例。这两次令人震惊的冲击，产生的却是鼓舞、振奋和信心。

从“渤2”事故的处理中，人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

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正式举行。外国通讯社和报刊对这次会议十分关注。合众国际社认为，这次会议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是“中国的一个里程碑”，说它将批准政府领导人的更迭，从而开始一场新的“领导层的革命”，这将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事”。日本《东京新闻》的社论指出，这次会议“是为确立现代化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会议”。“新的领导机构如果通过这次大会进一步加强合理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色彩，实现新老更迭，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和法制化肯定将更加强有力地得到推进。”有的外国报纸披露了邓小平“8.18”讲话中隐晦批评华的某些内容，认为：“宗法式的终身制和由‘家长’指定的接班人制度并不能使‘家长’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变得更智慧”。

……

总之，国际舆论对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表示了特别浓厚的兴趣。

9月2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案件的直接责任者。判处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马骥祥有期徒刑4年；王兆诸有期徒刑3年；张德经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蔺永志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此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了结，反映了中央高层推进政治民主的决心。

9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冶金部长唐克等人接受了出席人大会议的北京代表团成员的质询。

这次质询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宝钢建设。刘达、王惠德、钱钟泰、李瑞环等人分别提问：宝钢建设究竟要花多少投资？工厂建成后能出多少产品？建设这么一个厂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工厂的选址是否恰当？工程质量如何？……

唐克看来早有准备,他列举了大量数据对代表的质询作了回答。未尽周详之处,副部长叶志强、周传典作了补充说明。

尽管这是一次心平气和的质询,但提出的问题不能说不尖锐。因此,唐克在肯定建宝钢的举措之后,也承认:冶金部对量力而行的原则考虑不够,上马仓促;没有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没有请各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准备工作有许多欠缺的地方;如果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可再节约一些外汇。在资金使用上也存在一些浪费现象,买了一些不该买的东西。他表示:冶金部正在组织检查。

科学决策,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极左思想的流毒,按客观规律办事,在代表中间引起强烈共鸣。

9月7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他神情严肃地宣布,他已向中共中央提出并经中共中央决定,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提议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并且特别说明,中共中央认为,赵紫阳担任总理是适当的,是可以信赖的。同时提请审议的还有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等不再兼任副总理,以及陈永贵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9月9日,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大会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和有关人士的辞职请求,批准了中共中央提请审议的新一届政府负责人名单。

9月10日,会议宣布胜利闭幕。会议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了公民的所谓"四大"自由。在通过有关人事任免的决议时,将陈永贵解除职务与其他人作了区别。决定赵紫阳为总理,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副总理。叶剑英在致闭幕词时,对提出辞去副总理职务的五位老同志和辞去副委员长的五

位老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建议全体代表起立鼓掌以表示敬意和谢意。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人们注意到叶剑英没有提到辞去总理的华国锋和请求解职的陈永贵。

9月12日，《人民日报》为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胜利闭幕发表社论，称这是一次"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特别指出：这次会议的开法，也有很多革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央领导同志同其他代表一起入座，不像过去那样，等代表们和主席团成员都入座以后，才登上主席台，全场起立鼓掌。主席台上不挂领袖像，而是挂国徽。"领导同志与大家一起讨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以领导人身份去"探望代表"。

沈其震的一首《浪淘沙》作了如下感慨：

封建几千年，世界空前，妖魔鬼怪总纠缠。
一个灵魂深烙印，难舍难捐。
五届会群贤，聚议回天，重温无佛更无仙。
科学文明齐上阵，十亿中坚。

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大会的政治民主化色彩较之以往确实是浓厚得多。连外电也评论说中国政府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告，对问题坦率暴露的程度"令人吃惊"。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质问和批评，以及对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的质询和意见，都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的"激烈、尖锐。诸如宝钢的问题，大寨的问题、财政赤字问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和"渤海2号"事件等等。

作为共和国第三任总理，赵紫阳一上任就表现得不同凡响。他接任总理后的第二天，适逢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到京，在机场迎接马尔登时，新任总理潇洒自若、谈笑风生。

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纷纷电贺赵出任总理。日本共同社记者的评论说，这是第一个务实性内阁，中国人民对这个新体制寄予了很

大希望,这是由于行政领导能力受到高度评价的赵总理的上台,经济活动能出现生气,生活水平能迅速提高。也许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人民日报》在9月14日的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四川五个企业试行自负盈亏,搞活经济实现增产增收的消息,并为此发了编者按。众所周知,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全国之先,作出这种安排未必都是巧合。人们有理由期待通过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调整,使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出现更快发展。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人事变动,完成了酝酿已久的国务院领导成员调整,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体制。胡耀邦、赵紫阳在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的突出地位,以及书记处、国务院主要成员的构成,已根本改变了过去的人事状况。

斗转星移,人世巨变。经过一番风雨洗礼的中国,迈步走向更加成熟和稳健。

## 8—4 华国锋职务变动 胡耀邦升任主席

秋天的北京,正是一年最好时节,漫山的枫叶如霞似锦,古老神圣的天安门越发显得辉煌壮丽。然而,这一切并不掩饰"多事之秋"的意蕴。自从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正式宣布卸去总理职务之后,华国锋的外事活动明显减少多了,但作为党中央主席,在名义上他仍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有些重要的外国访华使者,也还是要见的。

9月13日,他会见了来访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马尔登说:我很荣幸能在贵国进行重大改革的时刻到中国访

问。你们的改革计划有着深远的影响。

华国锋说,这次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调整是国家领导体制的重大改革。要从中央到地方使党政分开。这次他和几位副总理辞去国务院的职务,就是为了使国务院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作系统。

几天以后,华国锋又会见了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这是一位84岁高龄的总统。

这次会见的一个话题饶有兴味。

华国锋对佩尔蒂尼说:我听说你昨天对叶剑英委员长说起你不想担任总统职务,但是,意大利人民又不允许你辞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没等佩尔蒂尼答话,在座的意大利外长科隆博便插了一句:"我们也不同意他辞职。"

华国锋笑着点点头:哦,可见这是因为你德高望重,受到人民尊敬的缘故。

佩尔蒂尼谦逊地摆了摆手,不置可否。

华国锋继续说道:我们的叶剑英委员长也曾几次提出辞职,但中国人民和政府认为他德高望重,所以,不同意他辞职的请求。

佩尔蒂尼说:是啊,年纪大的人固然有其不便之处,但也有他们的长处,那就是他们可以从过去的错误汲取教训,更好地履行自己对国家、人民的义务。这些话让华国锋听起来好像有些耳熟,敢情中国人和外国人也是所见略同。

于是,华国锋打开话匣子,向意大利客人介绍了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情况。

华国锋的直率使佩尔蒂尼感到高兴。

当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国才式锅炉"骗局被戳穿的消息。李国才原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建设公司加工班班长,过去也做

过一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是“红色造反司令部”及“赤卫军”的头头之一，从吉林市民兵总指挥、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一直升到石化部副部长、化工部副部长，堪称“劳模造反做官”的一个典型。

报纸说，李国才在1972年前后设计的“国才式锅炉”曾被吹嘘为运用了“对立统一哲学”，“国内没有看见过，世界资料也没有发现，是全国头一份”，“锅炉史上的创举”，云云。实际上，这种锅炉的热效率比国内工业锅炉规定的最低值还低14%，钢耗量比国内平均水平高2倍多，根本就不是什么先进设备。在这一骗局被戳穿以后，李国才恼羞成怒，对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威胁恐吓，从而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有人说：“李国才作为副部长不称职！”更有人大声疾呼：“今日之中国，滥竽岂能充数！”

像李国才这种“劳模造反”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红得发紫的人物。当时有一部“革命现代京剧”《春霞初绽》，就是以他为原型并经他修改审定编排出来的。

如今，终于被揭穿了“西洋镜”，昔日的辉煌，都伴随着历史烟云的逝去而归于沉寂。

9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西省平定县广播站青年工人岳增寿因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和大寨的一些问题，并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18年徒刑的冤案，最近得到平反的消息。

岳增寿从1974年5月到1976年12月，先后给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叶剑英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写了12封信（其中9封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这些信反映了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为强奸幼女犯王金魁翻案和弄虚作假的问题。报纸虽未点名，但一看便知指的是陈永贵。

1977年4月,平定县人民法院、平定县委分别向晋中地区中级法院和晋中地委作出书面报告,以"恶毒攻击大寨红旗"、"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等为理由,呈请对岳增寿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不几天,晋中地委批准晋中地区中级法院将岳增寿刑期增加为18年。同年4月25日,平定县法院正式作出刑事判决书,接着就在全县10个公社、3个厂矿和县城进行宣判,游斗岳增寿。当时,岳增寿不能站立,就绑在椅子上,捆在汽车上连续游斗了5天,然后投入监狱,致使岳增寿瘫痪。

岳增寿及其家属蒙受不白之冤,一直据理申辩。在受害者再三申诉下,平定县委才于1979年1月25日把岳增寿放出来。2月11日,平定县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一方面说"原以反革命判刑不当,宣告无罪,立即释放",另一方面仍然把岳增寿信中被认为是"诬谄"陈永贵的3个问题,写进再审判决书中,留下"尾巴"。岳增寿认为这是对他的陷害,就向晋中地区中级法院提出上诉,而晋中地区中级法院以"上诉无理"驳回了岳的上诉。

岳增寿和其家属冲破阻力,继续上诉,并向上级党组织和有关方面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在上级党组织和有关方面的督促下,平定县委于1980年8月20日作出给岳增寿平反的决定,并在8月23日召开平反大会。岳增寿与其妻子李金鹏得到团圆。

平定县委承认岳增寿向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写的信,批判了江青的罪行,反映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大寨大队以及农业学大寨中的一些问题,是正当行为,反映的问题和看法是正确的。在一些报刊上说岳增寿给"四人帮"写黑信,是颠倒黑白,是政治上的诬陷。承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岳增寿18年徒刑,并株连其家属和其他一些人,是一起新冤案。

8月25日，晋中地区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宣告撤销平定县法院和晋中地区中级法院对岳的一、二两审判决书、通知书，并承认岳案属冤案，应予平反。

9月18日，昔阳县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布撤销无罪释放强奸幼女犯王金魁的错误判决，维持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的原判。

据查，王金魁自1961年至1964年在昔阳县杜庄大队小学任教期间，先后强奸幼女6人、猥亵幼女9人的犯罪事实属实。1965年王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但在1974年由于陈永贵的授意和策划，致使该案错翻，宣布平反。山西省高级法院、晋中地区中级法院和昔阳县公检法组织联合调查组，经过复查，确认这是一起"人妖颠倒、放纵罪犯的错纠案件"。故将该案再翻过来，虽然王金魁已病死，但人妖已分明，法制受到维护，人心为之大快。

岳增寿、王金魁两案的曝光，对陈永贵是一个痛苦的打击。他知道，此时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单位的一些记者，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正在大寨和昔阳等地调查采访，并分专题写出了10多万字的内部报道。这些上了"内参"的材料系统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昔阳和学大寨运动中的问题。山西省委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连续召开会议，写出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初步总结。

陈永贵认为，这些揭发材料有许多是不真实的，但他又有口难辩。山西是他的大后方，没想到当初鼎力抬举他的山西，反倒成了批评他最厉害的省份之一。他感到很懊丧：看来真是应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墙倒众人推。

9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六次会议。在宣布这次会议召开的当天，《人民日报》公布了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部分提案，涉及"赤脚医生须改名"、"成立民意测验委员会"、"解决插队知

青就业后工龄问题"、"严格控制修建纪念建筑物"和"建议湖南省停建长沙革命公墓"等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一项"恢复原国歌歌词"的提案引人注目。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是在1978年二三月间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修改后的歌词明显逊色于原作，而且也不能与原作的韵律相配，唱起来很不像回事。

钱钟泰、关山复、冯至、许明月等提出：(一)原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名作家和音乐家田汉、聂耳的传世之作，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可灭亡的英雄豪迈情操，是一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曲。开国时，经首届政协通过为国歌，体现居安思危的精神，深入我国人心。(二)修改国歌歌词，是在极左思潮流毒尚浓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当时所谓的理由有二：一曰原歌词的作者"有问题"；二曰我国社会主义形势大好，不能再提"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今天看来，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三)新国歌歌词，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欠妥。(四)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新国歌歌词并不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听不见有人唱。因此，提议恢复原国歌歌词。

这项提案一经提出，便引起了上下各界的热烈反应。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拨乱反正更加逼近现实。

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这次人大常委会议决定组成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就在这年秋天，一封寄自江西鄱阳湖畔监狱的挂号信，向新华社记者透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23岁的青年女工李九莲因反对林彪、同情刘少奇并对华国锋有所批评而被定为死罪。12名曾为李九莲辩解的干部群众，被判以重刑。

这事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又两个月之后，距党的十一大召开也有5个月之久，"这可能吗?"带着极大的义愤，新华社记者

戴煌亲临江西赣州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核实,那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李九莲曾因对"文化大革命"和林彪有怀疑而被投入监狱。林彪叛逃后,她未得到彻底平反,只是带着"现行反革命,内部处理"的结论走出监狱。她为自己申辩,并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和声援。1974 年 4 月,李九莲因"反革命翻案"的罪名再次被捕。在鄱阳湖劳改农场,由于她对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无所顾忌地思考与评说,被判处死刑。此案至少牵连数十人同时被捕,其中一人也被判了死刑。

这起冤案使记者受到巨大的震动,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很快写出内参:《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这篇内参所引起的震动是显而易见的。

1980 年的国庆节与以往有所不同,既没有举行上千人光临的大型国宴,也没有规模盛大的游园活动。新任总理赵紫阳仅在一个 400 人出席的招待会上露面。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正在总结经验,愿意广泛地研究各国人民的成功经验。"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人也分别会见了西哈努克、费尔南德斯和黄文欢。

从 10 月份起,全党 4000 名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讨论《历史决议》的初稿,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常委都希望能对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工作作出总结,一致要求在《历史决议》中要写上这一段。

但是,华国锋不同意在《历史决议》讨论稿上写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工作中的失误,对"两个凡是"的本质错误缺乏正确认识,这就自然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功过是非的评论。在讨论中,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心平气和地、严肃认真地批评了华国锋在这几年工作中的失误。

在两个月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时，就有不少人提出：按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况和现实表现来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来衡量，不但把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继续担任领导我们这样一个大党，指挥几百万军队的主席职务也不适宜。还有的人说，毛泽东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这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自然形成的；华国锋则不是，他没有这种历史经验，也没有这样的才干和能力。

这次讨论《决议》，更多的人提出，中央要改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华国锋在一系列的批评面前，已经感到难以招架，改变他的职务，看来已是为时不远。

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个人和家庭是否悬挂和悬挂哪位去世的或现在的领导同志的像，完全由自己决定，各级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干预。今后全国性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时的挂像和举像问题，中央另行考虑。

10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各地过去和现在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视察准备的住房(包括住过的和未住过的)，一律开放，作招待所。

从此，“英明领袖”的巨幅像片、题词和那些曾被视为神圣的东西，逐渐销声匿迹。

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从11月10日起连续开了9次会议。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7名书记处书记列席会议，共计29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和华国锋的功过。

在11月10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

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

与会者认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这应当肯定；但是对这一事件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

正式报道说：在整个会议期间，始终保持了平心静气的气氛，所有发言都没有强加于人。

话虽如此，但是实际上政治局会议对华国锋的批评是极为严肃、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和严厉的。与会者的发言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并长时间坚持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

——在“十一大”前后，华国锋提出的一系列口号，例如什么“抓纲治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这虽然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他负有不可推诿的个人责任。

——除了仅仅与“四人帮”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外，华国锋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对解放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的态度，对中央领导层一些同志的态度，也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

——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

——在1977～1978年两年中，他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搞“洋跃进”。虽然不能由华国锋一人负责，但他确有重要的责任。

——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

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亦是大家知道的。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以邓小平的水平、能力和资历，以及他在党内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由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乃是众望所归。政治局许多同志都有此议。

但是，邓小平认为，由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不适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让比较年富力强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他认为在60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来接替。当然，只有十一届六中全会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

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一致赞同。

在中央政治局举行连续会议期间，中央还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会上，胡耀邦发表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他说：多少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封成神，认为谁谁说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有错误。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还搞了一段个人崇拜。危害之烈，莫此为甚。这样搞，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所以，个人崇拜这种根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须严肃批判，以后再不能搞了。胡耀邦在就任党中央

主席之前的这番讲话,表明了他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决心。胡耀邦富于激情、爱憎分明、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他对个人崇拜和不正之风的深恶痛绝,使他在党内外获得良好的评价。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国锋功过是非的同时,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也于11月20日正式开庭。经过七次会议,对华国锋的问题和处理思路已基本明朗。因此,与会者可以腾出一些精力和时间,观看审判林彪、江青一伙的实况录相。江青、张春桥在法庭上无法无天、蔑视审判人员的顽固嚣张态度,给大家上了十分严肃的一课。除恶务尽,否则遗患无穷。

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并加了很长一段批语(即:中发[1980]83号文件)。批语指出:

> 山西省委总结了大寨大队从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变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省委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检查报告的基本精神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地批评陈永贵的错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恢复过

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实贯彻执行党在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各项政策。只要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大寨和昔阳就不但能够恢复过去应有的荣誉，而且一定可以取得新的进步，同其他先进典型并驾齐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批语还总结了对待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实事求是，因地、因事、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反对"一刀切"和生搬硬套。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以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手段。

劳动模范不仅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优秀分子，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理应得到党、群众和社会的尊敬。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几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运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中共中央的这个批语，正式宣告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终结。批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农业学大寨问题的科学总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伟大转折的一个重要体现。此后，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便在全国广大农村迅猛地推广开来，农村改革之火遂成燎原之势，从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群众勤劳致富的积极性。

经过一阵紧张忙碌,一转眼冬天来临。

1980年的冬天虽然奇冷无比,但那股涌动在社会脉搏中的潮流却奔腾不息。

自从开展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选举活动以来,一种长期遭受压抑和扭曲的民主政治意识急剧膨胀,以所谓的"新三级学人"为主体的高校竞选风潮此起彼伏,竟致形成了80年代的第一波学潮。

在当时全国开展直接选举活动的1200个县级政权中,尤以中心城市的选举活跃异常。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西安、成都、贵阳……几乎所有大城市的高等院校,都弥漫着一股不安分的空气,而这股空气也向城市各社区飘溢。

在大学校园中,教室的墙壁上,饭厅里,图书馆门口,随处可见张贴的竞选宣言和竞选声明。油印、复写的竞选提纲和传单被分发到学生们的手中。

校园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一群学生拉过饭桌,架起简陋的扩音设备,然后参加竞选的人争先恐后地跳上饭桌,慷慨激昂地发表竞选演说,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参政意识和从政才干。台下成百上千的学生为他们鼓掌、敲饭盒或喝倒彩……

人们都仿佛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民主,体悟人生。他们细细地品味着竞选者的演说,置身于这样一个空前规模的县级直选运动,太需要冷静与思考。

可是,在否定与肯定之间缺乏明晰认证的情况下,参与的泛化导致了五花八门的结局。有的高校学生竟在自己神圣的人民代表选票上填上了孔子、曹雪芹、莎士比亚、罗曼·罗兰、孙中山、袁世凯……

不言而喻,校园热点的形成与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思想理论

界的各种争论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于决策圈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好秩序重建的权威问题。

11月29日,审判"两案"告一段落。同日,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恢复进行。

对华国锋所犯的错误如何定性,邓小平深谋远虑地提出华犯的是"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批评华国锋的错误,但不要株连其他人,过去各级组织中的一些同志受过华国锋的一些错误影响,这是难免的,希望各级组织一概不要"上挂下联",追究责任。这些见解反映了中央在对待和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的问题上更加成熟、稳妥。

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九次会议,这也是此次连续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认为他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接受了他不再主持目前工作的意见。但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有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中央政治局并且表示希望,十一届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是留有余地的。希望华能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干四化。

最后,中央政治局表决通过了三项决议:(一)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二)向十一

届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三)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一)(二)两项都是对六中全会的建议,全会如何作出决定,这是全会的权力。全会当然会审慎地考虑这些问题,并严格按照党内民主原则来进行讨论、表决和选举。对此,华国锋也是举手赞成的。结果,根据这次会议内容写成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获得了一致通过。

中央政治局考虑到高层人事变动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决定把会议内容通知省军级常委以上干部,并由他们向参加讨论《历史决议》的4000名高级干部传达。

中央政治局在"通报"中特别强调指出:为了保证全党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保密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在"通报"之后,华国锋的名字不再见诸报端,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疑。政治嗅觉敏感的人都猜测华国锋大概出了问题。

12月30日,政协常委会宣布:为节约开支和尊重群众意见,决定不开新年茶话会。中共中央则打算召开一个小规模的新年茶话会,辞旧迎新,毕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况且自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外界关于华国锋的各种猜测和谣传都有,以新年茶话会的形式,中央领导人集体亮亮相,那些小道消息自然会失去意义。

根据安排,茶话会将由华国锋主持,赵紫阳致辞。原先以为,为了党的团结利益,他是会出席的。

元旦那天上午,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人兴高采烈地来到人民大会堂贵宾休息室,等候出席茶话会并

与各界人士见面。只是未见主持人华国锋到场。正当人们翘首等待之际，华国锋的夫人打来电话，称："国锋身体不适，新年茶话会他不参加了。"

豁达大度的胡耀邦立即驱车前往华府，打算把他请出来。总书记兼内定中央主席的面子也可以说是够大的了。

当胡耀邦走进华家后院时，只见华国锋正身着"便衣"散步，他显然没有估计到胡耀邦会来请他。说实话，近个把月来，他的情绪很不好，懊恼和失意使他难以自拔。因此，无论胡耀邦作何劝解，他都坚辞不去。

华国锋称病不参加茶话会，其不良影响马上就反映出来。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等人出来与大家见面时，人们立刻发现少了一位重要人物。这无疑证实了原先的猜测和谣传，所谓的"绝对保密"已失去意义，其轰动效应是不难想见的。

庚申隆冬的北京一连十几天都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虽无雪景，倒也方便了百姓的生活，除旧迎新闹得红红火火。入夜，寒星眨眼，冷月似银，簇簇缤纷怒放的礼花在天幕上映成了变幻莫测的画面，美不胜收……

# 九、拨乱反正完成在1981

伴随新年钟声的敲响，龙的传人又迎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好年头。

现实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历史在曲折中完成了交替。一部大转折的编年史，应该作何评说？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高瞻远瞩、深思熟虑，这是巨人评说巨人的襟怀与风格。

公开审判“两案”与正确评价毛泽东，“两难选择”事关全局，拨乱反正系于一体。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邓小平的睿智与魄力，让人们切身感受到了大转折中“掌舵”的深刻含义。

“两把钥匙”拨开迷雾，六十华诞继往开来。1981年的中国，终于跨过了那道高高的历史门槛……

## 9—1 “非神化”邓小平把关三要点 写决议胡乔木慎执一支笔

毛泽东——一个与中国革命齐名的世纪伟人。从本世纪30年

代起，毛泽东就成为中共最具有权威性的领袖和导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经验和集体智慧。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杰出的代表和核心，毛泽东当之无愧地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

但是，任何事情走向极端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是柯庆施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所作的惊世骇俗之语，此人后来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是康生1958年夏天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首先提出来的，他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1965年11月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他后来也做到了"副统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将现代造神运动推向峰巅。"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一句话，"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条真理归'毛著'"。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最伟大的天才"。

正如他的卫士长李银桥所说：个人崇拜的轿子是被一步步地抬上山顶的。

高处不胜寒。毛泽东就曾对斯诺说过："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讨嫌！"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又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维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的所有言论和决定，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实际上

是从"左"的方面破坏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玷污了党的形象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在一些人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怀疑乃至否定的情绪。

对毛泽东的"反思"，比较有影响的事件就是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位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曾被认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居然成了叛国分子和阴谋政变的野心家，不啻引爆了一枚政治原子弹。这个事件所产生的冲击波不仅使国人震惊，而且也令其他国家难以置信。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林彪之事的政治负效应很快会对中国被愚弄、欺骗的一代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他们自己行为的反思很快就要开始。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布坎南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九·一三事件与中国政治》的专评。他认为：一向手举红宝书、万岁不离口的林彪，被毛亲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被宪法钦定的党内二把手，突然叛逃外域……仅凭这一点，人们就很难接受，昨日的领袖，一夜之间又成为千古罪人，这一大起大落的背向行为，不仅使中共的宣传机构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一般的平民也会对毛选定的接班人这件事的本身产生质询，并会演绎成大规模的反思毛泽东这个伟人的一切……

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有一位老教授见到街上一幅幅巨型批驳林彪的标语后，泪流满面地对儿子说："完了！彻底完了！林彪是毛一手提起来的，批驳林彪，毛主席怎能不受影响，用人失察之过也是一个大的责任啊！"

一位来北京观光的华侨悲叹："说林彪如何如何地耍阴谋手段

骗得了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岂不等于说毛主席的辨别真假能力太差了吗?！……”无奈之余，他摇了摇花白的头发。

至于《571工程纪要》中那些触目惊心的字眼更是让一部分人焦灼难耐。什么“红卫兵是替罪羔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虽然舆论工具不遗余力地批判这两句话，但对于数以百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来说，这种批判反而使毛泽东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黯淡下来。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又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粉碎“四人帮”，彻底解开了人们的“反思”情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观念变革，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开始了“深刻的、既理性又不乏感情充溢的全面反思”。

1977年春夏之交，在北京某科研单位的大门口，贴出了一张批判毛泽东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最早公开“否定毛泽东”的大字报，“也是‘否定毛泽东’思潮从隐蔽到公开的转折”。从此，从北京到各省市，“否定毛泽东”的浊流一浪高似一浪。

在首都出现公开否定毛泽东的大字报之后，社会上关于毛泽东的种种流言蜚语也开始广为传播，特别是那些对于毛泽东生活作风和思想品质的恶意诬蔑，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在许多人心中的形象。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在极大地解放人们思想的同时，也使一些人在否定毛泽东的路上越走越远。

毫无疑问，如何评价这位曾经有过极高威望、建立过巨大功绩而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领袖人物，是一个事关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以往的历史以及今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是一个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全国混乱，导致严重后果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

这年秋天，邓小平找陈云交换了意见。两位古稀老人，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都历经坎坷，面对这一历史性的课题，他们深知责任的重大。

“毛泽东思想还是不能丢！”邓小平十分赞同陈云在几次公开发言中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

“丢不得。这项工作要做细。”陈云若有所思地说：“苏联丢了，结果吃了大亏。”

邓小平接着拿出了自己的主见：要像延安时搞的决议一样，一次性把一些问题定下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要慎重。有些事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关键问题在林彪、江青这些人起了坏作用。

对，这既能使全党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可以客观、正确地理解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问题。陈云点了点头。

这些事只有靠我们来做了，不能拖。邓小平把话锋一转：你是老同志，出来把历史问题理一理怎么样？

天之降大任于斯人焉，责无旁贷！陈云神情庄重地说道：延安时期，把许多问题弄清了，定下了，全党统一了思想。这个东西非搞不可！

搞“决议”势在必需，但这个“文件”究竟搞到什么程度，这在当时只有一个粗线条的设想。

“摸着石头过河。”

一旦有了思路，就要着手探索。

在1978年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说：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

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邓小平对上述两个相互关连的敏感问题的处理看法，成为写"历史决议"的初步构想。他的这番话其实也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展以来，人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建国以来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发表种种议论的明确表态。

西方舆论认为，自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以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邓小平的复出，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表明中共的所谓“非毛化”色彩日趋浓厚。外电对中国“非毛化”的评论含有太多的臆想成分和复杂的政治因素，大可不必认真计较，不过，正确解答这个问题却又是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指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非神化”的立场，并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会上发表讲话，对邓小平关于毛泽东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表示赞同。他说：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文革”时期，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要先念语录。就连叶剑英、华国锋这样的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泽东，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是帮了倒忙的，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

胡耀邦也是“非神化”的支持者。

在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思想理论战线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的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及支持这种观点的言论，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大帽子很吓人。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

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但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在谈到关于毛泽东的评价时，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特别是6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他对待问题，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断，匆忙判断往往容易吃亏。在这个问题上，要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

领袖是人不是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话虽如此，但是，正确指出并坚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就是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很明显，拨乱，是纠正错误，反正则是继承。但这决不是全盘推翻历史，也决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

在理论务虚会期间，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议论很多，有的言论十分尖刻；更有甚者，放肆攻击诽谤毛泽东，诋毁毛泽东思想。一些非法组织和所谓的"民主斗士"乘机煽风点火，反动标语、传单、大字报和地下刊物也相当猖獗。一时间，"非毛化"的喧闹甚嚣尘上。

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了所谓"非毛化"的论调，明确指出中国决不搞"非毛化"，而是搞"非神化"。

3月30日，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作为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为共和国擎起一片蓝天。

邓小平庄严地宣告：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这个讲话在一年之后成为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要出发

点。

在中国，没有人比毛泽东同邓小平的关系更富有传奇色彩。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三次起落，都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联系。特别是最后两次起落，浓缩了共和国几十年的风雨历程，邓小平在政治上所遭到的挫折，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受的完全是诬妄之灾。但是，他对毛泽东公正求实的科学评价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

邓小平看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斗争经验的结晶。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心底无私天地宽"，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时就曾经说过：坦率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1979年10月1日，是共和国30华诞的纪念日。古人云：三十而立。抓住这个时机，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历史经验，无疑是一件极富政治意义的事情。

从当年6月起，中共中央就决定，今年建国30周年国庆，由叶剑英作一个重要的讲话。邓小平很看重这个讲话，他要求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两个"新"字颇有难度。

由谁来执笔呢？

胡乔木！

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一支笔”,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前后长达25年,写下了大量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献。

他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协助毛泽东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

在毛泽东、党中央指导下,他对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性文献起了重要作用;

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几十篇社论。其中,1949年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他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

他参加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文件,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的专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影响也很大。这本书5万多字,一个星期完成,真是成竹在胸,一挥而就。

对胡乔木这支笔,毛泽东十分赞赏。特别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毛泽东曾多次出言称赞。由他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收入《毛选》第三卷,堪称绝无仅有。

毛泽东认为,胡乔木的思索多于陈伯达,理论高于田家英。有一段时间,甚至对他写的诗词也格外偏爱,亲笔改了又改,“终日把玩推敲”,江青对此极为不悦。在1966年7月的一次会上,江青当面斥责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也许正是因为胡乔木的这支笔为毛泽东所厚爱,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怎么“动”他。尽管他也被江青一伙罗织了许多“错

误”，但比起那些挨整挨斗的人来说，他的境遇要好得多。

1975年6月，胡乔木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这项任命与邓小平复出有关。曾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手笔亦十分了解和赞赏，称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起用胡乔木来做思想和理论的整顿当然是十分合适的人选。

当时，胡耀邦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力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和国家计委起草的《工业二十条》是邓小平大刀阔斧进行整顿的三个纲领性文件。胡乔木不仅主持修改《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而且提出筹办《思想战线》杂志，拟在创刊号上推出邓力群的《论总纲》。

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三个文件被打为“三株大毒草”。胡乔木作为邓小平“参谋班子中的理论家”，遭到“半点名”式的批判。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乔木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由他起草的三中全会公报这一历史性文献，如今已载入史册。会后，胡乔木出任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在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新时期，胡乔木再度成为“中共中央大手笔”。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于7月上旬约了几个人来研究怎样起草叶剑英的国庆讲话。以后又组成了一个15人的起草小组来做这项工作。

8月12日，胡乔木牵头的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一次草稿。中央决定，先召集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来讨论，同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省军区征求意见。

8月下旬，根据讨论意见，起草小组对讲话内容作了一次大的修改，等于重写一遍。

9月1日和10日分别写出第一、第二次修改稿。邓小平对这

两次修改稿均提出了意见。主要是就讲话稿中对毛泽东在建国20多年各个阶段的作用怎么提法,提出了原则性意见。9月1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讲话,并且决定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再作一次修改,然后发给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讨论定稿。

在讲话的起草和讨论过程中,上下各方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开始有分歧,到后来才渐趋统一。其中,关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有人认为,现在中央对毛泽东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也有人认为,这个讲话稿的写法是"功劳是毛主席的,错误是大家的"。有的省在讨论中强烈要求在讲话中讲清毛泽东犯了哪些错误;但也有相反意见,认为这个问题最好不讲。

邓小平在看了第一次修改稿后马上就提出,最重要的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无论如何不能发表这样一个讲话,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这个问题是个关系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一点我不需要作解释。大家都清楚,这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

起草小组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在这篇长达2万多字的讲话中,没有一句对毛泽东的直接批评。因为国庆讲话不是对过去30年的全面、正式总结。但是,讲话的字里行间又暗含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这也是讲话的"新"意所在。

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则是恢复了七大时的提法,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此外再没有提出过分的说法。其实,毛泽东本人并不赞成什么"第三个里程碑"的说

法，对所谓的“四个伟大”也很反感。国庆讲话把握好这个分寸，也是很重要的。

9月17日，胡乔木就国庆讲话稿起草情况向在京中委和候补中委作了说明，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也对讲话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讲话稿，一致认为讲话稿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了建国30年来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对全党全军全国工作有长期指导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写《历史决议》的“实战演习”。

叶剑英在9月29日举行的隆重国庆集会上宣读了这个重要文献。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最杰出的代表。在评述了“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后，叶剑英说：我们既要正视过去的失误和挫折，又要充分估计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充分估计我们在战胜困难和挫折中所取得的胜利。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我们党和革命人民并没有因为困难和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在政治上更成熟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更迅速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看待过去的三十年，才符合历史的实际，符合革命的辩证法，符合无产阶级战士不可动摇的革命乐观主义的世界观。

在叶的讲话中，对当时十分敏感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初步总结。他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这无可厚非。问

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公开评价"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突破口的打开，为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扫除了障碍。

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1979 年 12 月，在清华大学校园内曾经张贴了一张署名"民声"的大字报。作者要求：我们党的领导人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具有大无畏的气概，要敢于揭掉毛泽东身上的神秘面纱，要敢于揭丑，并要求中央搞一个'秘密报告'，向全国人民讲清楚'文革'到底是谁发动的，到底有多少人受到迫害……

这张企盼中国也搞"秘密报告"的大字报在首都高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年 12 月 7 日，北京航空学院也贴上了未署名的七人文章，"呼吁党的领导人不要羞羞答答，如不清算毛泽东的错误，未来的一代人，包括我们仍要遭殃……"

从北京弥漫开来的这股"反叛毛泽东"的社会思潮席卷中心城市和穷乡僻壤，这种浮躁的情绪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令一些外国人也感困惑。一位美国记者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坦言："中国人的哲学，我以前一直认为是深邃无比的，可是他们的大脑又如此简单，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思考，无疑是造成民族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否定毛泽东在公开和正式场合是没有合法性的。但是，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在校园文化圈内和形形色色的沙龙中，否定、反叛乃至咒骂毛泽东的言论却畅行无阻。

毫无疑问，拨乱反正需要一个《历史决议》，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需要一个《历史决议》。

对党的历史作出严肃认真、客观公正的结论，是一件极为慎重的事情，怎样看待历史，怎样看待党的领袖人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弄不好就会引起思想混乱。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笔杆子"姚文元肆意篡改党史，把党的历史歪曲为"路线斗争史"，在党内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967年秋，他和张春桥在党的九大之前曾到上海搞了一个所谓的"调查"，然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报告"假借群众之口说：群众要求在召开九大前先修改党史。姚文元称：过去写党史都是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那个东西已经不够用了。要搞一个适应"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材料"。这显然是指1945年的《历史决议》把刘少奇称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言。"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历史决议》自然也就要推翻。

1967年10月，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附发了姚文元的报告。11月，中央文革小组整理了一份通报，由党中央下发全国。通报中以"群众意见"的形式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什么有人建议中央作出新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取代所谓"有错误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称：九大要大讲特讲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因此需要编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材料。

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把一部中共党史描述为"路线斗争史"，党内路线斗争成了社会上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

现，党内被指为错误路线的分子当然地成了革命的主要对象。

于是，讲党史就是讲路线斗争史，为了服从和服务于路线斗争的需要，可以任意篡改、阉割历史，导致谬种流传、危害甚烈。有一所高等学府开设了中共党史课程，期末考试时，出了这样一道试题：1924年开始的大革命的革命对象是谁？

"陈独秀"——有的学员不假思索地就给出了答案。

有中共党史常识的人都清楚，科学的答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可见，"文革"中只讲路线斗争史的做法造成了怎样的恶果。

这也难怪，教材和老师都只讲路线斗争，出现这种答案也就在所难免。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党的历史就是十次路线斗争史：

第一次，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第二次，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

第三次，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

第四次，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第五次，罗章龙机会主义；

第六次，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

第七次，高岗、饶漱石机会主义；

第八次，彭德怀；

第九次，刘少奇；

第十次，林彪反革命集团。

粉碎"四人帮"之初，又把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称作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分清是非，不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并且使"路线斗争"成了"上纲上线"的依据和"上挂下联"的工具，闹得人人自危，谈"线"色变。

要把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澄清，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恰如其份地评价历史人物，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必须拨乱反正，以党的决议的形式作出正确的结论。

在叶剑英发表国庆讲话之后，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也进入准备阶段。

从11月起，这项工作在邓小平主持下开始启动。起草小组负责人自然非胡乔木莫属。30多年前他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今，他又受命主笔撰写那个决议的"续篇"。起草小组成员有20多人，他们首先从资料工作入手，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召开一系列座谈会，为起草《决议》进行准备。

写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不可回避地要写十年"文化大革命"，写"文化大革命"，不可回避地要涉及到刘少奇。然而在当时，刘少奇尚未正式宣布平反。所以起草小组在刘少奇冤案平反之前亦是难以下笔的。这个问题，此前在胡乔木主持起草国庆讲话时就已出现，原先打算在讲话稿中对党内外一些重要的先烈、已故的领袖人物提出名单，以表示对他们的怀念。胡乔木等人认为这个名单不能不涉及到刘少奇，如果名单没有刘少奇，肯定是不合理的。鉴于刘少奇的问题尚未平反，加上其他一些具体困难，只好改变了罗列一个名单的打算，只提四个人的名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加上孙中山。但现在是写建国以来的党史，所以正式动笔起草《决议》，只能是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的事情。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且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人的辞职请求，从而为起草《历史决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起草工作正式开始。一项关系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大局的重大工程进入了具体运作阶段。

起草《决议》不同于写一般的党内文件，“慎之又慎”，须臾不可掉以轻心。况且涉及到的都是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难题之多、难度之大亦不难想见。

1980年3月15日，胡乔木作为起草小组负责人，就起草《决议》中遇到的两个难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去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

“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这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一定要答复。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

胡乔木认为：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错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与此相联系的，是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

从国际方面看，反霸权主义斗争是正确的，但是，范围也扩大化了，表现在“九评”中。

国内的因素还有一个，即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在党内生活方面，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威信过分突出。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接下来，胡乔木强调指出：“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主要是文化)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会搞得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由党中央亲自发动批一个剧本，搞得规模那样大，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也受到斯大林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苏联由日丹诺夫出面，批了好些作品，但是都没有像中国那样搞成大运动。解放以来，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到六十年代，文艺上批《李慧娘》、《谢谣环》，哲学上批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异议，批'合二而一'等等，应该说是不正常的。如果当作一种学术文化上的争论，这不成问题。就是当作普遍的党内的思想争论也可以。问题是这种批判带有特殊的政治色彩，简直使人民不知道党的工作中心究竟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是同这样一些特殊的趋势分不开的。非这样办不可，而且全党都非这样办不可。《清宫秘史》的批判没有能开展，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来补课。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会成为这么大的斗争的导火线，就容易了解了。"

胡乔木对文化战线的过火批判是深有感触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出过一本由红卫兵编写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大事记》，这本"大事记"就有多处提到江青与胡乔木的斗争。

胡乔木从1948年起就任中宣部副部长，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其间还兼任过新华社社长和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他不仅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而且也是宣传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这个"容易犯错误"的部门担任要职，自然免不了惹上麻烦。

那个后来被"文化大革命"揪住不放的《海瑞罢官》，就与胡乔木有"密切联系"。据吴晗自己所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就这样，胡乔木便成了《海瑞罢官》的"黑后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是在劫难逃了。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不知为党中央和毛泽东起草、

整理、修改了多少文章和文件，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

因此，他在谈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说：毛泽东思想需要先从理论上讲。比方说，可以从《实践论》的贡献讲起。一篇《实践论》，实际上不仅仅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一篇文章，而是自觉地有系统地开创了党的思想传统。我们现在还在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等等，就表明了这个事实。

群众路线，也可以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考察。

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里首先就有革命与建设的关系问题。现在国外还有些同情"文化大革命"，对它表示惋惜的人，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继续保持了革命的势头，革命的劲头。这个问题需要比较深入的分析。

为了保证《决议》起草工作的顺利进行，胡乔木带领起草小组的成员来到了远离市区的玉泉山。

玉泉山是北京西山东麓的一支山脉。山上翠峰嵯峨，枫林茂密，泉水清冽，是一处闻名遐迩的风景胜地。早在12世纪初，金章宗完颜时代就在山顶上修建了一座芙蓉殿。元、明两朝又在此建造了昭化寺、华严寺。清朝又修建了澄心园。1692年改名为静明园，精心雕凿了许多楼台廊阁，成为数百年来中国最负盛名的皇家园林之一。

玉泉山风景如画，曾引得无数文人骚客为它咏诗作赋。当年，风流倜傥的乾隆皇帝游此山，也禁不住惊叹称奇，挥毫写下"天下第一泉"的御书和"玉泉趵突"的诗。诗曰："玉泉昔日此垂虹，史笔谁真感慨中，不改千秋翻趵突，几曾百丈落云空！……"胡乔木吟读此诗，不觉又添了几分凝重。

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

耀邦主持进行的。但对整个《决议》起草把关定调的核心人物，是邓小平。

3月中旬，起草小组拿出初步提纲，送邓小平审阅。邓小平看过之后眉头一皱，觉得这个提纲铺得太宽，有些重大问题需要明确。3月19日，他在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中心思想。

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邓小平一开口就抓住了根本，说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三个“最”字，清楚地表明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着眼点。

为什么有人以中央为刘少奇平反，来证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呢？这与“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有关——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引人注意的是，八大报告和八大党章没有写毛泽东思想。七大报告提出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八大报告反而不提毛泽东思想？

这些问题到“文化大革命”时成了刘少奇的“罪状”，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其实，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决非刘少奇一人所为。事后，据刘少奇解释：中共七大提毛泽东思想有三条原因：(1)解放区分散，不能群龙无首；(2)为了反击蒋介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论调；(3)为了抵制第三国际教条主义的指挥，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当时毛泽东水平最高，贡献最大，应该提毛泽东思想。八大不提，因为当时党对搞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经验，方针、政策还有待于实践检验，还不成为科学体系。因此，经当时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八大党章上只写“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没有写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毛泽东思想不是刘少奇个人砍掉的，而是党中央集体的意志。

所以，当为刘少奇平反时，有人提出非议，邓小平立即严肃指出，“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当胡耀邦等人提到怎样看待毛泽东多次强调过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时，邓小平掰开指头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

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邓小平对党的历史了若指掌，尤其是对建国后党的历史更是洞若观火，这使起草小组的秀才们受益匪浅。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邓小平呷了一口茶继续讲道：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到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接着，胡乔木又问道：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党内外议论很大，究竟该作何评论？

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邓小平很果断地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

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讨论。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4月1日，邓小平再次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

这次谈话，邓小平为历史决议设计了一个框架。他说：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

邓小平再一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对建国以后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也更为具体，邓小平认为，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957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

在这之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总之，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此后，起草小组加紧了文件的起草工作。他们调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文件草稿，在一些问题上展开讨论，有时甚至是争论不已。决议的草稿到6月份就拿出来了。但这个草稿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十年的成绩估计得不够，对毛病和错误写得份量也比较重。

邓小平在看了决议草稿之后感到没有体现原先的设想，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写好。因此提出这个草稿“不行，要重新来”。“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

6月27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的谈话中，指出了决议草稿为什么不行：

"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邓小平的语气很严肃: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 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对毛泽东"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邓小平在强调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要实事求是的同时,特别加了"恰当"、"很恰当"几个字。意即掌握评价的分寸,不能过分。我们现在的中央所坚持的一套,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也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

起草小组认真领会邓小平这些讲话精神,重新组织撰写。

看得出,邓小平对这个草稿并不满意。按他的要求,起草小组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作为站在时代潮头的历史巨人,他把目光越过历史的峰峦,苦苦地探寻着脚下的路……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历史的回音。

"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这是现实的结论。

空谷足音，弥远弥深。

## 9—2　办“两案”彭真挂帅<br>破禁区审判公开

獬豸——一种形似“一角之羊”的神兽，龙的先民在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相传它具有分辨善恶的特异功能，“凡罪疑者，以角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神兽决狱”的传说讲述了华夏生民之初即向往一种理想的法治社会，实现扶正祛邪的强烈愿望。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条千年古训令国人深信不疑。

十年浩劫，冤狱遍地。林彪、江青一伙恶贯满盈，人民切齿痛恨。

在1976年的《天安门诗抄》中就有一首诗写道：

鼠辈狐群休猖狂，人民力量不可挡。<br>捉狼打虎时未到，到时必将虎狼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那些大喜日子里，每天都有千万封揭发“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来信，像雪片般地飞向新闻媒体和中央有关部门，亿万人民群情激愤地发出同一种强烈的呼声：“把‘四人帮’交人民审判！”

在长江岸边，武汉市一位受害者的家属，手捧烈士遗物，要求惩罚法西斯杀人凶手。

一位参加1927年黄麻起义，为人民负伤致残的红军老战士，看到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沉痛地说：林彪、“四人帮”欠下人民的血债，一定要清，一定要算！

大别山区红安县的干部群众，再三叮嘱记者，向党中央转告他

们的心愿:公审江青,我们要在电视上看一看。

党内外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强烈义愤,与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

1977 年 7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复出。这件事突破了"天安门事件",也突破了对毛泽东的认识,进而使中国逐步走出"两个凡是"的禁区,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

百废待兴的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尤为重大而又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处置"四人帮"?这是一连串互相关联的问题,真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后果难以设想。敢不敢触及这一系列问题,怎样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使之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无疑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政治艺术。

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早就十分清楚地看出:要搞一个类似 1945 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和认真的总结,包括对毛泽东作出正确评价,这是至关重要且又完全必要的。

对此,陈云与邓小平不谋而合。在 1978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冲破了华国锋的限制,提出了当时党内外十分关注的 6 个重大问题,一连点了薄一波等 61 人的所谓叛徒集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的案件,天安门广场事件,并点名指出康生有问题。他的发言,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

党内如此,党外如何呢?

当时有一件引人注意的事情:85 岁高龄的梁漱溟在政协会上作了一番"危言法制"的发言,他以刘少奇被打倒为例,提出了以法治国的重大问题。老先生言辞激动的讲话虽被有的人视为"攻击伟

大领袖毛主席”和“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邓小平却不这么认为，他特别关照政协的有关人士，不要为此加难梁先生。

摆在面前的情况说明，不解决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对林彪、“四人帮”继续沿用“路线斗争”的揭批手段，已不能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

1978年秋，邓小平与陈云两位元老在一次谈话中对做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和用法制手段来解决林、江反党集团的问题达成了共识。搞《决议》要从林、江集团的问题上打开缺口，林、江一伙民愤很大，许多老同志受了整，弄清楚是必要的。“问题弄清楚之后，党内解决不了，就交给人民。这是公正的”。

在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同时，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构成拨乱反正的两个重要方面。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必须永远废止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全会公报郑重宣告：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以法治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曾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如今成了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原则。

与此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选举产生了以

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成立了中央审理林彪、"四人帮"两案领导小组，由胡耀邦任组长，成员由中组部、中纪委、高法、高检、公安部、总政治部负责同志组成。下设办公室，是临时机构，人员都是从各有关部门抽调来的，由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曹广化将军任主任。当时办公室归属中纪委，因此对外称"中纪委二办"，实是"中央审理林彪、'四人帮'两案领导小组办公室"。中纪委黄克诚、王鹤寿领导两案的审理工作。

1979年初，当中纪委向中央报送了审查"两案"的情况和意见时，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几位老帅更加充分地了解了林、江两个集团的反革命事实真相。经过内查外调，证实"两案"成员既有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又有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既有违反纪律的问题，又有触犯刑律的问题。毫无疑问，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反毛主席的，他们利用毛主席搞了不少阴谋，把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交给人民审判，既能让人民区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认清问题的实质，又能使人们对将来的《历史决议》有个接受的过程。

1979年7月28日，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胡耀邦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强调指出"两案"审理的极端严肃性，要求"两案"审理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向子孙后代负责，向全党负责。

8月，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全国"两案"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相应成立了"两案"领导小组。因此，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两案"审理动员。

这次会议正式拉开了"两案"审理的大幕。"两案"领导小组确定："两案"的审理工作分两套班子进行。公安部及从各省市公安机关调来的人员组织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预审；最高人民检察院负

责起诉书的起草。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审理交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具体组织，总政副主任黄玉昆、史进前负责这项工作，并组织保卫、检察、法院部门和总参、总后及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力量，直接受命于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领导。

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黄克诚、王鹤寿等人都作了重要讲话。胡耀邦在讲话中强调：林彪、"四人帮"这两个案子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公开审判交不了帐。如果公开审呢？这个起诉书很难写，所以现在就要准备。这次对"两案"犯错误和犯罪人员的处理，我们要吸取教训，要坚持实事求是，要重视调查研究，要考虑"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要按照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办事。凡是要判刑的，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起诉书要经得起批驳，包括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批驳。

9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两案"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和老帅们纷纷就两案审理发表了意见。

邓小平的意见很关键：应该判刑的人中，有些人罪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判刑的人多少，判几个人要看罪行。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也作为一案。把他们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判，按集团把起诉书写出来。审判的时候你们要注意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即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其它小的罪行不一定写得那么细。不在于列多少条的罪行，关键在于他们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

华国锋接过话说：我同意小平的意见。对于两个案子，不管判刑也好，党纪处分也好，总的精神要把我们党的好传统发扬起来，就是要我们对这些人的处理站得住脚。

将来究竟用什么方式审判？审判的时候，这个情况我们再研究。华国锋似乎想得很周全：审判的时候，这些人可能胡搅蛮缠。比如江青，她给你说这是毛主席讲的，那是谁讲的，甚至可能攻击中央的一些同志。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见没人插话，转而又说：当然，我们不怕这个……但为了审判效果好，要仔细想一想。

江青胡搅，可以把她怎样损害毛主席的具体事写出来。邓小平插了一句话。

要估计到各种情况。就是在审判之前，估计到张春桥会怎么样？姚文元会怎么样？……以便好好对付。华国锋的话音刚落，胡耀邦便接过了话茬：我们起诉，就是要起诉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篡党夺权，祸国殃民，这是由头。

明确林、江一伙是反革命阴谋集团，祸国殃民，篡党篡国，必须交人民审判，使"两案"的审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不久，陈云组织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正式认定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党内审查基本结束，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这样，审判"两案"的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在关押了9年之后正式宣布被逮捕。9年，3285天，弹指一挥间。

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30分，林彪等人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

林彪虽然折戟沉沙，葬身异邦，但他原先手下的几员大将却执迷不悟。事发之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惶惶然如坐针毡，翻箱倒柜，销毁了他们同林彪、叶群等人的往来信件、笔记本、电话记录、照片等罪证。黄永胜仅在9月16日至17日就指示保密室销毁了重达1320斤的几麻袋文件。因黄永胜销毁材料数量很

大，竟把一个大陶瓷缸也给烧裂了。

黄、吴、李、邱毫无悔改之意，而且还相互串联。事实说明，这些人陷得很深，不会轻易走出来的。他们不仁，我们也就别义了！9月23日晚，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后这样说道。

当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找汪东兴面授机宜，布置了羁押林彪集团四员大将的方案。鉴于这些人都是军界要员，而且阵线不清，故周恩来不得不慎之又慎。此前，林彪集团已有几员得力干将被抓。

9月24日，中央警卫团在汪东兴的直接指挥下，实施对黄、吴、李、邱的隔离审查。地点定在人民大会堂，事前警卫部队加强了戒备，对人员押解、车辆、路线都作了周密安排。

上午8时30分，黄永胜等四人相继到达人民大会堂。他们刚接到电话，是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的。当四个人走进空旷的会议室，相觑坐定之后，彼此间似乎都感觉到了情况不妙。

不一会，几名陌生的军人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接着周恩来从另一扇门里走了出来。只见他脸色沉重地说道："我代表主席，宣布中央决定：根据掌握的大量情况，中央决定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黄、吴、李、邱似乎已有准备。他们从沙发上站起来，低着头，一言未发。

周恩来接着说："你们先停止工作，思考思考自己的问题。这是有必要的……"

警卫人员两人带一个，分别把他们带出会议室。然后，转送至北京卫戍区某师看押起来。

收审黄、吴、李、邱后的第5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中央鉴于黄、吴、李、邱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于胜任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

交待。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建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10月3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等10人成立中央专案组。

1971年底，中共中央专案组正式对林彪集团成员开始立案审查。在一次提审中，吴法宪交待了江腾蛟根据叶群传达江青的指示，在上海抄一些著名文艺界人士家，收回她30年代丑闻的事。叶群让吴法宪通知江腾蛟来京。

吴法宪的交待记录上报中央专案组后不久，便传来了江青的意见：要给黄、吴、李、邱的交待划个范围。“文化大革命”中，林、江集团相互利用、相互争斗，在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行上有许多是共同所为，若不对这几个人的审查和交待进行限制，势必涉及到江青一伙的问题。江青一伙在专案组的地位，使江青集团的罪行被隐瞒下来。不仅干扰了当时对林彪集团的审查，而且也对后来“两案”的审查增加了难度。

1973年7月，中央专案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策划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1、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2、永远开除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3、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4、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

鹏、邱会作等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5、对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审查报告》。林彪集团的审查就此了结。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个报告的一些定罪既缺乏准确性，又没有具体证据。审查结束后，黄、吴、李、邱仍然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某师。直到1976年12月，才被解押到秦城监狱。在那里，他们将与昔日相互勾结且又相互斗争的盟友兼对手江青一伙重新聚首，历史仿佛给这帮人开了一个玩笑。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是三个年头过去了。

1979年初，黄、吴、李、邱接到中央来人向他们宣布对案件重新审查的通知。对于"重新审查"，他们似乎抱有某种希望。因此，在预审过程中，他们或是上推下卸，或是知情不说。不承认有罪，只说是"路线"问题的错误。并且以历史上打过仗，立过功为本钱，摆老资格，拒不与办案人员合作。但是，无论他们怎样顽固抵赖、拒不认罪，事实终究是事实，把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地理出来，便足以让他们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

全国"两案"工作会议之后，对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预审和起诉书的起草工作迅即展开。从起诉书第一稿到最终定稿，一共搞了七七四十九稿，可以说是上上下下，反反复复，修修改改，殚精竭虑。中央"两案"审判领导小组原拟审判这两大反革命集团的罪犯达108名。后来几经研究，审判人数逐步减少，从80人，60人，40人，减至20人。最后，经中纪委副书记，"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副组长王

鹤寿提议，彭真同意，特别法庭只审10名主犯。其他案犯交各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审判。起诉的罪状条目也经历了多次修改变化。

难的是，林、江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居高位，江青一伙利用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黄、吴、李、邱在林彪指使下以军委办事组代替了中央军委，他们的许多罪行真相只是在极小的圈子内为人所知，这些"绝密"的证据不掌握，就难以定罪量刑；此外，林、江一伙的阴谋活动又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工作中的错误搅在一起，怎样做到在揭露林、江集团罪行的同时，又严格区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工作的失误？

在这些敏感的问题上，既要突破禁区，又要把握界限。解决这些棘手的难题，彭真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0年2月，彭真出任中央政法委书记。5月，由他主持中央"两案"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当办案人员把上述难题摆出来时，彭真果断地指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就要突破禁区，这包括思想禁区、人的禁区、材料的禁区；既然要依法治国就要向那些传统的东西开刀。他向中央建议，各级领导人，包括中央政治局，所有的历史见证人，都要向办案人员"开绿灯"，积极提供情况和允许调查材料。

"怎么做？一面对已逮捕的同案犯统一进行审讯，从四面包围；另一方面，由中组部和中纪委、政法委出面，把知情人找来开会，开党的会议，要求他们揭发案犯的罪行，共同对付那些人。有些牵连的人把事讲清了，就可以卸掉包袱。"彭真告诉办案人员：林、江是当权的，档案是重要材料。一部分集中在中组部，一部分集中在中央办公厅。要组织人去看，看那些重大事件的背景和有关主犯的材料……

林、江集团自恃身居中央核心决策圈，其间的许多内幕外人无

法知晓。因此，他们把许多事情都往毛泽东、周恩来头上推，极尽狡辩抵赖之能事。江青就傲慢地对办案人员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决定的事，你们知道什么！

对于林、江一伙设置的"暗礁"，彭真看得很明白：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事，在毛主席那里是好人犯错误，而林彪、江青一伙则是坏人办坏事。鉴于林、江集团的主犯把许多事情推到毛泽东、周恩来身上的问题，彭真提醒办案人员注意这两个阴谋集团在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之前搞阴谋，当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之后，他们又利用权力加以歪曲和篡改搞阴谋的部分。彭真把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形象地喻为"两头抓麻杆"，既抓住了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又让人们看到他们搞阴谋、耍两面派的嘴脸，同时又严格地区分了毛泽东、周恩来及党中央工作上的失误。

为了加强对江青集团的预审工作，抽调了浙江省委副书记王芳、辽宁省公安局长左琨、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局长洪沛霖、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局长卫立民、河北省公安局长白均和副局长王文同等来京，同中纪委二办、公安部等一些部门，各带一路人马，审理江青集团的罪行。

根据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80年7月，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了一份文件。中共中央批准"两案"审判办公室为实事求是办案，可到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档案馆及中央政法机关等有关单位查阅有关文件资料。同时，中央授权办案人员，在调查案情中要打破人的"禁区"，可以向高层人物了解案情。法律的尊严，终于叩开了厚重神秘的大门。"两案"的调查、取证很快有了重大突破。通过梳剔林、江集团的罪行，划清了他们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失误之间的界限，充分暴露出林、江一伙利用毛泽东的失误做手脚、搞阴谋、耍诡计的真实面目。将林、江集团案

犯提交法庭审判的时机和各项准备工作日趋成熟。

1980年7月16日至8月7日，被关押了近9年的黄、吴、李、邱分别补办了逮捕手续。逮捕时间从1971年9月24日算起。在此期间补办逮捕手续的，还有林立果"小舰队"的21名成员。

1980年8月，鉴于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犯罪事实已基本查清，可以认定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央正式决定将林、江两个集团作为一案起诉。列入总起诉书的48条罪行，是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以及长达9年的侦查证词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得到的，所列罪状，证据确凿，完全经得起法理和历史的检验。万事皆备，只待开庭。

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审判？何时审判？上上下下，国内国际都在密切地关注着。

198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提出了一个6条审判方案，准备报政治局常委会审批：

(一)正式确定按"集团"进行审判；

(二)起诉书、证据都要确凿，站得住脚，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

(三)从现在起搞好预审。让被告讲话，让他们申辩，从中摸清他们的思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

(四)在起诉前，把起诉书发给被告，争取被告不仅自己服法，而且出来作证；

(五)根据中央建议，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担任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及中纪委的王鹤寿、中央军委的杨得志

等同志参加；

（六）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针对这些案犯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而不公开审理。4、5两个月做准备，6月初审判，7月底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结束。林彪案由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起诉，江青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怎么审判，中央书记处再讨论一次，交政治局审定。秘密审理，这是最初的考虑。

1980年3月底，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四条决定：一是现在的"两案"领导小组对案子抓到底；二是中央政法委员会抓"两案"的程序，要严格按司法程序办事；三是对"四人帮"案要专门组织一个预审班子，由中央公安部负责；四是彭真同志讲，审判委员会主任他不宜担任，12年没工作，不了解情况。从分管政法的角度他也可以管一管。

这是一项被办案人员称为"特别关键、特别重要、特别及时"的决定。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前，中央书记处曾有过一次十分重要的讨论。

彭真在这次会议上扮演了主要角色，他的讲话也很有份量。他说：我看了对"四人帮"的起诉书和材料，没什么意见。对这帮人要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预审中不能轻敌。轻敌就要打败仗。按司法程序办事，公安部要搞好预审，检察院要搞好起诉，法院要搞好审判……要通过预审先核对事实。法律上有证言，但我们办案，一定要重视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苏联在证据问题上有沉痛的教训，只靠口供，搞了不少冤、假、错案。我们办这个案子同审理其它案子一样，只有口供没有其它证据不能判。时间不要限制得过死，以搞好为标准。不要匆忙，不要过早登报。

胡耀邦是总书记兼会议主持人，听完之后也发表了自己的意

见：审这个案件，是非常严肃、很有意义的工作。做好了全国人民会同情的。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为维护党纪国法做出典范。搞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亚于写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义，从复杂性来讲，比搞《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复杂得多。罪证要周密有力，人家考不倒。最重要的是要同毛主席的错误分开。这样做，符合历史的真相。对罪犯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要让他们中有的人站出来讲真话。比如王洪文、毛远新，他们要讲真话，对搞清这个案子非常有利。处理要妥善。自始至终不要在生活上搞虐待，要使我们的后代都知道我们对他们是人道的。对这个案子要多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虑。判谁不判谁，书记处定不了，报政治局才能定。

最后彭真又讲道：起诉书应当以证据做后盾，以预审做基础。四道程序把关。公、检、法是三道关，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现在的起诉书(草稿)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来。有不少是路线问题，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个事。要从事实做起，从调查研究做起。离开事实，谁也不算数。经过调查研究，有什么算什么。只有事实，案件才靠得住。林彪、"四人帮"他们搞专案，是先戴帽子，后搞材料。我们不能这样干。一定要注意三条：一是要客观，二是要全面，三是看本质。全面有两种，一是历史的全面，二是现实的全面。历史是这个人一贯表现怎样？现实是看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怎样？要看原始材料。要把好人办错事和坏人办坏事区别开来。

听着彭真的讲话，联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与会者对他的光明磊落无不表示赞赏。

这次会议纪录，很快传达到参加"两案"的工作人员。根据中央精神，两个班子加紧了审判的准备工作。

1980年3月30日，全军"两案"审判工作会议召开。总政史进

前副主任代表“两案”审判领导小组作紧急布置。同日，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审判方案（初稿）形成。鉴于被告都是军人，情况复杂，案情重大，因此需要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一审终审。法庭名称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拟请杨得志或粟裕、韦国清任庭长、史进前等四人任副庭长。建议由总政副主任黄玉昆任首席检察员，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曹广化、副检察长于克法任检察员。其他审判、检察人员由全军各大单位选定。案子不公开审理。最后宣布判决时，拟组织万余人参加大会。

中央书记处拟定的内部审判方案虽然没有变化，但原定6、7月份的审判却未能如期进行。审判推迟的原因，在于中央决策层。

就在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两案”审判方案的同一天，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了三条重要意见：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三条意见，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审判“两案”与作《历史决议》，都面临着如何看待和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当时党内确实存在一种情绪，对毛泽东否定过多，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归咎于毛泽东，甚至把这些错误归结于毛泽东的品质不好。这种思想情绪对审判林、江集团构成了影响，它使这帮人可以借此开脱罪责。再就是还有那么一股力量，继续坚持“左”的一套立场、观点和方法，明里暗里地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对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无疑对“两案”审判和《历史决议》形成了阻力和禁区。

既要反"左"又要防"左",历史、客观、全面地评价毛泽东,是做好"两案"审判和《历史决议》的关键。在具体运作上,区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林、江一伙的罪行,又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审判林、江集团,势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利用毛泽东的失误搞阴谋,篡党夺权,铁证如山。但是,他们俩一个曾是接班人,一个是"第一夫人",划清其间的界限,必须十分慎重。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复杂的因素,"两案"审判不得不推迟进行。

在"两案"审判和作《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出历史巨人的胆识与睿智。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核心,排除来自"左"和右的干扰,为推动两套班子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破各种禁区,统一中央决策层的认识,"两案"审判准备工作进一步深入展开。从中央和军队司法机关以及全国各地调集的400多名办案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8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会见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时,传递了一条重要信息:今秋,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的议程,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审判!据透露:这次审判将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但由于涉及到许多国家机密,所以将在内部进行,至于哪些情况公之于众,将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

还是秘密审判,中央方针不变。

9月4日,中央书记处制定出新的审判方案。

9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两案"审判方案。

下午3点,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和新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这一次，是由彭真亲自汇报情况。此时，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已近尾声，作为大会秘书长，他对这次会议的重大人事变动深表欣慰。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被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为"使中国成为一个法制国家而作雄心勃勃的努力中的主要建筑师"。

他先用镇定的目光扫视了一遍会场，然后操起淳厚的山西话宣布：十名主犯的情况已查清楚，起诉书中写了两个集团的罪行，包括十名主犯的罪行。关于"两案"的问题，现在主要情况已弄清楚了。一边是黄、吴、李、邱加江腾蛟，谋害毛泽东有江腾蛟，他是"三国四方会议"确定谋害毛泽东的指挥官。一边是"四人帮"加陈伯达，陈伯达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罪行都分不开。林、江是头子，康、张是军师。两个集团是狼狈为奸的一伙。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涉及毛、周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过错，这个大原则是中央已批准了的。起诉书还把周总理列入了被诬陷的领导人名单中。

然后，他望着邓小平：现在的起诉书中，有的话可不用。例如张春桥诬陷小平同志是"纳吉"的问题，现在查到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同意了。

"纳吉"的话，张春桥当面对我说了，可以不去掉。毛远新的记录，谁知道他是怎么说的。邓小平弹了弹烟灰，很坦然地说道。

彭真一边点头，一边提高音调说道：起诉书上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包括党纪、军纪、政纪问题都不涉及。这次审判只审罪行。历史问题也不涉及。说完，他放下起诉书草稿，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什么时候审？与会者显然更关心这个问题。

是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出台前审？还是出台后审？怎样做从逻辑上比较顺当？

彭真主张先审，并且要尽快审判。先审，解决敌我矛盾比较好。

后审，外国报纸会说我们审不下去，说我们内部意见不一致。

至于怎么个审法，彭真提出："两个集团"一案起诉，分庭审理。这是因为两个集团没法分开。你把这两个分开，康生、谢富治死了，这两个人算是哪一伙的？当然，这两个集团也有矛盾，矛盾在于他们做贼上一致，分赃上有矛盾。至于把林彪集团的案犯交给军人组成的第二审判庭审理，是因为黄、吴、李、邱同江青不一样，历史上还做过一点好事，打过仗。对他们一定要审，但判刑可以轻一点。时间上一定要抓紧，九十月份开庭。

此话在理，常委们也是这个看法。

关于审判方式，彭真认为：公开审判好。罪行证据都公布，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证据完全能站得住脚。

彭真的意见很明确：一是尽可能早审；二是两案并审；三是公开审判。中央作何决策？人们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

邓小平把起诉书稿拿起来，扬了扬说：

这个起诉书可以用了。

邓小平一言九鼎，会议厅里顿时活跃起来。

但是，不能有一丝虚假，不能侥幸。他调过话头提醒大家。

这次会议后，要扩大范围，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邓小平想得很周到，大家没有异议。

胡耀邦提出：审判时外国人不能参加，这涉及到国家机密。

用哪个法律去审呢？

林彪、江青一伙犯罪的时候，只有《惩治反革命条例》。现在，人大已经制定颁布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究竟他们适用哪个法律更准确？

又是彭真先开口：用哪部法律更合适，涉及到法律准绳作用的问题。这伙人犯罪之时《刑法》虽然没有颁布，但他们的犯罪行为，

按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是犯罪，按《刑法》也构成犯罪。因此，适用刑法更合适。具体问题，还可以请法学专家论证。

这可是举世瞩目的大案啊！彭真严肃地对随同自己来汇报的各部门负责人说：检察官和法官，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可是真刀真枪地干。不要出丑，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国家的声誉啊！

华国锋见审判已成定局，便说：还是一案起诉好。两个集团互相勾结犯罪。10月初就审吧，不要再拖啦！外国人不要参加。

是先搞决议，还是先审判？彭真问道。

先审！邓小平很果断地说道。

这两个案子不要低估林彪集团的罪过，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比笔杆子不会差。

黄永胜等人有功，量刑可以轻一点，不能减罪。

以什么形式审判？成立特别法庭，一审终审！

经过一番仔细思考，一直没有发表意见的叶剑英终于开口说道：一定要审！江青虽然是毛主席的夫人，但她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她反毛主席。

李先念对邓小平的意见表示赞同，他说：小平讲，一案起诉，两庭审理，可能简单一点。时间怎么样？

很紧，但可以做到。彭真看来蛮有把握。

但是还要注意，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问题，人们可能会问：如果没有毛主席点头，他们能干吗？另外，周总理批过的文件也不少。

周总理做了违心事，讲了违心话。当时他不这样做是不行的。邓小平说道：只有这样，才能做更多的好事，才能保护老干部。

他不那样做，那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境困难。彭真深有感触地说道。

这是公平话。赵紫阳说。

看来,公审"两案"已成共识。

于是,会议主持人华国锋宣布"两案"审判问题"就这样定了"。

末了,邓小平补充道:审判这个案子叫"投鼠忌器"。各人抓紧,要不审,有人会说他们不够罪,或者说我们意见不一致。"此事"请彭真同志一抓到底"。林、江集团一案起诉,两庭审理,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列入江青集团的陈伯达,再就是林彪集团的江腾蛟。

陈伯达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江青等人沆瀣一气,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罗、陆、杨,阴谋篡党夺权,制造冤、假、错案等许多问题上扮演了左右手的角色。后来,林、江集团之间因争权夺利而矛盾日深,陈伯达随地位的变迁,也与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锐转而投入林彪集团。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不指名地攻击张春桥,为林彪篡权大搞阴谋活动。毛泽东察觉了林彪、陈伯达等人为争夺个人权力进行的宗派活动,责令陈伯达检讨,并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对陈伯达进行严厉批评。会上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并宣布对其进行审查。会后又在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9.13事件"后,陈伯达被明确为"林、陈反党集团"重要成员。

在"两案"起诉书起草之初,陈伯达也是列入林彪集团一并起诉的。但随着预审和取证工作的深入,办案人员逐渐发现陈伯达的罪行不仅与林彪集团有瓜葛,更主要的是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关,应将陈列入江青集团起诉。经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协商,最终将陈伯达纳入江案审理。

如果说陈伯达纳入江青集团是"易主"的话,江腾蛟进入林彪

集团主犯行列则属“升位”了。黄、吴、李、邱和王、张、江、姚、陈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鼎鼎有名的显赫人物，比起他们来，江腾蛟要逊色得多。原先拟审的林彪集团5名主犯，除黄、吴、李、邱之外，还有一个是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王飞与林彪的四大金刚相比，也只是个小人物，但他的罪行很大。王飞是林彪父子“小舰队”的头目，他积极参与谋害毛泽东，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活动。让他出庭受审，能够揭露林彪集团的全部罪行。令人意料不到的是：王飞在1980年6月出现精神病症状，经诊断证实，王飞患了精神分裂症。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决定紧急换“马”，将犯有同样罪行的原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列入林彪集团主犯起诉。

1980年9月13日刚好是林彪自取灭亡9周年。这一天，检察官们进入秦城监狱，对每个主犯正式开始检察讯问，如罪名认定是否正确？证据是否充分？有无遗漏罪行？同时告诉被告，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他们有权为自己进行辩解，还有权委托律师辩护。

请律师打官司，1957年反右斗争以前有过。到后来连主管律师工作的司法部也撤销了，律师这门职业也逐渐销声匿迹。“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律师作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更是被林彪、江青一伙批得体无完肤。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律师才又重新恢复活动。颇有意思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一些主犯委托律师为其辩护，成了中国律师制度再度兴起的一条重要新闻。

1980年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人之一的彭真，大胆地提出了在两案审理中发挥律师作用的意见。对此，邓小平也持相同看法。

10月11日，司法部为了维护“两案”被告合法权益，正式推荐

了一批全国知名律师出庭担任辩护人。

10月12日,特别法庭成立了律师小组。每个被告准备两名律师。

当江青获知有权委托律师辩护时,先是表示要求请律师,并提出要请史良,后来又说请复旦大学的刘大坚。办案人员告诉她这两位年龄大了行动不便,并为她指派了张思之、朱华荣两位律师。江青认为张思之态度不好,特别法庭又以傅志人律师代替张思之律师做江青的辩护人。但江青在同律师接触时,要求律师代替她在法庭上讲话和回答问题。律师拒绝了她的非法要求,并向她指出:律师的职责是以事实为依据和以法律为准绳,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是不能代替被告人在法庭上回答应该由被告本人回答的问题。最后,江青又改变主意,提出不要辩护律师。她之所以变卦,是因为她认为"律师当不了我的'代言人',还会掏我的东西"。

张春桥也不要律师。他一听说要请辩护律师,几乎就要跳起来,他叫喊道:我不同意,我不接受,我不要。我根本不接受你们的起诉书,要律师干啥?胡闹!

黄永胜、王洪文、邱会作均表示不要律师。

剩下的5名主犯分别向特别法庭提出了律师委托书。特别法庭律师小组的10名律师接受委托,将出庭为被告辩护。被告陈伯达的律师是甘雨霖(律师、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傅志人(北京市律师协会秘书长);吴法宪的辩护律师是马克昌(律师、武汉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周亨元(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李作鹏的辩护律师是张思之(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苏惠渔(律师、华东政法学院讲师);江腾蛟的辩护律师是王舜华(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奎正(北京市律师协会负责人);姚文元的辩护律师是韩学章(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中(上海

市律师协会律师)。

至此,整个"两案"审判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人们期盼已久的"两案"正式开庭审理进入倒计时……

## 9—3　答法拉奇邓小平明辨是非　大讨论四千人统一认识

十个指头弹钢琴,这是钢琴家艺术魅力的表现。

审判"两案"与起草《决议》同时进行,这是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杰出所在。

在审判"两案"的条件日趋成熟之际,起草《决议》的工作也进入了关键阶段。1980年的盛夏,酷暑难当,骄阳似火,燥热的季风回旋在神州大地。

这年7月末的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一道引起轰动效应的指示。在这个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专门有这么一条: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在中国,毛泽东像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塑像的数量之巨,堪称世界奇观。以制作毛主席像章为例,从1965年5月到1968年8月,仅在两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有2万多家工厂企业就总共生产各种毛泽东像章、语录章达80亿枚以上,耗用铝、铝合金以及有机塑料6000吨以上。而全世界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30年间总共制造各类纪念章也只有25亿枚。事实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生产的毛泽东像章,肯定远远超过80亿枚。

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制作毛泽东像章、语录章的奇迹,而且也创

造了佩戴像章的奇迹。"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佩戴毛泽东像章。在某地一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表彰大会上,有一位代表的身上竟然佩戴了125枚毛泽东像章!

出版《毛泽东选集》及毛主席语录创下的数量也令世人瞠目。从1966年3月至1976年8月,全国共有1820家印刷厂承担了毛泽东著作的印刷任务。在这10年间,共印刷出版《毛主席语录》65亿册、《毛泽东诗词》4亿册,《毛泽东选集》8.4亿套(1—4卷,共33.6亿册),总数超过100亿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一些大专院校、党政机关和企业印刷厂10年间的印刷量,据统计约有17亿册),还有各种规格的毛泽东像22亿张。

按当时全国8亿人口分摊,人均拥有15册毛泽东著作和3张毛泽东像!

为了印制这些书和像,共使用了40多万吨纸张。而在这10年中,其中就有6年进口纸和纸浆所用的外汇占国家进口商品类别的第二位到第五位之间。

有人作过统计,在毛泽东的书之前,人类印刷量最大的书是《圣经》。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90年代,《圣经》在150年间共印刷了40亿册,年均0.27亿册。而毛泽东的书仅10年间就印刷了100亿册以上,年均10亿多册!

数万尊毛泽东气宇轩昂、高大雄伟的塑像,更是星罗棋布地耸立在城市、乡村、工厂、机关、学校、军营……

为了造就这一切,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要想改变这一切,亦需付出艰辛的努力。

就在文件发出的当天,人民大会堂前开来了两辆吊车,工人们奉命将悬挂在那里的巨幅毛泽东像取下。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反应,不少人纷纷对此发表议论。但是拆除行动照常

进行。

此后，从首都到全国各地采取一致行动，拆除了许许多多的毛主席塑像和语录牌。

几夜之间，朝阳——这座辽宁省西部的一个中等城市，在繁华的街道上，大路的主要通道上，突然不见了那高耸的语录牌，广场上的那尊高大的毛泽东雕像也突然消失了，唯有地上散落的砖头、水泥渣和石块，使人们仿佛记得这里曾有过一座雕像。

北京大学。曾有两座气度不凡的毛泽东雕像，几天功夫，亦不复存在。

不少地方雇用施工队伍，甚至运用部队炸毁那些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塑像和语录牌。精明的农户，用这些材料盖起了小楼。许多家庭也开始把挂了多年的毛主席像和语录对联换成了山水字画、明星彩照……

这个举动引起了国外舆论的关注，台湾报纸称：大陆批毛势在必行。于是"非毛化"的议论又一次升温。

奥琳埃娜·法拉奇女士是一位擅长捕捉时机采访新闻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她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采访过数十位政坛首脑和风云人物，素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而著称，其采访方式和采访报道也别具一格：她习惯于用录音机录下全部谈话，然后一字不漏地发表采访原话，以表明她的新闻采写"客观公正"。

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出不久，法拉奇便出现在北京。善抓重大新闻的法拉奇果然名不虚传，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显然使她极感兴趣。

经过十一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逐步确立，此时他已经是中共的实际负责人。在《决议》即将拿出来交给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之际，有必

要使国内外对中共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有所了解。决不能使形式上拆除毛主席像和语录牌，成为所谓"非毛化"的证据。因此，邓小平决定会见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借她的笔向外界宣传宣传。

8月21日、23日，邓小平同法拉奇进行了两次谈话。内容涉及面很广，重点和核心是关于中国的国内问题。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法拉奇一开口就抓住毛主席像和语录一事提了个很尖锐的问题。

邓小平果断而又很干脆地答道：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邓小平对这次谈话显然早已成竹在胸，所以不待法拉奇再问，他径直谈了中共将怎样对待毛泽东。

他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想把邓小平引入困境，她伸出五个手指，却要邓小平解释"四人帮"。

邓小平很机敏地答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接着，邓小平将话题延伸，回顾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道：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说到这里，邓小平换了一个坐姿，声音更加洪亮：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了解情况的法拉奇当然知道苏联"非斯大林化"的由来和后果。邓小平提到这个问题，也是要人们牢记这一历史教训——1956年2月24日，一个寒气逼人的不眠之夜，苏共二十大举行重要会议。这次重要会议没有邀请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其中也包括朱德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

那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夜。赫鲁晓夫通宵达旦作了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了中共代表团的极大震动。

邓小平当时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亲眼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由于团长朱德还要继续出访，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由邓小平带回北京。毛泽东读了秘密报告后十分震怒，他很尊重斯大林这位苏联党和国家的领袖，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都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斯大林"。

赫鲁晓夫的做法显然已是"离经叛道"。事实也证明,苏共二十大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强烈震动,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严重混乱,西方国家乘机掀起反共浪潮,给国际共运带来巨大困难。毛泽东决定公开反驳,于是便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著名论战文章的发表。中苏两党的分歧从此严重加剧。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指控斯大林为"暴君",说他在一系列大清洗中,处决或逼死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上千名十月革命时的老布尔什维克,屠杀了包括"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数百名红军高级将领,杀害了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数百万人被流放,上千万人遭株连……斯大林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随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斯大林的遗体被迁出列宁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更改了名称。一个曾经被苏联人民引以为荣的显赫人物,顷刻间坠入了十八层地狱。

苏共搞"非斯大林化",还要中共与之保持一致,不要在公开场合悬挂斯大林像。中共拒绝了。毛泽东说: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做法,也为中共日后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提供了参考。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更是把公允、客观和科学放在首位。

邓小平告诉法拉奇,尽管说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但当时做这件事,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因此,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

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法拉奇见邓小平滴水不漏，只好转移了话题，她问道：四个现代化将使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样不可避免地引起私人投资问题。这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此问的真实意图在于，如果出了资本主义，也就说明你事实上在搞"非毛化"。问题同样十分尖锐。

邓小平的回答很巧妙：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外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外国资本和技术，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

邓小平在这里说的"自力更生为主"，不是随便说的，在他主持起草历史决议时，就写上了这一条，并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要点。

机敏过人的法拉奇见几次发问都未能满足她的好奇心，便连珠炮似地提出了一串问题：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到何时？

邓小平沉着应答，始终不乱方寸：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由于胜利，毛泽东不够慎重了，在他的晚年有些不健康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但总的来说，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

无论如何看，在他的伟大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的？

法拉奇进一步问道：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看来，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决心打破沙锅问到底了。

邓小平听到这话，仿佛想起了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那座将军小院里度过的三年光景，那是使他思想认识发生飞跃的一段难忘经历。他很坦然地答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太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又问：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他们不敢动她？

有这个因素。邓小平答道：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这是法拉奇关心的又一个问题。

邓小平说：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样评价，给她打多少分？这是法拉奇的声音。

零分以下。邓小平颇为轻蔑地答道。

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这时谈话虽已接近尾声，邓小平的思维仍是那样明晰和机敏，

胆大且又心细：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内容在国外报刊披露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向外国记者讲解今后党的路线，被认为是"极为例外"的事，是"非常年代的一个非常举动"。国际舆论对这位中国历史大转折关头的掌舵人予以很高的评价。中央警卫局将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向官兵们宣读之后，普遍反映这样讲很好，大家都能接受，符合党心、军心、民心。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观点和思想也大都为《历史决议》所吸收。

9月中旬，聚集在玉泉山的秀才们拿出了决议草案。9月21日，胡乔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就《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发表了讲话。胡乔木专门讲"文化大革命"问题，是因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关心这个问题的评价。华国锋对彻底否定"文革"持反对态度，要求《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也应一分为二。因此，由胡乔木谈谈起草小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必要的。

他说：历史决议草案，经过很多同志的努力，小平同志、耀邦同志提了很多次意见，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我也说不

上是第几次的稿子了，一些主要的骨架，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要作很大的变化，实在说我也变不出来了。经过大家交换意见，现在的写法跟原来的想法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问题，在党内也好，党外也好，争论是很尖锐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这个决议草案中把它定下来了，这不是革命，而是内乱。然后，胡乔木又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过程和原因。他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在这次会上突如其来地来了个"炮打司令部"，所谓司令部，就是政治局。毛主席到杭州，委托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忽然刘少奇同志成了反革命了，成了打倒的对象了。这种状况，在党的生活上不但是极端不正常的，而且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稿子上说，从这次会起，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将来这样写出来，当然对我们党的历史是很不好看，对毛主席也很不好看，可是，我觉得这没有办法，既然要写这个决议，这一笔就不写不行。

在另一方面，在说毛主席跟林彪、江青完全不同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里面的一些功劳。第一，是基本上维持了解放军；第二，基本上维持了国务院；第三，基本上还勉强维持了党的统一。

"文化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发动"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毛主席的冲动。他受了很多的刺激，其中"海瑞罢官"引起来的问题的刺激大概比较大，还有一些别的刺激。林彪讲，毛主席最近就是考虑政变问题，那个话毛主席看过的，可见是真的。所以，毛主席那个时候的思想可以说是不正常的，完全是一种冲动，根本没有、说不上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思维。

胡乔木强调说：我们在起草的时候，一开始就下决心不提个人

的问题，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性格等等。并不是说这些不是问题，而是说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教育群众。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里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这个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性格就解释了吗？

接下来，最大的争论问题，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而且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错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至少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三十年胜利的历史，跟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的。

对毛泽东思想，当时人们的议论很多。有的人主张只讲马克思主义就行了，不要再讲毛泽东思想。还有的人说：现在要赶快出毛泽东全集，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的所有作品都照原样编出来，以便于大家来批判。

有的人认为，把毛泽东的错误说得越多、越重，就越能显出“思想解放”。还有的人甚至把毛泽东与封建君主相提并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

对此，胡乔木指出：我们现在写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毛主席的批判是够严厉的了。以为今天把毛泽东搞得愈臭愈好，这究竟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究竟能够适合于什么人的利益？的确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当然要实事求是，同时也不能不顾全大局。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也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个提法。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一段历史，他是在毛泽东身边亲历的。所幸他因病自1961年8月起休养，没有卷入毛泽东晚年“左”的狂澜，对问题的反思也就更为清醒。

1980年10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党员干

部共4000人，集中20天时间，讨论和修改《历史决议》。

由于当时汪、纪、吴、陈等人已从中央高层隐退，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也进入"倒计时"。因此，对《历史决议》的讨论，可以说是非常活跃。大家畅所欲言，思想解放，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如主张补写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压缩篇幅，去掉可以不说的内容，突出重点等等。

但是，在讨论中也有一些不大正确甚至完全错误的意见。有人认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比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还严重；有人说：毛泽东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说到底，就是毛泽东他老人家品质不好；甚至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错误，统统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还有人主张，决议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干脆不要写，不要提毛泽东思想。

4000人大讨论众说纷纭，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大家敢于直陈己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总结经验，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应该采取的正确立场。但是，在这当中也暴露出一些不恰当的认识和偏颇的看法。

针对4000人大讨论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于10月25日与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他"力排众议"，要求全党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魄力和勇气。

对于当时进行的大讨论，邓小平十分关注。这4000位中共高级干部的意见举足轻重，需要认真听取。

关于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邓小平非常严肃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

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足见他"力排众议"的决心之大。他语长心重地说：

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是谁做的？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做的？

问题很清楚：包括邓小平在内的现任中央领导人也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登上政治舞台的。全盘否定最终会丢掉根本，连自己也会被否定掉。因此，"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邓小平的观点很明确：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份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

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现在有些人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把一大批干部打倒。不过也不能由他

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无论怎么说，毛泽东毕竟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这不仅仅涉及毛泽东本人，而且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要看到全局，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样做，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力排众议"坚持道：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反对"两个凡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就无所谓历史转折，或许还是在原路上徘徊；然而，若是没有邓小平"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转折就很可能转成混乱，那些完全离开革命轨道的东西就会泛滥起来。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中国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邓小平的杰出表现确实让人们感觉到了"掌舵"一词的厚重内涵。

每当航道上出现礁石、险滩和迷雾，总会影响航行的方位和速度，但是，共和国的艨艟巨舰在巨人的率领下又绕过礁石、险滩，拨开历史的迷雾后，加足马力劈风斩浪驶向新世纪的黎明。

## 9—4　结审判举世瞩目　惩主犯人心大快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长安街车水如流。夏盛秋明金风爽，北京的十月令人心旷神怡。

自从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宣布即将公开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以来，公审"两案"便成了社会关注的头号热点。

10月17日晚，新闻媒体向人们透露一条重要消息：特别法庭可望在本月底或下月初正式开庭审判"两案"。这是彭真在会见德意志联邦新闻社社长蒂洛·波勒尔特时宣布的。他还说：这个案件经公安部侦察预审终结，已经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审查起诉。估计再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特别检察厅会向特别法庭提起公诉。

彭真的谈话，立即引起了国内外舆论对"两案"开庭的关注。

但是，直到11月初，特别法庭并未开庭。倒是1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公布了中共中央开除康生、谢富治的党籍的决定，使人们首先从改写康生、谢富治《悼词》的"前哨战"中，开始感觉到了公审林、江一伙的日子正在临近。

《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是由中纪委在经过一年多周密调查取证和认真分析研究后，于1980年9月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的。10月16日，中央批转了中纪委的两个审查报告，并加了批语。批语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以后，一年多来，中央纪委做了大量工作，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谢富治两人，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了严重罪行。现在中央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这两人的《悼词》，并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

中纪委的两个审查报告各附有7个罪证附件，因为很多内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故当时只发给省军级参阅，不再往下传达。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想当初，康生、谢富治归西之日，桂冠重重，悼词切切，何等风光。可谓生前红得发紫，死后备极哀荣。

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事情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康生、谢富治被立案审查，揭开两人的画皮一看，原来两人竟是如此丑陋可憎。

几十年来，康生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在延安时期，他曾就任中央社会调查部长，执掌党内生杀大权，专靠整人起家，养成了不择手段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的秉性。特别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正赶上“史无前例”的岁月，风云际会，又先后当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大奸似忠”的康生着实风光了一把。

谢富治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也是一个“操刀子”的显赫人物。与康生一样，此人也很善于见风使舵，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

康生、谢富治坏事做绝，现在，终于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11月6日，新华社报道：“特别法庭正在审查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起诉书，并宣布预审工作将于近日结束。”

1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大量篇幅报道了特别检察厅对“两案”提起公诉和特别法庭受理此案的重要消息。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列举了林、江反革命集团犯有四大罪状、48条罪行。四大罪状是：

一、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二、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三、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四、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经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的林、江集团主犯有16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第5项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在这之后，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为新闻媒介的“重头戏”，首都各大报纸开始连续披露起诉书的主要内容。中央电视台在审判期间，除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出有关审判的电视新闻外，还增设《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专题报道》专栏，比较详细地报道“两案”审判情况，并通过卫星向国外传送有关审判的电视报道。

中国的这场“超级审判”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几十家国际性的传媒机构临时向北京增派了120多名记者。美国的哥伦比亚公司以4万美元购买了北京审判电视发行权。日本也由一家国有电视台购买了在本国的发行权。据悉，世界上报道中国北京审判的电视台、电台和报纸近千家。

11月20日下午3时，开庭公审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时

刻终于来临,全中国、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北京正义路1号那座威严的法庭。

特别法庭正中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坐在审判席前排中央。他的旁边是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后面是特别法庭的全体审判员。坐在他们左侧的,是出庭主持公诉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后面是特别检察厅的全体检察员。审判席的两边分别是法庭书记员席和辩护人员席。

审判台下,竖立着一排低矮的灰白色铁栏杆,上面挂着一块写着"被告人"三个黑字的木牌。

下午3时整,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过之后,耀眼的强光灯把法庭上下照得通明。3时03分,江华庭长宣告:"传被告人王洪文到庭。"场内的照相机、录相机、摄影机的镜头都不约而同地对准了法庭一侧的门口。

王洪文第一个被押上了被告席。接着被带上来的是姚文元。

几天前,王洪文这个当年的"造反司令"读完起诉书副本后表示:"起诉书列举的罪行都是事实",他不需要律师辩护。比起4年前,王洪文变得清瘦多了,面容也很憔悴,站在被告席上,两眼眨个不停,神色沮丧。姚文元在10天前收到《起诉书》副本后,饭量大减,夜不成眠,血压上升了10～20毫米汞柱。他接受了法庭指派的律师,但他并不信任这些律师,他担心的是:"律师会不会替我说话?"此刻,姚文元一脸哭丧,发呆地望着面前的审判台,全然没有了当年那股文痞的威风。

第三个带上来的是江腾蛟。这位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看了起诉书后悲叹:"我受到法庭的审判,是罪有应得。"

接下来,邱会作、吴法宪和黄永胜先后站到了被告席前。神情

呆滞的邱会作对自己的盖棺定论表示服罪。显得特别苍老的黄永胜慢慢吞吞地走向法警指定的位置，尽管神情木然，但却装出一副坦然和镇静的模样。吴法宪看来受惊不小，丧气垂头地立在被告席上，活象个散架的泥胎。

愁容满面的陈伯达由法警扶着，步履艰难地走上来。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场就发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中央文革小组长"，被人民的狂飚扫进了被告栏。

排行第八的李作鹏微驼着背，脸色阴沉。他在读完起诉书后曾说："把康生列到里边来，非常正确，应该把他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张春桥吊着三角眼，微仰着平顶头，提着肩膀，身穿一件薄薄的中式棉袄，敞着领口，被法警押上了被告席。这个做了10年"改朝换代"黄粱梦的30年代的狄克，在接到起诉书副本时，先装作不看，后来又偷偷地拿起来急速阅读，想知道指控他有什么罪。此人一贯装腔作势，但在威严的法庭上，他的一切花招都难以奏效了。只见他呆若木鸡，满脸不停地冒汗，头东倒西歪，始终没有摆正，"奸臣像"不减当年。

3时15分，江华庭长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在两名身着蓝色制服的女法警的押送下，一心想当"女皇"的江青走进了法庭。今天，她穿着黑色上衣，足蹬黑绒棉鞋，一头黑发梳得溜光，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举手投足还保留着她惯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姿势，依稀可见她当年接见红卫兵时的风貌。过去民间曾有传言，说江青的头发是假发，现在可以证实此系谬说。

江青在众目睽睽之下，还运用了当电影演员时的一点表演技巧，故意抬着头，把脚步放得很慢，一丝冷笑挂在嘴角。但她的内心却很恐惧慌乱。此人好斗、好出风头，据说她曾为报纸在报道"两案"情况时把王洪文排到她前面而大发雷霆。有人说她是个离开了

"斗争、刺激和阴谋"就没法活的女人,实在入木三分。

3时18分,江华宣布宣读起诉书。法庭上下,严肃地静听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和副厅长史进前的宣读。

起诉书确认江青等10名主犯分别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这份起诉书和开庭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实际上成为全面回顾、总结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将成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一个重大步骤。

下午5时20分,江华宣布10名被告将分别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审理后,宣告休庭。今后人们的注意力,将转向具体审理10名被告的第一、第二审判庭,转向10名被告的定罪和量刑。饱尝林、江反革命集团祸乱之苦的亿万国人,关心"过程",更注意"结果"。

"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是当年李密在控诉隋炀帝罪行时所说的一句名言,而今,用以评论林、江反革命集团在十年浩劫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此话恰如其份。

在历时77天的审判中,数百万字的罪证材料,像一部编年史,揭开了林、江一伙篡党夺权的黑幕,记录了两个反革命集团产生和灭亡的过程,激起了人民对10名主犯的强烈义愤。

11月23日下午3时,第二审判庭一开庭首先提审吴法宪。

吴是林彪手下一员最为俯首贴耳的干将。连吴在亲笔供词中也承认:"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这位原空军司令对林氏父子的愚忠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法庭调查开始后，宁焕星审判员讯问被告："吴法宪，'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简称两个一切）'，这个话是不是你讲的？"

吴法宪明确承认"两个一切"是他提出的。1967年3月，林彪把他的宝贝儿子林立果安插到空军。当时还不是党员的林立果立即被任命为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过了几个月，吴法宪和周宇驰就充任介绍人将林立果拉入党内。

正是由于有吴法宪这样一些对林家父子忠心耿耿的干将，才使林彪篡党夺权、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活动得以密锣紧鼓地展开。有了"两个一切"，杀气腾腾的林立果便很快地拼凑起"联合舰队"；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周宇驰才得以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空军内部设立14个反革命秘密活动据点；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伙同周宇驰就制定出《"571"工程纪要》，准备"实行暴力突变"，以"夺取全国政权"；有了"两个一切"，林彪才能密令林立果动用空军。图谋杀害毛泽东；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指使林立果私调三叉戟飞机仓皇逃窜。

对于上述犯罪事实，吴法宪供认不讳。

11月24日下午3时，第一审判庭首次开庭，审判的主犯是王洪文和姚文元。当天的法庭调查，主要围绕起诉书指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犯罪事实进行。

1974年10月，在筹备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感到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于是，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决定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审判庭宣读了在场工作人员张玉凤的证词。证词谈到王洪文当时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

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审判长问王洪文:“你说过这样的话没有?”

王洪文承认他谈过这样的意思,而且说,这“是江青的话,由我去说的”。他还说:“跟四届人大提名有关的话,是张春桥说的。”

审判长问王洪文:你去长沙为什么要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

王答:“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所以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

审判长:你去长沙告邓小平的目的是什么?

王答:“要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职务。”并且承认他向毛泽东说过,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味道”。此话原是姚文元讲的,意思是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

王洪文被带走后,姚文元被押上被告席。他手里拿着一叠准备辩护用的材料。在整个审讯中,他手忙脚乱,有时翻阅着材料,吞吞吐吐地回答讯问,有时仰着头,翻着白眼,停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出几句话。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刀笔吏,如今已是丧魂失魄。

想当初,这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执掌宣传大权,全国的宣传、舆论工具全都听命于他。“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舆论一律”达于鼎盛。姚文痞正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诬陷忠良,篡党窃国。

“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就是由他一手制造的一连串文字狱而揭开帷幕的。一篇文章从政治上宣判一个人的死刑,乃是摇笔杆的姚文元所特有的“政治才能”。屈死在他笔下的,有党政领导干部,也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所犯下的罪行,将一一清算。

在法庭上表现最为恶劣的是江青和张春桥。

11月26日上午和27日上午,江青、张春桥相继出庭受审。面

对起诉书所列举的条条罪行，这两个穷凶极恶的主犯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是百般抵赖，摆出一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骄横架式；一个是歪斜脑袋，半闭眼睛，一声不吭，全然是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角色。但无论江青和张春桥作何表演，都不能掩盖内心的晦暗与空虚，更无法抗拒人民正义的审判。

江青在法庭上装疯撒泼，态度极其恶劣，在羁押期间也是桀骜不驯，动辄骂人。从1979年11月至1980年5月，她写下一份长达34页的"交待材料"，题为《我的抗议与更正》，详尽描述了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光辉斗争历程"。

1980年12月24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法庭辩论。江青在为自己辩护时宣读了这份"交待材料"，并将题目改为《我的一点意见》。

在公诉人江文指控江青犯罪事实之后，审判长曾汉周对江青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冷笑道："那就请你们按你们的那个根据去定罪吧，我听候你们的审判。有本事你们把我弄到天安门广场公审，枪毙！"

曾汉周很沉稳："是不是枪毙你，法庭将根据你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判决。"江青又是一声冷笑："你不要装腔作势演戏了。没有我这个道具，你这场戏就演不成呵！你要有胆量就把你的后台导演请出来，我要和他当面对质。"

曾汉周有些火了："我警告你！不许你漫骂法庭……"

"我无法无天，我不怕你呀！刘少奇、林彪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江青又开始撒泼。

曾汉周压了一压火说："法庭调查了大量事实，给了你充分的辩护时间，你反而利用法庭进行反革命宣传……"

"你才是反革命嘛！……"江青打断了曾汉周的话。

"你侮辱法庭，这就构成了新的犯罪！"

江青大声叫道："大不了杀头。我是孙悟空，我能变几个脑袋，你多砍几个，我多长几个……"

曾汉周一边按铃警告，一边说道："你再扰乱法庭，就取消你的辩护权利。""对不起，我可以方便一下吗？"江青见状又变了一副嘴脸。

曾汉周宣布："带被告人出庭方便。"

这时，江青站起身来说道："算了，我不去了，我要念一念《我的一点看法》，你不反对吧？"

"你可以念。"

接着，江青把她的"杰作"掏了出来，一板一眼地念道：

《我的一点意见》——一张起诉报告，满纸胡说八道；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

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什么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在工作中有错误，有偏差，但绝不是犯罪。

……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

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第五条对于我是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

然后，江青口中念念有词地说道：

清君之侧，目的在“君”。

罗织陷害，血口喷人。

利用专政，搞法西斯。

精神虐待，一言难尽。

破坏政策，凶悍残暴。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这就是《我的回答》……

此刻的江青，似乎完全忘记了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累累罪行。

十年浩劫，冤狱遍地。仅从起诉书上列出的数字统计，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群众就有7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3.4万多人，而不同程度受到株连的竟多达1亿！造成这种人间惨剧的罪魁元凶之一就是江青。说江青是古今罕见的迫害狂，一点不假。

江青一伙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应该千刀割、万刀割”，诬陷王光美“是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九大之后，林彪将王光美判了死刑，要“立即执行”。毛泽东在判决书上批示：刀下留人。王光美这才幸免于难。

他们诬陷戎马一生、劳苦功高的朱德是"反毛"的"大野心家"；冒天下之大不韪，诬陷周恩来是"现代大儒"，"迫不及待地要代替主席"；对敢于同她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的邓小平更是恨之入骨，诬陷为"反革命两面派"、"法西斯"、"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陶铸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凡是妨碍他们篡党夺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统统都在诬陷迫害之列，并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江青一伙对杀人害命不以为罪，反以为乐。在一次听专案人员汇报时，江青听说一个名叫辛毅的受害者被逼自杀，竟然戏言："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召见河南省群众组织的代表时，公然煽动群众"拿起武器"自相残杀。她的话一传达，郑州等地立即成立了武斗指挥机构，拉起了庞大的武斗队伍，配置了武器。4天之后，郑州烟厂和开封化肥厂连续发生两场武斗，结果是37人当场毙命，290人伤残。300人当了"俘虏"，其中两名"俘虏"被枪杀和活埋。事后，有人向江青汇报了"战况"，江青听罢眉开眼笑，连声称赞武斗指挥者的才能，说他是"杨子荣"式的英雄，他的事迹"可以写一本戏"。从这开始，爆发了一场把千百万人推入血海的"全面内战"。

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公安六条》，把凡是反对"中央文革"的都定为"反动行为"。据特别检察厅的调查证实，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损害而被定为"恶毒攻击"加以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10万多人。在"四人帮"惨淡经营的上海，仅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制造的冤案错案就有24.9万多起，受株连的无辜群众在100万人以上。在上海曾经发生了一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奇闻——林昭是一位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只因不愿意向现代迷信屈服，便被投入监牢。后又被戴上"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

她年轻的生命。人们对这位刚烈的女子的就义详情无从查考，只知道这样一段情节：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5分钱的子弹费。人们竟然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的确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创举。

江青一伙要是看谁不顺眼，谁就可能倒霉遭殃。1971年12月29日，江青到北京体育馆观看游泳跳水表演后，在几分钟的"即兴"讲演中，就"即兴"宣布了两个"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一个是有名有姓的"反革命"，罪状是"这个人很坏、最坏"；另一个"反革命"她连名字还不知道，但已判定了他的罪行。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还有一个高个子，每次去都看到他好像要打我的样子，眼睛里充满对我们的仇恨，这个人关起来没有？不关起来也要弄下去劳动改造……"就这样，那个"高个子"便莫名其妙地遭了殃。

林、江一伙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大肆毁灭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可又恬不知耻地把这场浩劫称之为20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那么大革文化命的"文艺复兴"究竟创造了什么？还是让我们看看起诉书所提供的事实：

>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界，仅文化部及其所属单位受诬陷、迫害的就有2600多人。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应卫云、郑君里、孙维世等被迫害致死。
>
> 教育界，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14.2万多人。著名教授熊庆来、葛伯赞、何思敬、王守融、顾毓珍、李广田、饶毓泰、刘盼遂、马特等人被迫害致死。
>
> 科学技术界，仅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研究院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就有

5.3万多人。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冶金学家叶渚沛、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昆虫学家刘崇乐、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冶金陶瓷学家周仁等被迫害致死。

卫生界,仅卫生部直属14个高等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著名病理学家胡正祥、药理学家张昌绍、胸外科专家计苏华、针灸专家陆瘦燕、中医叶熙春、李重人等被迫害致死。

体育界,大批干部和教练员、运动员遭受诬陷、迫害。优秀教练员傅其芳、容国团、姜永宁等被迫害致死。

十年内乱,让人知道了什么叫做"颠倒的世界"。

江青、张春桥之流亦知罪孽深重,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抱定了鱼死网破、孤注一掷的打算。1968至1969年,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的小会上曾几次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1976年4月,张春桥对其女儿张维维说:"主席百年之后,也好办,那就跟他们斗吧,斗得过就斗,斗不过就千刀万剐。"他甚至对张维维说:"要告诉你的对象,同我张家结亲,是要准备杀头的。"1976年9月,张春桥秘密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时告诉过徐景贤:"我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总是要连累你们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杀头了。"

张春桥心里清楚,他干这些天怨人怒的勾当,迟早要被清算。故尔横下一条心,准备杀头。他在法庭上负隅顽抗的表演,也说明了这一点。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林、江一伙作恶多端,逃脱不了法律的严厉惩罚。"践踏法制是要受到人民惩罚的!"刘少奇含恨留下的这句话终于得到了印证。当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推上审判台后,法庭内外、上下各方对这帮罪犯的量刑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方案,比

较一致的是，对江青、张春桥应当处以极刑；黄、吴、李、邱在历史上做了一点贡献，认罪态度较好，量刑可以稍轻。

在开庭审理期间，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向法庭转告了他们的意见。

有人提出："黄永胜、吴法宪应判17年有期徒刑，邱会作、李作鹏应判15年有期徒刑。判轻了说服不了人，不利于教育人民。太轻了群众不理解。江腾蛟谋害毛泽东主席，这条罪行严重。但未遂，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

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说法更多。基本意见是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或死缓。

当年曾被陷害打倒，后来复出担任总后勤部副政委的李耀文将军主张："江青和张春桥起码应判死刑，王洪文可判15年，姚文元可判无期徒刑。黄、吴、李、邱、江应判13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特别审判庭在开庭审理期间曾组织全国6万多名代表旁听，他们也都发表了各自的量刑意见。

更多的人直接投书法庭、审判长、审判员。

陈毅之子陈昊苏在来信中说：为了替受害者昭雪沉冤、伸张正义；为了防止重新出现江青一类的元凶巨恶使人们再蒙受苦难，有必要判处江青这样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主犯以最重的刑罚。

广东紫金县一位教师的来信中说：

"这些人罪恶滔天，不杀不能平民愤、伸张正义。如果谋杀前国家主席及前总理的罪犯都不处死，那么我国就应该宣布免除死刑。"

吉林四平一位工人致信：

"中国刑法规定，反革命犯、刑事犯的最高刑罚是死刑。林、江

反革命集团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反革命杀人犯，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我们的老同志、老前辈都死在他们的刀枪棍棒之下，如果对这些切齿痛恨的反革命还不判死刑，那就将开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下面学着重刑轻罚。刑不上大夫，何谈法律尊严？刑法将是一纸空文……”

如何量刑，不仅国内关注，海外也对此纷纷发表意见。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友人、法律专家致信致电中国，表明他们的意见。

香港《明报》等报刊，发表署名文章，主张以诬告罪论处部分被告死刑。因为这些人害死无辜人士实在太多，至今仍无悔改表现，不杀不平民愤，也不足以儆效尤！

法庭之外，喊杀之声随处可闻，民愤之强烈实属空前。然而，舆论并不代表法律，激愤也不是量刑的尺度。走向民主和法制的中国，更需要的是理智和冷静。

在审判拉开帷幕之后，电台、电视的收听、收视率急剧升高。每天傍晚六七点钟，街道、商店都出奇地冷静。人们聚集在电视机前，观看审“女皇”的精彩镜头，刚刚接触到“电视文化”的中国人由此看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天地。

1980年12月22日和29日，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与第一审判庭先后结束法庭调查和辩论。接下来就是根据法庭调查已查明的事实和论据进行定罪。经过法官们对两庭44场调查进行的认真审查和认定：

起诉书上指控的罪行减少了16条；

调查中新发现的罪行增加了7条。

法庭认定10名被告的罪行如下：

黄、吴、李、邱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江腾蛟则是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策划武装叛乱

罪，反革命杀人罪（未遂）。

江青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

张春桥除犯有江青同样罪行之外，还有一条策划武装叛乱罪。王洪文则在江、张罪行之上再加一条反革命伤人罪。

姚文元和陈伯达均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但在反革命集团罪的罪名上有区别，姚文元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陈伯达是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

罪行认定后，下一步就是依法量刑。

当时，全国虽然一片喊杀声，但特别法庭的法官们却保持着镇静。

对于如何审判"两案"，彭真强调必须依法量刑。他在对特别法庭旁听人员的讲话中指出：

"很多同志关心对10名主犯判什么刑？这个问题只能等待审判结果。审判没有终结，谁也无法作出最后断定。"

"法庭不是务虚会，不是发表空论的讲坛。"

"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是举世瞩目的大案件。审理结果，人们会看到我们是依法办事的，判处是公平合理的。但这样重大、复杂的案件，一点问题都不出，一点意见都没有，是难以设想的。会有各种议论，那有什么奇怪？各有各的立场、观点，各国有各国的法律、习惯，也各有各的言论自由。不同意见，听听有什么坏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就是了。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坚信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希望特别法庭和特别检察厅尽最大的努力，严格依法把事情办得好些，逐步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律。"

审判"两案"关系重大，若不依法办案，不惟前功尽弃，而且也

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为此，法官们一直在认真学习适用的法律。著名法学家张友渔、人大法制委员会领导王汉斌、杨秀峰纷纷发表文章和回答记者提问，对《刑法》适用规则进行解释，使人们清楚地了解这场十分重要的刑事审判。

《人民日报》1980年12月22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文章全面地论述了审判"两案"的伟大意义，回答了人们思想上存在的种种疑虑。在论及定罪量刑问题时，文章指出：

>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严格区分了反革命犯罪和错误的原则界限，只判处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而不涉及错误，这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
>
>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恶之大，危害之烈，迫害的人之多，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他们罄发难数的罪行，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无法估计的。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对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是从什么永恒的正义、不变的道德和义愤出发，而是严格根据体现着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原则，通过法定的司法程序，对他们依法治罪。这次审判就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办事，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子孙后代的检验。

这篇评论员文章使人们多少了解了来自决策层的意见。尽管如此，杀声并未平息。

就在特别法庭依法量刑，对10名主犯提出初步意见之际，上海方面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上海给中央呈送了一个报告，请示杀掉马天水。马天水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一个成员，曾经是上海市的负责人。

上海的意见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若马天水都可以杀掉，那么江青、张春桥的脑袋也就没法保住。更有人主张，将黄永胜、江腾蛟也杀掉……

根据我国《刑法》中对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罪行的量刑，不是不能判处死刑。但有几个因素要考虑：一是要考虑他们的犯罪背景，他们是在"文革"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罪；二是要考虑对我国安定团结的影响；三是要考虑主犯们的一贯表现和犯罪后的认罪态度，从重、从轻的情况。

担任特别审判庭庭长的江华认为：建国以来，我们判处重大的反革命犯，历来贯彻少杀的方针。这是延安时期形成的。事实证明这样做也是稳妥的。同时，林、江反革命集团不只是10名主犯的问题，各地的"两案"成员都还未处理，这样做，有利于团结教育他们的子女，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分化、瓦解敌对势力。此外，从国际影响和后人评说的角度考虑，都以不杀为宜。"乱世用重典，兴邦施轻刑"。我国当前形势大好，对这些主犯完全可以不杀，这也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江华的主张事实上也代表了中央决策圈的意见，不久，由上海拟议杀掉马天水而引起的"冲击波"便有所平息。

但是，当真正开始全庭合议时，合议庭里又有人主张杀。一位法官的妻子在家中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声称如果被告不判死刑，那将是法官死期来临。

看起来，"两案"主犯的量刑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必须提请中央作出最后决断。

本来，这次对"两案"主犯审判是很注意以司法独立为原则的。自从特别法庭开庭后，细心的人都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声音似乎在审判中悄悄消失了，在许多领导人的讲话内容中，也很少涉及审判。

之所以如此，除了司法独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当时中央正集中精力解决华国锋的问题。

在华国锋的问题解决之后，中央便可以腾出手来解决“两案”审判所遇到的困难了。

其实，邓小平一直特别关心“两案”审判，因为这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一个重大举措。因此，每次庭审的录相他都要亲自过目。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他又得到办公室的报告，特别审判庭在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量刑问题上遇到困难，已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对法庭内外的种种议论了若指掌，在他手头就有一封不久前民革副主席屈武写来的信：

小平同志并转中央：

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1、不能为死者申冤；2、不能平民愤；3、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4、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以上几点都不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按刑律，罪不至死，当然可以不判死刑；如依法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将铸成大错。

外国人将在这次审判中考验我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的特别法庭，是否真正能独立行使职权，还是他们一贯认为的“橡皮图章”。华主席向外宾吐露不判死刑，外国人已有看法。我想这问题中央一定考虑过，我建议中央重新考虑。如果依法判处死刑，除大快人心外，丝毫不影响华主席的威信，恰恰相反，证明我们国家现在真正不是“一言堂”了，而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了。反之，如果按刑律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我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威信将从此下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价值，在外国人眼里也不值几文了。事关重大，故敢直言。意见当否，在所不计，中央自可权衡轻重。一得之愚，仅供

参考。顺致敬礼

屈　式

屈武直陈己见，可谓肝胆相照。他代表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两案"审理的关注和支持。应当说，这是值得肯定的现象。对于10名主犯，人们要求重判，乃情理之事；但是量刑意见之多，涉及面之广，已使法律原则受到了社会因素的强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意愿的中国共产党来统一思想、参与法庭决策，是合乎历史与逻辑的正确选择。这对于刚刚走上法制轨道的中国来说，也是一段必经之路。

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认真的讨论，多数人提出对江青、张春桥判"死缓"。这一量刑，很快得到特别审判庭的支持。

1981年1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复之就我国法律有关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罪行量刑规定向新华社记者作了介绍。

刘复之着重就特别法庭指控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所犯有的阴谋颠覆政府罪、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法律条款量刑原则作了解答。他强调说："犯有以上三种罪行之一的，如果'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依照刑法第103条，可以判处死刑。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依照刑法第43条，'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记者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每一个被告都不只犯一条罪行，而同时犯有几条罪行。怎么决定刑罚呢？

刘复之答：刑法规定，一个人犯有数罪，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例如，一个人犯三条罪，应分别判十年、五年、二年；那

么,便在十年以上十七年以下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数罪并罚的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如果所犯几条罪中最严重的罪应判无期徒刑,则只能判无期徒刑,不能因为还犯有其他罪而上升为死刑。刘复之的答记者问,实际上透露了中共中央关于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量刑的意见,对部分被告从轻发落看来已成定局。

同一天,特别法庭召开第四次全体审判员会议,35 名法官除出国的人外都到会,讨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判决问题。

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合议庭确认:

林、江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危害国家和社会,触犯刑律,构成犯罪。

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但是,在讨论对有的被告罪行是否适用《刑法》第 101 条,即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的问题时,还是出现了一场辩论。

主张杀者依然大有人在,特别是一些民主党派的代表。

杀不杀?杀几个?

判死刑是立即执行,还是缓期执行?

这么大的案子,没一个杀头的,怎样向全国人民交待?

对此,主持合议庭评议的江华不得不重申,大家要把目光放远,把问题考虑周全。第一,若杀,国际影响考虑不考虑?

世界一些国家对主犯们尤其对江青的量刑非常关注。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华时就曾对赵紫阳说:"许多国际组织呼吁要援救江青,国际上曾有惯例,即对妇女一般不采取死刑。我们希望贵国政府在审判活动中考虑到这一点。"

在我驻外大使馆门前,已经有人示威。

第二,我们考不考虑后代人对我们怎么评说?

这些话发人深省,给沸腾的会议带来了冷静。

为此，合议庭评议延至次日，经过整整一天的讨论，最终形成统一的量刑意见。

1981年1月22日，人民大会堂，天津厅。特别法庭第五次全体审判员会——合议庭评议在这里举行。经过讨论，在有人持保留意见的情况下，最后以绝对多数形成了对10名主犯的判决：

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自判决之日算起，判决前的羁押时间，以羁押一日折刑期一日。

本案为终审判决。

这个判决，充分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最低刑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最高刑持平，亦反映了中央当初关于"两案"主犯量刑的原则。

1月23日下午4点，特别法庭的判决书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法官们在神圣而又肃穆的气氛中排队依次签了名，他们是：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

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

审判员:王文正、王志道、王战平、甘英、史笑谈、宁焕星、司徒擎、曲育才、朱理之、任成宏、任凌云、刘丽英、刘继光、许宗祺、严信民、苏子蘅、巫宝三、李明贵、李毅、吴茂荪、沈建、张世荣、张敏、范之、费孝通、骆同启、高朝勋、高斌、黄凉尘、曹理周、翟学玺

费孝通因出国,他表示服从法庭合议庭中大多数人的意见,请人代签。

判决书一式三份。签名完毕,用特别卷宗封存。

至此,一场举世瞩目的审判接近尾声。

一位女法官在结束这庄严的一幕后,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走出人民大会堂,法官们如释重负。上午还是小雪飘舞、天气阴冷,此刻却是天气放晴,远方的天际一片光亮。

## 9—5　华国锋称病不出戶　邓小平睿智定乾坤

书房,宽敞、明亮、幽静、温馨。

邓小平端坐在大写字台前的藤椅上,手里夹着支烟,两眼凝视着窗外那棵在寒风中摇曳不止的树梢,陷入了一阵沉思……

近日,邓小平了解到,对于华国锋职务的变动,无论是地方还是军队干部中,都有少数人感到不理解,甚至要求中央"收回让华国锋辞职的成命"。军队干部中也有这种态度,这引起了小平的高度重视,他立即约见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了解有关情况。

邓小平在听取了汇报之后说道:我们是要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即不反对党的基本政治立场,

不搞阴谋诡计，不在群众中进行派性分裂活动，不在群众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说白了，就是还有一个能不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问题。根据他们的态度和表现，我看有的人不适宜在部队工作，该离休的离休，该调走的调走，决不能让他们继续留在要害部门。

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这的确不是一个小问题，总政主任韦国清说道。邓小平说：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对这种苗头，决不可以小看。如果不及时地、有区别地给以坚决处理，听任这些问题蔓延汇合起来，就会对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很大的危害。邓小平说到这里稍事停顿，用坚毅的目光看了看在座的韦国清、徐向前、耿飚等军委负责人，然后继续说道：我在去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绝大多数党员、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苦难，都是记忆犹新的。我们怎么能够容忍那些一直紧跟林彪、"四人帮"的"造反派"以及继承他们那一套的坏头头，再来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呢？不用说全国，就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也不能允许他们得逞。可是在个别单位、个别地方，他们已经在猖狂地捣乱了，那里的群众，已经对这种状况非常愤怒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不坚决地起来保卫人民的利益吗？

对这些人就是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否则就谈不上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耿飚点头说了一句。

邓小平接着又说：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有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的比较多。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

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

还要注意,无论是"四人帮"的残余势力,还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都共同抬出华国锋来,打着他的旗号来干坏事。这虽然与华国锋本人没有直接联系,但他的旗号被坏人利用,这就不是以华国锋同志的意志为转移的事了。邓小平说罢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华国锋同志的态度是怎样?徐向前问道。

据说是病了。元旦茶话会耀邦上门去请也没请出来,他现在是闭门谢客,足不出户呵。邓小平淡淡地一笑:我看,抽时间大家还是去看看他。人家劝我们,我们也劝劝他嘛。有些同志是不了解情况,一旦了解情况,我看没有多少人会真正支持他。

农历辛酉年春节就要到了,为了振奋精神,让老百姓欢天喜地地过好年,有些棘手的事是得抓紧时间办。经过再三考虑,邓小平决定还是登门看望华国锋。

自从元旦告病以来,不断有人上门探望华国锋。也许是久日卧床的原因,加上心境不佳,愁容病态让人见了都觉得像是那么回事。

邓小平一进门便关切地问:怎么样?国锋同志。

唉呀,我这点小病不算甚事,还值得惊动你的大驾,实在过意不去呀!

哪里哪里,你是党中央的一把手,举世瞩目,我早就该来了。

一阵客套和寒暄之后,两人的谈话进入正题。

老道的邓小平看出华国锋是心病重于身病,不妨就事论事:你也该出来活动活动了,老躺着也不是个办法。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都有不少说法,制造了许多谣言。露露面,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嘛!

大概有人也认为我是装病,其实我的确是病了。一天到晚头都是昏沉沉的,医生嘱咐安心静养,我看还是静养一段时间再说吧。

是不是对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有什么看法?有看法可以提嘛!邓小平干脆把话挑明了。

华国锋一看邓小平主动提起这事,多日憋在心里的想法直往嗓子眼钻。他说:既然提到这个问题,我确实有些想法。有些话我也不想拿到会议上去了。在你面前我说几句心里话,即使错了,也就是我们几个人嘛,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你说吧!

华国锋说:我认为在决定中国命运的28天里,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的那段时间里,我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当时是我和东兴同志作了周密研究和部署。想一想,我在粉碎"四人帮"时冒了多大的风险,如果没有这个行动,能有今天的局面吗?

邓小平一边仔细听华国锋的诉说,一边不住地点头:我不否认你的丰功伟绩。我没有夸奖人的习惯,但是,你的功劳很出色,我没有理由不夸奖你。政治局多数同志主张你辞职,不仅仅是你犯了"左"的错误,主要还是能力问题……

邓小平说:我也给你说句心里话,来日方长,无限光明的前途还在后头嘛。

邓小平一板一眼地说道:逆境是个很好的教员。我们这些人,往往都是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我的最大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些。相比之下,你比我要幸运得多。你过去基本上没受什么挫折,现在受到一点挫折算不了什么,我希望你应该经受住考验。

邓小平的一番话语重心长,充满了人生哲理,也算得上是几十年风雨征程的经验总结。华国锋听着听着,火气渐渐消退。

见华国锋沉默不语,邓小平又说道:这次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是主张充分肯定你在粉碎"四人帮"斗争

中的功劳的。但也要实事求是地写错误，这些错误不是外界散布的流言蜚语，而是你主张“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的讨论，等等。

华国锋点了点头，还是没有吭气，但他心里明白，邓小平的这番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总之，我希望你能以实际行动开好十一届六中全会。这个会，早开比晚开好。越早越主动，越能赢得人心，说明你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邓小平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便准备起身告辞。

让我考虑考虑。华国锋想了想说道。

那好吧，我们等着你的回答。从而结束了这次不同寻常的探望使命。

邓小平与华国锋的这次谈话是有成效的，机智且又富有人情味，时机也选择得很好，点划恰到好处，让华国锋有所触动，但又不致使人感到难堪。

在打道回府的路上，邓小平不时地透过车窗观望急速掠过的景物，那浓浓的节日气氛令他感到惬意。下一步，就看华国锋的表现了。

1月25日上午，特别法庭宣布对10名主犯的终审判决。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几乎都聚焦北京。当江青等10名主犯被押上被告席时，这些昔日祸国殃民的案犯，今天的神态都显得格外紧张。

当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以为马上就要走上刑场，就垂死挣扎着狂喊反动口号。“缓期二年执行”，这一句她算是听清楚了，口号声随之降低了许多。两名法警按住江青，强行给她戴上了手铐，这时她又要挣扎，胡言乱语地大声抗议。审判长立即下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

早已等候在江青身旁的两名女法警将她的肩膀一架，一阵风

似地将她押了下去。大厅里立刻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其余各犯，脸色苍白，蔫不唧地站在被告席上。张春桥还是那副又臭又硬的奸臣像，姚文元和吴法宪尤如一对泥胎，王洪文、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目光呆滞，他们都在仔细地听着法庭对自己的判决结果。

判决书宣读后，江华传令将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

10点50分，江华宣布特别法庭闭庭，参加旁听的1200多名代表热烈鼓掌，表示衷心拥护特别法庭的正义判决。

宣判实况通过卫星和电视向全国和世界作了转播。至此，历时77天，轰动全球的"超级审判"宣告结束。

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义的判决》的社论。社论指出：从特别法庭开庭的第一天起，举国上下就十分关注法庭的审理活动。九亿多人民的心，同特别法庭息息相通。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处处听得到对林彪、江青一伙义愤填膺的指控的声音。广大群众要求庄严的特别法庭执行人民的意志，彻底清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希望特别法庭按照人民的法律，公正判处这一伙元凶巨恶以应得之罪。现在，判决宣布了，人民的愿望实现了。这是人民的判决，历史的判决，正义的判决！这10名主犯，连同已经死去的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6名主犯，将作为人民公敌、窃国大盗、民族罪人，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遗臭万年。

社论强调，林彪、江青一伙的问题既不是什么政见不同，也不是什么党内路线之争，而是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反革命刑事罪。通过审判，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林、江一伙的反革命嘴脸和本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尤为重要的是，"彻底弄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解决了敌我性质的问

题，再来总结党内的是非功过、经验教训就比较容易，也能更加实事求是了。”这显然是指正在作的《历史决议》和不久前对华国锋职务变动的通报。

不久，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案犯也相继受到处理。

经过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的起诉和审判，原空军某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原空军情报部长贺德全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原空军作战部长鲁珉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原广州军区空司管理处长陈伯羽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原空军情报部副处长王永奎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原空军军务部副处长郑兴和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陈伦和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原空军雷达兵部副处长许秀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朱铁铮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原空司管理局副处长兼汽车队长王琢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原南京军区空军气象处副处长陈玺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原武汉军区某师政委关广烈被判有期徒刑10年；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因患精神病，保外候审……

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处理通过另一个系统，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据统计，当时等待结论处理的达上千人。其中，省军职以上干部上百人，如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原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原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原空军某军政委王维国、原空军某军政委陈励耘、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等等。如此众多的显要人物被处理，堪称拨乱反正的一大奇观。

毫无疑问，把林、江反革命集团押上历史审判台并进行正义的

审判，这是拨乱反正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以法治国的里程碑，其历史和现实意义都极为深远。

“一唱雄鸡天下白”，又是一度轮回。消息报道说，今年春节期间没有冷空气影响中国。刚刚从审判“两案”的亢奋中出来的中国人，对鸡年倾注了新的期望。

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首都各界举行盛大联欢晚会共贺新春。

李先念、赵紫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1.5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进行联欢。刚刚结束对缅甸、泰国友好访问的赵紫阳，显得格外高兴。

叶剑英、彭真在广州过春节。叶帅今年的心绪也很好，挥笔写下《八一年春节》诗一首：

宏观代谢依新陈　接力华年一代兴
万里长江流可断　神州九亿足资源
作风制度陆续改　传统优良好继承
团结全民齐建国　欢呼大地又回春

令人关注的是，华国锋在沉寂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公开露面。

除夕晚上，华国锋与黄文欢亲切聚会，参加会见的还有邓颖超和姬鹏飞。经过一个多月的静养，华国锋的气色大有恢复。他很随和地翘着腿，一副慈祥的笑脸，加上淳厚的山西话，令黄文欢感到很亲近。随后，华国锋与黄文欢等人又一起共进晚餐。

无论如何，华国锋的露面是一个值得欣喜的信息。同时也使那些喜欢滋事的外国舆论机器陷入了更多的猜疑与困惑。

大年初一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与在京的全国政协常委、部分人大常委、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400余人一起欢度佳

节。邓颖超、乌兰夫、彭冲等人参加了这个新春茶会。邓小平与各界名流侃侃而谈,相互道贺。他那充沛的精力和硬朗的身体,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76岁高龄的陈云,也笑容满面地走进怀仁堂,参加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座谈会。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又是正月初一,他的心绪很佳。他代表党中央向全国1190多万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拜年,祝贺春节。他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不能说一天比一天好,但可以肯定说一年比一年好。

两天后,《人民日报》公布了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认为现在我国的经济形势确实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

2月12日,邓小平会见了随同弗朗索瓦·密特朗率领的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来访的法国记者。几十名记者团团围住邓小平,在强烈的水银灯光下和摄影机的咔嚓声中,邓小平谈笑风生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一位记者问:据报道,你们正在起草一部《历史决议》,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主席将作何评价?

邓小平答:我们始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席在晚年确有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说,他对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而他的错误,尽管我们要讲清楚,但毕竟是第二位的。

为什么华国锋主席最近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另一个记者单刀直入地问道。

邓小平成竹在胸,看来也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必要,于是脱口说道:他前不久还露了面嘛。他现在还是我们党的主席。现在猜测很多,这样的猜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任何国家、任何党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人事变动,这没有什么奇怪。

请问邓小平先生，你怎样看待西方对判处江青的反应？又一位记者提问。

邓小平哈哈一笑：各种反应都有，有人认为判轻了，有人认为判重了，但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中国人民认为这样判是恰当的。

邓小平的幽默令幽默的法国人也十分叹服。

立春以后，冰融雪化，春风阵阵吹拂大地，柳条青青，杨树吐绿，中南海里里外外又见一片春意盎然。

按照去年政治局"12·5"通报的说法，变动华国锋职务和胡耀邦、邓小平分别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等人事安排，必须经过十一届六中全会方能作出决定。再就是《历史决议》经过反反复复仔细推敲，提请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时机也已成熟。中央认为，这些重大事项的决定，不宜再行延迟。

胡耀邦见华国锋迟迟不提召开六中全会的事，心里未免有些着急。华国锋不是不清楚眼前的形势，但他似乎对收回成命还存有某种希望。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他也听到了一些省市的反映，其中就有人主张要妥善安排好华国锋的职务。对他在"两年徘徊"期间所犯的错误，有些人也表示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解"。

对华国锋的固执，邓小平显得很有耐心，经验告诉他，操之过急往往会把好事搞糟。近一个时期以来，他的耳朵里也被人灌了不少关于华国锋的议论。

有的人提出，要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或"第二副主席"；还有人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是立了大功的，如果安排不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不好接受；此外，关于华国锋作风廉洁、朴实恭谦、不搞特权的言论也不少。

这些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影响却不可低估，若放任自流，势将干扰中央的决策。华国锋迟迟不主动召开中央全会，大概也是认为

他在一些中央委员中还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邓小平也多次说过: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功的,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他的能力有限,不能胜任现职也是肯定的。

在华国锋处于犹豫观望的情况下,中央仍然对他的思想转变表示了很大的耐心。邓小平让一些人给华国锋捎信,转达他对华国锋的中肯看法。同时,对《历史决议》中有关华国锋功过的评述,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抓紧进行修改和定稿。这样,对华国锋所犯错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统一,使一些原先对华国锋问题认识不清的人转变了观念。进入4月份,形势急转直下,有关中共高层人事调整已是人心所向的共识。

4月19日,李先念在会见英国自由党领袖戴维·斯蒂尔时透露: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可能在1981年5月或6月召开。这条消息使外电对几个月以来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评论迅速活跃。

李先念向外界透露这条信息不是没有依据和把握的。随着《历史决议》的讨论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华国锋的错误进一步公开,华自己也坐不住了。有趣的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传说也对他不利。例如有的人说:那个著名的"你办事,我放心"其实并不存在,查过原始纪录的医生断言,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不可能写字,因此这个临终遗嘱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种种传闻,飞短流长,是真是假,莫衷一是。如果他一味地拖延,结果肯定不佳。因此他终于同意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

4月30日晚,首都各界人士1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欢晚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19时30分,当华国锋、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赵紫阳等人步入联欢晚会会场时,

竟然响起了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华国锋自从春节会见黄文欢后就再没公开露面，这次他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表明外界传说的那些棘手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这种场面自然也使华国锋好一阵激动，眼眶里湿漉漉的。好久没有找到这种感觉了，突然间重现，着实让人难以克制郁积的情感。

“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共产党领导崭新的国家，处处盛开社会主义的花朵。新长征步伐无比坚定，加快建设现代化的强国。”万人大礼堂里，雄壮的歌声和优美的舞蹈，激起人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晚会结束，兴奋不已的人流涌出人民大会堂。此时，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和正阳门两侧的花坛里，新栽和摆上了3万多盆鲜花，月季、绣球、金盏、三色槿、东洋菊、一串红、红白洋蝴蝶、天冬草以及大型棕树、龙柏球等，争奇斗艳，喷吐芳香。一阵晚风袭来，又卷起一阵歌海花潮……

## 9—6　两把钥匙启大幕<br>拨乱反正开新宇

邓小平没有出席那场精彩纷呈的“五一”联欢晚会，但他完全想象得到华国锋重新露面所产生的反响。

当天上午，他会见了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老友重逢，彼此都很高兴。会见之后，邓小平特意在装饰一新的人民大会堂四川厅设午宴款待贵宾。席间，宾主频频举杯，酒兴甚酣，又是另一番情趣。

邓小平今天的确喝得很痛快。回首1978年那个躁动多事的秋

季，他与陈云形成拨乱反正的共识，决计一方面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将两把不同的钥匙，同时插进了开启共和国拨乱反正的大门。经过三年来艰苦卓绝的探索和百折不回的努力，终于校正了共和国前进的航向。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这部名垂青史的杰作深感自豪。

午宴结束，邓小平与史蒂文斯总统亲切话别。然后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虽然拨乱反正大局已定，但不到最后时刻不可轻言胜利。手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抓紧把《历史决议》写好，真正使它成为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团结全党共同奋斗的强大动力。

此刻，聚集在玉泉山的起草小组成员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根据4000人大讨论的意见，特别是邓小平在讨论期间发表的重要谈话精神，起草小组一直在做细致复杂的文件修改工作。

由邓小平总揽大纲，整个修改过程有条不紊。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许多老干部积极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反复斟酌，集思广益，使决议修改日臻完善。

胡耀邦主张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人的意见。邓小平表示积极赞成。

胡乔木主张“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一些，分析原因要全面。这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

早在当年3月初，决议稿的轮廓便大体确定。这个决议草稿送达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部分老同志处，共50多人进行了修改。3月24日邓小平前去看望陈云，也是想听听这位老资格政治家的意见。当初两人议定两把钥匙启大幕，而今是到收获硕果的时节了。

陈云独具匠心，对修改决议稿提出了两条意见：

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60

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依据。

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邓小平一听，连声叫好。陈云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一辈革命家，寥寥数语，让人茅塞顿开。

两天后，邓小平在同邓力群谈话时，向起草小组转达了陈云的意见。他对陈云的两条意见十分赞赏，并对邓力群说：这些意见，请你报告胡耀邦同志。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同月，陈云还对决议稿提了几点意见：(一)关于建国以来32年中党的工作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二)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三)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四)要写国际上对中国的帮助。

起草决议过程中，在朝野上下引起轰动的一篇文章，是黄克诚1981年4月1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在当时，稍上一些岁数的人都知道黄克诚曾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在那次决定政治命运的会议上，黄克诚蒙受了巨大的冤屈。

本来，黄克诚是没有被安排参加庐山会议的。对于庐山上的"神仙会"和彭德怀在会上的发言情况，事前他一无所知。只因刚直不阿的彭德怀在临近散会的前三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坦诚批评"左"倾错误的信，他才被毛泽东召上了庐山，讨论这封所谓的"意见书"。

黄克诚与彭德怀共事多年,私交很好,又都是湖南人。而且当时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大将,分别担任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可以说配合默契,得心应手。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使他伴随彭德怀坠入了万劫难复的政治深渊。

黄克诚被打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成员之后,他欲哭无泪,只是愤怒的抗议:"把我说成是彭德怀的走狗,砍了我的头也不承认!"但是,无情的斗争和政治高压,最终还是迫使他违心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他才得以平反。

在许许多多遭受"左"倾错误迫害和政治运动打击的人喋喋不休地抨击毛泽东的时候,由黄克诚这样一个十分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站出来说说公道话,无疑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其实,这篇文章只是黄克诚在1980年11月中纪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第一部分。在那次会议中,黄克诚以十分诚恳的语调说道:我们要从10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

他推心置腹地说:

> 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

令人敬佩的是,黄克诚不仅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功勋,而且还主动承认了自己在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因为当时

他也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能把错误都往一个人身上推。

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10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黄克诚还寓意深刻地讲述了毛泽东曾经引用杜甫《戏为六绝句》诗一首的故事。

那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邓小平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送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对此感到十分震惊，决定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予以驳斥。在一次中央开会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时，毛泽东给在场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念了杜甫的这首七言绝句：

王杨卢骆当日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初唐作家，合称初唐“四杰”。然而，当时一些人无休止地讥笑他们为文轻薄，殊不知四杰之文并不因这些无休止的攻击而废置，在他们身亡名灭之后，四杰之作仍将有如江河万古长流，永存世上。

毛泽东当时念这首绝句，便是针对赫鲁晓夫之流的所作所为有感而发。

黄克诚提醒世人：这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使我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

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将军，以他胸怀全局的思想境界和公而忘私的高风亮节影响了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曾经受过错误迫害的人。

于是,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逐渐趋于一致:功绩第一,错误第二。

1981年5月,中央政治局举行为期12天的扩大会议,邀请70多人参加决议的讨论和修改。

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这个文件是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吸收。

他肯定地说:现在这个稿子,在我看来,起码是有一个好的基础。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符合三项基本要求的。

邓小平简明地提出,决议的中心有以下4个问题:(1)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2)建国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3)这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4)毛泽东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

为了早一点把决议拿出去,中央决定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与会的70多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定稿后交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历史决议从开始起草到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起草小组先后正式提交会议讨论决议稿有7次之多,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花了15个月时间,完稿时只不过35000多字。这当中渗透着邓小平的心血和智慧,他先后十六七次提出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意见,精心组织和指导着这项工作。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充分发扬了民主,集思广益,始终贯穿了实事求是的思想,集中

了集体的智慧，代表了全党的意志。

1981年6月22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预备会，再一次讨论历史决议。

邓小平很高兴地告诉与会人员：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份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

他在对决议进行解释时指出：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不提毛泽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

他说道，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份，就是这个意思。

对决议中提华国锋的名字，邓小平也作了解释，他说：曾经有人主张决议不点华国锋的名。但是，历史决议是一个更庄重的文件，点华国锋的名合乎实际，否则就没有理由变动他的职务。从当时的社会动态来说，也有必要。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在六中全会召开预备会讨论历史决议的同时，中共中央于6月22日到25日，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130多人，在中南海座谈，征求了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

在中央党政军机关，有近1000名党员领导干部也对《决议》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举行。全会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胡乔木在全会上就历史决议的修改情况作了说明。他认为，对于党在历史上的错误的自我批评，我们党"早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再作得过多就必然走向反面"。这也是宜粗不宜细。

经过与会人员认真的审议，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光辉的历史文献。它的问世，时值中国共产党60华诞，以这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厚礼，献给党的60岁生日的确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决议》对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评价是这样的：

> 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建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

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6月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宣告结束。全会发表的公报说: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结果是:

一、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公报》一发表,举国上下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华国锋从党内第一号人物变为名列最后的中央常委。6月30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照片时,将华国锋与胡耀邦、李先念放在一起,但胡在照片中占了一大半,华国锋则被摆到最边上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中央经过这次人事变动,为确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

政策的贯彻执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组织保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

《决议》问世，赢得了党内外和国内外人士的普遍好评。

老百姓说："过去毛主席在天上，他是神，我们敬仰他，可就是觉得离他远。如今党中央通过《决议》，把他的功过讲清了，就像把他从天上请到人间，和我们百姓住到一起，我们都感到他老人家也是人，离我们近了，我们对他老人家更亲了。"

《决议》把毛泽东的功过分清了，真正做到了"功不掩过"，"过不废功"。

《决议》通过后，香港《明报》社社长查良镛(亦即武侠小说家金庸)回内地来，邓小平问他：对于六中全会，海外一般的看法怎样？

查良镛回答道：一般觉得，六中全会的决定很好。对人事的变动，大家是十分满意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一般觉得比想象中的为好。因为其中缺点与错误的部分，本来一般预料不会说得这样多而透彻。现在的决议说得相当坦白而公正，实事求是。

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兰契奇认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新的、最有勇气的评价。"

日本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六中全会消息。《每日新闻》的社论说，六中全会重新确认三中全会以来的现代化路线意味着继续执行开放的经济政策。《读卖新闻》的社论则说，六中全会基本上建立起推行现代化的体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合众国际社记者认为：《决议》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终于对过去取得了一致看法，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未来了。

法新社说:《决议》重申了中共恪守传统的思想原则。

希腊《黎明报》评论说:中共《决议》对毛泽东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六中全会《决议》最重要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并且认为:《决议》是一篇有创新见解的论文,它"清除了过去的错误并为今后确定了正确的道路"。

《纽约时报》的一篇专稿在评述《决议》经济建设部分时说,中国共产党"把经济成果作为党的首要工作",逐步"实现现代化",这除了反共分子外受到"所有人的欢迎"。

……

这些反应,从一个侧面否定了中共"非毛化"的无稽之谈。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决议全面总结了建国32年来的成功经验,也深刻反思了1957年以后"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华国锋也结束了"第一把手"的特殊地位,成为一名"普通"的副主席。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安排对他还是有回旋余地的。只是华国锋并没有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再次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他不愿意做认真的自我批评,直到十一届七中全会和中共十二大仍然如此。

有鉴于此,中央认为,华国锋继续留在党中央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常委之中显然是不合适的。

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正式开幕。大会的四项议题是:(一)审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二)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三)审议通过中纪委的工作报告;(四)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此前，华国锋对继续在政治局留任曾报有希望。但结果，根据十二大代表们的一致意见，他只被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决定了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公布这些名单时，再也没见到华国锋的名字。显然，他已不再是党的最高领导核心的成员。

从十二大到十五大，华国锋已连续四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没有具体的党政职务，也没有在政界抛头露面，但他却一直享有中央委员的殊荣。

把历史视为一个定数，个人则是形形色色的变数，如何求得其中的正确解答，永远是一道充满魅力的"试题"。

华国锋虽然离开了最高领导核心，但他作为这段历史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仍然值得人们关注，他的这段政治轨迹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思考。

任何人也不能否认，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立下大功的重要人物，他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较量中，起到了值得肯定的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之初，走出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大祖国抱有十分强烈的愿望，华国锋的政治威望也在这时达到高峰。如果他在其后的拨乱反正中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主动地站在变革时代的前列，事情很可能就是另一种结局。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年轮碾过种种虚幻的设定，记录了一部朴实无华的人物春秋，对于后人，它永远是一笔值得珍视的财富。

1983年1月25日，即在"两案"主犯宣判整整两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发表了一项裁定，宣布对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原判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

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不久，江青便保外就医。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

1982年7月16日，王洪文因患肝癌在狱中病死，终年58岁。

对林彪集团的主犯，也实行保外就医，并允许他们同家人在指定城市安置。

黄永胜保外就医，安置在山东青岛。不久病逝。

吴法宪保外就医，安置在山东济南。

李作鹏保外就医，安置在山西太原。

邱会作保外就医，安置在陕西西安。

江腾蛟保外就医，安置在山西太原。

……

这些当年显赫一时的"大人物"走出监狱，布衣民间，这一切只能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政治稳定、政策正确。历史将会证明，这场世纪性的审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986年9月2日，美国三大广播公司之一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了邓小平。

这位华莱士出生在波士顿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作为节目主持人，在美国家喻户晓。为了这次采访的成功，他曾煞费苦心，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仔细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材料。对于华莱士来说，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无疑是采访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问邓小平：您说过，您要活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以对您说什么？

邓小平略加思索后，毫不含糊地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过去干革命坚持了这个原则，今

天搞建设我们仍然坚持这个原则。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

华莱士问得含蓄，邓小平回答婉转。

接下去，华莱士干脆地把话挑明了说：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邓小平用一句概括明了的话作了回答：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但我还是不清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华莱士希望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挥。

邓小平肯定地说：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我们要摸索前进。

1989 年 2 月，国内"自由化"思想回潮。有人企图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试图酝酿一场动乱。邓小平在 2 月 26 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如果我们现在 10 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邓小平强调：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

治的不稳定。正因为《历史决议》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才使得我们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有了坚实的基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了强大的武器。

1991年8月，也就是《历史决议》问世10年之后，邓小平又一次重申了他对历史转折和历史巨人评说的基本观点。当时国内的政治风波平息已有两年，形势趋于稳定，经济调整比较顺利。国际上正在发生大转折，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出现了"亚洲太平洋世纪"之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抓住机遇上台阶，迎接新世纪的挑战。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思想。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总之，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

苏联、东欧剧变，形势每况愈下。中国岿然不动，"风景这边独好"。这不能不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历史决议》的强大穿透力。

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想，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这是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评价。

历史的大转折，让世人领略了搏击风浪的无限精彩；

历史的大回眸，为后人演绎了一段催人奋进的英雄进行曲。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创立兴中会时率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命题，它寄托了处于落后挨打屈辱境地的中华民族必欲崛起

的强烈梦想。近百年后，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重现生机，当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直追之际，一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又在神州大地叫响。

1981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62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再次提倡“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了五四运动先驱李大钊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

“打破樊笼飞彩凤，脱开铁锁走蛟龙。”中国，在经历了那段极不平凡的大转折之后，终于迎来了她奋飞崛起的金色年华……

# 后　记

岁末年初，辞旧迎新之际，《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一书基本定稿，但还缺个后记，受两位作者之托，由我来执笔。

确切地说，本书是我动意和策划的。记得是1997年的盛夏，在举国欢庆香港回归的日子里，当观看完盛大庆典后已是夜深人静，贤妻爱子已进入梦乡，我却久久难以入眠，想到了许多许多……

在读研究生时，我学的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过八年的经历，使我更能深刻领悟到，香港回归祖国，雪洗百年耻辱的丰富内涵；领悟到这一名垂青史的伟业，只有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中国，只有经历了1978年前后的历史大转折，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冲出了"左"倾迷途，实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辉煌成就后才能取得。

离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近20年了。于是"1978年"这个字眼使我想起：正是在这一年盛夏的一天，作为下乡知青正在农田里干着农活的我；一个生活在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几乎都是文盲，靠"推荐上大学"难有希望的我；一个1966年上小学，1977年高中毕业，在"文革"中荒废了学业、文化课基础很差的我；一个参加了高考正在焦急等待结果的我，突然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于是，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了。此后，经过读大学、研究生，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再往后调到出版社当编辑，这就是我曾走过的

一段人生之路，这就是我的这20年。

正是在这20年中，自己的小家和由父母、姐弟组成的大家庭的日子都越来越好过。特别是在我这个父母都几乎是文盲的家庭里，在三中全会以后崇尚学习、崇尚科学文化知识的大背景下，我们兄弟三人都攻读了研究生，并且有小弟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这些，在"文革"中是不敢想象的。

我不敢设想，假如没有经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大转折，中国没有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国会是个什么样！我又会在哪里。

个人是渺小的。一个人的经历和某个家庭的变化，不足以说明什么。然而，面对着近20年来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变化，面对着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强盛，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总之，面对2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深得民心、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邓小平不愧为世纪伟人！

对于共和国的历史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大转折，实在是太重要、太值得隆重纪念了。今天，无论是富裕起来的工人、农民，还是在政坛上为改革开放建功立业的、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无论是在科学、文化、教育领域大展身手的知识分子，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击风浪、创业有成的企业家，都会由衷地感到：我们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20年的历史已经昭示：华夏儿女每一个人的命运，党和国家的命运，皆系于1978，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新世纪的曙光，皆源于1978，源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大转折。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该忘记，给党和国家，给每一个人命运都带来深刻变化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该忘记那些在大转折

过程中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作出贡献的人们。

“历史是人民写的”。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特别是作为学过历史、研究过中共党史的我，此时产生了一种要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做点实事的强烈冲动。于是我想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这个选题。

1997年8月，我的三位好朋友李艳、熊志勇、张文和应邀在我家中相聚，在我说出了大家合作搞一本书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想法后，赢得了这三位朋友的赞同和支持。最后确定，由李艳执笔完成上卷，张文和给以全方位的支持，熊志勇撰写下卷，由我在资料、图书和审读修改等问题上给予支持。此后，便进入了本书的搜集资料和写作过程。

近年来，我一直是中共中央党校国情国策研究中心聘任的兼职研究员，该中心主任周维煌教授听说了我的计划后，非常赞同和支持，委托我以该中心的名义来策划和组织编写这本书，联系落实本书的出版事宜。在此前后，我已推动出版社将此书列入出版计划。

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大转折的真实历史以生动活泼、可读性强的形式撰写出来，才适合普通大众的阅读、购买要求，同时也是我对作者的写作要求。当时，我们确定本书的写作原则是：严肃的态度、生动活泼的形式，全方位、全景式的介绍1976—1982年这段历史。所谓严肃的态度，就是要以对党和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介绍和评价所涉及到的人和事；所谓生动活泼的形式，就是不把它写成学术著作，而是以大量生动活泼的事例、科学的结构、流畅的文笔、新颖的标题，做到引人入胜，读者爱读。在行文中要有文采，对有些人和事需作些画龙点睛式的评论，说明相关的政治哲理、社会哲理和人生哲理，以此来提高本书的思想品

位，使读者能从中受到启迪，领悟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应该说，真实、可读性强，这是党史作品更能为普通群众所接受的最佳途径。最后定稿的本书，按照最初的设计和要求，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此，每一位读者自然会感觉得到和得出公正的印象。

熊志勇博士不愧是写作的高手快手，不到3个月，就写出了下卷的第一稿约30万字，但我和张文和看后，都感到没有达到我们最初设想的特色要求和出版水平，需要全面改写，部分则要重写。当时，我认真阅读了下卷第一稿的30万字，写出了比较具体的修改意见，重申了本书的风格特点和写作要求，希望他尽快完成修改工作。此时，熊志勇感到很为难，因为尚有教学任务和其他写作任务，时间太紧。当我明确表示没有合适的人担此重任，请其务必帮忙改好时，这位挚友的做法实在令我感动：他为了做好这件有意义的工作，几乎是每天干到深夜，终于在1997年11月下旬重新写出了第二稿的30万字。

1997年11—12月份，李艳的上卷也陆续交稿，我与张文和开始了审读统改工作。这期间，王农媛同志也审读了全部书稿，对全书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对这些意见一一作了修改或处理。随后全部书稿交到中共党史出版社，进入从编辑到社领导的一、二、三审程序。许多重要人物的政坛生涯和人生轨迹，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选题，来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出版社为了对读者负责，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稿。该室科研管理部聘请熟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这段历史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孙大力进行审读。孙大力同志在百忙中审读了全部书稿，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和具体的指导。根据审读意见，我和作者及出版社的编辑们又对全书作了一次修改。本书能够正式出版，与上述多位领导和同志

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衷心感谢曾关心和支持过本书的中共中央党校周继煌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洪模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王杰、鲍永升、沈丹英同志，红旗出版社的徐建一、李凡、高晨野、王农媛同志，国防大学的王年一、吴彤等同志。衷心感谢北京市新华书店系统的任超、张金龙、张志明、赵文良等同志在本书的发行方面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据本书的两位作者介绍，在他(她)们的写作过程中，除我和张文和之外，曾得到了王晓华、董马敏、董长浩、熊永革、熊娟、李希等人在搜集、整理资料、校对、抄写等方面的具体支持和帮助，作者请我在后记中向他(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为本书的总策划和第一个读者，回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联想到历史、现实和未来，我感到又有了许多新领悟，更深刻地体味到，这段历史就是一部现实社会中最值得研读，最值得品味，最有现实意义的“改革开放版”的《资治通鉴》。

本世纪即将走完的钟声已经敲响，新世纪的曙光即将来临。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结构正处于新的转型过程中，现实社会还存在许多矛盾和不尽人意之处，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很多艰难曲折。但我坚信，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闪烁的真理光辉，一定会照亮二十一世纪！新世纪的历史一定是更美好、更壮丽辉煌的篇章。

孙　启　泰

1998 年 2 月于北京

# 再生中国

● 熊志勇

#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下

中共党史出版社